

# 大跃进

DAYUEJIN

南方出版社

# 亲历记

毛泽东秘书  
MAO ZEDONG MISHUSHOUJI  
手记



李锐文集

策划编辑：唐建福

责任编辑：庄 豪

封面设计：郭 炜

## 李 锐 文 集

(卷三)“大跃进”亲历记(上、下)

李 锐 著

南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海口市海南一环路华宇大厦12楼)

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中山新华印刷厂印刷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逸仙路)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0.5印张 16插页 150万字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7-80699-673-6·Z·23

全套定价：106.80元

# “大跃进”亲历记

## (上卷)

李 锐 著

## 目 录

- 前记（一） ..... (1)
- 前记（二） ..... (3)
- 讨论三峡问题 ..... (5)

三峡问题的公开争论是 1956 年开始的，我与主管长江的林一山各写二万言论战，一批水电专家也加入。当年我忧心忡忡，还以“大鱼网主义”为题写出“尖酸刻薄”的讽刺小品。毛泽东只听取了一方之言，就要“高峡出平湖”。我与“对手”同机前往南宁参加“御前会议”，“对证公庭”，但仍“胸有成竹”。

- 驳辨上书，是非分明 ..... (20)

我与林一山“两个冤家”参加接近尾声的南宁会议，田家英和胡乔木都为我捏把汗，告之主席大批“反冒进”，总理当面挨了批评，柯庆施攻击陈云。“两个冤家”展开舌战、笔战，“裁判”毛泽东宣布我获胜，同时给了我一个吃惊的“奖品”——作毛泽东的秘书！这在党内恐怕是“史无前例”之事。

## ● “大跃进”的序幕南宁会议 ..... (36)

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努力反冒进，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却“疾言厉色”予以狠批，并将反冒进与右派进攻联合起来。柯庆施“乘风破浪”，成为毛泽东的“知音”。南宁会议奠定了毛泽东在中央的特殊地位，而党内唯一还可以同毛泽东以平等的态度讨论问题的刘少奇则似乎今非昔比了。

## ●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 (83)

回到北京三四天后的一个晚上，毛泽东突然召见。谈笑风声之余，我问他要我关注哪些方面的事，得到的回答真是出乎意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写了共 25 页纸的《对六十条的意见》，第一次履行“兼职秘书”之责。《六十条》推动了急于求成的“大跃进”的到来和浮夸风的出现。

## ● 同床同梦永绵绵 ..... (96)

我与刘澜波之间能随便交流，有时也能讲一点“私房话”，当时我甚至讲过一些可视为“狂妄”的话。水利、水电分分合合 30 多年，其间“重重矛盾”真是难以说清。我真心希望合并后的水利、电力两部“同床同梦永绵绵”，但这个梦依然落空了！

## ● 水主火辅问题 ..... (114)

当年翻山涉水、操觚鼓舌、上书言事，终于赢来南

宁会议确定的“水主火辅”的电力发展方针。但庐山会议后，却被批成“大水电主义”，大批水电干部也成了“三反分子”，言之使人痛心。“水主火辅”方针昙花一现及后来重点发展水电的方针长期不能实现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 ● 农业“大跃进”的前奏水利化运动 …………… (130)

在批判反冒进的高压气氛下，动员和发起了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各地在缺少农具、施工机械的情况下，拼命加大劳力投入和增加劳动强度，动员农民不分昼夜“大兵团作战”。全面“大跃进”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出现，浮夸风、高指标风和强迫命令风刮遍全国。

### ● 周恩来带队查勘三峡 …………… (140)

南宁会议后，周恩来受命抓三峡问题，率中外专家和各有方面负责人组成的庞大队伍勘查三峡。在船上，诸公评头品足、阔论高谈，我则“话不投机惊落座”。虽然周恩来刚在南宁会议上被毛泽东严厉批评，作过检讨，不能不当三峡的促进派，但他对这样一项世界史无前例的巨大工程还是采取了慎重的实事求是的方针。

### ● 酝酿总路线的成都会议 …………… (170)

成都会议讨论 25 个问题，陈伯达大谈速度问题与个人崇拜，毛泽东插话说：“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柯庆施要我写文章谈教育和文化大跃进、大革命，“15 年

内，全国人人都成为大学生”。但我的文章“没有写好”。陈云等检讨反冒进中的“错误”，毛泽东确立起“轰轰烈烈、干劲十足”的总路线，并指出“两个剥削阶级”的论断，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

### ● 武汉会议与广州会议 …………… (291)

毛泽东等 10 人去武汉，本为听汇报，实际又开了一次会议。毛泽东继续阐述“两个剥削阶级”论断，并称对科学家也不要迷信，要贴那些院士的大字报，要破除迷信。武汉科技界 5300 多人“向毛主席交心”。毛泽东在广州夸大其辞地说其身边的胡乔木“喜欢顶人，有时把你顶得要死，顶到墙上动不得。”

### ● 全面发动“大跃进”的八大二次会议 …… (313)

刘少奇作报告说，“东风已经压倒西风，而且将继续压倒西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各组认为邓小平的报告“大快人心”。毛泽东再谈破除迷信、年轻人胜过老年人，称十个“美帝”也不在话下，并说“讲点黑暗”、“准备打大战”、“准备党内分裂”……周恩来、陈云等在大会上痛苦地作检讨。八大二次会议真是立竿见影，“大跃进”全面发动起来。

## 前记（一）

一九八四年冬“退居二线”之后，我就想将自己亲历过的一九五八到一九五九这两年，即南宁会议到庐山会议这一段“大跃进”的历史资料，整理出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只将《庐山会议实录》定稿，并增订再版，其他就只零星发表过几篇文章。我不算一个懒人，伏案乃生平习惯。可是，虽居“二线”，仍然人来人往，杂事不断，且有一件繁重分务缠身，一年之中，难得有一个较长的安定时间。那本《实录》和其他书稿，都是利用夏喘发作时，到外地或住医院时完成的。所以这个夙愿就一直拖下来了。

大家知道，“大跃进”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重大失误，连续三年的“大跃进”，使我国经济发展遭遇到严重的挫折，而且饿死了几千万人，教训非常深刻。如实录出这一段历史，于后世自有鉴戒的意义。自己已是望八之人，来日无多，确实有一种责任感驱使我赶快结束这件未了之事。现在我先写出从南宁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这近半年的经历，由于时间、精力所限，粗糙差误难免，希望读者多加指正。至于从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前这



一段“亲历记”，我当尽快完稿，否则，“未了之事”还是没有结束的。

1995年10月12日

## 前记（二）

《大跃进亲历记》的前一部分南宁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已于1996年3月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我是1995年10月交稿的，随即写后一部分，即1958年6月的华东区计划会议到1959年6月上庐山开会前的形势。这后一部分篇幅较大。1996年夏季在怀柔水库山边躲夏喘痼疾时，已将大部分初稿写出，其余部分一直拖着没有动笔。这一年来虽然依旧琐事不断，但为什么不能像过去那样，只要材料齐全，就能挥毫而就呢？是否同年届八十有关，精力与思维都走下坡了？自认一生从不偷懒，可是有时确不想握管，自己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眼看又该躲夏喘了，于是下定决心，发了一个狠劲，将没有最后完稿的几章，一气呵成，并将全书最后定稿，前一部分也有所增订。

今年4月满80岁时，承蒙京中友好为我聚会祝寿，我讲了这样几分钟的话：此生正好大体分成4段。第一个20年，在学校读书，一二九运动时开始革命；第二个20年，战争年代与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勤奋工作；第三个20年，沦为“阶级异己分子”，并单监8年；第四个20年，继续工

作，离职后更勤于伏案。可以说，我早岁即知世事艰难，虽学工科，却好历史。我们这一代人有幸是本世纪世变沧桑的见证人，自己又曾在政治游祸中生活过来，有钱难买回头看，一种历史责任感，使我笔耕不已。“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应当让后人记住前人的经验教训，失败的教训尤为可贵，如果不牢牢记住，还会重犯错误。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不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

《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新版很受读者欢迎，坊间竟有5个盗印版。《大跃进亲历记》前一部分出版后，同样引起读者关注。南方出版社出版。之所以用“亲历记”之名，因其中有些事虽非亲自参与，却是发生过重大历史影响也是当时自己很关注的。

我好像一个挑担“脚夫”，到了目的地，将担子卸下，顿觉一身轻松了。

期待读者的指正。

作者

1997年6月30日

## 讨论三峡问题

1958年1月17日，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让我第二天乘专机去南宁，参加中央的会议。办公厅负责人说：电报上写的是讨论三门峡问题；还说专机在武汉停留时，接林一山一起去。

“讨论三门峡问题”？我纳闷了一下：三门峡正在施工，没发生什么问题。过武汉接林一山一起去，当即想到是电报中多出了一个“门”字，必定是讨论三峡问题。因近几年来，水利部特别是长江水利委员会及其负责人林一山，曾以各种办法催促中央：为了解决长江防洪问题，三峡工程应尽快上马。我当时在电力工业部主管水电建设，一直是坚决反对这种意见的。

1953年毛主席视察长江，从武汉到南京航行中，听取了林一山的设想：三峡筑坝解决长江防洪，并可南水北调。长江特大洪灾之后的1954年底，京汉线旅途中，林又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汇报有关三峡工程的技术问题和坝址查勘情况。大概就在此时，燃料工业部电力代表团在苏联参观时（刘澜波任团长，我任副团长），接到国内来电：水利部要修

三峡工程，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当即回电：现在还没有力量顾及此遥远之事。1955年，长委（即长江水利委员会）曾多次组织中、苏专家查勘长江和三峡坝址。这时黄河流域规划已经完成，三门峡即将开工。1955年下半年，为上三峡，已请来苏联专家12人。1956年，成立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于长委机构之内，正式进行长江流域规划工作，主要是三峡工程的研究设计；水电系统也派出工程技术人员参加。

三峡问题的公开争论是1956年开始的。这年《中国水利》第五、六期合刊上，发表了林一山两万多字的长文《关于长江流域规划几个问题的商讨》。文中强调“长江流域规划中必须首先解决防洪问题”；“第一期计划的防洪任务即完成拦洪1000亿至1500亿立方米”（按：三峡坝址处长江千年一遇洪水总量也不过1000多亿立方米）；“三峡是防洪性能最好的地区，三峡水库有巨大的防洪库容，在正常高水位235米（海拔高程）时，有效库容可达1150至1260亿立方米，可以根本解决两湖平原的水灾”。文中也谈到长江中游平原洼地，应当防洪排涝并重，提出平原湖泊地区的蓄洪垦殖计划。全文中心在有了三峡这个超大容量水库之后，还可以保证万吨巨轮终年通航于城陵矶与重庆之间，可以装机2300万千瓦，年发电量1500亿度；可以通过汉江丹江口水库引水至华北黄淮平原。文章称这种方案为发扬“重点主义精神”。我于是针对林的这种不切实际的观点，写了一篇题为《关于长江规划的几个问题》的两万字长文；并组织一批水电专家，就长江的水文、防洪、发电、航运、地质及有关工程技术和施工等方面的问题，分别写了专文，于1956年第九期《水力发电》刊出《长江规划专号》。

在抗日战争时期，美国著名的大坝专家萨凡奇到三峡去查勘过，向国民党政府建议，修建这个工程，当时考虑电力主要用于发展耗电的化肥等工业。因此，有一批在水电系统工作的老工程师，曾于 1946 年到美国垦务局，在萨凡奇的指导下参加过三峡工程的规划设计工作，他们熟悉此事。水电总局还保存了一些有关资料。

我的文章主要谈三个问题：河流规划的综合利用原则；长江的防止洪规划；动能经济问题（水电同国民经济的关系）。文中指出综合利用是河流规划的唯一总方针和总原则，必须从经济合理和技术可能，反复论证各种方案，从而选定长江干流开发的第一期工程。林文过分强调以三峡“中心水库”解决千年一遇的防洪问题，因而离开了综合利用原则，不能从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实际需要和可能得到充分论证（我还特别指出，他的长文只有五百个字谈到水电）。按照 235 米高程，三峡水库要迁移人口 215 万，将淹没四川沿江十几个城市，重庆大部被淹，不能为了免除武汉（实际只是荆江地区）千年一遇的洪水威胁而牺牲重庆（如此则万吨轮船通重庆已失去意义）。防洪也必须采取综合规划原则：湖泊洼地蓄洪排涝、加强堤防、支流水库和干流水库四个方面不可偏废，而堤防的作用自古相沿，尤为重要。我们只能根据国家经济技术发展条件，逐步提高防洪标准，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地去解决最高标准的长江防洪问题。至于要求在 1967 年建成三峡这样大的水电站，同国民经济包括电力的发展远远不相适应，也将遇到一系列世界上尚未经历过的技术问题。文中认为应先开发长江各大小支流的水力资源，以满足国家近期迫切的电力供应，同时也有防洪等综合效益，

将来时机成熟再考虑三峡。可是对这期《专号》的文章和观点，林一山本人、长委和水利系统当时没有任何反响，没有撰文反对或赞成。

就在公开出版这期《专号》的同时，为了使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更多地了解长江及三峡工程的有关情况，我又特编辑了一期《关于长江规划意见特辑》，共十二篇约六万多字，刊于水电总局的内部刊物《水电建设参考资料》，包括以下内容：

1955年2月，刘澜波从莫斯科发给燃料工业部党组一千多字电报：《关于长江规划问题》（这是由我起草的），以及我们访问全苏水电设计院时，院长和副总工程师的有关谈话记录。他们强调河流综合利用规划，三峡是远景目标，不宜作为长江干流开发的第一期工程。

1955年10月6日，我同长江苏联专家组组长德米特里也夫斯基谈岷江上游水电问题时，对长江开发的意见。

1955年12月，德米特里也夫斯基来北京汇报时，正盛传七年之内修成三峡。我即向周总理和陈云、邓小平、李富春副总理、薄一波主任并水利部部长李葆华、长委主任林一山，写了一份《关于长江防防洪方案和三峡工程的意见》，并附萨凡奇关于三峡计划的概要。1956年2月间，全苏水电设计院总工程师瓦西林可和占比雪夫水电站总设计师马洛歇夫来到中国，检查长江苏联专家组的工作。2月2日，林一山和长委总工程师汇报长江情况后，我代表电力部作了《关于长江规划的几个问题》的长篇发言。林一山的《长江流域规划有关问题的简要介绍提纲》亦附后。

2月27日，瓦西林可和马洛歇夫查勘长江和三峡后，

在长委作了总结性的发言，由长委印发了这个发言的记录。我与四位水电专家张昌龄、陆钦侃、胡慎思和章冲，也写了书面的《查勘三峡后的几点意见》。

2月8日、10日在轮船上，18日在汉口，20日在北京，瓦西林可同我单独作了四次谈话，都是有关长江规划和三峡工程的一些原则意见。他认为应先确定正确的防洪标准，否则不可能有正确的防洪措施。针对急于将三峡上马的做法，他说：“如果有办法，不要先修一个最大的工程。俗话说，不要为一个最大的东西弄昏了头脑，贪多嚼不烂。必须有充分资料。不能靠激动和想象说服人，单靠勇敢、拍胸，不能解决问题。不要一屁股坐在三峡。”他还谈到规划方案中，对水电注意很不够

2月23日在国务院，瓦西林可和马洛歇夫的《向周总理汇报要点》中谈到，“三峡如果出问题，长江将不可收拾”。

此外，还有水电总局关于《汉江流域规划简要报告》的几点意见，以及汉江丹江口、沅水五强溪的比较问题等。最后一篇，是我于1956年7月28日写给周总理和毛主席的一封信，题目是《关于长江三峡问题的意见》。其中谈到：长江规划牵连问题过多过大，非短期内能完成。从经济技术两方面考虑，我国短期内难以修建三峡工程。为解决长江防洪问题，并非必须很快修建三峡不可。从而谈到解决1954年型洪水的一些可靠的措施。从电力需要说，十年之内也不必修建三峡这样大的水电站。

在这之前的1956年初，为了解全国经济建设情况，毛主席和刘少奇曾分别找中央各经济部门负责人座谈（我参加



过电力部向刘少奇的汇报），并命各部及直属总局负责人直接向毛主席写一份详细的报告，字数不限。这时，我任水电总局局长（还有一个电力工业部“部长助理”身份）已三年半，内外种种有关情况，可说心中已经有底。于是，自己动笔，于三月底写了《如何加速水电站建设》长达三万多字的报告，其中除说明我国水力资源盖世无双，可以做到多快好省发展水电以外，还提到了水电与水利之间，从黄河、淮河到长江的种种矛盾与工作的不协调。内多直率之言，并于三峡问题专门写了一大段，约三千多字。由于当时电力部有个别领导对此颇多顾虑，想将矛盾捂住，这个报告没有能够送到毛主席手中。因此，毛当年并不了解水电方面这些不同意见。《水力发电》这种发行范围很狭的业务性刊物，也不为世人注意。上述《关于长江规划意见特辑》的那些内容，包括7月28日写的那封信，毛泽东也无从得知。1956年夏天，毛第三次游泳横渡长江时，在有名的《水调歌头》一词中写道：“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这就更鼓舞了三峡上马之风。早在1955年12月，水利部就传出：三峡工程可以三年勘测设计，四到五年施工建成。国务院一次谈到三峡工程的会议上，众口一词认为应尽快动工，我提出不同看法。周总理严肃地看了我一眼，大声说道：有一个人说困难，这很好。随后我将水电总局保存的三峡重要图纸，送请总理过目。

就在1956年的9月1日，《人民日报》版头条刊载了“长江水利资源查勘工作结束”通栏特号字标题的新闻，副题为“开始编制流域规划要点，争取年底确定第一期开发工程方案；解决三峡大坝施工期间发电、航运问题的研究工作

即将完成”。报道中还谈到了施工期的具体措施：“工作人员正在逐步深入研究‘围堰发电’<sup>①</sup>和‘临时船闸’等措施，这项极有价值的研究工作不久就要完成”，而且还谈到：“长江流域的货运量、航运效益和土地资源情况，都已经整理研究完毕”，当时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似乎三峡工程很快就要上马了。我于是写了一篇《论三峡工程》的四千字文章寄《人民日报》，报社寄来了清样，但终于未能刊出。报社副总编辑王揖（我们是延安《解放日报》的同事）告我，总理不赞成当时在报上公开争论此事。后来，我只好《水力发电》1956年第十一期上，发表了一篇《克服主观主义才能做好长江规划工作》的六千多字长文，说明长江规划以大三峡方案为主导的急于上马的思想，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片面性和随意性。文章从《矛盾论》谈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客观世界的规律离开人们的意识而独立存在，人们只能利用它而不能随意创造它。国民经济有其本身的规律，互相之间的关系也有其一定的客观规律”。“总之，要做好长江规划工作，必须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必须研究所有问题的各个方面，必须具体分析全部事物的内在联系。必须掌握所有矛盾中的主要矛盾，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不能从片面情况出发，不能从表面现象出发。这也就是说，不要从绝对的防洪要求出发，而要从发电、航运、灌溉等综合利用观点出发；不要只看到一个方面的需要，而要看到可能；不要只想到遥远的将来，更要看到今天和整个经济的发展；不要只看到技术上的一个问题，而要看到技术上的全部问

<sup>①</sup> “围堰”为拦河坝施工中，在河流中筑临时围堰，以便清理坝基和浇筑坝体

题；不要只看到一个三峡 235 米高程方案，而要看到其他许多方案；不要只看到干流，也要看到主要的支流；防洪不要单只看到水库，而要考虑切实可行的各种综合措施；不要只看到库容巨大的好处，也要看到带来的淹没损失的难以解决；在研究各项问题时，不要只看到顺利的一面，也要看到困难的一面。我们应记住列宁说的这一段话：‘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列宁的关于辩证法要素十六条中的第一条：观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细节，而是事物本身），这就是要求一切从客观实际本身出发。正如刘少奇同志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所说的：‘一个人如果不懂得正确的意见只能是对实际事物的客观的全面反映，而坚持要按自己的主观的片面的想法去办事，那末，即使他有一切善良的动机，也还会犯或大或小的错误。因此，为了避免犯错误，基本上必须从求得正确地认识客观实际、正确地辨明是非人手。’”

毛泽东早就有“一定要修好淮河”的题词，淮河是一条手掌形平原河流，当时在上游的几条支流修了防洪水库，但对干流防洪作用极其有限（兴师动众修的润河闸，后来在一次拦洪中被冲毁）。在三峡大水库的启发下，这时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也计划在淮河干流临淮岗处，建一大防洪水库，可是得移民 100 万人以上，这个计划后来自然未能执行。

我这个人对自己认定了的事情，不管有何等阻力，是定要坚持到底的，尤好发表一点意见。当年对三峡问题的确是忧心忡忡的，这不仅是由于这个方案关系国计民生太大，太

不成熟，而且由于它的干扰，会打乱水力资源即水电的正常开发。直到五十年代中期，上上下下对我国必须优先发展水电，还没有一个统一认识。1957年3月间，报上登载过一个“大鱼网事件”：广东台山县县委一位统战部长，做了一个3万多斤重的大鱼网，想把过海的鱼群一网打尽。结果，大鱼网打不上一条鱼来。于是我借题发挥，以“大鱼网主义”为题，用笔名写了一篇小杂文<sup>①</sup>，开篇说道：“这位同志的心意当然是好的，他本来认为大鱼网好处多：大，集中，方便，效率高，能解决大问题。生活中确实有人喜欢办大事情，热衷于解决大问题，急于一次彻底解决问题；还有人把这提到理论的高度，说这种‘大’癖是解决问题的‘重点主义精神’；”文中未点明河流的名称，谈到临淮岗与三峡两大水库之事后，说道：“生活中是必须有幻想的，幻想对生活起促进作用。三十六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几十个党员，就立下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建立新中国的目标，这时何尝不是大的幻想，但没有这种幻想就不成其为中国共产党。问题在如何做，如何实现这个幻想。历史已经回答不能用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或王明路线来创建新中国。现在如果有科学家、作家、诗人提出某些大幻想，那当然是可以的，也是需要的。然而，如果一个机关的几千干部，把现实问题及至本身迫切业务一概放下不管，却请来几十位专家专门来计划如何打通喜马拉雅山的隧洞，使中国、印度通火车<sup>②</sup>；如何从沈阳坐船到广州；人类五十年以后将如何？等等，那就无以名之，只能名之曰：大鱼网主义。遗

<sup>①</sup> 此文刊于1957年4月14日《人民日报》

<sup>②</sup> 当时苏联确有人作此种研究。

憾的是，现在似乎真有这样的机关；我们的报纸和记者（包括《人民日报》），有时也颇喜欢宣传大鱼网，而且比批判台山那个大鱼网还起劲：加花边、登头版，甚至头版头条。”文末说道：“这篇小文章可能引起一些小风波；对没讲穿的例子中的‘具体问题’，可能有同志会提出异议乃至抗议。但笔者预先声明：谈到具体问题，那是需要大文章和专家们才能解决的。我这篇短文不过是一篇谈点杂感的小杂文而已。”

这种颇为“尖酸刻薄”的讽刺小品，当时没有引起任何舆论反响。只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我在水电部受批斗时，此文曾印发作为“罪证”之一，并使整个水电工作都蒙受不白之冤：“反三峡、反水利、反火电”。此是后话，附带在此一提。

总之，所有以上这些有关三峡的意见和水电、水利之间的矛盾，毛主席都不知道；他只是听取了林一山和水利系统单方面的观点和看法，因此要“高峡出平湖”。

前面谈到的1956年3月底写成的有关水电长篇报告（不久前才找到，全文已刊《中国水力发电史料》1991年第一期），其中关于长江和三峡问题的一大段意见，还可摘录一些，以说明当年我去南宁时的“胸有成竹”：

长江在我国国民经济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长江流域面积约18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五分之一；流域人口约2.3亿人，占全国五分之二；流域内富有矿藏、森林，雨量充沛，土地肥沃，农产占全国总量43%；航运量占全国水运

75%；全流域水力资源约2亿千瓦；沿岸城市如重庆、武汉等均为工业中心。但是由于流域内降雨强度大，暴雨面广，持续时间长，长江中下游平原易遭洪水灾害。因此，治理和开发长江，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将发生极大影响。在长江干流建造大水电站，综合解决防洪、发电、航运、灌溉等问题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由于干流工程不仅牵连极复杂的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问題，而且工程本身过于浩大，许多技术问題远远超出当前世界已有的经验，因而勘测设计和施工都必然需要较长的时间。干流水电站（水库）建成之前，关于解决中南和西南工业基地的电源，以及为尽早解决长江水患，事实还必须考虑修建其他主要支流上的水电站和防洪工程（主要是加强堤防）。

长江规划要点将于今年年底提出。关于长江规划我们有这样几点意见：

1. 必须实现高度的综合利用，确定方案时须十分慎重。长江问題关系大半个中国。长江的干流与支流，防洪、发电、航运、灌溉之间的关系，各个国民经济部门当前要求和长远发展的关系，以及解决这些问題如何结合国家经济和技术可能条件，种种问題，极端复杂。只有掌握全部有关资料，进行充分的研究，召集各有关方面详细讨论，根据经济上的合理性和技术上的可能性，将各种方案全面地反复论证，才能选定第一期工程。因此，从事规划工作的人员必须具有高度的综合利用思想和不带

任何主观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才能将事情办好。去年十二月水利部传出要在七八年内修好三峡工程，我们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当时即向总理写了报告，说明经过规划之后，三峡工程如果必须修建，以可能设想到的最快速度，一切如理想安排，从勘测设计到基本完工，至少也得十二年时间。（苏联现在修建的两个320万千瓦的水电站同三峡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

2. 防洪本身也必须是综合的规划，即是干流水库、支流水库、湖泊洼地蓄洪以及堤防工程，四个方面不能偏废。同时必须根据国家经济技术条件、工程的难易、见效的先后，分步骤地采取各种防洪措施，逐渐提高防洪标准，逐步解决长江的洪水问题。我们认为，解决长江的洪水问题，以及整个长江规划问题，不能“一屁股坐在三峡”。即从防洪而言，长江的洪水不可能用一个水库装起来。三峡对长江的防洪，难以像三门峡一样，可以基本解决黄河的洪水问题。例如把重庆淹掉的方案是站不住的。三峡也不能解决汉水、沅水和洞庭湖、鄱阳湖区域的洪水问题。在长江干流和主要支流的工程建成以前和以后的一定时间内，长江的蓄洪、分洪尤其堤防工程是必须认真加强的。

3. 防洪的规划必须与电力规划及其他综合利用的规划密切结合。这就是说，防洪标准应当同国家整个工作的发展，同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工作相适应。例如，不能为了解决防洪，先修水库，而电站

机器慢慢来装。（以下谈到电站每台机组及整个电站容量同电力系统的关系，远景 1967 年全国电力容量预计为 2500 万千瓦。）现在还不能设想十年之后，就可以用三峡这样一个水电站的电力来供给半个中国的用电。我们认为长江干流工程的水力发电问题，就其经常的长远的作用而言，其重要性并不亚于防洪。关于防洪的标准问题，《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第十条这样说道：要求在七年至十二年内，基本消灭普通的水灾与旱灾。照一般概念，所谓普通水灾应当属于十年或二十年一遇的洪水。根据中央精神再提高一些，也许可以这样要求，1967 年以前在长江上解决比较大的洪水；如 1954 年发生的百年一遇的洪水。根据长江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 1956 年 2 月 2 日向苏联专家的报告，当蓄洪垦殖计划完成后（蓄洪容积 500 ~ 700 亿立方米），可以保证洞庭湖区和武汉地区遇到 1954 年的洪水不再成灾。因此，单纯从防洪出发，认为必须一 1967 年以前建成三峡水库，我们认为论据是并不充分的。

4. 长江干流工程当然也决定于国家投资的情况，消耗电力的企业投资，即令全部用于氮肥等耗电工业，也比工程本身的投资大 5 倍左右（如果说干流工程的投资只要 100 亿元，整个投资则在 600 亿元左右）。因此，不论是为了防洪、发电或灌溉，都必须进行充分的经济分析和效益的论证。

我们完全赞成主席和中央的积极开发长江的方



针，以解决我国的大问题，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加速前进。我们武汉、成都两个水电设计院一直在从事长江流域的工作，对于干流也作了积极的配合，如承担部分地质勘测工作，派遣得力干部参加规划领导。但是在电力的远景部署上，关于长江干流三峡等电站的容量，列入计划的时间，列入的数量等问题，现在还难于肯定。

关于整个长江工作的原则，我们认为应当遵照主席的指示精神：“不可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

这个长篇报告，第二天去南宁时，我带在身边。其中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帮助我在会议上的辩论，这个报告也就没有再交上去了。以后同毛泽东的接触中，我也没有提及此事。关于我国加快水电建设的必要与可能，我想正好趁此机会，直接向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作点“宣传”。于是，我还带上有关水电的资料，并请负责水电规划的老工程师，赶出一张全国各大水系近期和远景应予开发的大中型水电站示意图。

飞机在武昌机场着陆时，林一山已经在等着。他的秘书魏廷铮（现任长委主任）提着一口沉甸甸的大皮箱。相形之下，我的手提包实在太寒伧了。我们只是打了一个招呼，在飞机上也没有交谈。我跟林过去只见过面，没有交往。接管沈阳之后，听到东北局的一些负责同志对他有过某种介绍。1952年9月，我从湖南调北京之前，湖南省委几位负责同

志一同去参观过荆江分洪工程，是他向我们作的工程说明。当时觉得他天文地理侃侃而谈，很博学，知识丰富。如今这两个人要参加“御前会议”，“对证公庭”了。

从上面作的一些介绍，可以说明，在三峡问题的争论上，我是“知己知彼”的，如此匆匆上阵，仍“胸有成竹”。我不时俯看机翼下的大地景色，心境自然而平静。

## 骋辨上书，是非分明

近中午时到达南宁，住在一栋新盖起来的宾馆，田家英马上来找我，对我表示严重的担心，说他和胡乔木都为我捏一把汗，急切地向我介绍了会议形势：主席大批“反冒进”，总理当面挨了批评，柯庆施攻击陈云。大家紧张得很，有的人睡不着觉。《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发表的反冒进社论原件，也从北京调来了。反冒进砍掉了多快好省、农业纲要四十条和促进委员会，泼了冷水，泄了气，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会上主席插话很多，发表了许多意见，反对分散主义，权力要集中。批评做经济工作的人只务实不务虚，只专不红；平时不通气，一来文件就倾盆大雨，四时八节逼着签字，这实际上是一种封锁。讲了许多工作方法问题，开动大家脑筋，等等。田还谈到乔木的看法：主席当时的精神状态，那种“乘风破浪”的兴奋情绪，有点类似抗战初期。根据林一山和水利部门意见，主席主张修三峡。薄一波反映，此事有反对派；还讲了水电同水利之间，有许多矛盾，难以协调。于是主席当即决定，水利、电力两部合并，将林一山与李锐找来，当面各抒所见。他们为我的担心当然有理。过

去虽然常同田家英接触，但隔行如隔山，关于三峡问题，从未谈起过。随后见到周小舟，他也是同样担心。他告诉我，毛主席在插话中，又狠狠地批了张奚若那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因此，我在三峡问题上的反冒进，当反对派，是很不合时宜的。由于晚上就要开会，我也不及向他们多谈多问。不过我心中有底，飞机上的平静心情并没有受到干扰；就如同运动员参加决赛，演员上台之前一样，必须情绪如常。

在饭厅吃晚饭时，人们见了，笑我与林一山是“两个冤家碰了头”。当天晚上，“两个冤家”参加了接近尾声的南宁会议。我们的住处离主席住的“明园”不远，会议即在不太大的会客室中开的。中间一张长条桌，大家围桌而坐。我们两人坐在毛主席正对面，对而左右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周围还有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及各大区和中南各省（两湖、两广、河南、江西）的一把手；柯庆施、李井泉、欧阳钦、张德生、刘仁（代林铁）、史向生（代吴芝圃）、陶铸、王任重、杨尚奎、周小舟、刘建勋等，中央工业各部有王鹤寿、赵尔陆、黄敬等，还有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包括两个当事人，参加这次会议的现在健在的只有6个人了！）

在延安时期，如此面对面同毛泽东坐在一起开会，只有过一次，即1942年《解放日报》的改版座谈会，参加的人要多些。林一山，是毛熟悉的，他们之有过多长谈短谈。这条横穿中国东西的伟大长江，其开发利用，其关系国计民生、工业农业、航运电力、防洪灌溉、近期远景等等，是如何重要，三峡又是如何“不可替代”的伟大工程，他确实被

林的悬河之口打动了的。据说他曾向林说过这样的话：我很羡慕你呀，我很想当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主任呢！而这个李锐，则不认识（我在《解放日报》写的好多篇社论和长篇文章，当年曾得到过他的赞赏，有过批语，但社论不署名，长文用的笔名）；李锐这个名字，可能还不陌生，因为从《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这本书，知道有我这样一个湖南人。周世钊告诉过我，五十年代初，同主席见面时，就谈起过我在写这本书。此书于1953年在《中国青年》和《党史资料》上连载过。这时单行本也已出版。我心中想到，在客观形势上，我确有极为不利的一面，人们为我担心是很在道理的。

大家都坐定了，毛泽东即要我们两人开腔。问林一山，你要讲多少时间？林答，要两个小时；又问我，我说只要半小时。我自然请主管长江的林一山先讲。

林一山从汉朝贾让治水谈起，两千多年间，长江洪水如何为害，平均十年一次。辛亥以来的四十年中，平均五年一次，可见长江洪灾越来越严重。1931年水灾，死14.5万人；1935年大水，死14.2万人；1949年大水，死5700人；1954年特大洪水，采取紧急分洪等措施，保卫了武汉和荆江大堤安全，仍死了4900人。他还谈到长江如同黄河，河床也在逐渐抬高。特别强调荆江河段之险，保卫荆江大堤的重要，这关系到300万人的生命安全，汛期有溃决的危险，万一决口，将造成难以想象的惨剧，且将淹没武汉，切断京广铁路，断绝沪渝航运，造成复堤工程等一系列严重恶果。于此，还谈到如遇1860、1870等年洪水，则后果更不堪设想。这些年份，宜昌以上洪水来量都比1954年为大。1954年，汉口以上分洪决口水量约600亿立方米，汉口以下约30亿立

米。因此，如能控制住 1000 亿立米洪量，就可以解除近百年来已经发生过的最大洪水灾害。之后，就谈到长江流域也有旱灾，全流域丘陵区占 22%，其灌溉必须由大型工程远距离引水才能满足。长江的伟大，还表现在它有充足的水量，有超流域的全国意义。华北黄淮平原缺水，需要由汉江和长江引水 400 亿立米，以灌溉约 1 亿亩耕地。如果按远景计划，这个地区大量改种水稻，黄河水源留灌蒙古沙漠，则黄淮平原所需引水量在 1200 亿立米以上。此外，从长江引水，还可以洗碱，更是永久性效益。同 1956 年 6 月那篇长文不同，这时林一山大讲水力发电是我国工业动力的主要来源。为了十五年内赶上英国，以钢铁与电力增长比例计算，钢达到 1000 万吨时，电力需要 400~500 亿度；当 1972 年钢达到 4000 万吨时，电力相应需 2000~2400 亿度；第五个五年计划钢可能达到 6000 万吨，电力相应要 4000~4500 亿度。他也谈到耗电工业，化学肥料每亩 50 公斤，则全国插种 30 亿亩，每年需 1.5 亿吨化肥，单是化肥一项即需耗电量 2000 亿度。然后又比较了国内外航运情况，我国水运如何落后，仅及铁路运量的 16%。三峡以上干流河道渠化后，可以使长江变成我国独有的“地中海”；以目前铁路运力计算，长江就至少可以代替 200 条铁路的作用。到 1972 年，长江干流货运量，仅钢铁一项即达 9100 万吨。所有以上这些除害兴利的雄伟计划，彻底征服长江，根本改变长江流域以及黄淮平原的自然面貌，只有以三峡水利枢纽为主体的流域规划，才能使之产现。长江洪水最高峰来自宜昌三峡以上，至少占汛期干流水量 50% 以上。因此，三峡枢纽对长江防洪有决定性意义。只有三峡才能控制川江洪水，解除荆江大堤

的严重威胁和洞庭湖区的洪灾。宜昌以下的支流，找不到有控制性的有效水库，如汉江、沅水的洪水典型年度变化很大，能控制的水量较小，而且还不一定是干流防洪中所必须削减的洪峰的组成部分。关于三峡水库的正常高水位，经过苏联专家的帮助和研究，林一山这时不再强调必须 235 米了，而提出 200 ~ 210 米的方案，以 210 米为最好。这样，水电站至少可装机 1340 万千瓦，年电量 1000 亿度以上。耗电工业可以集中在它的周围，也有利于国防。输电距离可以北越陇海路，南接五岭，东至上海，西通重庆。将三峡全部投资摊给水电，单位千瓦造价不过 526 元，比火电也贵不了多少。由于 1916 年《水力发电》的《长江规划专号》中，我的长文及其他有关文章，谈过三峡这样超巨型水电站如过早上马，同中国电力工业及相应经济发展不成比例，林说，到 1977 年，三峡输电范围内，所需电量至少将是 1600 ~ 1800 亿度，从国家亟需化肥和化纤等工业情况看，三峡电站不但经济而且合理。林一山最后谈到三峡工程技术上的可能，地质勘察结果，已选好了几个比较坝段，共三个方案。施工难度和强度同国外类似工程相比，也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又说“围堰发电”的设想（随后写的文章就不提了）。关于投资，估计总数约为 72 亿元，按照基建投资一五计划时期共 480 亿元、二五 900 亿元、三五 1620 亿元、四五 2750 亿元、五五 4680 亿元推算，1963 至 1977 年累计约 9050 亿元。以电力投资占基建 10% 计算，不能说国家没有钱修建三峡枢纽。关于 100 多万人的移民问题，他根本没有谈，随后的文章中也没有述及。

以上这些大要，是我根据回忆和林随即写出的文章作的

概括。林讲的时候，以远大的理想为主，不很系统，有时离题较远。讲了许多听者不易一下弄明白的数据，“行话”也太多，不必要讲的讲得太多。总之，不是从当前实际与可能出发，而是从遥远的理想出发，特别强调洪水要死人，成百万人死于非命。他讲的时间超过了两小时。

我讲得比较简单，没有超过半小时。我首先讲长江不同于黄河，自古以来是条好河，轮船从上海可以通到宜宾，是世界大河中数得出的黄金水道，最好的通航河流；泥沙远不如黄河之严重，水量为黄河的 20 倍，洪水量为 50 倍；最大与最小流量之差，黄河为 200 多倍，长江只 25 倍。三国时期就有诸葛亮夏口（汉口）吊丧，可见两千年来，武汉三镇并未因洪水有何变化。黄河下游大改道七次，开封城被淹没过，城墙低于河床十几米，故称为悬河。黄河为世界上最严重的害河，对国家威胁太大，治标治本，必须及早解决。三门峡控制流域面积 90%，水库削减洪峰可起防洪决定作用。（黄河洪水峰高量小，为尖峰形；长江洪水峰缓量大，为馒头形。）估计三门峡水库有五十年寿命，可以为上游水土保持赢得根治时间。可是三峡只能控制长江流域面积 50%，即只能管住西水（川江），而对南水（湖南四水及赣江等）和北水（汉江）则无能为力。宜昌以下中下游平原地区，发生的洪涝灾害特别是涝灾，三峡只能望洋兴叹，无能为力。长江汛期由雨季决定，一般南水最早，次为川江，最后为汉江，有时也有错乱。因此，历史上各种洪灾形态不同。1954 年，南水推迟，川水、汉江都提前，受灾面积中，渍水内涝及先涝后洪约占 80%（我这里说的比例同林一山的完全不同），水利部门历来重防洪轻除涝，因此，武汉被围困四十



天。堤防是我国自古以来，也是世界各国行之有效的最好的防洪措施，决非“落后”不可靠之物，决不可贬低而放松其作用。不论有无三峡，必须搞好堤防。1870年所谓长江千年一遇的大洪水，主要是川江洪水，四川灾情极重；洪水过三峡后，向南冲开松滋口（南岸四口中最上位），并未冲破荆江大堤。因此说什么荆江决口要死上百万人，是一种危言耸听不实之辞。我们的能耐难道还不如蒋介石时期？长江堤防加高加固，1954年洪水再来，武汉可保无恙。长委总工程师已讲清楚了这个问题。

我引用孟浩然的诗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说明宋朝以前荆江河段9穴13口南北分洪，演变到明朝，最后剩下的北岸郝穴，据传被宰相湖北人张居正<sup>①</sup>堵塞，于是洪水向南（历史上北堤固于南堤）先后冲开藉池、松滋、调弦、太平四口，洪水经洞庭湖入江，于是，云梦泽从历史上消失了，从而淤肥了洞庭湖田。（湖北人因此埋怨张居正“保北舍南”的政策。辩证法说明洪水也有有利的一面。）历史上盲目围垦湖田，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仍然如此。防洪标准只能依据国力逐渐提高，想一下解决百年、千年一遇洪水是不现实的。历史与现实说明，长江防洪最重要措施在加固堤防和分蓄洪水，如已修的荆江分洪区很起作用。这也是至今世界各国采用的方针。如按坝高200米方案修建三峡水库，估计移民就至少要105万人，这是一个极其严重、极为困难的问题。

我强调说，三峡如修建，其作用主要是一个一千几百万

---

<sup>①</sup> 张居正，湖北人，明代有名的宰相。

千瓦的大水电站（水库只有发电才能收回成本并赚钱），三峡水库防洪能保护荆江大堤，对武汉并不起作用。胡乔木于此时插话（显然是帮我的忙），讲水电很重要，引起毛泽东与大家的兴趣。乔木曾同我谈过，主席爱听好事、鼓舞人心之事。于是我说，1957年，我国电量为190亿度（装机约460万千瓦），钢524万吨，煤1.2亿吨。十五年赶上英国，钢要求达到3500~4000万吨，煤5亿吨，电2000亿度（电相当于苏联1957年水平）。电的增长倍数量大，为10倍。现在190亿度电量中，水电只占47亿度（23%），其他均为火电。火电发展受煤的制约。如东北煤炭虽多，但不久以后也将从关内运煤去。中国水力资源世界第一，开发条件极其优越，造价比火电贵不了多少，因此，电力工业长远方针应该是“水主火辅”，缺水力资源的地方才以火电为主。应尽力开发物美价廉的水电。西方和苏联都是优先发展水电；欧洲好多国家水电已开发殆尽；日本水力资源很少，都是小河流，1957年水电仍占电力的三分之二，当年一占领东北就开发松花江和鸭绿江。水电站形成的水库，又有防洪、灌溉、航运等综合效益，一举数得。新安江工期预计为四年半发电，造价4.1亿元，每千瓦700元（后来实际为三年半发电，造价未超过）。这时我将带去全国水电开发示意图铺在桌上，引起了毛泽东和与会者极大兴趣。之后，我又谈到左右三峡修建时间是国家财力，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电力而不是防洪；按水库高程200米，一个装机近2000万千瓦、能发1000亿度以上电的大电站，何年需要投入呢？根据苏联的经验，最大电站的极限可达全国电力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我又谈到电网是许多电站组成的，要什么样条件才能

形成全国统一电网。因此，最乐观的估计，三峡这样大的电站，中国要几十年后才可能有此需要。随后谈到三峡工程技术问题很复杂，如弄清地质情况要多年时间，搞水电的有此经验；其他多级船闸、电站机组容量（至少60万千瓦一台等）以及施工等等问题，都是超世界水平的。国防也是问题，同世界形势有关系。毛主席这时插话：三峡这样的工程当然会吸引敌人的注意，决不能遭受破坏。有人插话，那是下游几千万人生命安全问题。最后我又谈到“围堰发电”，那种“临时电站”的极不合理。

我讲的时候，听者为之动容。讲完之后，我看到那些为我担心的人，或者担心三峡上马的人，似乎有一种宽松了一点的表情。这时我心中感到：如同下围棋，林一山执黑先行，可是现在棋局的主动权已操在执白手中了。两个人都讲完之后，毛泽东发言：讲了还不算数，你们两人各写一篇文章，不怕长，三天交卷。第三天晚上，我们再来开三峡的会。

“两个冤家”，1956年都为三峡问题写过大块文章。就林一山而言，他是长江水利委员会和长江规划办公室的主要负责人，多年来朝思暮想三峡工程如何才能上马。1955年下半年，苏联专家来到后，长办即集中了长委成千技术人员，还有众多水电、交通、农业和科学院等有关部门的技术人员，以及十几位苏联专家，为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枢纽勘察设计而日夜工作，积累了大量的资料。这次到南宁来，他让秘书带了一大箱子材料，写起文章自是得心应手。关于三峡属国家长远问题，我虽然“胸有成竹”，但究竟不是我的日常业务；且1956年后，此事早已放下。现在仓促准备，

所以成文速度远不如林一山。记得到第三天早晨，乔木急急跑来问我，文章交出没有？他说，林一山的已经印发了，怎么不见你的？我说，已经写好，就要交出。他看了一下我的开篇，就说，主席在这次会上提出写文章要有三性：准确、鲜明、生动，你这个开头还不够鲜明。于是我又稍加修饰，匆匆交出付印。这两篇文章已经收进历史档案，属于《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央南宁会议文件》。林一山的文章约两万字，题为《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初步意见》，内分四节：（一）长江概况。（二）综合开发长江水利资源的迫切性和对我国经济建设的重大作用。（三）以长江三峡水利枢纽为主体的流域规划。（四）有关兴建三峡枢纽若干重要问题的研究。我的文章约八千字，题为《大力发展水电以保证电力工业 15 年赶上英国和修建三峡水电站的问题》。赶英国部分为四个问题：（一）电力工业在 15 年内赶上英国的关键。（二）水电能不能赶得上呢？（三）水电如何赶上去。（四）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投资与技术力量）。文中谈到电力长远发展方针应当“水主火辅”。关于三峡有六点看法：第一，控制三峡修建时间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第二，投资问题。第三，105 万人的搬迁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第四，三峡与国防的关系。第五，三峡的技术问题。第六，关于“围堰发电”问题。（现在看来，这篇文章仓促写出，有些问题就在当时也是离谱的。）乔木点明三性之后，文章开篇加了这样一句话：“主席：遵照您的指示，将如何更多更快发展水电，使我国电力工业在 15 年内赶上英国，以及三峡工程何时修建问题，汇报如下。”

第三天晚上，大概是 1 月 22 日，仍在原处开会。大家

都已将两篇文章看过了。记得彭真坐在我的斜对面，看见他在我的文章上划了许多红杠杠；毛泽东表态后，他拿起打了红杠的地方，支持我的看法。会议情况大概有点像围棋什么名人战、天元战的结局一样，胜负已决，只待主持者宣布结果。会议不到半个小时就散了。仍是毛泽东先讲，说我的文章写得好，大加表扬；意思清楚，内容具体，论点可以服人。特别赞赏我的文章中关于电站容量跟电网及全国电力的比重关系，以及坝址地质条件的说明。关于三峡问题，他是这样说的：中央并没有要修建的决定。对三峡我还是有兴趣的。如果今后 15 年能建成，那是赶上美国的。还有原子弹，太集中了也不好，还得有别的电站。关于水电，说水力用之不竭，应当多搞水电，加快发展水电，“水主火辅”嘛。没有水力的地方，当然要搞火电。这时李富春、薄一波也插话，都赞成只要有条件，应当尽量多发展水电，现在赶不上，第三个五年计划总可以做到水主火辅。毛泽东最后还指着我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大家都要注意培养秀才”。[南宁会议产生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第四十七条为“要培养秀才”。]

关于坝址的地质工作，我在文章中着重谈到几年来在工作中的体会，是任何人都看得懂的：“三峡水电站所有重大的技术问题，可说无一不超过当前世界的水平很远。当然这一点吓不倒我们。但问题是需要时间。”“在实际工作中，有一些技术问题允许冒一定程度的风险，但有一些技术问题绝不可丝毫冒险。任何一个水电站的工程中，在开工之前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地质问题。因为我们的工作是在峡谷中间斩断一条河流，将顽皮的水驯服下来。而被拦河坝抬高起来

了的比平时增加了几百、几千倍力量的水流，它总是不服输，总是尽力地、无孔不入地、日日夜夜地来破坏我们的工程。河流的峡谷在地质上属于最软弱的地带，否则河水就不会从这儿冲出来。因此，凡是修水电站的地方，地质问题总是极其复杂的，总是不容易在短时间内弄清楚，总是同我们的主观愿望作对，这个问题决不能有任何疏忽，决不能有任何侥幸的心理，五年多以来，这是所有从事水电工作的人员感触最深的一个问题。三门峡、新安江、刘家峡这三个水电站，1952年前后（三门峡更早一些）就开始做地质勘探工作，都做了整整五年，工作量极为浩大。例如钻了几万米的钻眼，新安江和三门峡还在河床底下打了一条平洞。这三个电站都经过苏联几批权威的地质专家反复鉴定，才最后定案。但是刘家峡于去年定案之后，最近来了一位地质构造专家，又几乎要做翻案文章。现在刘家峡的坝址还需要补作一些地质工作，才能正式开工。地质勘探是一种很笨的工作，很难采取快速的办法解决问题。一座水电站坝址的选定，正如许多球队夺取冠军锦标一样，是采取分级淘汰制，由大范围到小范围，由众多坝段到选定一个坝段，最后由一个坝段中多数坝址中选定一个坝址，坝址选定之后还得有后备坝址，以防万一。”

毛泽东最后很不客气地对林一山说：第一段不大懂。你师范大学毕业，文理不通。（这两句话，《工作方法六十条》最初草稿曾写入第四十七条：“要培养秀才”。）还说：谁要是想睡好觉，听林一山讲一顿。你师范大学毕业，写文章文理不通，大而无当。薄一波和胡乔木这时也对林一山重重批评了几句：要说实在话，再不要在中央面前讲煽动性的话。

（第二天吃饭的时候，乔木又对林一山数说了一顿。）

我没有料到的是，在散会之前，毛泽东指着我说，你当我的秘书，需要这样的秀才。我连忙说，当不了，水电业务忙得很。这时，旁边的人也讲赞成的话；毛于是说，是兼职的嘛。会后，毛将三峡问题交给周总理负责处理。

这样一场三峡之争的结局，我是有精神准备的；可是“当秘书”这个意外结果，我真是毫无精神准备，这在党内恐怕也是“史无前例”之事。三峡问题是南宁会议最后一个议题，大家都为此事的如此结束而高兴，田家英、胡乔木等不用说，北京来的知道三峡轻重的人，将心上的一块石头放下了。周小舟向我打了这样一个比方：李锐，你中了状元了。在当时那样紧张的批判反冒进的形势之下，三峡这样具体问题争论的结局，同这种形势完全不协调，可见只要言之成理，毛泽东那时还是很听得进反面意见的，尤其是小人物的反面意见。

过去在延安时就同田家英较熟识。1941年秋，我从中央青委调到《解放日报》评论部工作，他在中央政治研究室，有文章来，必经我手，于是也就成了文字之交。1952年秋，我从湖南调到燃料工业部管水电建设，从此脱离“坐而论道”的宣传岗位。一到北京，我就把多年搜集的一大批中国近现代历史书籍送给他了，表示从此“洗手”，脱离文字生涯。家英自1948年就担任毛泽东的专职秘书。那本《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在《中国青年》连载时，我让他同刊物编辑直接打交道，内容有什么违碍忌讳等等，也由他全权处理，他比我在行。多年来，我们之间可以随便谈心，没有什么顾虑：确实是“多时不见忽相忆，无事而来乱扯谈。

世界纵横三万里，古今上下五千年”<sup>①</sup>。我早就知道一些他在中南海工作的难处，他也谈过毛泽东的一些性格特点，特别是有时意见多变，不易适应。散会后第二天，家英跟我详谈了此次会议的情况后，我对“兼职”之事忧心忡忡，说自己心中藏不住东西，心直口快，恐怕容易惹祸；还说虽已活到四十岁了，并不善于处理复杂的环境，尤其没有应付高层人事关系的本事。但他赞成我这种“兼职”（后来曾想活动我任“专职”，被我坚决拒绝了），原因在他们都不熟悉工业，认为主席（我们谈话时他称为“主公”）现在直接抓经济建设，我来了，可以作他们的帮手，等等。我开玩笑说，我这是“自投罗网”。回北京见到刘澜波时，我也谈过此种心情，而且肯定说，我一定会碰到麻烦的（我用了“碰鬼”这一湖南上话），不料这些话真成了谏语。

同周小舟也是能随便交谈的。他是一个平易近人、讲究实际、遇事有自己见解的人。南下时，他是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我任过他的副职，1951年初他到湘西区党委任书记，即由我接替他的职务。小舟抗战初期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因此对我这回的“胜利”，特别高兴，他还特意让我签名送他一本《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当时南宁书店正摆满了这本书。关于会议的情况他也谈了些自己的看法，说很想读点书，更多熟悉经济工作。

在延安中央青委工作时，胡乔木是我的顶头上司。原来1939年夏在重庆开南方局青年工作会议时，我是湖南代表，胡从延安来，会后同我一起到湖南检查地下党的青年工作，

<sup>①</sup> 见《龙胆紫集》“怀田家英六首”第一首。



党决定我调离湖南，我们一起离开湖南，又一起到延安，是他将我留在中央青委工作的，我同他谈问题也较少顾忌。

“水主火辅”方针的认可，这于我可说是此行最大的收获，觉得从此水电建设可以展开一个新的局面，要钱要人可能比以前会顺利一些。但这个方针在电力部内部是会有争议的，尤其计划部门和火电系统会持怀疑态度。多年来，我常常谈到水电是在“夹缝中奋斗”（“夹缝”即指火电与水利之间），觉得今后有可能从夹缝中脱出了。从事水电建设的人，无不希望水电这一廉价、再生、干净的能源，能多搞快上。这时尽管心情有愉快的一面，但我仍背了两个包袱，离开南宁回到北京：一个即“兼职秘书”，前途未卜；另一个是水利、电力两部合并，我很不安，担心受到责难，因两部领导对此毫无精神准备，以为是我挑起了这种矛盾，导致合并。我知道电力部的同志是不同意采取这种办法解决矛盾的。于是我向李富春反映了这种顾虑，请他向两部领导讲清这个“时差”——并非是我谈了三峡的看法和两部矛盾之后才做的合并决定。在我的记忆中，水电水利工作之间的矛盾，到1956年、1957年时，除长江三峡问题外，官厅问题早已解决，黄河、淮河、辽河等有关问题和有关工程，大体都已解决或接近解决，尤其是黄河规划，两部合作得较好。其实当时两部不合并，也是可以正常工作下去的。

我的秦城诗作《龙胆紫集》中，有“三峡”诗三首，其中第一首即记南宁开会之事：

一电忽传飞邕宁，事关三峡误三门。  
故人为我担忧虑，成竹藏胸敢直陈。  
骋辩当廷虚实显，上书隔日是非分。  
偶逢破格常言事，祸伏之心归语人。

第三首则对“秀才”之名颇有看法：在三峡之争中，我是从自己的工作水电建设同国家经济发展规律的关系，作了经济和技术等较全面的了解，才得出比较切合实际的想法，从而坚持了自己的观点，毫不动摇。如果要说在这场争论中对优胜者值得赞扬的，首先应当是义理，而非词章；而且这是在脱离了坐而论道的宣传岗位之后，才能做到的。这种心情和祸伏结局，反映在第三首五言十二句中：

案前摆战场，亦似叙家常。  
诸公心落石，朝日雾飞光。  
但说文章好，未言经济长。  
已非涂抹手，斩水劈山忙，  
或云夺鼎甲，谁解非瑞祥。  
及今思讖语，鬓雪须也霜。

## “大跃进”的序幕南宁会议

南宁会议于1958年1月11日开始，到22日结束，距今近40年了。我是在17日以后，因讨论三峡问题参加会议的；由于赞赏我的意见，竟意外地被命为毛泽东的兼职秘书，从此就卷入了“大跃进”的漩涡之中。由于田家英和周小舟当时即告知会议的主要情况，现在根据有关资料记录下来，自认还是能比较确切真实的。

南宁会议可说是当年“大跃进”的序幕。现在来回顾这段历史，对于当前和今后的经济建设，怎样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无疑还是很有意义的。

### 反冒进问题的前因后果

南宁会议自始至终，毛泽东主要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错误”，从而为“大跃进”作了思想先导。

1956年反冒进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主要是由于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上，而实际是经济建设方针上，毛泽

东跟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意见不一致。这就需要回顾一下1956年到1957年的一些有关情况。

由于缺乏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只能照搬苏联的一套，156项骨干工程由苏联援助，整个计划也是基本上依靠人家拍板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得很好。这些做法，虽然当年只能如此，但毛泽东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三大改造已经不同于苏联，尤其在农业改造中，大加批判实际并不存在的“小脚女人”右倾保守之后，农业改造一马当先，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急速加快，敲锣打鼓，3年完成了原来设想15年之事。根据“广大农民群众中存在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认识，以及当时国际形势趋于缓和，毛泽东认为应当不按常规走路，以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他首先考虑农业远景，以为应加快发展。1955年11月，他主持制定了《农业十七条》。随后于1956年1月出台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粮、棉产量每年分别以8%、10%以上速度递增，从而保证到1967年粮食年产量为1万亿斤，超过过去设想水平达80%；棉花为1亿担，更超过一倍多。按毛泽东当时的话说：现在我对农业有信心有办法搞上去了，已有出路了；工业上还没有办法，还没有劲，我要用农业“压迫”工业。他认为应趁此良机加快工业的发展，工业不能跟农业脱节，中国工业化以及科教文卫等事业的规模和速度，都应当扩大和加快。

早在1955年夏，国务院曾根据各部的设想，讨论并编制过15年（1953—1967）远景和二五计划的轮廓：1967年，粮产量达到6000亿斤，棉花5600万担，钢1800万吨，工农

业总产值十五年平均年增长 9.5%。毛泽东对这个设想是不满意的。他批评领导机关的思想严重落后于实际。在 1955 年 12 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就这样明确说道：“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许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必要了。”公元 2000 年才可能达到的指标，1967 年就要达到，可见当年的那种急躁，何等地脱离实际。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出版，毛泽东上述思想在党的会议上的传达，立即产生全国上下的广泛影响。关于工业建设应力求多快好省作为一个方针，这四个内容不同又相互联系的字，是由周恩来、李富春、毛泽东先后提出并最后形成的。但他们提出时着眼点不同，毛泽东在多与快，周恩来则强调全面掌握。1956 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正式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从而使得各级计划部门和经济部门出现了冒进的偏向，大上基建项目和增加基建投资，职工一年增加 200 多万人，造成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的紧张。1956 年 1 月中旬，在党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谈到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计划必须是实事求是的，而不是盲目冒进的。随后二月间，在国务院的有关会议上，由周恩来主持，几次压缩指标，压缩年度基建投资，反对盲目冒进。他还这样谈到：“领导者的头脑发了热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

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sup>①</sup>经过这样“促退”之后，1956年的基建设资仍比上年增长60%，当年基建多用了20亿元，市场多售粮110亿斤，财政和信贷多支出30亿元（占财政支出十分之一），不得不多发了10多亿元票子，造成国家财政的紧张。

由于周恩来和陈云、李先念等的努力，国务院向六月间召开的人大会议的报告中，写上了急躁冒进是经济建设中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七月到八月间，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周恩来找国家计委负责人讨论二五计划时，关于建设速度，都认为必须根据可能、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计算生产潜力，除人力条件，还必须考虑到物资等其他条件。关于农业生产，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要全面估计到，“水旱虫灾总要起作用”，仍会有丰年、平年和歉年，粮食生产难以每年6%以上速度递增。关于工业生产指标，周恩来和陈云、薄一波等都不同意把钢产量看作是衡量国家工业化的唯一尺度，并批评了片面发展钢铁生产的错误观点。

为配合党中央、国务院反冒进，刘少奇指示中宣部起草一篇社会论刊《人民日报》，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对于坚持两条路线斗争，有什么倾向反什么倾向，作了深入阐述。由此，反冒进在全国上下引起了广泛的重视，从而为向党的八大提出一个合乎实际情况的二五计划的制订，创造了有利条件。后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这样谈道：“1953年小冒了一下，1956年大冒了一下。”因此，经济建设必须坚持“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方针，成

<sup>①</sup>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91页

为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的共识。当时对于这种压缩指标，反对冒进，毛泽东未表示异议，在党的会议上，或同有关人上的谈话中，他都没有提出过不同的意见。由于已经有了工业速度应当加快乃至可能加快的想法，以及中华民族应当有点雄心壮志的气概，他只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讲话中，讲过这样的话：美国那点东西，1亿吨钢，几百颗氢弹，不大算数，中国要超过它，首先是接近它。关于发展速度，他当时认为中国应当比苏联快一些。

早在1955年12月到1956年3月，1956年2月到4月，刘少奇和毛泽东先后听取了国务院所属34个部委（主要是经济部门）的汇报，为党的八大和二五计划的制定，作调查研究准备。在汇报中，除了各业务部门本身的具体问题外，涉及到经济建设中许多全局性的问题。当时适逢苏共二十大召开，斯大林的盖子揭开。在经济建设上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轻视轻工业，农业长期停滞，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等等，问题甚多。他们两人在听取汇报时，都有重要的和精辟的插话，说明他们根据中国的国情，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许多新的设想，在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的新的发展道路。这样，边听边议，最后毛泽东总结为十大关系问题。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之后，随即于5月间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个报告说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几个重要的原则问题：首先必须正确处理积累同消费、重工业同轻工业、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必须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三者之间利益；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时，必须同时注意生活资料尤其粮食的生产，提出农业与工业并举的方针等。其次，合理解决经济建设的布局，大

力发展内地工业，同时充分利用沿海老工业基地以支援内地。第三，经济管理体制上，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扩大地方权力，给地方更多独立性。同时给企业必要的自主权。第四，在中国同外国的关系上，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必须有分析有批判，不能照抄照搬：“过去我们就是鉴于苏联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要引以为戒”。《论十大关系》为当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思想指导，也是八大文件中经济建设方面的理论依据

在三大改造已经完成，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国内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以后，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扩大党内党外民主生活，改善有关制度，已成为突出问题。毛泽东在听取各部汇报时，介绍了刘少奇说的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哇哇叫，二怕民主人士发议论）之后说，我们搞两个万岁，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万岁。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还谈到：“一个党，就是一鼻孔出气，呼吸就不舒适，会使思想僵化，社会发展停滞起来。”鉴于文化科学领域内，存在着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左”倾思想，也曾受到苏联在这方面粗暴干预等不良影响，毛泽东在研究十大关系过程中，提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个著名的“双百”方针，也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郑重作了说明：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学派，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們也需要这样办。在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李森科、非李森科，有那么多的学



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都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随后，5月26日，陆定一向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对这个方针作了全面的系统的说明。双百方针不仅在文艺界和科学界，也在全国文教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眼界顿时开阔起来，思想顿时活跃起来。1957年1月间，在党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针对党内一些同志对此方针的怀疑和某些消极现象的出现，毛泽东先后两次谈到：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双百方针很不理解。这个方针是合乎辩证法的。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香花也是跟毒草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sup>①</sup>同时，他也指出：“统一物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sup>②</sup>随后在2月和3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的讲话，《在中

<sup>①</sup>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46页。

<sup>②</sup>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50页。

《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双百”方针，明确宣布，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以上引述有关双百方针问题的情况，可以说明毛泽东当时的主导思想，是为调动一切社会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全面服务。

总之，新中国刚刚成立七年，在抗美援朝、三大改造、经济建设等方面取得一系列胜利之后，在国内外有利条件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在探索有别于苏联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都认为国家任务已由阶级斗争转而向自然开战，即发展生产力的斗争，同时也要在文化科学技术方面更加开放，同生产力同步发展。像我们这些当年在经济战线上做具体工作的人，从自己日常业务中，更是理所当然这样认识 and 理解的。

1956年9月召开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刘少奇的政治报告，邓小平的修改党章报告，周恩来的二五计划报告，都是经过中央集体反复研究并经毛泽东审定的。这三大报告和有关决议，说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上，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探索，我们党已经趋于成熟，作出了一系列的正确决策。

首先，是党的工作重心已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由于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

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sup>①</sup>这就是说，新中国已经开始进入了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是整个八大路线的基础和核心。这是对中国国情实求是分析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也是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的结果。

其次，关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总结了一五期间的成功实践，以及1956年坚持反冒进的经验，认为应当继续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周恩来在报告中特别指出：“应该根据需求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同时，要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要正确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规定好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要注意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等等。薄一波在大会发言中，根据1953年到1956年的建设经验，提到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在今后若干年内，在通常的情况之下，我国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不低于20%，或略高一点；我国国民收入中国家预算收入的比重，不低于30%，或略高一点；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不低于40%，或略高一点。”

第三，为适当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将一部分职权分给地方，以便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对于经

<sup>①</sup> 引自刘少奇在八大的政治报告。

济体制作了一些改进的规定。陈云在长篇发言中，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格局：工商业的经营，除国家和集体为主外，应允许个体经营为补充；市场调节为辅，应允许企业有一定自由，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流通管理方面，以国家市场为主，统一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为补充，允许某些商品价格在一定范围内波动。

第四，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继续巩固人民民主的统一战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正式写入了八大文件。“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是错误的”。为健全国家的法制，要逐步制定完备的法律。只要没有违反法律，要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受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干涉。

第五，关于党的建设，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偏向。鉴于国际共运和党的历史教训，强调了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突出个人、为个人歌功颂德，全党要健全集体领导，避免个人专断。

八大开完之后，在编制 1957 年经济计划过程中，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家计委和经委继续贯彻反冒进的方针。鉴于东欧的教训，大家在讨论中提到毛泽东常说的“既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话。从而确定 1957 年实行“重点发展，适当收缩”的方针和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发展计划。周恩来说：“不适当收缩会影响货币、物资、各方面的平衡。也可

能出现中国的波兹南事件。”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中，议论了这个方针和计划控制指标。毛泽东在会上还这样说道：经济建设不是一点没有进退地、四平八稳地前进着，有时多一点，有时少一点，有时快一点，有时慢一点，有时上马，有时下马，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承认了这一点，那么今年冒进一点就不是不得了，明年少搞一些进也没有什么。1957年1月下旬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方外，陈云提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观点，以及经济建设必须保持财政收支、银行信贷和物资供应三大平衡的著名论点；并强调基本建设规模必须瞻前顾后，避免陡升陡降，造成损失。这些方针和论点，当时为我们经济战线的工作人员所深刻体会。由于及时批判了冒进的思想作风，坚持了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经济建设方针，1957年的计划完成得很好，是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工业总产值仍比上年增长4.5%，钢和煤的增长都在10%以上，基建投资则比上年减少20%多。1956年国家财政、物资等紧张的局面，缓和下来了。

针对苏共二十大之后出现的问题，波匈事件的教训，以及国内几处城乡学生请愿、工人闹事、农民闹退社的情况，毛泽东在这段时间内，主要考虑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内部矛盾这个大问题。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即根据党中央会议讨论的结果写成，第一次从国际共运范围内提出两类矛盾问题。在一月下旬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关于

这个问题的更进一步展开论述，是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所讲十二个问题中，有一半是与这个问题直接有关的，如两类性质的矛盾，肃反问题，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等问题，人民闹事出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也是与此有关的。这个讲话随后向广大干部传达了，有着广泛的影响。随后三四月间毛泽东经天津南下，一路在济南、南京、上海、杭州的党员干部会上都谈到这个问题，但每次反复强调的还是以下观点：全党面临的新任务，就是建设，全党要学会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已基本结束，这是八大作了结论的；我们在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随着敌我矛盾在国内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开始比过去显露了。这时刘少奇也沿西线南下，也在一些省市讲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说人民闹事，罢工游行请愿，多由于领导机关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并且谈到如出现下述四种情况，中国也可能发生匈牙利事件：1. 党犯了长期路线上的错误；2. 处理方法错了，如用镇压等；3. 反革命利用；4. 党内有人领导。4月27日，刘少奇在上海党员干部大会上说，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主要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这种非对抗性矛盾，可以用小民主办法，和风细雨来解决；我们没有必要去强调斗争，故意地、人为地使斗争激化，使斗争紧张起来，好像我们就有那么一种嗜好，不斗一下就不过瘾。可见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人的观点，这时是比较一致的，都反映了八大的正确路线。

还在八大的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就谈过要继承党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现在我们的工作中还经常有许多这样的事情。”反对宗派主义，是要讲团结的。“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sup>①</sup>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我们准备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sup>②</sup>随后在三月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谈到这个问题：通过整风，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改革以及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党内党外积极批评共产党在这三方面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方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是延安整风的宝贵经验。文件强调，用和风细雨、实事求是的方法，开展批评。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要求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方面的矛盾，对高等教育、普通教育、文艺、科学、卫生等方面，“切实

<sup>①</sup>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96页，第297页，第299页。

<sup>②</sup>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7页，第328页。

攻一下”，不然官僚主义等永远不得解决。并且提到党外人士有职无权，学校党委制，以及好大喜功等问题。这样，一年多来，党的一系列决策和号召，毛泽东的多次重要讲话，确实如和风细雨，浸润着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心田。

关于帮助共产党整风，整风运动怎样从小民主的小鸣大放转到大民主的大鸣大放？和风细雨怎样变成急风暴雨？早春的天空为何黑云乱翻，乃至“黑云压城城欲摧”？“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怎么忽然变成“惊涛骇浪”？“大多数是正确的善意的意见”<sup>①</sup>，怎样被视为“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为何从欢迎批评转到“引蛇出洞”？总之，为何整风运动突然变成反右派斗争，最后导致反右派严重扩大化及其严重后果等等，这些问题都不在此探究评述，这里要谈及的，只是同南宁会议反冒进一事有关的思想来源。看来，从1956年到1957年发动整风运动时，因受苏联、东欧形势的影响（认为中国也有发生匈牙利事件的土壤），毛泽东对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即所谓“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阶级斗争形势”，不论在量的方面和质的方面，都估计得过于严重，从而把许多多善意批评、肺腑之言甚至稍不顺耳的正确建议，统统视为右派进攻，把刚刚讲过的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了。完全以言定罪，以思想意识作为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同时还以政策代法律，以群众斗争代司法程序，从而使八大规定的法制建设渺无希望，人治代法治更加合理升级。

<sup>①</sup> 李维汉：《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工商界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1957年6月3日）。



由于“右派言论”中有“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这一类的语言，有许多批评冒进的意见，于是毛泽东从此将“反冒进”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将冒进与保守同左与右、同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总之，将政治意识与政治斗争引入经济思想与经济领域，从而经济生活必须以政治挂帅，无处不存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了。于是，八大的正确路线，从政治思想、经济政策，到党的建设、民主法制等方面，逐渐为另一种“左”的思想、政策和路线所替代了。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篇著名的报告，本来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从理论上阐述和发展了八大的正确路线，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在理论上的一个贡献。报告中再次阐述了双百方针，希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造成一种更加民主自由、生动活泼的局面。在讲话时，本来想强调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今后应该向科学技术进军，开展技术革命。可是，1951年6月19日，此文作为正要开始的反右派斗争的指导文件发表时，毛泽东加了这样一段很长的话，从而改变了八大对我国社会情况和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

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sup>①</sup>这种同八大精神相背离的思想理论，成为以后阶级斗争的实践和理论步步升级的嚆矢。

同时，毛泽东在文章中增加了区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标准，显然与反右派斗争有关。这样就导致以政治标准作为统率一切的争论，包括思想、理论、科学、文化、艺术等方面不同观点的是非标准，不仅难以真正辨别是非，而且为以政治手段、阶级斗争方式解决思想领域中的种种问题，开了方便之门。接踵而来的反右派斗争，即是许多从善意出发向党提建议的人，当作敌人，打成政治上的右派。国家进入建设时期，必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这个本来正确的设想，反右运动一来，走向反面：将同志、朋友变成敌人，二十多年之后，50多万人才平反，时间和才华都耽误了，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至于“文化大革命”中泛滥起来的“思想战线的大革命”，其荒谬危害和造成的损失，就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种历史的教训太沉重了。

1957年10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中郑重表示，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是不对的，还是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正确：“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sup>②</sup>同时，从1957年工业发展速度（10%）远不如1956年（31%），农业因水旱灾害较大而没有达到计划指标（仍比上年增加50亿斤），这种很不恰当的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89页。

<sup>②</sup> 《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75页。

背离实际的估计出发，他对反冒进提出了错误的批评：1956年经济文化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冒进了，刮起了一股反冒进风。因此，“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还扫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认为党的委员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sup>①</sup>毛泽东认为反冒进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而且给右派的猖狂进攻以影响，右派是促退派，共产党永远是促进派，因而影响了1957年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的发展。他认为发动全体农民讨论发展纲要是非常必要的。“要鼓起一股劲来。去年下半年至今年上半年松了劲，加上城乡右派一闹，劲就更不大了，现在整风反右又把劲鼓起来了。”<sup>②</sup>他预料，反右斗争的胜利，将使我国社会面貌一新，将使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将掀起一个规模宏大的高潮。他还谈到中国的建设道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sup>③</sup>。由此可见，这种对反冒进的批评，不是工作成绩上多了点少了点的问题，而是对有关经济发展方针的批

① 《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74页。  
② 《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94页。  
③ 《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73页。

评，对社会主义建设快慢的批评。1955年以来毛泽东一直在追求一种较高速度的新的发展经济的办法，来代替积极稳妥、讲究综合平衡的苏式道路（或者认为这是一种四平八稳、缺乏革命精神的旧历书）。

经过几年的反复变化，毛泽东终于放弃了一度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达成的正确共识，而不同意八大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回到自己这样一种对中国当时社会政治情况的错误看法，据此来探索一条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于是，从反冒进入手，首先力求以多快为主加快经济建设的速度，以自己的崇高威望和无畏精神，动员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而促成“大跃进”的到来。

### 柯庆施的“乘风破浪”

1957年11月，庆祝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时，64个国家共产党的负责人云集莫斯科开会，毛泽东亲率中国代表团前往参加。这时，赫鲁晓夫提出“十五年赶超美国”的目标。“或是灭亡，或是在经济上也超过先进国家”，这是从列宁到斯大林的战略思想，斯大林在1939年讲过“十至十五年超过”的话。这种想法也影响了毛泽东。1955年他谈过用十个到十五个五年计划赶超美国的设想；《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提到：“准备以八个至十五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赫鲁晓夫提出了这个口号之后，毛泽东在各国党的代表会上说：“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他是以钢为标准说的：“我们今年有了520万吨

钢，再过五年，可以有 1000 万吨到 1500 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 3500 万至 4000 万吨钢。”“以钢为纲”的思想，可能于此萌芽。

关于毛泽东批评反冒进和改变八大路线方针的思想观点，以及“十五年赶超英国”的雄心壮志，当时在言行上跟得最紧，因而很受毛泽东赞赏的人之一是上海党的领导人柯庆施。“柯老”（毛泽东当年谈话即用此称呼），也是后来大跃进“万马奔腾”时，“一马当先”，睥睨一世的人物。1957 年 11 月 13 日，柯庆施到杭州参加浙江四级干部会议，作了一个长篇报告（一万八千字），主要谈“关于矛盾的问题”（约占一半篇幅）。开宗明义就说道：“主席在三中全会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个矛盾，概括起来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是我们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为了使这个判断同八大决议衔接起来，柯是这样说的：“有人说：‘你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的，这与八大决议是不是矛盾了？八大决议没有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这是由于大家没有好好看。八大决议讲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现在又讲阶级斗争，而且讲阶级矛盾是主要的，是不是有矛盾呢？不矛盾的，因为阶级斗争解决的问题是所有制的问题，所有制的问题解决了，阶级斗争应该说基本结束了。基本结束了是不是说没有阶级斗争了呢？那谁说过呵！不但没有说过，八大决议还说：‘毫无疑问，我国人民还必须为解放台湾而斗争，还必须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还必须为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不坚决进行这些斗争，

是决不许可的。’解放台湾是什么矛盾哪？最后消灭剥削制度是什么矛盾哪？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是什么矛盾哪？这不是阶级矛盾吗？八大决议接着又说：‘但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主要是从阶级斗争结束之后，我们要很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生产这个角度来说。”柯庆施这种说法的强辞夺理是显而易见的。下面他还不能不引用八大决议这一段话：“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由此，柯讲到共产党的“斗争策略”：“这里不是说得很清楚吗？第一，基本结束是讲所有制问题解决了；第二，基本结束不等于完全结束了。所以这次的提法与过去基本上没有不同。但有一点，过去是分散提的，这次是集中提的。过去为什么分散地提呢？八大的时候，人家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地接受改造，把财产交给国家，你那个时候还说‘阶级矛盾是主要的’，那个话就不得人心。那么现在呢，我们说：‘你心里还不服气，我们还要来一个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原来他以为‘我把财产都交了，我已改造完了’。他尾巴翘得很厉害，在这个时候，你让他翘一翘，翘得很厉害，然后你可以说：‘你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呢？所有制问题解决了，但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解决。’所以现在集中提一提很需要，这就叫做斗争的策略。在什么时候我们应该着重什么提法，这是要有策略

的。”

柯庆施的这种解释，即阶级划分的“理论”，不仅是所有制问题，还有更关紧要的“思想战线”问题，要从思想上划阶级。这个报告在起始时，这样谈到人民内部矛盾有两种不同范畴的问题：“一种是属于改造性质的——资产阶级改造、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改造。所谓上层小资产阶级，在农村就是富裕农民。一般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改造问题不大，但富裕中农的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资产阶级的改造那就需要很长时间了。”他们中间“还包含一个问题，对社会主义道路动摇问题。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上说：他们不服气。不服气怎么办呢？这里就分两种人：一种不服气厉害的人，就成为右派分子，要跟我们较量一番；一般的人不服气，但他也就算了，你今天做一点工作，同他说一说，对他的安排注意一下，他就服气了。明天呢？明天还不服气，这样在那儿动摇。所以政治战线上还要来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因为两条道路问题还没有解决。所谓没有解决，包含两种意思：少数的人坚决抵抗社会主义道路；大多数人是动摇。……动摇的就不要打倒他，要慢慢地教育他、改造他。所以大多数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在政治、思想上的两条道路问题就没有解决，他们处在中间状态。为什么会把他们放在人民内部呢？因为他们不是右派，不是反革命分子，没有拿刀拿枪来打我们。人民内部叫做什么问题呢？叫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里上层建筑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意识形态。经济基础是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意识中还有个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的残余或者影响。”对于代表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柯庆施

说：“尤其麻烦的是两种人：一种是上层小资产阶级，一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只要工人说几句话，他就缩回去了，他要是说鬼话，要是有什么违法行为，只要随便向他算一算帐，他就受不了。……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第一，他说他有学问，他认识几个字，他尾巴翘得很高；第二，他说他没有剥削人家；第三，学生中他有影响，他还有点群众基础，这个事情是比较难办的。你不能随便把他捉起来，杀掉，所以我们要对他做很多的工作，还是要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然后，讲到“人民内部矛盾怎样解决呢？毛主席提出的叫做不许压服，只许说服。什么是说服？说服的办法是什么？这就是大鸣大放、大争大辩，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摆事实讲道理。”他还谈到他自己的经验：“记得在杭州开会的时候，主席曾经问怕不怕，我说我也怕也不怕。从大的道理上讲，我不怕，因为军队在我们手里，枪杆子在我们手里；可是这么一放以后，究竟放出什么玩意来，闹出多少问题，放出什么结果，放出后怎么办，这么一些具体问题我们摸不到底。……现在呢？我摸到了底，有了经验，我就不怕了。”“这次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毛主席告诉我们：你们负责同志一句话不说，坐在那里硬着头皮去听。”柯庆施介绍了自己的经验：“有的时候实在听不下去了，我就借抽烟的名义，走到后面去喘一口气。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让他充分去说，不仅说而且把他在报纸上登出来，这就使得右派分子的面目完全暴露了以后，你就反他的右派。思想问题，让他充分说清楚，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最后我们摆事实讲道理。”

一个多月后，1957年12月25日，柯庆施在中共上海市



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又一个长篇报告（三万多字），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其中的第一部分和第四部分在1958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全部转载，并在文首刊有以下的编者按：“柯庆施同志的这个报告，虽然大部分是关于上海的情况和问题，但是报告特别是报告的第一部分和第四部分，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柯庆施同志在报告的第一部分中，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对于国内的主要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及其正确的处理，都作了详细的分析和阐明。这一部分中还谈到了对1956年工作的评价，批判了那种认为1956年各项工作都‘冒进’了的错误的说法，说明了多、快、好、省勤俭建国方针的正确性。这是值得大家重视的。报告的第四部分分析了党内干部的思想状况，提出了发扬革命朝气，打掉官气，实行劳动锻炼，深入基层、联系群众的制度，以及培养又红又专的红色专家等重要措施。”

关于国内的主要矛盾，柯庆施在行文方面比浙江的报告显得礼貌些，报告中是这样说的：“1956年初达到高潮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手工业三大改造运动，标志着我国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这方面的矛盾基本解决了。但是，社会主义革命是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最彻底、最深刻、最广泛的革命；所有制的基本改变，不但还没有完全解决经济战线上的问题（所有制还没有完全改变，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发展还很不充分），尤其还没有完全解决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在我们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

党章的总纲里，就着重地指出：党仍然面对着‘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并且杜绝产生剥削制度的根源’的严重任务。因此，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仍然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不过在所有制基本改变以前，这种矛盾突出地表现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即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限制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在所有制基本改变之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就突出地表现在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即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不相适应，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还不承认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甚至还企图夺取这种领导权，从而破坏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

柯庆施在报告中谈到上海的一五计划完成得很好，工业产值超过计划 16.3%；右派进攻遭到严重失败，上海是一片大好形势。可是，“有一部分同志曾经认为我们上海的各项工 作都‘冒进’了。对上海工业方针的争论就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上海各方面的工作发展得这样快，是不是‘冒进’了？”他认为不是“冒进”，而是“正常”。他引用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那段谈“右倾保守思想作怪”的话，“毛泽东同志这段话，值得我们反复地阅读和思索”。认为“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我们有些同志的思想难道不是这样吗？”然后关于一定要贯彻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讲

了下面这样一大段鼓劲的话：“我们认为，既然是干社会主义革命、干社会主义建设，干这种前无古人的事业，干这种同帝国主义争时间、比速度的事业，那就必须有一股革命的干劲。那就必须对上海的各种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因素采取积极的态度，并且争取把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根据国家的统筹安排，千方百计地出主意，想办法，充分地利用上海基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在我们看来，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就努力做到，这才是正常现象；不去努力做到，这才是不正常现象。否则，就谈不到革命态度、革命气概和革命速度，就谈不到尽可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因此，我们应该坚决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勤俭建国方针。这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的方针。为了多、快、好，就需要勤，就需要努力，就需要认真；为了省，就需要俭，也需要努力，需要认真。这个方针，是既反对了右倾保守，又反对了急躁冒进。这是一个促进的而不是‘促退’的方针，是在现在的国际环境中，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应该采取的唯一正确方针，而且是一个已经在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正确方针。在执行这个方针的过程中，也可能发生个别缺点和错误，但是决不能因此对整个方针发生动摇。曾经有些人同党的看法相反，他们把这种革命态度、革命气概和革命速度，看作冒进，看作是‘好大喜功’。他们总是说这也办多了，那也办快了，这也冒进了，那也冒进了，他们就是不看一看到底是社会主义前进了，还是资本主义前进了；到底是社会主义多了、快了，还是资本主义多了、快了；到底是‘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还是相反。试问，经过一番努力能够使社会主义前进

得快一些多一些，这难道是错误吗？难道我们能够说，经过一番努力就能够做到的去做，以使社会主义事业前进得慢一些、少一些，才是正确的，才是正常的吗？难道我们坚决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就叫做‘好大喜功’，就要受到责备，而执行相反的方针才应当受到赞扬吗？当然，赞扬的人是有的，但决不会来自渴望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的广大人民。因此，我们必须批判这种实际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这种思想已经给我们造成了一些损失。去年下半年以后，多、快、好、省方针不大提了，贯彻《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规划也执行得不带劲了，不少人的革命干劲低落了。这才叫做不正常现象。在整风运动中，必须批判这种右倾保守观点，改正各种不正常现象，以便迎接新的建设高潮，促进建设事业的新高潮。”

在报告的第五部分中，柯庆施也抢先发表了15年赶上英国的提法：“在十五年后，苏联的工业在最重要的产品和产量方面可能赶上和超过美国。我们应当急取在同一期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那样，社会主义世界就将把帝国主义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为达到这个目标，他讲到上海的十二项任务。第一项是“大力发展工业生产”，其中说道：“一般轻工业，纺织工业、机电工业、化学工业部门要根据具体情况，争取若干质量较低的主要产品，在第二、第三两个五年计划期间，逐步地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或美国同类产品的质量水平。”第二项是“争取《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提前实现”。“其中粮棉产量，在正常年景下，还应当大大超过《纲要》中所规定的指标，争取在5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达到1500

斤到 2000 斤，皮棉每亩平均年产量达到 150 斤到 200 斤”。此外，其他各项任务中，还有这样一些指标：争取在 5 年内，“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能占 60% 以上”；“基本上普及小学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在 10 年内，大学生中工农成分要达到 70% 以上，劳动好的青年应优先录取”。“争取 3 年内，使上海市区和郊区基本上无蚊、无蝇、无鼠、无雀、无臭虫、无蟑螂、无钉螺，5 年内彻底做到，并坚持到子孙万代。市区有条件的地方，1958 年就应彻底做到”。报告的末尾，写得如此生动，如此富有文采：“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乘风破浪’。我想很可以用这句话来描写我们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我们的前面有浪，这就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所必然遇到各种困难。但是我们的后面有风，这就是广大的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的日益高涨的革命积极性。这是一股具有无限潜力的风，这是一股不可抗拒的风。只要我们坚决依靠群众的这种革命积极性，我们就一定能够克服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让我们用乘风破浪的革命气概勇敢前进！我们一定能够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定能够加速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的一切任务，一定能够在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作出更大的贡献。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柯庆施的这两个报告，当时有其内外两个方重要意义：就党内而言，及时地直接地支持了毛泽东批判反冒进准备“大跃进”的思想，为南宁会议作了先导。可能毛泽东常自感“曲高和寡”，尤其在北京找不到“知音”。他老讲北京的空气不好，自己的一套想法得不到有力支持，于是转面向地方寻找支持。现在在外地、在下面、在“诸侯”们中找到

“知音”柯庆施了，尤其上海是工业的“半边天”，他需要“知音”们的支持。因此，在南宁会议上大大夸奖了柯庆施这些“知音”们，说北京不出真理，真理出在上海出在地方上。就党外而言，柯庆施这种文章为制造全国舆论鸣锣开道，《人民日报》予以转载。而且，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即以“乘风破浪”为题，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极为毛泽东欣赏，在南宁会议上予以表扬。社论说苏联两颗人造卫星上天和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在几十天中间，把整个世界形势改变了”。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的力量胜过帝国主义的力量，和平的力量胜过战争的力量”。社论宣布：“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扫除消极、怀疑、保守的暮气。1955年底1956年初的干劲，曾经造成1956年的我国经济事业中的大跃进。目前，这种干劲又在活跃起来，显出威力来了”。社论引用了古语：“乘长风破万里浪”，最后说：“让我们乘风前进！让我们乘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乘压倒右派、压倒官僚主义、压倒保守思想的共产主义风前进！”

南宁会议上，毛泽东特别表扬柯庆施这篇“乘风破浪”的文章时，对周恩来说：“总理，你看过没有？你能写出来吗？”周恩来只好说：“看过了，我写不出来。”接着还说了上海是我国工人运动策源地这样的话。

由于1956年反了冒进，陈云在南宁会议上也挨了批评，他是财经方面主要负责人，自不免首当其冲。至南宁时我就听说，柯庆施早在主席面前攻击过陈云：对下面卡得过死。有一个具体事例，即上海要建一个大煤气工程，没有被批

准。1958年我同陈云接触时，陈向我说过这样的话：柯庆施是一个手中随时拿着大棒的人。

从1958年南宁会议到1959年庐山会议这一段期间，根据我的亲身经历，感到柯庆施是“大跃进”中关键人物之一，以上摘录的他的两个报告的要害部分，对“大跃进”这段历史的研究自是一种重要史料。

### 狠批反冒进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的南宁会议，有两大内容：一是毛泽东对过去经济工作的批评，主要是进一步批判反冒进；二是关于工作作风与方法问题，产生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会上听取了薄一波关于1958年经济计划和预算问题的汇报，一些省市也汇报了与此有关的情况。毛泽东于1月11日、12日、13日、16日先后四次讲话，并于15日、16日、17日、19日、20日听取汇报时，多次插话。

毛泽东在三中全会上批评反冒进，形成要加快建设速度首先在农业上突破的想法，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定的，认为1956年公布了《纲要》以后，已经“造成了全国农业生产的高潮”。全国已经有29个县市达到400斤、500斤、800斤的指标；广东和福建有七个千斤县；湖北红安县土地瘠薄，今年平均亩产已达834斤（这些数字是否浮夸，史家应予鉴定）。接着就批评1956年反冒进的错误：“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

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于客观规律的。1956年的成绩充分反映了这种跃进式发展的正确性。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了解合作化以后农民伟大的创造性，所以他们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社论最后号召：“让我们展开全民的大讨论，动员全国的力量，万众一心地行动起来，掀起一个规模巨大的农业生产建设的高潮吧！”这是通过报纸对反冒进的第一次公开批判，“大跃进”一词也是首先在报纸上出现。毛泽东对此非常欣赏，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发明，这个口号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号，在社论的批语中写道：“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12月1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这篇社论也经过毛泽东的修改审定。文中再次批评了反冒进，称1956年的国民经济为“跃进的发展”，这个方针完全正确，可是，“还有少数有保守思想的人实际上在反对这个方针”。“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来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起了消极的“促退作用”。社论要求“1958年的各项计划指标订得尽可能先进些”。这篇社论的精神，可以认为代表了毛泽东关于“大跃进”的最初思想，即至少应当有冒进的1956年那样的增长速度。

这是舆论方面的响应。地方上的响应呢？毛泽东在三中全会上的两个重大意见：关于八大国内主要矛盾提法的改变，批评反冒进以加快建设速度，首先在上海和浙江得到最



积极的响应，两地都在党的四级干部会或党的代表大会上予以热烈讨论，负责人的报告都形成了文件并予发表。其中柯庆施的报告最被看重。因此，趁热打铁，姨 1958 年 1 月 3 日至 8 日，毛泽东亲自到杭州召开了华东六省市党的负责人会议，并有两次较长的讲话。会议所涉及的问题以及讨中形成的十几条工作方法，可视为南宁会议的开端。毛泽东的两次讲话都谈到右派和右派分子处理问题，以及两类矛盾问题；认为如果没有一九五六年的跃进，工业产值比上年增长 31%<sup>①</sup>，就不能完成五年计划。会议中提出讨论问题，主要是农业纲要中的二二项规划（水、肥、土壤、品种、密植、病虫害、农业机械、副业、畜牧、绿化、除四害、地方病）；以及经济和文教十二项规划（工业、手工业、农业、副业、林业、渔业、牧业、交通、商业、文教、科学、卫生）。确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都要搞十年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今后一年要开一二次大中型会，小型会下去开。省委负责人要常下去跑跑，走马观花，下马看花，一年用四个月下去。毛泽东谈到的其他问题还有：政治与业务要结合，即红与专的问题；要反对空头政治家，也要反对迷失方向的经济家、科学家；称赞湖北省委领导干部搞试验田，麻城、红安两县经验要推广，要普遍搞试验田；工业部门也可搞试制品，这是领导方法问题。提出不断革命问题，农业改造两三年完成，不能断气，要趁热打铁，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然后再破坏，得花力气，因资产阶级思想扎了根

<sup>①</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上的回顾》一书指出：“据统计，1956 年实际完成的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28.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39 页

(东欧的教训就是断了气); 思想战线、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整风运动的办法, 应长期进行; 今后重点放在技术革命, 政治家与科学家结合起来。他从事物的相对稳定性谈到订计划、做决议, 是相对地平衡, 而不平衡、闹矛盾是绝对的; 企业与企业间、个人与个人间, 是不平衡的。不平衡不仅是社会法则, 也是宇宙法则; 刚刚平衡, 立即突破; 刚刚平衡, 又不平衡。早在 1955 年 12 月, 刘少奇在一次有在京中央委员参加的党政军各部负责人的座谈会上, 传达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 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时, 就有这样一段话: “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 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sup>①</sup> (南宁会议谈到对立的统一和斗争, “要搞点对立的斗争”。) 这个不平衡的哲学思想, 是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经常谈到的观点, 后来成为计划工作的理论根据, 导致做计划的随意翻番乃至无法做计划, 这是后话了。这里谈到的一些问题, 后来在南宁会议上又继续谈开或有新的发挥。概括起来, 最后形成的《工作方法六十条》, 其中有十多条是杭州会议议论过的。

在这次会议上, 柯庆施特别提到要有干劲等问题, 受到称赞。杭州会议还提出全国按原来大区 (中央局), 搞成几个经济协作区, 有的省可交叉, 认庙不认神。八大二次会议后, 1958 年 6 月初, 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七个协作区。

南宁会议是紧接着杭州会议开的, 可以说, 是杭州会议

<sup>①</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522 页。

的继续。由于部分党中央和国务院负责人、各大区（协作区）负责人和中南省第一书记参加了，会议时间较长，讨论的重大问题也多，最后形成了《工作方法六十条》，所以史家称南宁会议为发动“大跃进”最初的一次会议。1月11日、12日，毛泽东接连讲了两次；14日，集中讲了24条工作方法。之后，在各省和中央财经负责人作关于1958年计划汇报时，毛泽东又有许多插话，这些分散的意见或者即兴之言，还有讨论时的部分众人之言，几条几条凑起来，有分有合，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多年来的经验，也总结了国际共运的经验，最后形成了《六十条》。这个集当年“工作方法”之大成的重要文件，其中有许多光辉的思想，值得永远学习的工作方法，也有不少是推动了“大跃进”狂潮的错误的东西。可以作这样的看，产生这个《六十条》的原动力，是1956年和1957年这两年发生的国内外重大事件；反冒进，鸣放，整风，反右，农业尤其水利“高潮”中出现的大无畏精神，以“呼风唤雨”的英雄气概，从尽快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愿望出发，想用最短时间超英赶美，使中国迅速强大富裕起来，从而发动了轰动全国也震惊世界的“大跃进”运动。《工作方法六十条》的草稿，1月31日就印出来了。

三中全会批评反冒进，毛泽东是从经济主针来谈。南宁会议时，前前后后，反反复复，多次谈及此事，他主要将反冒进同政治联系起来，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是政治大问题；认为这个问题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澄清，否则，无法前进。虽然语言上照例生动风趣，但辞锋犀利，甚至偶带挖苦，有时还不免疾言厉色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

题。一反就泄了气，6亿人民一泄了气，不得了。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伸出手看看，究竟有几个指头生了疮？不过一个指头有毛病，不过多用了一些钱，多用了一些人；就“库空如洗”呀，“市场紧张”呀。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治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不就变了吗？钱多花了，计划大了，要批评，我也批评过，如广东、河北通县专区产量定得过高。我是“抱着石头打泡沔”<sup>①</sup>，做事历来是稳当的。

——十个指头是关系6亿人的问题。对于我们共产党，对于我们的事业来讲，总是几个指头是好的，不过一个指头有毛病。那就是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搞泄气，使整个工作受到很大损失的问题。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占董”。张奚若（未划右派）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陈叔通也讲过：“我看方针是冒进为主，保守为副。”过去北方亩产一百多斤，南方二三百斤；蒋委员长积二十年之经验，只给我们留下4万吨钢（年产）。“好大喜功”，看什么大，什么功，是反革命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的好大喜功。不好大，难道好小？中国这样大的革命，这样大的合作社，这样大的整风，都是大，都是功。不喜功，难道喜过？“急功近利”，不要

<sup>①</sup> 打泡沔，湖南土语，游泳

功，难道要过？不要对人民有利，难道要有害？“轻视过去”，轻视小脚，轻视辫子，难道不好？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青岛、长春的房子就好。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偏听偏信”，不偏听不可能，是偏听资产阶级，还是偏听无产阶级的问题。有些同志偏得不够，还是要偏。我们不能偏听梁漱溟、陈铭枢的。“喜怒无常”，有常，也并不好，不能对资产阶级右派老是喜欢。“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比后进的问题，古董总落后一些嘛。我们除四害，把苍蝇、蚊子消灭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总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1956年“冒进”，1957年反“冒进”，1958年恢复“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这里举了河北和安徽两个例子，后者曾载《人民日报》社论《乘风破浪》。）河北兴修水利，1956年1700万亩，1957年200万亩，1958年2700万亩。治淮河，七八年共花了12亿元，只做了12亿土方；安徽去冬今春8亿土方已超额完成，决定再做8亿土方，（随后报纸公布，去冬今春共搞了16亿土方）一共不过用几千万元。双轮双铧犁，浙江发动全省讨论，浙江、安徽、两湖都能用。（周小舟发言时，谈到双轮双铧犁推广中确有缺点。）要为双轮双铧犁恢复名誉，重新启用。扫盲，路上挂识字牌，还要坚持。

——我乃罪魁祸首。1955年12月写敢《农业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反了右倾保守，对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是个人崇拜也好，偶像崇拜也好，不管是什么原因，各地人

小报纸刊物都登了。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后来又心血来潮，找了34个部长谈话（大家劲都很足），谈了十大关系，就头脑发用胀了，“冒进”了，我就不敢接近部长了。三中全会，我讲去年砍掉了三个东西，没人反对，我得彩了，又复辟了，就又有勇气找部长谈话了。这3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什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研究一下，究竟哪个大？

（谈到此处，就提出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的问题。）

——这里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了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为什么要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只有一个指头有病，是九与一之比。这篇东西没有弄清这个比例关系，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像陈叔通、黄炎培、陈铭枢的方法。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序言”提出批评。又引用了我在“序言”中讲的一段话，<sup>①</sup> 我的文章重点不在此，而在反右倾保守，要引就应引用全文。文章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烦我，二可利用我打别人。

——我要争取讲话。1956年1月至11月反“冒进”。二

<sup>①</sup> 社论引了这一段：“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

中全会我讲了七条，是妥协方案，解决得不彻底。<sup>①</sup> 省市委书记会议，承认部分钱花得不当，未讲透，那股反“冒进”的风就刮普遍了。廖鲁言（农业部长）向我反映，40条被吹掉了，似乎并不可惜。对此可惜的人有多少？叹一口气的人有多少？一下吹掉了三个东西。有三种人：第一种人说：“吹掉了四十条，中国方能得救”；第二种人是中间派，不痛不痒，蚊子咬一口，拍一巴掌就算了；第三种人叹气。总要分清国共界限，是国民党是促进的，还是共产党是促进的？

——反“冒进”的人为党为国，忧虑无穷，脱离了大多数部长和省委书记，脱离了六亿人民。请看一篇文章，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此文使登徒子两千年不得翻身。宋玉的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九个指头不说，只说一个指头，就是这种方法。我们就怕六亿人民没有劲。不是讲群众路线吗？六亿人民泄了气，还有什么群众路线？看问题，要从六亿人民出发，要分别事情的主流、支流、本质、现象。

——五月间右派反攻，使得那些有右倾思想的同志提高了觉悟，这是右派的功劳，也是激将法。

认为反冒进的矛头是针对“序言”，是同历史方向背道而驰，挫伤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乃至同右派只差50米远了……两年来，对1956年那篇《人民日报》的社会，毛泽东是一直耿耿于怀的，只有到南宁会议时，才将这些看法一一道出。首当其冲的是周恩来和陈云（陈没有参加会

---

<sup>①</sup> 二中全会上，关于经济问题毛泽东讲了七条意见，认为1956年共多用了约30亿元，其中基建投资多用了15亿元。同意1957年计划安排是稳妥的等等。

议)。在八大之前，最后修改二五计划草案时，鉴于多快同好省之间的关系，人们往往只抓住前者而忽略后者，周恩来曾在一个重要之处删掉了“多快好省的精神”几个字。此事在会上也被毛泽东一再提出。因此会议形势极其紧张，有的同志晚上睡不着觉。当时，立即从北京把社论原件找了来。原来社论是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先后经过陆定一、刘少奇、胡乔木三人修改定稿，少奇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35年之后的现在，我们重读这篇著名的“历史文献”，会感到这篇文章虽然重点在反对急躁冒进，但也确实处处照顾了题目的另一面：“要反对保守主义”。文章一开头就肯定了1955年下半年以来，“反对保守主义的斗争”已经取得重大效果，即全国已有90%以上农户加入了生产合作社，私营手工业和工商业改造也已基本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鼓舞下，广大工农群众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引用“序言”中那一段话，也恰到好处。而且在“什么是右倾保守，什么是急躁冒进，这里有一个客观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实际的可能性”，这样一段论正确的工作方法之后，还有以下一段话：“我们应当根据事实下判断，有什么偏向，就反对什么偏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把什么都反成保守主义，或者都反成急躁冒进。如果反对过火，就会反了一面又造成另一面的偏向，于工作反而有害。”文中关于急躁冒进的具体例子只举了两个，一个是双轮双铧犁，“生产计划定得过高，没有考虑到南方水田的条件，以致在南方大量积压”。另一个是农村扫盲，中央本来规定的时间是五至七年，可是“至某些县里成了三年，愈到下面定的时间愈短”。以致农忙时也大搞，“个别的地方甚



至设立识字岗、拦路识字站，强迫群众识字”，“妨碍农民生产，招致农民埋怨之外，并收不到好的效果”。据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说：“乔木同志加写的双轮双铧犁的例子，定一同志修改突出的扫盲例子，在当时是比较敏感的两件事，因为都直接涉及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为适应农业合作化后的新情况，推广新式农具，《纲要》规定：‘在3年至5年内，推广双轮双铧犁600万部。’在急于求成气氛下，1956年原设想生产500万部，后来计划安排生产350万部，推销270万部，但仍满足不了各地需要，以致中央在4月19日不得不致电各省委，说明因钢材紧张，不能按原计划组织生产，要求各地降低生产和销售指标。结果，却因为没有考虑到这种犁根本不能用于南方水田，以致到10月底，虽生产出170多万部，却只销出80万部，还退回15万部；没有退回的，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只能挂在墙上无法使用的‘挂犁’。”<sup>①</sup>

应当说，这篇社论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完全是从当前客观实际情况出发提出意见的，也就自然要联系毛泽东最近的教导。社论在引出“序言”中那段话之后说道：“现在的情况正是有些同志违背了毛主席的这一指示，超越了客观情况所允许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去硬办一些一时还办不到的事情。”然后，农业方面举了扫盲的例子，工业方面举了双轮双铧犁的例子。特别引起毛泽东不快的，可能还在下面这两段话：

---

<sup>①</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38页。

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止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40 条一出来，各个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急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得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来。

为什么反对了右倾保守之后，在有些工作中又发生了盲目冒进的偏向呢？这主要是由于我们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造成的。由于没有运用辩证法的方法，没有从事物的复杂的矛盾和联系中去全面地观察问题，只从一个方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就把许多问题看得太死、太绝对化。又由于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对实际情况了解得不够，心中无数，有盲目性，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事情就当然容易偏于一面，发生片面性。在反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之后，在许多同志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他们以为既然要反对保守主义，既然方针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既然要执行四十条，于是一切工作，不分缓急轻重，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即把一切事情办好。这样由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当然免不了要犯错误。

关于怎样正确了解多快好省方针，防止片面化、绝对化，社论特加论述。最后说道：

总之，做任何工作，都要善于把上面的方针、要求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从实际情况出发，去考虑和确定自己的工作步骤。只有这样，才不至于犯右倾保守或急躁冒进的错误。

我们党的漫长历史说明，革命精神与“左”倾急躁总是结缘不解。对于 1955 年农业改造高潮之后出现的这种积习和传统，这篇社论是触及到了的。同随后而来的“大跃进”那阵十级台风相比，当时冒进之风不过“起于青苹之末”罢了。可是，这样一种及时敲响的小小警钟，并已经事实证明是敲得及时的警钟，硬是听不进去，听进去过的人也多连忙“洗耳”不止。对一篇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精神的文章的错误批判，竟然导致历史的逆向发展，这确实是任何人也始料不及的。

由于在一篇定性为反毛泽东的错误的社论原稿上，有刘少奇修改的笔迹，刘也就同这一“错误”脱不了干系了。党内唯一还可以同毛泽东以平等的态度讨论问题的刘少奇，从此似乎也今非昔比了。南宋会议之后，逐渐使毛泽东奠定了他在中央的特殊地位，这是党内生活的极大变化。在 1980 年讨论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草稿时，胡乔木同我谈过这样的看法，胡耀邦也有过这样的说法。

我没有去查证过，不知当年这篇针砭时弊——反对急躁冒进，反对片面性和盲目性的社论，是否是 1958 年至 1978

年这 20 年间，《人民日报》敲响的最后一声警钟？然而，历史确在嘲弄这篇社论。既然是反冒进的“罪魁祸首”，南宁会议以后发生的事情，似乎是理所当然地要按照它所指责的反其道而行之：你们不是反对急躁冒进吗？请看我们急躁冒进到何种程度吧；你们不是反对片面性吗？请看我们做到怎样的片面性吧；你们不是反对盲目性吗？请看我们达到何等的盲目性吧；你们不是说不要只顾多快而不顾好省吗？请看我们的各种“卫星”是怎样上天的吧。

除开批判“反冒进”之外，南宁会议上受到批评的还有国务院尤其经济系统的工作作风问题，主要是报党中央主席的重要文件只未最后成品，逼着签字，这实际是一种“封锁”。又附带批评了分散主义，说这回是攻击部长以上的人，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在谈到这方面问题时，提出“务虚”与“务实”的问题，“虚业”与“实业”即思想政治和专业实务如何统一结合的问题，其中有具体的中肯批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在“大跃进”时期，是广大干部经常念道，却又难以结合好的一种苦恼。这方面的批评也是令人极其紧张的：

——（会议的开场白即说道：）向人代大会的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了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说我不负责）。章伯钧说国务院只给成品，不让参加设计，我很同情。不过他是搞资产阶级政治设计院，我们是无产阶级政治设计院。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平时不给一点情报，不下一点毛毛雨，四时八节要开会了，一个成品拿来了，倾盆大雨下给我们。我们都是如团粒结构不够的土壤，怎么能吸收得了呢？水都从地表流走了。你们平时就

不跟我们通气，不拿一点半成品、原材料来，一定要等到你们把什么都搞好了，才拿给我们，这实际上对我们是一种封锁。很多文件是闭着眼睛强迫签字的。大概你们像那个茶花女一样，见爱人时总要打扮得漂漂亮亮，临死之前还是如此。你们为什么不能像农家姑娘一样，可以蓬头散发见面呀！农业纲要四十条，最初是八条，后来是十七条，同地方的同志多次交谈议论，最后才形成四十条。这回先到杭州，同华东同志谈了十几条；在这里又谈了二十多条。作汇报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要思想提出来交谈，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办，不那样办。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报告也一般不大好议论，写得不讲考据之学、辞章之学和义理之学，前者是修辞问题，后者是概念和推理问题。

——党委方面的同志，主要危险是“红而不专”，偏于空头政治家，脱离实际，不专，也就会慢慢地褪色了。我们是搞“虚业”的，你们是搞“实业”的，“实业”和“虚业”应当结合起来。搞“实业”的，要搞点政治；搞“虚业”的，要研究点“实业”。搞“实业”的人不同政治结合，脱离了政治，那就会成为灰色的或白色的，就会成为迷失方向的实际家、科学家、经济学家或艺术家。思想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红安县搞试验出的报告，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我读了两遍，请你们都读一篇。红安县报告中所说的“四多”、“三要”、“三不要”，是全国带普遍性的毛病。就是对“实业”方面的事不甚了解，而又要领导。这一条不解决，批评别人专而不红，就没有力气。党委领导要有三条：工业、农业、思想。省委也要搞点试验田，如何？不然，空头政治家也就会变色。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

已早以为自己红了，钻到那“实业”里面出不来，义理之学也不讲了。北京工作的同志不下去跑跑，不动脑筋，光在那里罗列事实。于是局长领导部长，秘书专政。北京难出真理，真理常在下面。

——中央只揽了一个革命，一个农业，其他实权在国务院。有人反对党政不分，想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最好的好意也是想将一半大权揽过来。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到党委，到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为了反对分散主义，我编了八句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那 32 个字。

——我们打了 20 多年仗，打仗必须发动群众。土改也是要发动群众，历来反对恩赐观点。社会主义发动群众应当更充分些。大鸣大放，发动群众。为搞水利，不发动群众不行。冒进是全国人民热潮冲起来的，是好事（只有部分是坏事，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搞工业，搞农业，难道比打仗还厉害些？我就不相信。搞经济就那么复杂，那么多学问？

有一次插话中还谈到：唐朝诗人三李（李白、李商隐、李贺）有点幻想，令人喜读；光搞现实主义这一面不好。

在南宁会议上，形势当然是一边倒。与会者都程度不同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教诲：“头脑大大清醒起来”，都表示要当促进派。记得三峡问题谈完后，周小舟向我介绍那几十条时，说大家都希望主席多谈一些，多受到一些启发，甚至表示他也想将英文捡起来。李井泉等人还从自己的工作出发，说明“反冒进”受到的损失；有不少人汇报时，谈了反省性的意见。批反冒进首当其冲的是周恩来、陈云，以及国务院财经方面负责人，他们曾是反冒进的主角。周恩来除在会议

上表态外，还单独向毛泽东作了检讨。事实上，凡犯有“反冒进”错误的人，都得一再检讨下去。后来在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和陈云等都为此又作了正式书面检讨。

在南宁会议上再次受到表扬的是柯庆施，以及湖北的王任重等。1月15日，毛泽东在会上说：上海对内部矛盾问题的讲法，有所发展，他们搞了两个月；浙江对此也有创造。各省理论怎样？没有理论，领导困难。中同2作同志不动脑筋。这一下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1月16日，毛泽东在会上又说：柯庆施“乘风破浪”的文章很好。上海有100万工人，也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才能产生出这篇文章。北京不是没有也，不多也。任何一个省委、部委，特别《人民日报》，主要东西，宁少勿多，认真搞，是并不难的。省委、各部都忙得要死，昼夜奔忙，不搞考据之学、辞章之学、义理之学。1月15日，湖北汇报时，毛泽东赞扬说：真理在湖北，为什么不在别处？他们十年计划能六年完成（湖北的大话讲得多，随后粮荒也来得早），农业能如此，工业为何做不到？问题是过去没有抓。在南宁会议上，柯庆施成了头号标兵。陶铸等人就表示，我们要“赶上柯老，我们要赶”。

在讨论1958年计划草案时，大家贯彻对反冒进的批判精神，都尽可能要“赶上去”。会议根据国家经委汇报制定的191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比1957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刚确定的指标，又大大提高了一步（如工业总产值增长指标十二月为10.4%），主要增长速度为：工业总产值15.1%，农业总产值6.5%，基建投资12%，钢17%，生铁22%，煤

16%，发电量 15%，粮食 5.9%，棉花 6.7%。这个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当时正常发展所能达到的高度，但同随后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到北戴河会议所定的高指标相比，又瞠乎其后者了。

南宁会议造成的后果，首先是经济上比 1956 年更严重的急躁冒进，急于求成错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八大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以及经济建设上积极稳妥、综合平衡的方针，统统置诸脑后了，而以盲目追求多快、打破平衡的方针代之。

其次，经济问题变成政治问题。反冒进为右派所喜，为右派言论，冒进为左派所好，为革命精神；冒进是发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不依靠群众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前者轰轰烈烈，多快好省，后者冷冷清清，少慢差费。党内历史上有过的只能反右、不能反“左”的传统恶习，错误的所谓反倾向的“路线斗争”，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以“两种思想、两种方法、两条路线斗争”的分野，重新出现，从而不仅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而且对整个社会政治生活，带来日益严重的影响。

第三，党内组织生活开始出现个人专断的格局。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无产阶级政党这一有史以来的基本原则，从此遭到严重破坏。党的八大所通过的一系列正确决策，1956 年反冒进以来一系列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包括二五计划的一些主要指标，本来都是党中央常委和政治局集体领导的决定，毛泽东本人也是同意过的，由于他对此本来或转而持有异议，引而不发，终于一发必速，最后在南宁会议这样的会议上，对本来集体决定的正确的东西，进行不容



反驳的指责，如同对待右派一样，过火批判，予以否定。从此，这种中央主席个人专断个人随心所欲的局面，就再也难以改变了。

回顾一下，南宁会议为何形成如此一边倒的局面？除开与外部的反右形势和斯大林问题、波匈事件等有关外，当然，这同毛泽东的历史威信和对他的“个人崇拜”有关，也同党内民主生活已经不很正常有关，特别是还同那些极力迎合的人有关。从更广泛的范围或就当时全党干部的认识来看，可不可以这样说，总存在一个同“左”的东西“结缘不解”的问题。多年的历史说明，“左”似乎是共产党员安身立命之处：不怕“左”，不怕“过火”，不怕“冒进”，而只怕被认为“右倾”、“保守”；因为不论怎样，前者是保险的，是“为了革命”，而后者是“立场问题”，“不想革命”，甚或“阶级异己”、“反革命”问题。这是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存在意识。人们呵，谁不怕戴“右倾”或“左派”的帽子呢！

##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回到北京三四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去看望黄克诚。我们是1922年9月一起调到北京的。来京后，每年总要去看望两三次，有一次还是请他帮助，为水电系统要部队的转业干部。南宁会议的情况他已大体知道，我谈了这次的“奇遇”和自己的担心，也谈到毛泽东有如抗战初期的兴奋状态。入党多年来遇到的领导，黄克诚是最能让人随便交谈、可以交心的人。落座还只有刻把钟，忽然中南海主席处来电话，要我立即去。

从颐年堂的正门进来，来到现在让人们参观的起居工作的菊香书屋，庭院和房屋一仍旧式。毛泽东穿着那件现已成为文物的旧毛巾睡衣，半靠半卧在宽阔的板床上。见我进来，让我坐在靠近床边的椅子上。谭震林正坐在沙发上同他谈话。谭是认识的，1956年新安江上马前，我到上海找华东局要干部，是由他主持商定，让淮委支持，并派人同我去蚌埠找过淮委负责人。这时，谭正在谈淮北如何水网化的问题，说可以变成江南一样的产稻区，办法是搞小型水利为主。我同水利的最早接触，是在延安《解放日报》评论部工

作时，部内分解放区、陕甘宁和大后方3个组，我负责解放区组。除开新华社的电讯外，还经常翻阅华北、华中敌后解放区的报纸。1943年，我写了一篇几年来解放区水利事业成就的综合报道，附有一份详细的统计表，同国民党地区当时的水利情况加以对比，并写了一篇以《敌后解放区的水利事业》为题的讨论（“解放区”这一名词也是第一次在《解放日报》上出现），说明烽火连天的敌后解放区，在水利事业上，比国民党的大后方成就要大得多。这篇报道引起毛泽东和中央同志的重视，后来在《论联合政府》中曾予提及。因此，我对小型水利的作用印象很深，对几年来水利系统的好大作风，不以为然。当问到我对淮北水利意见时，虽然并不了解具体情况，仍随声附和回答了一句：赞成搞小型小利。引起毛泽东一句话：呵，你也赞成。不久，谭震林就起身走了。

当他俩谈着话时，我注意了一下室内情况：这张大板床的另一半，堆满了种种线装书；远处靠墙是一列书架，上面绝大部分也是线装书；两个大沙发对着床端放着，靠床头还有一个较大的茶几（这也是就餐时的饭桌）。后来我去卫生间，发现一个方凳上有一本线装《红楼梦》，正打开平放着。原来听说，每逢外出，总要带一大批书。至此，落实了这个印象：手不释卷，置身于书海之中。这个晚上谈过些什么已记不清楚；记得最确切的是，我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今后您要我注意哪些方面的事？回答真是出乎意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即将一份打印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给我（封面上有“毛泽东同志”楷体蓝色印字），这是他自己用的一份，要我过细看看，提些意见。

《龙胆紫集》“戊己诗”<sup>①</sup>第2首，即写这夜的情况：

一墙古籍半床书，谈笑风生榻上居。

欲问关心何等事，九州万物概无馀。

我的旧档中有一叠《对六十条的意见》，共25页纸，其中有底稿和有关札记、分类统计。大概是几天之后寄还的。现在将“底稿”抄在下面：

有些小意见写在原件上。这里还有些零碎意见、感想写上，谨供参考：

1.60条的分类统计，主要是领导和工作方法30多条；农业问题4条；提出今后要着重抓工业的问题，但工业只有2条，写了抓先进典型、新技术、新产品试制3项。因此觉得关于工业还应多写几句。如要抓些什么，如何抓法，一个时候，围绕一个中心问题开几天会，旧央有关单位主持，参加的人有部长、局长、总工程师（也可请个别非党、政治好的）、厂长、个别车间主任、基建工程负责人等，包括中央系统和地方系统的人。开会可分大、中、小型3种，到工业集中城市和各省去开。

2.关于计划问题。首先要求年度计划与五年计划如何很好结合，在投资、速度、各部门间比例关系等重要环节上结合得好。这方面第一个五年中有教训。现在经委同计委的具体工作部门，也还有些扯皮现象。苏联经验，5年的叫做国民经济发展计

<sup>①</sup> 戊戌年即1958年，己亥年即1959年。

划，10年的叫现实性远景计划，15年的叫假设性远景计划（更长远的计划如20年、25年就只能根据更多的假定来考虑）。三者之间，有区别也有联系，须着于区别其间的关系。有一些部门如电力部门必须有比较可靠的十年至十五年的远景计划。编制得最好的计划，也会由于群众的积极性和许多未能估计到的因素，需要在执行过程中经常修改。远景计划的制定，计划部门要同科学研究部门合作，也可发动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讨论。一个大的经济单位，要有几个很实际、知识较渊博、又有远大眼光的人，来考虑、研究长远计划，以保证在计划工作中不迷失方向。这样的人只要几个，助手也不要多，主要是善于利用国内外各种资料。

3. 积累问题。研究的方向应当是如何最大限度地积累资金，如何全民勒紧裤带，不惜巨金来发展工业和农业。

4. 在各种经济建设中，如何避免力量与资金的分散，是各级领导要经常注意的一个问题。

5. 社会主义建设中速度问题的总原则，是只可加快，不可减速。如像长跑运动员一样，很懂得掌握自己的体力和速度，每段距离中如何分配，如何压倒对手，最后如何冲刺。〔这一条说明，我当时的头脑也是发热的，尽管这种要求主要是从自己本位工作水电出发。〕

6. “技术革命”口号如何提法。当然，技术也是不断革命的。但这个口号容易狭隘地理解为，只

是落后与先进、新与旧的一种关系。而我们今天提出这个口号主要意义在：为学会并掌握技术，为技术不断进步而斗争。即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跃进、不断提高而斗争。

7. 推广新经验，新技术。如果条件、情况相同，就不能采取自愿态度，而应当用自上而下的适当办法使之执行。

8. 老干部、各级领导干部如何从外行变成内行，要作个规划。总结第一个五年中这方面的成绩和教训。总结现在各大学所办老干部班的经验。如何以内行或比较内行逐渐代替外行，这是总的干部路线。

9. 干部能上能下应逐渐形成风气。

10. 各个部门的领导应帮助一批政治上好的技术干部，懂得做组织工作，有工作方法，善于走群众路线，以便参加领导工作。目前技术、经济部门中，领导干部内行较少，应当作这样的安排和长远打算。

11. 善于发现新人才，更加注意提拔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到领导岗位上来。经过整风、反右和劳动锻炼之后，更有基础来进行这项工作了。

12. 有一些习惯性、周期性的问题，如浪费、贪污等，必须经常注意，绳以法，年年大反一次。

13. 各经济、技术部门必须经常了解世界各国本行业中的尖端，最先进的情况。要有计划地定期地派人出国（苏联、东欧和资本主义各国）考察，

考察团人员一般不要超过 10 人，要都是真正的专家，要有一个政治上很强的人带队。

14. 各单位要有一个很好的小图书馆，一个很好的小资料室，要经常注意新书目录，各种新资料。

15. 不要害怕反对意见。要重视自己认为是不正确的反对意见，不要去压制坚持反对意见的同志，要容许不同观点的无拘束的争论，要有意识地启发各种不同意见展开充分讨论，以便在决定问题时，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各个侧面，从而作出正确的决定。

以上这 15 条，似乎并非最后送出的定稿，因为现在抄录的这份底稿只有 7 页，其他 18 页还有许多内容未包括在内，草稿是用几种颜色的铅笔写的，可见不是 1 天或 2 天之内的构思。现在再摘录出一些，以说明自己当时注意的问题，当时的思想水平，和如何尽“兼职秘书”之责的。

有 2 页专门写工业方面应注意的事项：

1. 国家发展水平与速度关系问题。高度的生产技术，才能有高度的速度。

2. 各经济部门比例关系：农业与工业（寓工于农），轻、重工业，煤、电、铁路交通先行工业，钢铁与机械，民用与国防，骨头与肉（主件与配件）等。

3. 国力与基建规模，生产力布局问题（资源

分布与经济地理)，地区规划。

4. 中央与地方的结合。

5. 大中小结合。

6. 先进与落后结合。洋办法、土办法，机械化与人力。

7. 勘测设计，资源勘探，产品设计，基本建设设计等。工程施工问题。

8. 新产品试制

9. 产品质量检查。

10. 新技术推广。在勘测设计、生产运行和基本建设诸方面，有许多技术规程、规范都是从苏联照抄照搬来的，有些已不完全符合我们情况，应当及时修改，否则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这方面我在几年水电建设中有所体会。

11. 专业化，标准化，协作关系。各部门协作的重要。

12. 节约问题，投资效益。（先进定额，节约材料，减少储备和流动资金，降低成本，等等。）

13. 劳动生产率，是综合指标，最后结果。有关技术安全、生产组织管理等问题。

14. 工资、福利制度。

15. 产供销平衡。

16. 资源综合利用问题。

另外还有一些条条，是上面 16 条中没有写上的：



——要善于找帮手，广交各界朋友，各种耳目，利用记者，各种各样群众联系。

——领导部门，要有意识上一两个人减少日常事务，较“清闲”一点，以便保持头脑清醒，尤其计划部门搞长远规划的，要有这样的人，他们当然都是最实际又最能听奇谈怪论的人。领导人定要不被事务洪流困住，重大问题亲自过问，打破砂锅问到底。

——反映意见，定要全面，正面、反面，赞成、不赞成，决不可随风倒。

——不会开会，还是一个大问题。

——选拔干部的德才标准，逐渐转向业务能力。

保留自己这些过眼烟云的资料，也在如实说明，当年如何第一次履行这个“秘书”身份的，以后继续受到表扬也好，庐山会议最终实践了“几不怕”也好，是合乎逻辑发展的。

旧档中标明“1958年”的一个本子上，记录了《南宁会议六十条》，当是寄出意见并附还原件时，特意抄下来。同随后党内公布的《草案》相对照，则出入较大。后者不仅是条目及其次序的调整变动，主要是文字修改和内容的充实，还加了“前言”。后者篇幅大约扩充了一倍。如原件第一条是：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后者是第6、第7两条，分写如何检查，如何评比。又政治和经济、政治和技术的统一问题，原来是放在不断革命这一条内的，后者分

开写了。增加了农业高产的例子。也有一些内容删除了，如关于人的生到死是辩证法规律，“死亡就要庆祝”；也删掉了一些具体例子（如“培养秀才”这条，曾将我的名字写进去了）。后者的第2条：“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工业工作，这里也有十4项”，是原件中没有的。上述我草写的“工业方面应注意事项”的16条，大体都包括在内，也有的不在内。这14项当是国家计委、经委等业务部门参加定稿的。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是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其中提出了许多有关领导经济建设的工作任务和方法。由于当时的主导思想是反冒进，是追求建设的速度，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就此提高全党的认识，这些任务和方法以及某些理论原则，就不能不包含许多错误的东西，而且有些正确的东西在执行时也会走样，甚至走到这反面。总之，《六十条》和“大跃进”的关系，同反冒进一样，也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六十条》提出了一些正确的原则、任务和方法。例如，是以上各级党委要抓工业，提出14个项目，内容虽然还不全面，确是生产和基建中重要的基本东西。如必须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上去：“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钻研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一方面，要反对迷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学失方向的实际家”。要破除不合理的规章制度：8年来积累的规章制度有许多还是合用的，但有相当一部分妨碍了群众的积极性，应加修改或废除。（问题在

“大跃进”时，群众一发动，规章制度被横扫乱破，造成严重后果。)关于领导干部要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如何深入下层，同群众打成一片；每年要有4个月离开办公室，到下面作调查研究，增加感性知识；要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决不可摆架子，等等。这些都是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和多年积累下来的正确经验。

《六十条》推动了急于求成的“大跃进”的到来和浮夸风的出现。首先是这样一些脱离实际的过高指标：“争取在3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在今后5年或8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40条的规定”（原规定12年完成）；各地方工业产值，争取在5年或10年内“超过当地农业产值”；还介绍湖北、四川等地，每年总结亩产2130斤、1680斤等“单季高度的经验，各地可以研究试行”；提出生产计划中央和地方共3本帐的办法，助长了脱离实际，盲目提高指标，为层层加码大开“绿灯”的错误做法。“不断革命”的观点和要求，引入经济领域，成为“大跃进”的思想理论武器。《六十条》写道：“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1949年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接着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于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问题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种“不断革命”的观点，同“共产党的哲

学就是斗争哲学”，“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斗则进不斗则退”等等观点，是一脉相通的。这种观点在战争年代、革命时期起过主导作用；但在夺取了全国政权，进入建设的和平时期，经济建设需要按照经济工作本身的规律，持续协调地发展，尤需要稳定有秩序的环境。“不断革命”则鼓吹事物经常处在一种人为的不停止的变化状态之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要求经济生活也像打仗一样由政治挂帅，边建边破，快速而跳跃地发展，乃至运用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等等方法，这就不能不造成严重后果了。

同“不断革命”论密切关联的是“不平衡”论。《六十条》写道：“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的内部车间和车间、小组和小组、个人和个人之间，都是不平衡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根据这种观点或法则，自然就可以任意打破平衡，搞人为的不平衡；“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事物也就前进了一步”。这样，以“不平衡是绝对的规律”作指导思想，导致“大跃进”时期计划工作放弃了综合平衡的规则，否定了国民经济必须在综合平衡中发展的规律。

此外，《六十条》中的“大权独揽”，第一书记挂帅（“大事一定要问。要有二把手、三把手，第一书记不在家的时候，要另外有人挂帅”）造成了“大跃进”时，从上到下，层层独断专行的不良作风，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挂帅”是我国自古以来封建用词，战争中“元帅”是可以发号施令的。经济生活中没有元帅，自然不能用打仗的方法来领

导经济建设。

《关于传达和讨论毛主席六十条指示向中央的报告》，河南这回走在前面，1958年2月2日发出，中央于2月7日向全党转发了。河南省委的报告说：“主席不断革命的指示，给我们以敢于理想、敢向前看的无限勇气，从理论上、思想上解决了能不能跃进、敢不敢跃进的问题。打破了庸俗的‘平衡论’，粉碎了‘反冒进’（就是反跃进）的观点，以最锋利的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把我们武装起来，乘内破浪，跃进再跃进。贯彻执行主席的60条指示，就能缩短我国的过渡时期，在这与帝国主义比时间、比胜负的时期，中国的大跃进，对世界的命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河南确实这样说到做到，后来放粮食卫星，办人民公社，放炼铁卫星，都走在全国的前列。许多省纷纷表示决心，要在5、6、7年时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提出的任务。许多省市的地方工业，在今后5年内不是增长百分之几十，而是要增长几倍。在杭州和南宁会议上，因干劲大受到表扬的甘肃，这时决心在5年内，地方工业产值要比现在增长16至19倍，以赶上或超过农业总值。

接着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的社论。以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法则说明，事物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认为“积极平衡和消极平衡，这是计划工作中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支持新生事物和群众的积极性，不断地提高落后的指标和定额，这就是积极的平衡，否则，就是慢与差的消极平衡。只有冲破旧的平衡，达到新的平衡，事物才能前进。社论以此论点再次批判了1956年的反冒进，说当时工农业“显然是一个很大

的跃进。但是那时候有一些人被这种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中的不平衡状态惊呆了。他们只看到这种不平衡所引起的某些在进步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的困难，以为这也困难，那也困难，惶恐得很。这就是因为他们对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缺乏正确的了解，对党和广大群众克服困难的力量缺乏足够的估计，因此就错误地提出了‘反冒进’的口号，给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群众高潮泼了一瓢冷水。”社论认为工业农业的“大跃进”局面已经到来。最后号召：“我们必须反对庸俗的平衡论，或均衡论，反对消极的平衡方法。从庸俗的平衡论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我们也就敢于跃进了。”从此以后，计划工作中不断地出现层层加码的高指标，“打破平衡”、“积极平衡”成为计划工作的理论；高指标风漫天而起，一发不可收拾。

## “同床同梦永绵绵”

1952年调到北京工作后，头两年还继续记点工作日记，以后由于工作忙乱，这种日记就中断了，只是偶尔记点杂感之类。参加重要的会议和听重要的传达，以及出差工地等，则是作记录的。这种幸存的许多记录本，现在帮助我如实写下一些有关史料和属于个人的回忆。

从一个有美术图片的记录本中，找到这样一页：“1958年1月24日南宁归来记”，一共有简短的杂感11条。其中第一条为：“经过确切了解并肯定了的東西，不论阻力如何，必坚持之。或者终于水落石出，或者从而得到深刻教训——同水利部的关系问题，三峡问题，水火电问题，再次证明。”从而知道，南宁会议止于1月22日或23日，即谈完三峡问题，会议就结束了。我当是24日乘飞机回到北京的。

回到北京，当然首先向部长刘澜波汇报。同刘在延安就认识。自从主管水电建设之后，从燃料工业部到电力部，他是我的顶头上司的。他是一个比较随和、民主作风很好的人，由于出身关系，同大小知识分子都合得来。像在湖南同周小舟的关系一样，我与澜波之间能随便交谈，有时也能讲

一点“私房话”譬如前面提到的国务院一次讨论三峡的会议，散会后一同出来时，他向我说：三峡是主席赞成的。我脱口而出：主席又不是圣人。这种话，在当年可以视为“狂妄”的。大概是1954年分配地质大学生时，国家给燃料部分分了249人。煤炭和石油尤其煤炭的地质勘探力量，都比较有了基础。地质为水电建设的生命线，当年只有3个人。澜波在部里还主管教育，他主持分配这批学生时，只给水电十来人。会议还没有结束，我很生气，讲了很生硬的话，便拂袖而去，他也不以为意。1954年末到1955年春，我们在苏联参观时，两人曾在莫斯科基辅饭店，同住一间房一个多月，常常聊到半夜，议论过对苏联的看法，党同国际的历史关系，以及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情况等。我从南宁带回的两个包袱，同澜波是敞开心谈的。关于“秘书”问题，由于知道一些中南海“内情”，自觉很难适应，弄不好会出事情的。他倒是觉得，这样对水电今后的发展，或许会带来好处。自从到苏联参观之后，关于水电应优先发展，我们之间的认识已趋于一致。至于水利与电力两部的合并，他认为总是两张皮，一个主要同农业关系密切，一个同工业关系密切；既然中央作了决定，也就只能如此了。事实上，两部合并之后，一把手是水利部部长李葆华，二把手是刘澜波，每逢中央开会，尤其是有关计划问题，他们两人总是一道参加的，一个谈电力，一个谈水利。1954年，黄河规划组团查勘，中外专家浩浩荡荡，从山东到甘肃，他们曾是一正一副，两部合作得很好。因此人事上，合并没有带来什么麻烦。除开部里的行政机构有所归并外，电力与水利业务仍各不相下。真正的两部合并，只是水利部的工程建设局和电力部的水电建设



总局合并成一个局，部属科研机构合在一起，名称变为“水利水电”罢了，其他下属勘测设计院和工程局还是各自独立的。水利水电总局搬到原来的水利部办公，我被任命为水利电力部的副部长，离开总局了。

直到 1955 年，燃料工业部才分成电力、煤炭和石油 3 个部。刘澜波是电力部的部长。从国家经济工作的发展说，我一直认为燃料部分部太晚了，或者开国之初就成立电力部，则更为理想（开国时有过食品工业部），这样对水电的发展也有利些。电力是关系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发展的。当年我们常引用列宁一个公式：“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这在苏联是家喻户晓的。现在电力部刚刚独立两年多，就又要同另一个部合并，部里上上下下都觉得突如其来，是很难一下接受的。

这里需要谈谈的，只是导致两部合并的原因，即水利同水电之间的矛盾到底何在？此事说来话长。

水力发电，“水还能发电”？在旧中国（东北和台湾地区在外）人们对水电是陌生的，这种情况也反映在水利系统。1952 年，我一上任就遇到官厅问题。中国河流自古以来的严重问题是洪水为患，“大禹治水”，家喻户晓；历代相传，“善治河即善治国”。国民党时代，长江、黄河、淮河都相沿有专门水利机构。新中国一成立，即设水利部统率其事。永定河关系北京的安危（河的名称即有来历），1949 年就修建官厅水库，以保证首都安全。当时，水电方面曾一直以各种方式，提出同时建电站的意见，最后并由水利、燃料两部苏联专家向苏方总顾问写出统一的书面意见：“工程布置上同意水电方面意见——泄洪隧洞可以作发电引水隧洞之用。”

理论问题虽已解决，但水利部早已动工，木已成舟（泄洪隧洞下方已不能布置厂房），无法补救。我们只得在对岸再做地质勘查，加打隧洞，建筑厂房。由引可见，中国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单纯防治洪水的治河观念，缺乏对河流综合利用的开发思想，是何等地反映在开国之初几年的水利工作中。淮河佛子岭和梅山两水库的发电问题，都是事后作的补救，不合理之处颇多。辽河的大伙房民有类似情况。这几个工程都是“水库”和“发电”先后施工，给水电施工带来很多困难和损失。淮河是平原河流，发电问题较次要（佛子岭、梅山等上支流上游，可以结合发电），当年存在的问题主要还是防洪本身没有作好综合规划，水文资料不准确，设计洪水偏低，有的工程不够安全而作补救，后来才重新编制全流域规划。地方上对各已建水库，都提出从前没有考虑的灌溉问题，才又陆续在下游修灌溉工程，以的挥水库综合效益。

这一情况，也同水利部请来的苏联专家有关。由于地理环境和国情不同，苏联河流的防洪问题不突出（主要是融雪时的“桃汛”），所有重要河流的开发治理综合利用以水电为主导，由电站部主其事，有关经验和专家也都集中于该部。苏联没有水利部，灌溉等工程事务均归属农业部。水利部请来的苏联专家是由农业部派出的，经验较狭窄。譬如 50 年代初，在治淮和荆江分洪等工程中大出风头的布科夫，就办了一些很不在行的事情，如黄河邙山方案即他的主张（此人回国后挨了批评）。黄河规划及其后的长江规划，绝大部分专家和主其事者，都是苏联电站部派出的。

黄河规划之前，有过黄河水利委员会坚持的单纯从防洪出发的邙山方案，并且曾在“中央批准”的情况下，进行设

计和准备施工。因此，当专家组来到和黄河规划委员会查勘全流域过程中，情况是颇为复杂的。当时黄河规划的首要问题即在解决郎山和三门峡两个方案的比较。最后，黄河全流域规划中确定三门峡与刘家峡为第一期工程。（由于泥沙淤积规律估计错误，对中游水上保持过于乐观，三门峡后来进行改建，100万千瓦水电站改为25万千瓦径流电站，但其防洪、防凌、灌溉等作用依然显著。）前述1956年林一山长江规划的2万字长文，关于水力发电只有500字，也是由于一切从防洪出发

这种情况也反映在高教部门，长时期中设置水电专业很不积极。旧中国大学传统专业有土木、水利二系。后来清华、天津、哈尔滨等几个大学新设的水力发电专业，又都设在水利系内。顾名思义，毕业生自然被优先或全部分到水利部门，最初水电只分到10%左右。后来我亲自参加国务院召开的分配会议，据理力争，1955年才与水利部平分。当时水电的技术人员不及水利的十分之一，而担负的工程项目已经超过。

关于水力发电同河流综合利用及其工程的关系，在1956年3月底我写的那个向中央的长报告中，有如下说明：

不论一条河流的洪水问题如何严重，其首要任务即使定为解决防洪，但只要这条河流有水力尤其是巨大的水力资源，水能利用问题就总是河流综合利用中最复杂的和联系方面最广的问题。它同河川流量的关系，特别是同国民经济各部门和电力系统（与火电的配合）本身的关系，都比防洪、灌溉和

航运等要复杂得多。因而在河流全面规划中，梯级开发方案的选择，河川流量的调切，动能经济的规划，水工建筑物的布置，水库水位和运行方式的确定，工程投资和效益的计算等方面，水能利用往往起着主导的作用；而防洪只是消极的除害，要求比较简单，不可能成为河流积极兴利的综合利用中联系一切方面的中心。

从河川流量关系说，防洪只关心洪水而不关心枯水。单纯为了防洪，就可以不必作复杂的水量平衡计算；而水能利用既要关心洪水又要关心枯水，在水量平衡调节上，终年同防洪、灌溉、航运、电力系统打交道，都要照顾协调好，因相互之间在水量调节上要求不同，日夜四季错综复杂。为了解决防洪问题，实际上只是要求在河流规划阶段决定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水库在汛前空出多少库容来装必须削减的洪水，除此以外，在以后的设计阶段（初步设计，技术设计等）、施工阶段和将来长期的运转中（包括拦河坝、电站引水道和厂房的维护检修等），并无其他专为防洪的特殊工作，而在这些方面关系最深和最经常的还在发电。例如在设计工作上，水电站必须从整个电力工业和有关国民经济部门（包括防洪）的布署和发展全面分析论证之后，才能在初步设计中决定全部建筑物的位置和水电站的主要数据（参变数）——水库的正常高水位、非常洪水位、水库工作深度（水库可以允许的最低水位和最高水位之间的深度，亦即水电站水头

可以允许变化的范围),泄洪容量,调节流量,保证出力(即遇到枯水时可以发出的电力),装机容量,机组数目,年平均发电量等等。因此,大河流的水电站建设,必须要妥善解决一切有关问题,包括防洪的要求。如重新设计后的丰满水电站,1953年遇到千年一遇的洪水,就从入库的17700立方米/秒削减到出库的7500立方米/秒。在水工建筑物的布置和施工方面,其复杂的程度也是决定于是否建设水电站。原因是单纯为了防洪,可以只修拦河坝,而不修发电厂房;但为了发电,却不能只修厂房而不修拦河坝。又如对水库区域的地质问题,漏不漏水等,防洪同发电的要求也不一样。水利部对官厅水库区域地质问题是没有解决的;后来我们花了1年时间才作出结论。因为库区漏掉了水,不仅是漏掉了电,而且危害建筑物的安全(现在官厅坝出现严重的漏水问题,正在设法补救中)。再就整个河流开发来说,规划的一个中心问题在于梯级布置,而对梯级关切最深的是电力部门;防洪一般只注意其中危害下游(或包括中游)的一二梯级,以上游不大关心。黄河规划的46个梯级中,除6个灌溉低坝(也可发电)和三门峡以外,将来担负其余39个梯级修建任务的,交主要是电力部门。这一情况也表现在过去黄河的勘测工作上,从龙羊峡到三门峡包括三门峡共32个梯级,是水电总局所勘测和选定的。

以上所述,并非否认或低估防洪本身的重要

性，而是说，在有关国民经济部门的部署和技术复杂的程度上，发电必须考虑和解决全面的问题，包括防洪的要求在内。若只主要考虑防洪而斩断河流，则必须发生一系列问题，有官厅、佛子岭、梅山、大伙房等前车之鉴。

苏联在多年实践中创立了“水能利用”这门新学科。这门新学科一方面确定了水能资源最有效和最经济的利用原则，同时也完善地解决了河流综合利用问题。在河流总体开发中，水能科学和水利科学是不可分割的。由于思想认识的距离，以及实际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几年来，我们同水利部门的合作是很曲折的很困难的。这种合作的关系直到现在长江的规划工作中还存在许多问题。有关河流综合利用的问题，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我们认为大家应当很好接受过去的教训，从而在思想认识、工作步骤、规章制度、协作配合以及具体分工上，取得一致和求得解决。

以上这些水电同水利之间多年存在的矛盾，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是有所了解的；有些重大问题，我也曾向李富春和周总理写过报告或信件。例如，在三门峡开工前，讨论工程局的领导分工时，水利部曾正式提出意见，将水电总局合并到水利部。国务院没有同意，仍决定三门峡工程由电力、水利两部共同负责。因此，南宁会议上才作出两部合并的决定，以求两者矛盾在一个部门内部协调解决。在这以前的六七年中，水电建设的处境确实是极其困难的，我们常说是在

夹缝中（水利与火电之间）奋斗；同水利的关系，水电在大江大河中的地位，尤有旧社会“庶出”之感。“文革”时在秦城 8 年单间牢房中，常常回忆和思念“水电八年”，共作了几十首旧诗词，其中最长的《六铺炕吟》<sup>①</sup>，长短 200 句，为 1960 年前，自己 8 年水电工作与生活的总结。其中谈到官厅的如下：

福州洪水古滔天，大禹自古称圣贤。  
 开国安邦治天下，史不绝书治水篇。  
 永定河名久已误，首都当似金瓯固；  
 斩头埋爪在官厅，无相侵渎龙王墓。  
 除害兴利两分家，有如庶出篱下苦。

谈到黄河规划与三门峡的如下：

黄河之水天上来，黄祸传名赤县灾；  
 三年一害，大徙七回。  
 其长可与长江匹，水量不过廿分一；  
 其祸在泥沙，黄土高原冲刷下淤积。  
 流过中州地上河，治河当比万事急。  
 防洪故当冲，却不应孤立。  
 大小之字路，曾经两度走。  
 全面规划幸及时，梯级安排垂永久。

<sup>①</sup> 六铺炕在北京北郊，原水电总局所在地。诗前有按语：“《人民日报》1973 年 11 月 2 日头条载水电大好形势，喜而有感，赋此长歌。时患肝炎，住复兴医院。”

大库容争五十年<sup>①</sup>，锁住泥沙不下溜；  
岂料泥沙难称心，不甘顺从任左右。  
黄梁一枕俟河清，工程改建十年后；  
径流电站低水头<sup>②</sup>，泄流排沙，如此枢纽！  
当年赋诗何乐观，余亦赧颜今回首；  
滔滔入海过三门，亘古阻拦人鬼神<sup>③</sup>；  
终有粉身碎骨日，唯余砥柱待河清。

紧接着写三峡问题、南宁会议和两部合并：

大河公案未了结，三峡问题了不得。  
词赋大江立石壁，岂可以此当军贴。  
有人妄言吹法螺，想毕其功于一役：  
武汉永安澜，渝州可淹没。  
“解决原子能”，帮腔之气尤咆哮。  
《人民日报》报头条，  
真是龙王宫中上下头发热。  
兴师动众请专家，火烧眉目急。  
万言书对万言书，长江规划编专辑。  
谬论狂言一扫光，速决战役打歼灭。  
判不可摇山可移，法螺悄悄不声息。

① 三门峡水库原设计寿命为50年，在此期间内，估计中游水土保持当见大效，可以锁住泥沙。

② 三门峡改建后，水库任务主要为泄洪排沙，不能常年蓄水，水电站只能利用低水头和自然流量，故称“径流电站”。

③ 三门峡处原河床有石岛拦河形成之水道，其中只有“入门”通船。筑拦河坝后，只有砥柱石尚屹立河中。



一电忽急召，两造飞邕江；  
案前骋雄辩，刻日著文章；  
真伪昭于上，驳倒夸大狂。  
人心颇觉快，白日忽蒙光。  
众贺簪花客，内中实惶惶。  
乱麻快刀斩，两部合一堂。  
水能大利用，解放此宝藏。  
从此不异梦，同梦又同床。

从南宁会议到庐山会议之间，即从1958年1月到1959年8月，我被卷入“大跃进”狂风巨浪的漩涡之中，经常在外参加中央的会议和在水电工地奔跑。这个期间如何“同床同梦”，可回忆的东西不多；而三峡问题，则终是“同床异梦”的。水电本身当然也有“大跃进”，这留待以后叙述。由于离开了总局，回忆中我亲身参加的“大跃进”，也多是纸上谈兵，即计划计划而已。

由于庐山会议之后，不仅我本人挨批斗，而且还斗出一个“李锐反党集团”，受影响者据说有二三百人，原水电总局的多位领导成员以及下属勘测设计和工程机构不少领导人，被株连在内；而且被批斗的内容因人及事，甚至视水电为“反水利、反火电、反三峡”的“三反分子”。因此，水电的发展不能不受到严重影响，“同床同梦”竟恶梦一场，这是谁也料不到的。

1979年1月我回京复职之后，不久，水利电力部又分成两个部。此时林一山上书国务院，要求长办由国务院直接领导，并建议凡“江河水利枢纽”即综合利用的大“水利资

源”“大水库”，由一个直属国务院的机构从规划到施工统一管理。林指责“过去有些时候简单的水力发电梯级开发方案代替综合利用流域规划或者搬用工厂建设的办法孤立选点，尤其是有些大型工程不从正确的流域规划入手，未作详细的勘测设计科学研究就盲目开工，建设过程中暴露出各种重大问题，一直到总理亲自组织讨论采取补救措施。”这显然是指葛州坝水电站而言。但总的意见在：大水电站的建设不能归口电力部。于是我不得不为水利与水电分合问题等，也向国务院汇报自己的意见（由电力部党组于1979年3月5日以正式文件转报）：

看了林一山同志的《关于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机构问题的建议》，有下列几点意见：

（一）关于水利水电分合问题，我们有过30年的实践经验。50年代初，水利、电力两部工作中确存在过水利与水电间的矛盾。矛盾来源于缺乏统一认识，缺乏实践经验。1953年，以水利、电力两部为主，成功地进行了黄河流域的综合规划，随后，电力部又参加了长江规划工作。1958年两部并后，共同进行勘测设计，兴建了一系列水利、水电工程。许多中小型水利工程都结合了发电。实践证明，已建成的凡有较大库容的水电站，从丰满、云峰、水丰到新安江、刘家峡、桓仁、桔溪等，必然同时有利于防洪、灌溉为主要效益，丹江口与青铜峡等原来以防洪、灌溉为主要效益的水利枢纽，实际上都是大水电站。河流的综合利用终于成为大

小水利、水电工程的根本准则。今后两部分开，如都能继续坚持原则、顾及全局，相信可以做到“异床同梦”，决不至于各执一端，各行其是。在20年合部过程中，由于“四人帮”10年干扰，也有个别工程存在偏离综合规划原则或盲目开工的教训。因此，从另一方面考虑，分部之后，对一些大型工程，也不无这方面的好处：即合部时，虽有组织上的统一，仍可能发生少谋专断之失；分部时，虽有组织上的分置，却易收多谋慎始之效。

（二）事实证明，所谓水利、水电间的“重重矛盾”，只要正确执行了河流综合利用的原则，在规划阶段充分讨论研究，是完全可以获得妥善解决的。回顾两部共同进行黄河流域规划时，关于下游洪曾有过邛山与三门峡两个方案之争。经过广泛、反复论证，最后国务院采内了三门峡方案。对三门峡的评价，曾经有过很大出入，特别是受“四人帮”否定一切思潮的影响，三门峡也被说得一无是处。三门峡的教训主要有二：一是当年对水土保持的估计过于乐观，二是对黄河泥沙的淤积、运行等规律没有摸清。经过改建后，三门峡除发电效益大大降低外，在防洪、灌溉、防凌等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黄河规划中，上、中游梯级布置及选定的其他第一期工程，也都是正确的，如已建的刘家峡、盐锅峡、八盘峡、青铜峡等，以及建设中的龙羊峡等，都发挥了或将发挥巨大的综合效益。黄河上、中游其他梯级近期陆续修建，将成为西北电网

的主干，担负华北电网的峰荷，并将发挥灌溉、防洪、拦沙等巨大效益。〔下略〕

（三）关于大江大河开发的组织机构问题，30年来，我们有“统一规划，分工负责”的成功经验。两部分开之后，我们已与水利部商定，建议成立一个河流综合利用规划委员会之类的机构，由水利、电力、交通以及农业、林业、水产、环境保护等部门（必要时有关省市参加）联合组成，由国家计委统一领导（日常办事机构可设在水利部），负责协调各部门的工作，解决大型综合工程各方面的矛盾。至于水力发电是我国最为丰富、理想而又现实的能源，其规划、建设和管理，尤其电网的统一调度，同整个电力工业混为一体，不可分割。《建议》中以国情迥异的美国垦务局和军部工程局为例，认为“大型综合利用水利工程开发水电”，可以向电力部门卖电，向航运和其他用水部门收费等“经济”设想，必将造成国家电力工业布局 and 运行、调度的混乱，还将造成企业管理与财政体制的混乱，其理不言自明。

关于三峡的修建，这是独一无二的有关全国经济、技术的特殊复杂而重大的问题。这项工程如果时机成熟，需要动工，当然应列为国务院专门项目，由一位副总理主持其事。但并不能因为有一个三峡问题的存在，就可以引申为“大江大河的规划”以及所谓“大型水利枢纽”，都要由国务院来主管，列为“专项建设”。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始

终没有成立过（黄河规划委员会曾正式成立过）。“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日常业务事实上一直归原水电部领导，国务院并没有管过，总理也只过问重大原则和及时处理有关问题。我们建设取消这个称号，仍用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原名（如黄河水利委员会等），属水利部建制。

（四）为加快电力工业的发展，除电力工业部负责修建大、中型水、火电站以外，也应同时发挥其他部门的积极性，如水利部门为了防洪、灌溉等要求修建的水利工程，应尽可能同时建设水电站，以及钢铁、石油、化工等部门修建自备电站或余热电站等。所发电力，根据情况并入或不并入电网。

（五）关于国家统一的水利法规、河流综合利用法规等，可由法制委员会、水利、电力、交通、农林、环境保护以及地方水利机构组织专门委员会编制。至于一般有关水利、水电的勘测、设计、施工等技术规程、规范，过去大体都编制过，问题主要是十多年来遭到严重破坏，有章不循，乃至把技术资料都烧了，水工实验设施都砸了。今后自须严加贯彻执行，并根据实际情况和新技术的发展作必要的修改。

林一山看到我的意见后，于6月2日作了一个《回答》，经“任重同志并报国务院”，其中关于三峡问题，南宁会议的讨论只有一句话：“1958年1月，毛主席在党中央南宁会议上确定由周总理负责抓长江规划和三峡工程的工作。”然

后谈到经过成都会议和北戴河会议，“结束了2年多的争论”。关于葛洲坝工程，是这样说的：“毛主席在对工程的批示中批明了在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1972年冬，周总理按照毛主席批示精神，亲自主持会议，讨论修改设计，并决定成立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负责该项工作。经过两年修改设计，1974年秋，主体工程复工，纠正了不按基建程序办事的错误，转变了被动局面，这项工程是万里长江上建的第一个坝，真正是我国自行设计和施工的巨大工程，几年来不断解决了大量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通过它锻炼培养了设计施工队伍，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正在为完成周总理提出的为三峡工程作实战准备的光荣任务而奋斗。不能用像李锐同志的意见来评价它。”

对于林的《回答》我就没再回答了，因为分部的关键问题已经解决：水电仍归属电力部管辖，水利部管地方的小水电站建设。

由两部的分合问题，引来上面旧事重提，意在说明，最重要的关键还在领导思想和决策的正确与否，机构的分与合还不是根本问题。

1982年，我离开电力部的岗位后，刘澜波也已逝世，水利、电力两部又重新合并；1988年机构调整时，两部又行分开直到现在。这真是古人所云：“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间道理是说不清楚的。两个部30来年这种分合的变化，期间具体情况，利害得失，正反是非，究竟如何，似无人总结，但有一个大势我是了解的，即电力（此处指火电发展包括煤、油、核电，电网运行及科技研究、人员

培养等等）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水利则得到实惠，从名与实两方面将水电包括在“水利”之内；而吃亏受损的是水电建设，尤其“文革”十年无人照顾，遭到惨重破坏：几个骨干勘测设计院或瓦解拆散下放，科研实验被砸烂，几所骨干水电中专学校被撤消（连校舍也奉送），资料被烧毁，总领导机构水电总局已不复存在。因而导致现在的局面：整个水电群龙无首，人们形容为“四分五裂，七零八落”；计划上一个大项目，竟无一主办单位！我现在已进入老年，80在望了，很难免俗，在这里“重温旧梦”；可是，中国的水电事业确实不愿旧梦重温啊！

这里为什么要提到“旧梦”的问题呢？1982年，我的《论水力发电与河流规划》一书出版，这时我正奉调到中央组织部工作，在“后记”中写道：

我为水电摇旗呐喊，前后共11年（中间隔断20年，也是“身在江湖，心悬魏阙”）。与此有关的经历和议论，多见于这本小书。今后已无缘就此饶舌，书是非自难顾及。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30多年来，同其他经济部门一样，水电建设成绩很大，但遗憾似乎多一些，相信今后必定会走一条康庄大道，快马前进。一朝告别，回顾往事，不免依依。成诗八句，特附书末：

重为冯妇又三年，临去还思已了缘。  
何用内惭空呐喊，无须浩叹误河川。  
如今水力皆称宝，自古文章不值钱。  
但愿波涛都化电，同床同梦永绵绵。

当时水利、电力两部正又合并，所以我真心希望“同床同梦永绵绵”。可是，这个梦依然落空了！



## 水主火辅问题

南宁会议确定了电力发展“水主火辅”的方针。在北京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传达南宁会议的大会上，大家也听到了水利、电力两部合并和有关这个方针的传达。当然，除开从事水电工作的人曾一时高兴外，电力部内部尤其火电和计划部门是接受不了的。事实上，大家也明白，形势还是会逼着多搞火电的，因为煤电容易上马（无需计入煤炭开发及其运输投资），“远水救不了近火”，水电比重超过火电，谈何容易！这里需要回顾的是，为什么当年我们如此执着地要求国家发展水电？有什么理由，什么根据，什么条件，提出“水主火辅”方针？

1956年那篇长报告中，曾比较详细地说明了这些问题。

首先，同火电相比，水电有四大优势：

（一）对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能起巨大的推进作用。水电无需燃料，水源用之不竭，是最最廉价的电源（当年还不会用“一次能源”、“再生能源”、“洁净能源”这些词汇）；通过河流的综合利用，同防洪、灌溉、航运、城市供水等方面的结合，有助于解决国民经济多方面的问题；尤其大水电

站，可以促进一个新工业基地特别是耗电工业（包括核能）的发展。（事实证明，没有刘家峡，也不会有今日兰州。）在缺乏燃料地区，水电更是唯一电源，将来核电的发展，也不能取代水电。

（二）比火电有更多经济上的优越性。除综合利用效益外，发电成本只及火电五分之一至十分之一，甚至更少；如将火电所需燃料及运输投资计入，单位千瓦投资相差无几甚至还便宜；机电设备只占总投资三分之一，而火电占三分之二，水轮机等国内易于制造，可节省外汇；运行人员只及火电的十分之一至二十分之一；厂用电只有火电的十分之一。基建周期虽比火电长，但大水电站同当年相同容量大火电厂也相差不多。

（三）运行非常灵活，机动性特别高。水电机组启动、停车不超过一分钟，在电网中最适于担任尖峰负荷、备用容量等，容易做到自动化和距离远距离控制，极少出事故，这些都优于火电。因此，在电力系统中，火电与水电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凡能替代火电和水力资源丰富的地方，自应优先发展水电。

（四）水电站多位于偏僻山区，容易防空；战争时期，供电比火电可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列宁格勒电源全靠水电，莫斯科大部靠水电。

过去我们曾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不利于开发水电，其实，水电比火电的经济优越性，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如由于不受燃料价格的影响，西方的水电股票在股市中是最稳定的。因此西方各国无不优先发展水电，大发展从30年代开始，二次大战后尤着重发展水电。50年代

中期，水电比重占全部电量 80% 或 90% 以上的国家，有挪威、瑞士、加拿大、新西兰、意大利、瑞典、日本等国。北美、欧洲及日本等国，最经济、最优越的水力资源已开发得差不多了，仍继续开发条件较差、投资较大的工程。印度、埃及、智利、希腊、土耳其（后来有巴西）等不发达国家，二次大战后也都在积极发展水电。日本国内无大水力资源，侵占东北 14 年，实行“水主火从”：丰满（56 万千瓦）、水丰（63 万千瓦）、镜泊湖（3.6 万千瓦）基本建成外，桓仁（浑江）、义州、云峰（鸭绿江）共 100 万千瓦，亦已开工；当年东北电量水电已占五分之三；基建速度也快，水丰 4 年、丰满 5 年发电。侵占台湾 50 年，建大小水电站 26 座，共 28 万千瓦，水电比重 84%。侵占海南岛的第 2 年，即建成一座 7000 千瓦水电站。侵占华北期间，黄河包头以下一段，有多目标的开发规划；在拒马河紫荆关已动工建水电站；对滦河、官厅也作了打算。

最为重要的是，我国水力资源世界第一，有 5 亿千瓦以上，可开发的打对折，也在 2.5 亿千瓦以上。其中 72% 在西南各省区，只有江苏、山东两省最少。这不比石油、煤炭等在地下，勘探费时耗资，水力在地表，一查就明。开发条件的优越，更是世界少有，可举出以下四条：

（一）地理位置适中，左右逢源，大部地区雨量充沛，利用水力资源最困难的，如上海，也可找到浙江的新安江，较远一点有福建闽江等。科学技术的发展，送电距离将越来越远。（按现在已可以考虑西电东送，西南水电送到东部地区。）所有缺煤地区，如长江流域、广东、福建、广西、云南、西藏和西北一些地方，正是水力资源比较丰富和特别

丰富的地区。

(二) 地形地质条件好。我国平原平川、丘陵山区、高原大体各占三分之一。(苏联西伯利亚远东及美国,是平原多于山地。)河川上中游甚至靠近下游多峡谷区,河谷地质多岩石基础(如长江流到武汉,河底仍是岩床),因而修水电站工程量小。如刘家峡、新安江每千瓦所需混凝土量,只有苏联古比雪夫、斯大林格勒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土石方则只有六十分之一至七十分之一;黄河上、中游各梯级每千瓦混凝土量,比世界各相等大水电站,平均少一半。

(三) 造价低廉。一方面由于工程量小;另一方面由于土建工程建设占总投资三分之二以上,同国外、同工业器材比,我国土建单价相对较低。当年计算的造价,水火电站相比(火电只计本身投资),5~10万千瓦水电站,只比火电贵半倍左右,个别相等;大水电站不相上下,刘家峡还便宜些。如果按综合经济效益,防洪、灌溉等分摊投资,则水电造价还会比火电低廉。苏联水电造价一般比火电贵3~4倍不等,北美、欧洲也是贵1~2倍不等。

(四) 建设速度快。苏联规定的中型3年、大型5年的施工期限,我们可以做到。狮子滩就规模而言,接近大型水电站,从开工到发电为2年半;新安江属大水电站,为3年半。原因在我国可以四季施工,施工准备可以简化(如临时住房等),以及我们特有的吃苦耐劳传统精神和丰富的组织工作经验。

“文革”居秦城单监8年时,一想到我国的水电和过去的紧张生活,就感到某种依恋、安慰和逝去的兴奋。《龙胆紫集》中有一首《沁园春·咏水能》,正是写上述我国水电资

源的优越条件：

盖世能源，水力福州，其妙难言：  
叹黄河九曲，一收一放；  
长江三峡，遮日遮天。  
万水奔腾，千江怒吼，穿过崇山峻岭间。  
哀畴昔，尽空归大海，灾害绵绵。  
而今改造天然，待立坝河中把水拦，  
顿旱魔迹，丰登五谷；  
龙王匿影，竞渡千帆。  
最数涡轮，无穷动力，天降银煤亿万年。  
争贡献，遍江淮河汉，大小诸川。

既然我国水力资源如此丰富，开发条件又如此优越，为什么水电不能优先发展呢？

从1950年到1954年，水电投资从544万到7609万元，5年一共约1.6亿元，其中主要用于丰满的修复，如果将丰满投资除开，前4年水电投资还不及当时造纸工业的投资。到1955年度才增到1.2亿元。一五计划中水电投资约4.7亿元，预计可超额完成1.6亿元。这是一种显然的前松后紧的局面，本来可以提早开工的大工程，如桓仁、新安江、刘家峡等，都不得不推迟到1957年或1958年才能正式开工，这些工程和其他工程挤在一起也引起投资突然上升，形成遭遇战形势：项目定得迟，要得急，全面被动，只好用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办法。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就在：关于水电建设的方针、任务和计划，曾长时期内不明

确，摇摆不定。这同当时燃料工业部的领导以及国家计委领导，对水电的认识不足有关。1950年，燃料部开过一次全国水力发电工程会议，对于中国水电建设方针没有一个肯定的意见。然而，在丰满工作的苏联专家组，在会议上有过一个非常明确的建议：“中国主要应当建设大型水电站解决综合利用的国民经济问题。同时，也要修建必要的中型水电站；远景发展中，水电比重应当大于火电；国家必须成立一个领导利用一切不利资源和计划建设水电站的委员会。”并且认为，丰满的施工队伍已积累成套经验，完全可以接着修下一个大工程。他们建议燃料部迅速解决这个问题，还提出可修建桓仁。因桓仁早已完成水下围堰，坝体已浇出水面，铁路支线只差铺轨。可惜这些意见，没有引起重视。丰满工程局为此不断提出建设，包括从火电系统收集日本遗留的水电资料，可是，都石沉大海，没有结果。不仅如此，丰满为东北水电作勘测设计的几十个技术干部，反而被东北火电设计机构并去；燃料部也不同意水电工程局为桓仁进行设计。于是，一五计划东北南部仍大量安排火电。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曾在四川长寿龙溪河（狮子滩为该河第一级）成立过水电工程处，同时成立全国水电勘测总队，在西北、西南修了十几座小水电站，最大的是龙溪河第4级下清渊洞3000千瓦。日本投降后，成立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有十几个勘测、施工单位，共有技术人员约300人，其中有30人在美国参加过三峡规划的工作。全国解放前夕，被遣散了100人。1950年这个处的部分人员，调到燃料部成立部内的水电工程局（成立工程局前，有一个水力组归计划司管）。我1952年秋到这个局时，只有技

术干部 40 人，老干部 8 人；分散在各省区的水电单位包括丰满工程局，都归地方或地方电力部门领导。这种情况当然无法促进全国水电事业的发展。燃料部有的领导还想将这个局并入火电总局，火电总局更是赞成，部党组几次讨论未决。面临此种形势，我只有不顾“想独立搞个摊摊”的嫌疑，去找陈云同志，反映这一情况，当时知道他很关心水电。同时，写了一个成立水电总局统辖全国水电事业的报告，经中央财经委批准。这样，才最后解决水、火合并不合并的问题。1953 年初成立水电建设总局之后，燃料部于是有 4 个“部外”独立的总局（其他 3 个是煤炭、电力、石油）。其中煤炭的担子最重。当时部内外流传过一句怪话：“重煤，轻电，不管油，水电不在话下。”4 个方面工作的安排，自有轻重缓急之分，但部领导对水电确实重视不够，分部前 3 年中，对于水电工作只讨论过 3 次。部领导的主要问题在：一方面，对水电建设的规律认识不清，对中国水电发展条件不作了解；另一方面对中国已有的水电力量，又估计不足。长期以来，大家对大型水电站存在一种疑惧心理，总认为投资大，时间长，问题多，因而“不能着急，得慢慢来”。国家计委燃料计划局 1953 年的文件中，曾对中国应及早修建大型水电站持否定看法：桓仁不必急于建设；三门峡要待三五计划考虑；还说修建古比雪夫、斯大林格勒的准备工作，开始于 20 年以前；我国 5 至 10 年内只宜建若干不太大和中、小型水电站。根本不同意水电总局将三门峡、刘家峡列入一五计划，以及桓仁立即动工等意见。1953 年，燃料部向中央的报告长达 2600 字，有关水电部分只有 170 多字；我曾经先后提供过 700、500、300 字的 3 次稿子，都不

被采纳。1955年6月，向中央的报告《燃料工业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长达2万字，关于水电仍只有一句话：“3万到5万千瓦的水电站，从确定项目、勘测设计到开始发电，约需5年左右的时间。”关于我国水电建设方针和已有条件虽只有三四百个字，硬是不让挤进去，而且不能采纳这句话：“从国民经济长远的发展，电力工业、国防工业和河流综合利用的要求，都需要尽可能快地和尽可能多地建设水电站。”我当年的苦恼是可想而知的。

主管部门对水电建设采取如此冷淡的态度，有两个具体原因。一是，燃料部和计委燃料局管电力计划的人，全部是学火电管过火电的，只熟悉火电，只有以火电解决问题的经验。都认为“水电投资大，无经验，无力量”，“不可能过多建设水电站”。他们对水电总局的意见，怎么样也听不进去，尤其不相信造价低的说法。狮子滩的投资不超过1亿元，从1951年起，年年提出来又放下去；上海虽公认为不宜多发展火电，新安江上马却一直摇摆，对上海看法一有变动，就首先削掉新安江；只有在实在无法建火电的地方，才不得不让水电补空子，一五计划的全部水电项目几乎无不反映这一情况。赣南钨矿用电，原来安排火电，因找不到煤，才临时抓水电，上犹水电站是临时上马的；昆明石龙坝新厂，年初从计划中砍掉，年中急于要电，才又仓促复工；官厅的情况也类似狮子滩，对北京负荷上涨也曾估计不足；广东缺煤，流溪河是地方提出来的项目。

第二个原因是偏听苏联一个方面的意见，对中国水电未作全面了解。1953年，苏联总顾问曾向计委领导谈过苏联修大水电站的苦头：投资积压大，时间拖得长。历史上，



苏联二五计划电力基建只完成 55%，莫洛托夫曾予批评。因此三五计划确定：“应修建不大电站和中等电站、热力电站和水电站，并大大发展小水电站”，“要求坚决放弃那种醉心于建筑巨大企业的观点”。其实，当年莫洛托夫批评的是火电站（这种“不大电站”方针后来吃了亏，又受到批判）。苏联三五计划决定修建一批大水电站，因二次大战中断。战后苏联水电有极大发展，电力系统中首先考虑水电，但投资大、工期长，确实是一大问题，国内对此也是有争论的。燃料部的电力专家组是搞火电的，也反映了“火电派”的意见。关于我们宣传的中国水电造价低、工期短，苏联专家更是长期不相信的，不同意我们的投资计划。直到狮子滩建成，上犹等工程开工取得成绩后，这些问题才从内到外，逐渐取得较一致的看法。

由于大江大河防洪的迫切，引出河流综合利用和大水电站及时提上议事日程；也由于水电工作本身所作的努力，使大家对水电要优先加快发展取得共识，从而才有可能出现南宁会议上“水主火辅”的方针。至一五计划结束的一九五七年，水电总局所辖各单位，共有行政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各达 5000 人左右（技术人员中大专以上约三分之一）；下属 8 个勘测设计院、10 个工程局、1 个机电安装公司、1 个科学研究院；正在施工的水电站 15 座；近 60 项大中型水电站，在进行各个设计阶段的勘测设计工作。除开丰满的重新设计和三门峡工程设计由苏联负责外，其他全部水电站都由自己设计，并且大胆采用了一些有世界水平的先进设计。新安江的大机组也是国内制造的，促进了我国水电机械的迅速发展。同时，已经掌握了大水电站的机械化施工，混凝土的浇

筑全盘机械化，在国内还属首创。后来新安江3年半发电，工程质量很好。这种速度属世界最前列。（1980年我到新安江，听说来参观的意大利水电专家根本不相信此事。）当年引起人们对水电抱怀疑态度，有一件信誉很坏的黄坛口事件，是一大原因。黄坛口水电站（4.8万千瓦）原由浙江地方兴办，由于急于求成，两岸坝的接头处地质工作没有做够，以致开工后，坝体必须改变设计，增大投资，加以用户的问题未解决，1953年命令停工，国家监委出面查处，《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指责。水电总局“代人受过”，也作了检讨。但对停工处理，我们和地方上一直有意见，多次争取，1956年才又复工。黄坛口一时被称为“荒唐口”。这个事件在水电系统曾大张旗鼓进行教育，作为一辈子的教训，使上上下下都认识，地质是水电站的生命线，必须重视勘测工作，它是水电建设的先行和基础，关系到水电建设能否做到又好、又快、又省。

《六铺炕吟》的开篇部分，即写下从事水电工作最初几年的心情：

盖世无双水力，一千六百大川。  
洪波奔流射东海，砾崖转石万壑间。  
浪打龙门开石壁，千里江陵一日还。  
分布均匀开发易，综合利用投资廉。  
白煤用不竭，自应力争先。  
不倦操觚鼓舌，经常涉水翻山。  
最爱迷人工地夜，惯摇顶我上滩船。  
道路多曲折，风波回首看：

刚掌冷官印，水火言合并。  
且待来日外力援，水电暂时休鼓劲。  
专家组或可有言，是否苏联有教训？  
地理国情多不同，我取我行径。  
不畏人言闹山头，自掌自运命。  
若不过此关，推迟多少年！

关于黄坛口事件，是紧接着官厅“有如庶出篱下苦”之后的苦恼和鞭策：

孩提蹶步谓“荒唐”，黄坛口坝恶名扬；  
北京查究杭州怨，上下夹攻一身当。  
张冠李戴不为意，口诛笔伐亦无妨。  
代人受过祸得福，树碑立传永不忘。  
其时形势实险恶，尚未出师前哨伤；  
漏屋又逢连夜雨，破船恰遇顶风狂。

当年确实是经常翻山涉水，不倦操觚鼓舌——写文章，作报告，趁机宣传，上书言事……，风来雨去，险滩恶浪，驾了几年顶风上滩船，终于赢得这个“水主火辅”的方针

第一个五年计划水电超额完成时，全国水电总容量由1949年的16万千瓦增至1957年的102万千瓦。水电在全国电力总容量中的比重由9%提高到22%，电量比重达25%。根据“水主火辅”方针，曾经设想，1972年全国电力容量达到5000万千瓦，其中水电比重约略超过50%。这个设想并非没有根据。当年不仅是苏联、东欧和西方各国在大发展

水电，战后日本经济极端困难，仍在大力开发水电。（1957年日本电力1685万千瓦中，水电1029万千瓦，火电656万千瓦。）1953年至1957年5年计划中，共计划建水电330万千瓦，火电240万千瓦；1957年全国在建水电达到1020万千瓦，火电656万千瓦。这些事实不能不鼓舞我们勇敢前进。

这个昙花一现的“水主为辅”方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刘澜波代表水电部作“为全国初步电气化而奋斗”的发言中，还着重谈到：“关于我国电力工业的长期建设方针，中央确定以发展水电为主、火电为辅。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其意义决不止于电力工业本身，对整个国民经济也必将发生深远的影响。”他从资源条件、综合利用和成本效益3个方面，说明了我国开发水电的特殊优势。然后谈到：“第一个五年中，水电建设得少了，固然由于当时用电急，以及电力投资的限制等原因所致，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大家对我国水电建设的优越条件还理解不深。几年以来，一些同志常在以下3个问题上抱着怀疑的态度：一、水电站的造价是不是真正便宜？二、水电站能不能很快建设起来满足用户的需要？三、我们自己有没有能力更多地建设水电站？经过第一个五年水电建设的实际情况，现在这3个问题可以作正面的肯定的回答了：水电每千瓦造价只比火电贵10%（容量相同的新建电站对比）；建设时间比火电一般只长三分之一；自己可以独立设计、建造各种类型的大水电站，并由国内供应大型设备。发电容量为65万千瓦的新安江水电站，去年才开工，施工单位已提出要在1960年发电，为时不到4年。这种速度是其他国家所没有过的。加速实现水主火辅方

针的关键，在于第二个五年中水电要有一个大跃进，而关键又在今明两年。”发言中还谈到为实现水电的大跃进，“这方面目前有两个有利的条件：其一，各省近年来建设了并且正在建设着大批的水利工程，其中绝大部分都能结合发电；其二，水轮发电机制造部门的生产能力有可能迅速提高，在设计上采取措施，套用已有设备图纸，就可能多生产水电设备。”

自从1954年同刘澜波一起到苏联，参观考察电力工业特别是到过许多已建和在建的大小水电站后，关于我国应当而且可能大大加快水电建设，我们之间的看法，可以说完全一致了。他在八大二次会议的这个发言，充分表达了这种一致。

“大跃进”的挫折，基建投资大幅度下降，许多水电站也被迫下马。“水火并举，因地制宜”的方针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但后面还有一句话：“在有水力资源的地方多搞水电。”庐山会议后，我个人的坎坷浮沉虽无足挂齿，但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时，却连带批判了什么“大水电主义”，什么“三反分子”，使得水电事业的发展水电干部的成长也受到严重的影响，言之使人痛心。

1978年，我国电力容量为5712万千瓦，其中水电1728万千瓦，火电（煤电和油电）为3984万千瓦，水电比重为30.2%，电量比重下降到17.4%。

为达到2000年生产总值翻两番，关于电力建设方针，国务院领导早指出“因地制宜地发展火电与水电，逐步把重点放在水电上”。煤电的发展受煤炭和运输的制约越来越严重，按照“水主火辅”也好，“逐步把重点放在水电上”也

好，都是希望多搞快上水电的，可是事与愿违，水电多年来一直迈不开大步，论者多谓国家财力不足。1979年我复职回到水电岗位，又工作了3年，深深感到水电疮痍满目，蹒跚难前。可是一了解，“文革”期间，建起烧油电站1200万千瓦。如果算一下大帐，按每千瓦油电比水电节省基建投资800元计，1200万千瓦共节省96亿元。可是这些烧油电站的耗油量，平均每年按1600万吨计，原油1吨200美元，每年烧油损失的外汇即达32亿美元。后来由于石油大增产的设想落空，油电又改回烧煤。这一折腾，白白浪费巨额资金，照例无人总结教训。按前述1958年的设想电力18年无审议计划，1972年达到5000万千瓦水平，到1977年才年实现，其中火电3500万千瓦，水电1500万千瓦，比原来设想水火各半，水电少了1000万千瓦。如果当年不盲目搞油电，仍能坚持“水主火辅”或“重点转向水电”的方针，水电每千瓦投资就按1000元计，也不过100亿元。按当年1美元折人民币2.8元计，3年油电的耗资金就足够这1000万千瓦水电的投资了。因此，所谓投资不足影响水电发展不是根本原因。水电七五计划只完成73%，电力投资中水电比重已由过去三分之一降为六分之一。这确实是由于“投资不足”造成的。按照计划经济体制总结水电40年发展缓慢的历史，为什么南宁会议“水主火辅”的方针昙花一现？为什么后来定的“逐步把重点放在水电上”的方针依然长期不能实现？其原因除开领导决策方面的问题外，还得从国家的经济体制、投资体制、价格政策（包括电价吃大锅饭），以及贷款、税收等政策，来深入研究，才能彻底了解这个奇怪的问题：同煤炭和石油一样，水电是一次能源，又是最洁净能

源，还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再生能源，可是它的命运同煤炭和石油不一样（而且资源早已查明，都在地面上），不能尽快发展；才能了解为什么西方各国七八十年来总是优先发展水电，曾经长期“水主火辅”，巴西这样的国家也能后来居上（巴西 60 年代才大力发展水电，现在水电比重 90%）。否则，煤电易上易于救急的局面无法转变，我们还得“重火轻水”下去，也只有煤炭部长难免长叹：空交了水电这个“好朋友”。往者已矣，来者可追：从思想认识上，从经济体制与有关政策的改革上，来解决不能优先发展水电老大难的问题吧。多年来，一想到国家的能源远景，常不免忧心忡忡。现在回忆到南宁会议“水主火辅”方针这段旧事，又饶舌说了这么多老话。

## 农业“大跃进” 的前奏水利化运动

南宁会议回来后，毛泽东第一次召见时，谭震林在谈淮北如何水利化，大办小型水利的问题。多年来水电与水利之间的矛盾，关系到综合利用方针（如淮河修佛子岭水库是单纯防洪，水电站与灌溉都是后来补上的）和许多工程上的合作问题，加以水利、电力两部合并，使我当时就比较注意全国大搞水利化运动的情况。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大跃进”是从农业开始的，农业“大跃进”又是从1957年冬至1958年春大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开始的。

八届三中全会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这个《纲要》是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最早于1956年1月25日经最高国务会议通过后公开发表。经过1年多讨论修改，增加了农业发展两条道路斗争、巩固农业合作化制度等内容。经过修改后的《纲要》认为：“发展农业可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让农民的命运掌握在地主、富农和投机商人的手里，极少数人发财，而大多数人贫困和不断破产。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让农民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掌握自己



的命运，共同富裕和共同繁荣。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我国过渡时期中将长期存在，但是由于农业合作化的基本完成，我国绝大多数农民已经摆脱了前一条道路，走上了后一条道路。

今后的任务是要尽力巩固合作化制度，同时继续反对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纲要》在要求实现所规定的目标方面，虽然把原要求5年或7年内实现的指标，改成12年内实现，但是强调要“反对保守主义”，而且维持了最关键的粮食单产高指标。毛泽东在全会上要求粮食产量五年内达到人均2000斤，半个世纪内达到亩产2000斤。

全会之后，正式公布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其中说道：“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工作，在12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社论还说：“我国农业不久以前才从小农经济束缚下解放出来，某些陈旧的生产习惯并没有随着经济制度的改变而改变。许多人惯于根据小农经济的生产条件来看合作化以后出现的新情况，对过去没有看见过的事情，常常是不敢想，不敢做，信心不足，顾虑重重。”社论提出要集中力量，彻底打破“右倾保守思想”。接着在11月13日和28日，《人民日报》继续发表社论强调反右倾。13日的社论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于客观规律的。1956年的成绩充分反映了这种跃进式发展的正确性。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了解合作化以后农民群众伟大的创造性，所以他们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

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28日的社论说：“为什么有些县几年来农业生产不但没有跃进，而是增产很少甚至产量降低了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最根本的问题，是这些地区的领导者有严重的右倾保守思想。或者是盲目自卑，或者是盲目自满。”“我们要改造人类社会，改造大自然，同时也要改造我们自己。没有革命志气，什么事也做不成。革命建设的事业，就是要变革现实世界，而旧事物总要顽强地以惰性反对新事物的出现和发展。因此，在变革过程中，右倾保守思想是经常存在的，需要用很大的力量同它作斗争。必须不断地、经常地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才能胜利前进，才能实现生产大跃进。”

如果说，《纲要》是农业“大跃进”的纲领，那么，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则是实施这个纲领的第一个步骤，这是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在通过《纲要》的修正草案后，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要求各地农村要鼓起一股像一九五五年冬季生产高潮中那样一股劲头来，掀起一个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的高潮。

三中全会之后，各省、自治区和京、沪先后召开党代表大会，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制定落实《纲要》的计划，部署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许多地区还专门召开了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的会议，以进行大规模的群众动员。实现《纲要》和水利化的过程，被认为存在“跃进”与“渐进”两种方法的矛盾。“渐进”的主张受到批判。批判者武断地认为：主张“渐进”“是为了吓唬别人的前进”，而不能“跃进”，就达不到《纲要》的指标，从而也就否定其实现的可

能性。1957年12月6日江苏《新华日报》的社论《该不该跳，能不能跳，敢不敢跳》颇具代表性。该文如此上纲上线：“我们在农业战线上，应该跳，也可能跳，问题是我们敢不敢跳。敢与不敢，在我们思想领域里，是表现为积极与消极的对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诚与否的对立。”对农业和水利发展速度的不同看法，变成了对革命事业是否忠诚的政治态度问题，这无疑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政治压力，而且直接同反右派斗争联系起来，1958年2月，在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上，湖北的代表建议：“把这些右派分子带到大山区水利工程的工地上，让他们在轰轰烈烈的水利运动面前，再一次看到我们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群众的伟大创举，再一次认识自己的荒谬和无知，老老实实地在群众的监督和教育下改造自己，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四川叙永县的代表说：“去年五六月间，大鸣大放的时候，县一级机关的右派分子说，总是恶毒地诬蔑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恶毒地诬蔑我们党和农业合作化。这一次我们把这些家伙集中起来，带到山上参加劳动，让他们多长一些见识，多受一些教育，从劳动中去改造他们。”云南晋宁县代表控诉县委书记“这个资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右派分子：“不准我们搞千斤社千斤队，他说所有先进增产计划都是吹牛，他打击一切先进生产措施，并且还叫拆散合作社。”“今年工程比去年大，不仅不要政府给钱，口粮全部自带，而且是争先恐后，白日黑夜干。现在，社员们的生产劲头大极了！‘叫荒山低头’，‘叫土地翻身’，‘把高山劈成两半，叫河水穿过高山’，‘不修好水利，不过老年’的口号，已经变成群众性的行动。”

在水利化运动中，一方面是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另一方面是树立样板。河南是最早树立起来的样板。《人民日报》报导：1949年至1955年10月，河南全省共扩大水浇地750万亩；1955年10月至1956年5月仅7个月，就扩大水浇地2400多万亩，相当于前7年的3倍多。这个省的济源县是全省水利建设典型，其措施被概括为4条，即坡地梯田化，荒山绿化，沟地川台化，大量修建小水库。河北的天津专区也是样板之一。《人民日报》专门发表社论《推广先进经验，发动群众大兴水利》，号召学习济源县和天津专区的经验。样板的树立大大刺激了人们的情绪，各地纷纷起而仿效，甚至不顾天时地利（降水量和地形地质）的差别，盲目照搬样板的做法。当时在全国影响最大、后来后果最严重的是推广了济源治理潞河的经验：“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或社队自办）为主”的“三主方针”。3月21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社论。

1957年8月，河南省委在总结潞河治水经验的基础上，召开了沙颍河治理工作会议。在这之前，地方上已开始批评水利部门的治水思想，是以排水为主，大型为主，国家兴办为主，防洪尤其内涝和干旱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认为这种“以点线治理为主，是没有摸清水的规律，对于水利和农民生产、生活的关系，还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他们还没有看见群众的力量，不相信群众兴修小型工程的作用。甚至还规定了某些清规戒律，限制广大群众的治水活动，担心群众‘搞乱’了”。“1955年冬，河南全省掀起第一次群众兴办水利高潮，半年打井100多万眼，发展水地2400万亩。”但是有一种人“抓住群众兴办水利中的某些缺点，片面夸大，甚

至根本否定群众性治水。说什么‘水利建设冒进了’，说什么‘水利工程是技术工作，群众掌握不了，不应该搞什么群众运动’，‘群众办的小型工程起不了多大作用’等等。”<sup>①</sup>被批评的这种人就河南水利厅的负责人。

沙颍河治理工作会议有水利部的领导参加。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在会上算了3笔帐：第一笔是平原地区每年有多少降水量，除了渗漏以外，还有多少地面径流；第二笔是北方平原地区种水稻要消耗多少水量；第三笔是北方地区的降水供农业用水还不够用。因此，她为“三主方针”找到了理论根据，于是作为水利部的上级领导，完全同意河南提出的“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的方针，以“蓄、小、群”同“排、大、国”相对立，向全国推广，首先推广到整个黄淮平原地区。以后在“大跃进”年代发展到在平原地区大搞平原水库，大挖河网，搞“竹节水库”（将平原河流节节拦蓄），直到大搞引黄灌溉。由于执行了“三主”的错误方针，不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许多工程不仅不能兴利除害，反而加重了灾害，主要引起广大平原地区盐碱地大量增加，引起地区间的水利纠纷，涝、渍加重等等。

上引3月13日《人民日报》报导正题为：《大干一冬春，胜过几千年》。文中谈道：“截至春节为止，全省农民大战百天，已扩大水地面积3200万亩，现在运动正以日增近50万亩的速度迅速发展着。从现在起，还可大干3个月，熟悉运动情况的人们认为，5000万亩这个指标，也将被英雄的河南农民大大突破。这是怎样的一种跃进呢？它比解放

<sup>①</sup> 参见1958年3月13日《人民日报》报导《记河南省水利建设高潮》。

前几千年来河南全省发展水地面积的 7 倍还多”“‘河南省 1959 年实现水利化’，曾经有不少人是怀着既兴奋、又有些怀疑的心情来接受这个计划的。可是这个计划又将被提前实现了。全省原有水浇地 4300 万亩，去冬今春又发展 5000 万亩，全省 70% 的耕地变成水地了。”

在河南的带头下，兴修水利和积肥运动出现的浮夸不可避免。1957 年 11 月份统计，各省上报的扩大灌溉面积计划达 9000 万亩，比 9 月份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的控制指标高出 50%。12 月，国家经委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又将指标提高到 9221 万亩。到 1958 储备年 1 月 31 日止，各地上报已经完成扩大灌溉面积的数字，就达 11798 万亩，超过计划 28%。按照各地上报的数字计算，全国每天增加灌溉面积 100 万亩。1958 年 1 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确定，全国灌溉面积计划达到 6 亿亩以上。2 月 3 日《人民日报》社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称：“打开最近各地报纸，真个叫人心花怒放。跃进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革命的干劲洋溢在字里行间。农村中每天有近一亿人向大自然进军，热火朝天地进行水利建设；城市中千百万厂矿企业的职工，正在敲响挖掘潜力的锣鼓，一而再、再而三地突破原订的计划指标。”社论说：“1956 年我国各项事业的大发展，尽管其中有个别的缺点，但仍然是一个基本上健康的大跃进。正确的态度应当是肯定跃进，肯定好的东西，同时采取适当的方式来调和克服其中个别的缺点。但有些人却分辨不出 9 个好指头和 1 个坏指头的区别，把个别当作一般，把支流当作主流，对整个形势作出错误的估计，名为反‘冒进’，实为反跃进。”这篇经毛泽东审阅的社论，充分反映了他在南宁会

议上批判“反冒进”的讲话精神。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从而以所谓更加“跃进”的步伐在全国展开。

为了完成一再提高的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的指标，各地在缺少农具、施工机械的情况下，拼命加大劳力投入和增加劳动强度，大规模动员农民，不分昼夜，进行“大兵团作战”。从当时各地提出的口号中可见一斑：

“早出工，晚收工，月亮底下当英雄。”

“风大吹不走高潮，天冷冻不了决心。”

“白天一片人，夜间遍地灯。”

“山硬硬不过决心，山高高不过脚心。”

“男女老少齐出征，兴修水利干得凶，青年劲头赛赵云，壮年力气赛武松，少年儿童像罗成，老人干活似黄忠，干部策划胜诸葛，妇女赛过穆桂英。”

“大雪飘飘透骨冰，大家筑塘更齐心，男女老少齐动手，分散的石头拾成堆。”

“山高没有锄头高，石硬没有锄头硬。”

“抓晴天，抢阴天，小风小雪是好天，汽灯底下是白天，争取一天当两天。”

“白天一片红，晚上一片明。”

“天上满天星，地下万盏灯。”

“共产党，像爹娘。修水利，福无疆。吃饭再不靠天给，农民要当老龙王。”

据统计，全国各地农村兴修农田水利每天出工人数，从

1957年10月份的两三千万人，到1958年1月，不断增加到一亿人左右。到一九五八年四月中旬，全国农民投入兴修农田水利共计130多亿工日，以1亿劳动力计算，每个劳动力投入130多个工日，完成的土石方总量达250多亿立方米。有人计算，如果用这些土石方铺成1米厚、66米宽的路，可以从地球铺到月球。据水利部门当年统计，从1957年10月至1958年4月，全国扩大灌溉面积35334万亩，比解放后8年增加的灌溉面积总和还多29.3%；改善低洼易涝耕地2亿多亩，改善灌溉面积1.4亿亩，新增可控制水土流失面积16万平方公里；积肥约3100亿担，平均每亩可施肥1.8万余斤。

受河南“大跃进”的影响，不仅各地农田水利和农业指标乃至“除四害”等速度，不断加大加快，还刺激了其他行业的“大跃进”。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报告中说：“去冬今春的农业新高潮，有力地推动了今年的工业新高潮；而工业的迅速发展，又反过来推动了农业的迅速发展。”李葆华在八大二次会议发言中，谈“水利运动的新形势”，认为“蓄、小、群”同“排、大、国”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水利建设的正确道路应当是：以蓄水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群众自办为主，在这个基础上，结合必要的排水、大中型和国家主办的工程，达到全党办水利，全国办水利，多快好省地把水患变为水利，以适应社会主义工农业发展的需要。这条道路正确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也就是水利建设中的群众路线。同上述路线相对立的也存在着另一条路线，这就是：以排水为主、以大型为主、以国家举办为主的路线。实行这条路线，必然是少、慢、差、费。很明显，这条路线是



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要达到的指标：“到1962年我们将有12亿亩水田和水浇地，约占耕地面积的70%以上，基本实现水利化，消灭普通旱灾。”“在水土保持方面，要求完成10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到1962年将有120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得到初步控制，约占水土流失面积的80%。”“在治涝方面，结合大量发展水稻，要求完成3.3亿亩，到1962年共完成治涝面积4.2亿亩，基本上解决淤涝问题。”“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内基本上消灭普通水旱灾害，提前完成农业发展纲要中的要求，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作为农业“大跃进”的前奏和全面“大跃进”运动的第一个高潮，1957年冬至1958年春的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最大的问题是导致了浮夸风、高指标风和强迫命令风等刮遍全国。对于农业生产来讲，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都是必要和积极的措施。我国是一个南北、东西地形迥异，自然条件大不相同，灾害频繁，生产技术又极为落后的国家，农业一直靠天吃饭。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以提高地力，是农业方面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但是1957年冬至1958年春的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是在批判反冒进的高压气氛下动员和展开起来的。由于八大所制定的积极稳妥的经济建设方针被否定，发展各项事业的正常主张被一律指责为“右倾保守”思想，“跃进”（脱离实际的冒进）被肯定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针，因而人们希望加快生产的热情被引向完全脱离实际的狂热，导致生产计划和指标的一而再、再而三地修订和提高，成倍、几倍、十倍甚至几十倍地增加。其结果，或者是所指定的高指标无法实现，计划变成空话、大话，或者是因

---

而降低标准，不顾质量，造成种种有害后果。水利方面后来继续“大跃进”造成的严重灾难，更不同于其他行业和部门，不仅是工程半途而废或完全报废等问题，而是为了减除灾害反而造成或加重灾害的问题。

## 周恩来带队查勘三峡记

1958年1月，南宁会议讨论三峡问题后，毛泽东将这件大事交给周恩来负责：一年抓几次。

回到北京，我忙于水利、电力两部合并。水利部原有一个工程局，于是同水电总局全并为水利水电建设总局，我也就到部里工作了。这个总局标志着原来两部之间水利同水电的矛盾，现在用同灶做饭这个办法解决了；可是三峡这样的问题，仍难以同床同梦。

2月下旬接到通知，总理要亲自带队到三峡坝区考察，听取中外专家和各有关方面的意见。队伍是庞大的：有李富春、李先念，水电部李葆华、刘澜波、张含英、钱正英，科学院张劲夫，国家技委刘西尧，交通部、地质部的人，记得北京去的人还有胡耀邦；此外，长办的林一山、李镇南（总工程师）和苏联专家们，四川阎红彦，湖北王任重等；各部门有关工程师和专家很多，有好几十人。2月26日在武汉集合后，晚上坐上一条新造的旅游客轮江峡号，向上游驶去。同我去的有总局两位水电老工程师：一位是陆钦侃，当时正派在长办工作，他曾在美国垦务局参加过萨凡奇的三峡

规划；另一位是程学敏，负责水电长远规划，我去南宁开会时，带去的水电远景示意图就是他赶制的。他们两位后来都是政协委员，一直参加三峡论证，没有在最后的论证报告上签字。

大部分人都没有去过三峡。在船上大家兴致很高，谈笑风生。1956年2月，我陪苏联水电设计总院总工程师瓦西林可和水工设计院总工程师马洛歇夫去过三峡，他们是来检查长办苏联专家组的工作的；那次是同林一山和长办苏联专家及一批技术干部一起去的。沿岸重要地段和峡区的情况，尤其坝址等重大技术问题和流域规划问题，谈得很多，看得也比较过细。两位专家回到北京后，还向周总理作过汇报。因此，2月28日，当船过荆江大堤和沙市时，周恩来等一行人都上岸去了，我没有去；听说周恩来还问到：怎么不见李锐？很可能以为我对荆江大堤不关心。沙市街道在堤下，长江悬在上面，高出堤后地面上十多米，没有习惯的人，遇洪水时这一情景是吓人的。当年水电总局的俄文翻译傅玉兰，写过一篇《随周总理踏勘长江三峡记》（刊《旅行家》1958年第5期）。她写到那天下雪，在离郝穴不远处，看了“安澜”铁牛和护堤工程。周总理特向水电总局专家组长尤林诺夫作了介绍，1780年修建的这种护岸导流丁坝，是中国古代专家智慧的见证。后来船过秭归时，曾暂停开会，周总理向苏联专家们说，这是中国古代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乡，《离骚》等诗篇已由苏联汉学家费德林（时任苏外交部副部长）译成俄文。到达南津关时，大家上岸游了三游洞。以美人沱和三斗坪坝区时，周恩来详细听取了地质人员的汇报，看了钻出的岩芯。尤林诺夫拍的一张照片——我站在总理身

后一起凝视地质图，还有幸保存下来（这张照片曾随傅的文章刊出）

这样一路下船勘查，上船开会，从2月27日起，3月6日到达重庆，一直由周恩来主持开会。他边听发言，边做纪录。在重庆开总结会，由他作的总结。在船上7天，我同技术干部都住在“统舱”。因白天开会、谈话，又有争论，睡得很不好，那时刚过40岁，还能支持。我手头有一本长办1980年重印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论证会资料》第一集《历次会议文件选编》，其中第一部分《积极准备兴建资料》第一集《历次会议文件选编》，其中第一部分《积极准备兴建三峡枢纽会议上发言汇编》（1958年3月15日编印），共辑有21篇发言。第21篇就是周恩来的总结，我的发言是第2篇。不知何故，林一山和李镇南的书面和口头发言没有编印在内：“书面”即《长江流域规划要点报告》，当时已印发给大家。

这次周恩来率队查勘三峡，是三峡工程以如此规模的第一项论证，也是我最后一次在会议上参加此事的论证。记得大家的发言是比较畅所欲言的，作为历史资料，我愿意将之摘记下来。

最近，在1959年第一期《七一》（湖北当年的理论月刊）上，找到林一山的发言，题为“三峡坝区研究工作的思想指导问题”，内容完全是谈南津关和三斗坪两个坝区的比较选择，他当时极力推荐美人沱坝址。在“具体分析两个坝区的各种复杂条件”，包括地质、地形、施工布置、工程造价等利弊，加以比较之后，林一山说：面临“全国大跃进的形势突飞猛进的发展”，“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完成三峡的初步

设计要点，而初步设计要点的中心问题又是坝区的选定。”因此，“中共长办委员会决定，三峡地质勘探中心应由南津关石灰岩地区转移到斗半坪火成岩地区。”

3月2日开会时，为三峡工作的苏联专家组长德米特里也夫斯基首先发言。他首重谈了大坝的工程地质情况，从各方面比较了南津关与三斗坪两个坝区的条件。他认为目前做的地质工作还难将两个坝段作综合的优劣比较。然后谈到：“以混凝土折算，三峡工程量比当年最大的已建水电工程，如美国的鲍尔德、大苦力，印度的巴克拉，苏联的古比雪夫、布拉兹克，要大4~9倍”他着重说道：中国何时需要三峡的电力？以苏联的经验而言，全国发电量的年增长额，应大于这样巨型水电站电量的二倍左右。如年发电量为100亿度的古比雪夫水电站投入时，全国发电量的年增长额为175亿度。（按1957年全国电力装机容量仅463万千瓦；发电量193亿度，其中水电不到四分之一。德米特里也夫斯基举出这个数字，显然意在说明三峡水电站何年需要投入，很难说清楚，实为遥远之事。他最后指出：长江的重要支流，如岷江、嘉陵江、金沙江、乌江、洞庭湖水系的4条支流、汉江等，在规划要点阶段研究的不够。他指出的这个问题，就是应当将这些重要支流的规划方案。同三峡方案作一种比较。可是，林一山一直向他宣传，三峡方案是中央的既定方针。因此他不能不委婉地说了这么几句：“上面所讲的问题研究的不够，只有说明我的意思，不能说是我的建议；也就是说，有可能找到另外一些办法，既能解决防洪，又能满足发电灌溉等要求。”

德米特里也夫斯基发言之后，还有三位苏联家发言，可

是他们都对三峡有不同看法，不是促进派，因此，《发言汇编》中就因此没有编入吧。我幸存下来的相档“工作笔记”1958年的一本中，记有他们讲的要点，都是针对《长江流域规划要点报告》只强调三峡而谈的。

电力专家组长彼斯托夫斯基说：三峡工程技术上是可能的，期限由国家财力而定。输变电线路投资（如60万伏高压），可能接近三峡本身投资造价。此外，要同时解决用电户的布置及其投资，如果三峡本身投资是80亿，那么用户投资是500~600亿。他说，苏联有一个时期水电建设得少，就是由于造价高，资金周转不过来。建这样巨大水电站，对缺少资金的国家不利，不如先建火电。有关三峡的工业布置，这只有国家计委才能胜任，长办不可能单独进行。在三峡建成之前，长江流域需要大量电力，从建水电来说，应当先由支流来解决，它们工期短还有防洪库容。因此应当研究整个流域规划，这是最为迫切的，必须重视这个问题。

尤林诺夫曾担任过苏联电站部水电总局局长。他首先说，林的报告对长江各条支流和上游干流研究得不够。防洪措施是最重要的，但不能等待三峡。他认为像长江这样的大河流，大枢纽工程，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来研究。苏联的岁卡拉河、伏尔加河花了30年。有关的一切问题都要弄清楚，要深入研究，不要怕花时间，如5年，10年，建成三峡总是20年以后。因此，在修建三峡之前，需要开岁支流，这样，逐渐减少宜昌以下洪水，并减轻长江中下游洪水压力，同时可解决支流本身的防洪问题。支流本身防洪，是三峡无能为力的。规划必需考虑所有这些问题。他希望长江水利委员会尽快研究支流第一期工程的规划，同时他仔细研究三峡

规划设计。规划与具体设计有别，两者不要混淆。

水利专家组长戈尔涅夫说得更直截了当：从防洪观点看，可用支流水库代替三峡；三峡投资太大；也不能认为三峡能彻底解决长江防洪问题；三峡建成后，都还需要堤防和分洪措施。他还强调，干流、支流所建枢纽工程，都不能解决排涝问题。对排涝最有效的是广大小型水利工程，能就地拦蓄，可利用群众力量办。

3月3日继续开会。周恩来指定要我先讲。在这个会议上，可说我是相当孤立的，当时正值“大跃进”高潮开始出现潮头；南宁会议有关三峡争论的情况，人家并不清楚（长办和水利部门的人都只知道，毛主席指定周总理抓三峡这件大事）；“高峡出平湖”的词在继续鼓舞着人们

1987年1月14日，王任重发表过一篇《随同周总理考察三峡记》（见王著《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一书），文中摘录了当年他写的日记（1958年2月26日至3月6日）。他在日记中这样记下我的发言：“讲综合效益，三峡工程很理想，技术上虽然有很多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但是，他不同意林一山的意见，反对长江流域规划确定的三峡为控制利用长江水利资源的主体，他主张先开发支流，先小后大，先近期后远期。他认为长江防洪问题不大，加高堤防就可解决。”

我的发言按《发言汇编》全文抄录如下，以存其真：

从综合效益来讲，三峡是非常理想的，也是很好的。在技术上虽然有很多困难，但应该说是可能的。经济指标特别是单位指标都是很好的，三峡可



以解决（按：“解决”二字用的不当，从下文谈防洪即可证实。原件如此不作更改）长江洪水问题，以及开发长江的水力资源，这都是用不着怀疑的。过去有些问题，曾引起争论，这主要是三峡兴建的时间和坝的高程问题，过去长办曾强调三峡正常高水位 235 米，这次提出三峡正常高水位 200 米是比较现实的。过去长办对三峡电能、投资及其他经济方面的问题，研究得不够仔细，现在长办在这方面作了很多工作，研究的也比较好，因此这方面的争论也就不存在了。这是我要谈的第一点。

从林主任的文字报告中看，对三峡谈的多，对整个长江流域规划如何办谈的少。三峡虽好，但它的最大不好是时间长，需要 15~20 年才能建成，它不能解决和满足国家建设的近期要求。国家的长远计划，一般需要解决 15 年以内的问题，今天要赶上英国，三峡是用不上的，现在应该结合三峡统筹安排 15~20 年以内的工程。

在防洪方面，李镇南同志的分期提高长江防洪标准解决长江的洪水问题是对的。但在发电如何逐步满足用电的需要，体现以水电为主的方针？在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方面，如何兴建灌溉枢纽，并充分考虑现在的群众性工程？在航运方面如何进行充分考虑？都谈得较少。

林一山同志提出长江流域规划原则是：（1）以三峡为主体进行长江流域规划。（2）正确掌握三峡与干支流开发的相互关系。（3）远景规划与近期规

划相结合。这三个原则，实际上就是一切围绕三峡，后两条都是从属的。我认为进行长江流域规划的原则应该是：（1）综合利用。（2）多快好省。（3）远景规划与近期工程相结合。毛主席说：“五年看三年，十年看五年。”因此现在的近期工程是关系到国家今后的发展，有必要与远景规划分清楚，在步骤与次序上要分明。当然，远景与近期是有联系的，一般考虑 15 年以内算近期工程，目前我们不能只搞远景不搞近期。重点与第一期工程，在黄河是一致的。但在长江是不一致的。三峡是重点，但它不能首先开工，因此它不可能是第一期工程。只谈重点不谈第一期工程，不能解决国家的现实问题。

长江是一条大河，应先支流后干流。林虽然谈了支流，但太少，且过分地强调了三峡的作用，贬低了支流的作用，这是片面的。如林报告中第 15 页提到的沅水，事实上沅水对长江中游的洪水是有一定影响的。长办的苏联专家组长，在 1955 年初到北京时，曾强调长江支流的作用，特别是强调南岸的支流，即乌江、四水和赣江。乌江和沅水要比汉江水量多一倍。因此我认为长办对地支流研究是不够的。现在我们的工作应先易后难，长江的枢纽工程也应先小后大，从国家投资看也是如此。因为这样做，可以积累经验，以便今后进行三峡工程。这是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谈一谈关于长江的防洪问题。长

江的防洪问题，公认是首要的任务，但长江洪水灾害性质与黄河比是不同的。长江洪水量大，而历时较长；黄河是洪水量小，峰峻沙多，历时短而骤。长江洪水两千年间有记载发生大小洪水共 214 次。在明朝堵塞了荆江北岸的九穴十三口，加上人为的围垦，如从 1925 年至现在，洞庭湖缩小约 1000 平方公里。这样，在清朝以后，长江洪水才开始有愈益严重的趋势，这是人为的恶化。而黄河洪灾是一种随自然情况发展起来的。长江的最大、最小流量又相差 25 倍，而黄河差 200 多倍。长江洪水经过洞庭湖容蓄后，汉口最大流量为 76100 秒立米，长江千年一遇最大流量为 96000 秒立米。假若在汉口通过 96000 秒立米，相应的洪水位是 31.88 米，比 1954 年最高洪水位 29.37 米高出 2 米。黄河陕县河床的安全泄洪量只有 8000 秒立米，而陕县可能发生最大流量为 20000 秒立米，两者相差悬殊很难解决。在长江增高 1 米的堤防。就能使汉口增加洪水宣泄能力 8000 秒立米，这相当三峡的有效库容 420 亿立米，由是可以说明长江堤防在防洪上的作用。故长江防洪最主要的措施是堤防，长江荆江大堤，是一个好堤，不是一个坏堤。林主任的报告中强调荆江大堤不决口是偶然的，我不同意。应提出确保荆江大堤。实际上荆江大堤是可以确保的。就是三峡做好以后，荆江大堤还是很重要的。现在汉口的堤防已加高至 30.73 米。如需解决 600 ~ 1000 亿立米的防洪库容，先做支流，可以减轻三

峡负担。若在 15 年内，水土保持做的好，洪水还会减少，三峡的防洪作用也就可以减轻了。长江 1954 年的溃灾淹没地区的 80%，三峡是不能解决的，这要靠支流。

第四个问题是对今后研究长江的一些意见：

第一，应加强支流的研究工作，如金沙江、岷江、沱江、嘉陵江、乌江、清江、洞庭湖的四水，汉江和赣江。在这 12 条支流上，假若在 15 年内，获得逐步的开发，就可以得到有效库容 1000 亿立方米，发电 1200 亿度，灌溉 4000 万亩，航运亦可改善，将来配合三峡运用则更好。三峡单位指标虽好，但支流投资可以分散，周转快，收效快。因此先作支流是合理的。支流的汉水丹江口，沅水五强溪，嘉陵江、岷江等应先开发，特别是宜昌以上支流，修了水库，对三峡施工也有好处。

第二，不能把三峡概括一切，这里面具有一定的矛盾。在我的印象中，长办对丹江口研究程度没有三峡研究的这样深，而眼前是需要丹江口。远景研究过高，将来变化很多，就会使三峡研究成果等于学校毕业时的论文设计。从报告中可以看出，林一山偏向于美人沱，如现在马上对美人沱进行初步设计，将来就有可能变成（大学生的）毕业设计。南津关的缺点我们知道是喀斯特问题，而美人沱进一步发现的缺点还不知道，说美人沱的导流施工容易，也是值得怀疑的。现在还没有根据说南津关不如美人沱，而林却强调美人沱好，工作再深入一

些，可能就不一定了。现在对三峡兴建，不要强调过快，准备与设计工作，应拉长一个时间。经济方面问题不谈，单从技术准备看，1963年能否开工也是有问题的。若这样还会影响近期工程的进行。因为现在全国都很紧张，特别是地质问题困难，而事实上地质会越做越复杂。经济研究的组成，现在也是有问题的。如照李镇南同志说法，各个部门需要派强有力的骨干驻在武汉。国家计委研究我国15年以后的情况是比较少的，现在可否考虑与计委共同工作，或长办经济工作人员驻京工作。

第三，长江流域规划范围问题。长江虽有超流域的意义，但应约束在一个范围以内。现在无所不包，几成为全国的经济规划。这种全面性是吃力不讨好的。各部门、各省市，能做的工作，长办不应代替，不能单纯以长江地理概念来划分。

第四，关于力量问题，应统一考虑。长办队伍是最强大的，现在拥有技术人员3000人，工程师400~500人。过去日常工作交各省，目前长办主要在搞规划，但其中大部分搞三峡，这是值得讨论的。关于三峡与第一期工程的比重，各占多少，应有一定考虑。

《发言汇编》上接着是钱正英发言，她说下述四个问题，“是长江流域规划中带有纲领性、关键性的问题。过去长办的工作研究了这些问题这是对的。这次林一山同志提出的报告也是对的”这四个问题全文抄录如下：

(1) 三峡的地位：因三峡有特殊的地位和开发条件，三峡是流域规划中的关键问题。是规划中的中心枢纽，这应该首先肯定下来。假如长江不进行流域规划要点阶段的工作，那么现在的长江各个支流如何规划，如何对长江进行开发，这些问题都是很困难的，这样就会影响全国整个建设的布局。

(2) 干支流关系。长江流域的支流规划，想一下都在今天拿出来那是很复杂的。也是不现实的。我不相信，在汉口会做出太湖流域的规划。因为支流规划工作，多是依靠地方。现在的长江流域规划，就是要提出规划中的主体和各支流规划的工作方向，而这一问题，林一山同志已正确地提了出来。支流在下游控制，在防洪方面才能为干流服务，因此要求在支流的下游建建水库，这样淹没的地方会比三峡淹的更多，且与支流本身利益相矛盾。如支流灌溉，应在上游修建枢纽，这样效益大，但对长江的防洪效益小。因此，不首先肯定三峡，干支流的关系是很难正确肯定的。

(3) 对长江各个不同地区，结合长江干支流规划，拟定出各个地区的开发方向。

(4) 长江与其他流域的开发关系：虽然向华北引水是远景，但现在要进行论证是否可能？引水路线如何？这些都会具体地关系到黄河、淮河、海河的治理与开发，这些问题是应当在流域规划中进行的。

钱正英完全听不进几位苏联专家的意见。她讲的头两个问题，实际是一回事，即三峡同各支流（还有上游干流）的关系。按理应当从河流综合利用原则，即防洪、发电、灌溉、航运等，如何按时间先后、开发难易、技术条件、国家财力等等，做出综合比较，在长江流域规划中确定第一期工程。她就是一锤定音：三峡就是好，不容分辩，一切都应当围着三峡转。“不首先肯定三峡，干支流关系是很难正确肯定的。”这无以名之，只能叫强词夺理。所谓“支流的下游建水库”，就水电而言，乃无的放矢。因为河流到了下游就没有落差，只有上游和中游适当集中落差之处，才能修建水电站，这是常识问题，钱是治淮出名的。当年淮河已修的上游各支流防洪水库，只控制淮河流域洪水百分之五，因此她认为应在靠近下游干流的临淮岗，修一个大水库来装洪水，可是要迁移一百多万人。她这种光凭主观愿望，不从实际出发的依靠水库防洪的指导思想，不仅支配了三峡这类大问题的处理，40年来，也造成洪灾未减轻而涝灾反加重的形势，并导致灾难性大小水库事故的发生，葛洲坝的出现也是这种脱离实际的思想产物，反而影响水电的多快发展，她主持水利部和水电部工作几十年，其错误思想作风从未得故到清算。这里只是附带说这么几句。

下面，她就对着我来了，“对林一山与李锐两同志争论的看法”：“过去阶段”争论主要是“三峡修建时间，三峡坝的高程和流域规划中的经济研究等三方面的问题。我觉得不止在这几个方面，我觉得争论的是要不要长江流域规划？是否在长江流域规划中应将三峡作为突出的问题进行研究方案，作出方案比较？我觉得争论的实质是这样。那时正在反

冒进，有些低潮。李锐同志提出争论的意见，我认为是属于一棍子打死，因为我过去是支持林一山同志的。”“现在阶段，现在基本是一致了，承认了三峡地位，在经济上合理，在技术上可能。”“今天李锐同志刚才的批评，仍有些过分的地方：干支流关系，李锐同志提出先支流后干流，我认为干流应相结合，交叉进行，流域规划要点提出干支流相结合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关于防洪问题”，“堤防固然也有它的作用，但不能过分地夸大，堤防是否能进一步提高水位，各省都认为有困难。”“武汉市提高了洪水位，泛区受不了，三峡未建成以前，有一定程度的确保，超过一定程度则不能确保了，彻底解决长江洪水仍待三峡。”她最后这句话是最关键的。

我没有再在这个会议上发言。我心中有底，经过南宁会议，三峡大闹不起来。不过，其他人的发言，或间接直接对钱正英的意见作了批驳。当然，也有附和的。

张劲夫讲的话很短：“对地三峡的兴建，赞成积极与慎重。三峡的兴建，希望多吸收些人讨论，经济技术方面，都可以提出问题。如经济方面规模与效用，应进一步研究；如三峡输电的投资不次于三峡工程的投资，这个问题应明确提出来，不应回避。三峡的用电户影响国家的工业布局，估计充分是有好处的。对这些问题应深入研究，这对今后三峡做结论有好处。技术问题，应从可能性中多找几个方案进行较研究，假若事先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收集很多有效的意见，这也是有好处的。”

刘西尧的发言更短，他说：“积极准备兴建三峡，我是同意的。”“关于大中小型结合问题，光是先小后大，先支流



后干流，不见得妥当。但林一山同志的报告也有片面性。”

交通部办公室主任张方昂的发言，希望如林一山所说，三峡建成后，661公里航道改善，“万吨轮船直达重庆是一个‘地中海’”。但因为重庆以下还有35公里天然航道，希望正常高水位为210米（林一山的报告已从过去的235米降到200米）。他最后说：“对三峡的争论是有好处的，在初期各有各的主张，正由于这样，才使人注意长江流域规划的各方面问题，收集资料，进行研究论证。今后还应当争论，争论还应受到欢迎和鼓励。”

陆钦侃的发言专谈防洪。他几十年一直参与三峡的规划论证，直到最近还向中央上书，说明三峡的防洪作用有限，现在不宜急上马。下面是他的发言全文。是针对着林一山的方案谈的：

长江流域规划，对防洪有片面的看法。如特别强调荆江大堤、汉江遥堤，但对其他地区如洞庭湖860万亩只能确保200万亩；对无为大堤300万亩和赣抚平120万亩，则只提出问题，而无具体措施。1956年做中游平原防排方案，亦未考虑下游。以前淮委考虑安徽多，其他省少；长江流域规划是否亦有类似情况，是否重湖北而忽视其他各省？如江苏省的洪灾一点也没有谈。

对洪水来源考虑亦有片面。长江中游洪水来源有三，这就是长江干流、洞庭湖水系和汉江。虽然不能否认干流洪水大，占汉口的洪水60~70%，但不能说其他30~40%不应先解决。其中洞庭湖

水量要占 20~30%，较汉江水量为多。长江洪水因雨量大，但由于气象上原因，各支流发生洪水时间错开，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洪水才发生遭遇，其中最主要的是洞庭湖水系，四口四水同时流入洞庭湖最紧张。解决洞庭湖固应做三峡，但建成三峡，为时尚久，因而需要先做支流。在四水中，沅水最大，1931、1954 年都与长江干流水发生遭遇，1931 年沅水尾间受灾 120 万亩。就是三峡做了，也不能解决中游各支流尾间受灾的问题。沅水五强溪除发电 120 亿度外，还有有效库容 220 亿立米，相当于洞庭湖有效蓄量，可以减轻洞庭湖负担。林主任很早就提出研究沅水。苏联瓦西林柯等专家认为沅水防洪效益很大，可以初步解决长江洪水问题。五强溪比清江水库大得多，1935 年暴雨区中清江，但不等于每年皆如此；清江固可以做，但不及沅水防洪作用大。

长江防洪迫切，不能等待三峡水库的兴建。长江每隔五、六年发生一次洪水，在三峡未建成前，还可能出现三、四次洪水。1954 年以后，长委会作中游防洪排渍方案片面，不考虑下游，且未与各有关省联系，后来行不通，不能实现。以后进行长江流域规划防排方案未继续研究，把重点摆在三峡，以致影响近期工程。

荆江大堤我同意重要，堤质也不好，1954 年虽有 10 万人上堤防汛，但未予以足够重视。堤应进行改善，且较新建为廉，如堤基渗漏可通过灌浆

处于理。有人认为无法办。请问为什么修建三峡围堰防止渗漏，尚可进行灌浆处理，而荆江大堤为什么就不能照办呢？解决荆江大堤的洪水威胁，不是没有办法的，如扩建二号北闸可以解决百年一遇的洪水；下荆江可用裁弯取直办法扩大泄量，控制四口亦很有利。所以支流水库可在三峡以前兴建，如丹江口、五强溪、亭子口等水库都可进行。三峡水库应长期地、不断地研究。但各支流水库防洪任务多少，并不取决于三峡的正常高水位和三峡的防洪库容。为了解决近期工作，应尽早确定第一批兴建的支流水库。

三峡高程同意 200 米方案，过去长办强调三峡 235 米，林一山同志在《中国水利》发表的文章亦是如此。在 1955 年庐山开会讨论时，大多数亦是主张三峡高程 235 米，当时我主张低方案，认为三峡高程 200 米较好，林却说是电力部的意见。现三峡采用正常高水位 200 米是对的。

长办对支流研究也不够，过去走一些弯路，现在才对支流指标好、淹没小的水库开始研究。三峡应当研究，但力量上应不影响近期工程的建设。

张含英老前辈当时是水电部副部长，在国民党时代他就主管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工作。他赞成三峡工程应当尽快积极进行。但“重点工程不一定是第一期工程，这应因地制宜决定。三峡无疑是重点，但长江支流都非常大，如丹江口也是世界上的大工程，它已经肯定是第一期工程，要在第二个五

年计划施工。三峡工程应详细研究，但在三峡未做出以前，是不做其他工程，还是有些工程要做？这个问题正是长江支流的关系与开发先后，显然是大家比较注重的问題。”

发言到此，干支流关系与开发先后，显然是大家比较注意的问题。李葆华发言不长，他说：“在苏联专帮助下写出的流域规划要点报告，提出了长江的治理方案，选择枢纽，确定三峡重要性；提出干支流的关系，虽不那样的明确，对支流强调不多，但对支流已引起了注意。”“关于三峡两年来有很大争论，争论的结果慢慢地都接近了，过去都有片面的看法，现在都日趋全面了。”（这是两边都打50大板的办法，作为的原水利部的部长，总算是说林一己了也有片面性）。“三峡问题，我与澜波等同志交换意见，都愿意做促进派。认为三峡要积极进行研究和准备，20年建成三峡是太长了，虽然可以提前防洪、发电，但应争取大家都看得见才好。”他当然受到“大跃进”已开始刮风的影响，于是这样提出希望：“即使三峡解决不了赶上英国的问题，将来也可用来赶上美国。”“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大跃进中，经费困难不一定很大，近远都要抓，三峡不能看是很长远的，而是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办到的。”

刘澜波的发言很短，先表了个态：“今天我以原电力部及现在的水电部两重身份来说，都愿意做一个三峡促进派。”他同意苏联专家组长的估计，“可能是15~20年建成。从防洪方面说，越快越好，从发电说先行一步也好。时间决定于准备工作，及经济的需要与可能。”他说，“电力专家组长的意见，不能说是火电派，他的意见也是综合利用的。”他最后的几句话，似乎是以原电力部的身份为我说的：“过去是

有争论的，最大争论还是时间问题，也包括防洪措施与看法等问题。动手应在大技术问题解决之后。我自己个人过去对长江没有研究，以往的争论，也没有人说是不要进行长江规划”

地质部工程地质局负责人张更生，详细谈到三峡的工程地质条件和今后勘探工作的意见。他强调了工作中的困难在：“以往由于设计方面不按程序，要求过多过高过急，经常变动，造成返工浪费。如去年要地质队提交技术设计阶段的地质资料（各坝段的剖面图、基坑开挖量、基坑渗透量、边坡开挖量），当时不需要，也是一时做不到的工作。如要求做详细地质工作，又具有不准确的地形图，作出地质图都变了位置，以后还得重测重作。”特别重要的是他还谈到（即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三峡已经大张旗鼓开始了施工准备，仍然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进行区域工程地质调查，对于解决水库内地质构造、浸没、渗漏、边坡塌岸、固体径流（即泥石流）来源，以及库区矿产等项较为重要。否则像官厅一样，由于缺乏水库地质调查工作，现在发生浸没和渗漏问题，再处理又花费了不少力量去补救。”

程学敏的发言最短，他是针对《要点报告》三峡 1963 年开工说的：“三峡在各方面差不多都集中了世界水平，也有很多方面超过了世界水平，尤其是施工导流困难仍多，应该正视困难，予以足够估计。在安排工作方面，三峡勘测设计应尽快，但依靠其解决问题，则不能不放在可靠的基础上。考虑（三峡）要迟些，应先作（支流）其他工程。现在还不能肯定三峡于何时开工，可能要第三个五年计划而不一定在 1963 年。”

李善民当时是原电力部武汉水电设计院院长（此院后来搬到长沙，改“武汉”为“中南”），他是南下的老干部，原是湖北襄樊地区的专员，能钻研业务，已相当内行。他首先谈到“三峡过去确有争论，这主要是：（1）在防洪上是一次解决，还是逐步提高？（2）在开发上先支流还是先干流？（3）在时间上三峡什么时间修完？对丹江口也有争论，即永久性电站或临时性电站？”（按当年长办的南水北调规划，是由三峡水库引水经丹江口水库再引水北去，90万千瓦的电站带临时性。现在如果要实现这个规划，三峡水库引水到丹江口已不可能，丹江口本身必须将大坝加高20米，再移民几十万人。）他认为，“实际过程中，支流是会走在前面的。如丹江口，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即应开发。”他从电力需要出发，认为资水的柘溪、沅水的五强溪及四水其他支流，都应先于三峡开发；湖北的清江最在1962年投入，因电力需要正急。

发言的最后一人是当时湖北第一书记王任重。他首先说：“三峡水库的兴建的确会对国家建设起到难以想象的巨大作用。过去是有争论。现在对要不要三峡的看法是一致了。目前大家都一致肯定了三峡水库。兴建三峡水库的准备工作，实际上现在已经开始了。目前即要进行设计工作，施工时间不是很遥远的，因为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要开始施工。过去争论是有好处的，今后在以三峡为主体进行长江流域规划工作中，仍然会有争论。在争论中出新的问题，不搞清楚不要作结论。”在南宁会议讨论三峡问题时，他没有发言。这时，他接着说：“林一山同志，在工作上是负责的，提出问题是经过论证的，也是有根据的，不是瞎说的。”“有

人认为长委会在湖北，因而光替湖北做工作。的确林一山同志对湖北是有帮助的，但是他不是湖北的长委会，事实上湖北省委也未直接要林做什么，林也无片面只管湖北的观点。”关于林一山报告中少谈支流，王任重是这样为他解围的：“因为这次会议就是要谈三峡，其他方面谈多了，重点不易突出，所以我与他商量，就是要写三峡。因而在报告中长江上中下游、干支流关系、中小型工程谈得很少。”王最后谈到，“确保荆江大堤、汉江遥堤，决不是要保护堤后面的耕地，事实上在 1954 年，这些地区已是都淹了，问题是在于威胁 300 万人的生命死亡问题。过去长江曾根据资料进行计算，荆江大堤万一溃口，即使在理想的情况下，亦要淹死 10 万人，其他不可想象的后果和事例更多。汉水的遥堤亦是如此。”

王任重在《随同周总理考察三峡记》前言中说：“假如不是因为‘大跃进’以及其他因素造成的 3 年经济困难，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我想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按照当时的设想，可能早已在 70 年代中期建成开始发电，为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长江中下游几千万人民也不必再为洪水的威胁而提心吊胆了。”

所谓“有了三峡水库，就可以解决长江的防洪问题，”这一直是几十年来的浮夸之词，也是钱正英等人几十年来催促三峡工程很快上马的主要依据。其实，三峡水库对武汉防洪并不起作用，主要在能减轻对荆江大堤的威胁。长江北岸古有云梦泽，同洞庭湖一样，是极其有效的长江分洪区域，今天的局面是以后形成的。这个情况，林一山曾说得很清楚：“荆江两岸在历史是著名的云梦泽和八百里洞庭，是长

江洪水的泛滥区。随着泥沙的逐年淤积和围垦利用，现已成为湖北、湖南两省的重要商品粮基地。明代张居正（按张为湖北人明代有名宰相）为抵抗洪水，舍南救北，修建了荆江大堤，堵死九穴十三口（即洪水再不向北岸分了）。此后，南岸受分洪溃口影响，地面逐年淤高，形成南高北低，荆北洪水威胁加重的局面。特别是清代乾隆年间荆江大堤加高加固后，这种局面就更加日趋严重了。目前南岸地面已高出北岸7至10米，荆江大堤一旦溃决，洪水猛兽吞簸江汉平原，损失将极为惨重。”

1952修荆江分洪区时，我还在湖南，当时对这个工程湖南是有意见的。因为蓄洪之后，等于在“头上顶了一盆水”，对湖南形成一种威胁；后来照顾大局，同意修建。可是为什么就不能向荆江北岸分洪呢？难道我们也是张居正吗？请看中国科学院专家李驾三的回忆：

“1952年，水利部苏联专家组长布可夫在审查荆江南岸分洪方案（即现在的分洪区）时，发现荆江两岸地形南高北低，不理解为什么当时要在南岸不在北岸分洪。这样组织上就派我协助他研究荆北分洪问题。在查阅文献资料时，我发现解放前我国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先生早已有此设想。他在1936年《对于治理扬子江之意见》一文中，这样写道：‘扬子江北岸自江口而下，自宋、明以来筑堤封固，唯恐不严。江水大涨危迫之际，则舍南救北，北岸固免一时之害，然今日视之，南岸之地多淤高而变为肥沃之田，北岸则仍守其卑下地，永为瘠上。将来南岸诸湖泽以次淤平，则北岸势不能免为江水之壑。故一为江洪多一调节计，二为淤肥江北之地计，三为免将来必不可幸免之患计，此时即宜着眼于是，使



江水得于调节控制之下，流入北岸诸湖，而并为之筹谋排水之路，是在今日科学发达时代，必可使之有利而无弊。此言一发，必遭鄂人这激烈反对，为余固本余研究之得以立论，世人骂所不恤也”。于是，“李骂三“就做了一些具体工作，并提出《荆北分洪方案》，代表布科夫向有关方面做了汇报。”他认为，这个方案实施后，“在提高荆江段防洪能力方面，基本上与三峡水库相同，而且运用起来更为灵活，同样的蓄洪容积可以取得更大的效果，可以通过分洪及经常性的淤积，淤肥淤高北岸低洼湿地，并可引水淤高荆江大堤的堤背低地，逐步缩小荆江大堤的堤背高差，从根本上改变长江中游南高北低的防洪被动局面，逐步缓解荆江大堤的险情。这是三峡工程无法比拟的。”“工程在起防洪作用的同时，还可结合地方生产，为改造低产出，发民灌溉，防止内涝，发展水产和渔业，沟通航运等等，创造条件，从而做到除害与兴利相结合。”

这个《荆北分洪》方案当年就被搁下，而且几十年来从不提及，这当然是由于“鄂人之激烈反对”，以及钱正英和长办等钟情于三峡的人，志不在此；否则“为解决长江防洪，必须修建三峡”的旗子就打不下去了。李骂三于1992年3月的建议书（《“荆北分洪”是解决长江中游防洪问题的比较理想的方案》）中，除上述理由外，还谈到最后一个有利条件，“就是本方案原来已有一定的思想基础，臭施起来可能阻力不致太大。因为本方案分洪区下部洪湖以下部分，实际上就是长办在1980年提出的《洪湖分洪区方案》。因此只要在该方案已经实施或准备实施的基础上适当加以调整，并增建分洪区的上部，即长湖到白露湖部分，重点是两个大

闸和围堤。”可是，就是长办自己安排的这个 1980 年长江中游防洪方案，十多年过去了，至今也没有完成，关键还在志不此也。

在船上开会的发言中，只有湖北省水利厅办公室主任蒋光耀涉及到这个问题，他反对荆北分洪，他是这样说：“荆江专署不同意人民大垸挖开及上车弯扒口分洪。”湖北省水利厅厅长陶述曾，是老一代的水利专家，他强调：“单从堤防加高解决洪水，有困难。湖北省的堤表面看来还好，但基础不好，堤的溃口不在堤身，而多因基础下有粉砂层造成管涌下塌。目前改善也很困难，如何改善亦尚无结论。”前述陆钦侃的发言是在陶之后，他已回答了这个问题。

从以上发言看出，关系到三峡工程和水库的要害问题，如泥沙淤积，对重庆安全和四川防洪的影响，投资的估算，包括船闸等技术可能性，艰巨的移民问题，尤其是整个生命环境影响，等等，当年都没有涉及，这次查勘和会议的意义，正如周恩来在重庆作总结时开头的一句话：“这次是开的促进会，以后还要常开。”

当时的形势是南宁会议之后，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 1956 年的反冒进，“大跃进”的浪潮开始涌起。周恩来是被批评的当事人，已经作过检讨。他虽然不能不当三峡的促进派，但他对这样一项世界史无前例的巨大工程，还是采取了极其慎重的实事求是的方针。他的总结发言基本内容，都充分表现在随后中央成都会议上通过的有关三峡的决议，这是由他主持起草的。在重庆的总结发言中，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三峡的指示：如有可能，就要积极准备，充分可靠。如何积极准备呢？他说：“这次会议是根据南宁会议的精神

召开的。在南宁会议上曾提出兴建三峡的可能性问题，现在就是要听听苏联专家和各部门兴建三峡的意见。要回答这一问题，当然要涉及全江，要谈整个长江流域规划，必须要联系到远景与近期的开发，干支流的关系，大中小型工程的结合，上中下游兼顾，以及水火电的比例等一系列的问题，也就必然涉及长江流域的综合利用，整个工业的布置，和电力网的建设等。”他认为“两年来的争论是必要的，不争论哪会有这样多的材料回答各方面提出的问题。”“在今后工作中，还允许有反对意见。三峡千年大计，对问题只发展一面，很容易走到片面，为三峡搞得更好，还是可以争论的，因为这样才能有利于工作，”他特别提醒：“三峡综合利用，不能孤立地谈，要与干支流，上中下游结合，要分担任务配合进行。”“三峡枢纽是问题的主体，但是我们不能集中一点，不及其他，三峡是重点而不是一切，应有主有从，这样才能全面论证问题。”讲话中具体谈到：“坝高 200 米，是否可以肯定下来”；“在不太长时间，15~20 年内完成三峡的兴建”。最后以十六个大字，来互相励，这就是：“鼓起干劲，相互促进，乘风破浪，力争上游！”

我的旧诗词集《龙胆紫集》中，有一首定 50 年代从事水电工作的长诗《六铺炕吟》，关于这次查勘三峡船上开会，有以下十句：

奈何三峡余波尚未绝，独我坚持长远说。  
当年大跃潮头，诸公袞袞峡中游；  
美人沱觉花岗好，南津关为乳洞愁；  
评头品足观坝址，阔论高谈坐舸楼；  
话不投机惊满座，区区总算逆潮流。

在船上有人谈到旧中国没有什么水电事业时，周恩来即说，长寿的龙溪河上不是有个下清渊洞水电站吗？有人插嘴：那么小，他不以为然说：小也是电站呵。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水电处，在贵州、四川等地建了一些小水电站，其中下清渊洞是最大的，后扩建成 3000 千瓦。于是，在到达重庆之前，由于我的动员，3 月 4 日晚，船在长寿县停泊。第二天，大家参观狮子滩水电站。我与总理同坐一车，沿途介绍了龙溪河开发的历史。狮子滩是 1956 年建成的当时四川最大的水电站，装机 4.8 万千瓦，为龙溪河这条长江的小支流梯级开发的龙头，有多级调节水库。周总理一行的突然到来，电厂的工作人员说不出的快慰，大家结队欢迎。重庆市的下放干部等在礼堂门口，总理亲切地询问了他们的生活情况，还和大家一起照了相。然后从狮子滩下行，沿途看了上清渊洞、回龙寨和下清渊洞三座水电站。这条小支流的水力资源已全部开发，四个梯级共装机 10.45 万千瓦。周恩来在狮子滩参观时，仔细看了厂房、机组、大坝和溢洪道，还进入大坝腹部的廊道，廊道中非常干燥，说明这座堆石坝的设计和施工质量很好，他不断称赞。在纪念册上，题词道：“龙溪河的开发，为综合利用四川水力资源开辟了道路。”李富春和李先念联名题词：“为长江综合开发，开辟了道路；为四川的国民经济的发展服务。”我当时很感安慰，这反映河流综合利用思想已深入人心。1952 年我调到燃料工业部主管水电工作时，河流综合利用思想在有关部门（主要是水利部）和高层领导中，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关于三峡和长江流域规划问题，3 月间开的中央成都会

议，通过了一个决定。我列席了这次会议并参加了决定的起草。记得第四项防洪措施中最后一句话：“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是我加的。还记得决定第五项中的七种关系，“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即有销路）”这两句是毛主席加的。可惜的是几十年来，因志在三峡，有关主管部门并未认真按照这个决定的各项规定，尤其第四项规定，全力去办。现将这个决定全文附后：

### 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 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

（1958年3月25日成都会议通过  
4月5日政治局会议批准）

成都会议大组会议在1958年3月23日讨论了周恩来同志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会议同意这个报告，并且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时间约需15年到20年。现在应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

（二）为了便于今后有关的工业、农业、交通等基本建设的安排，并且尽可能地减少四川地区的

淹没损失，三峡大坝正常高水位的高程应当控制在200公尺（吴淞基点以上），不能再高于这个高程；同时，在规划设计中还应当研究190公尺和195公尺两个高程，提出有关的资料和论证。

（三）三峡工程的准备工作时期，对美人沱和南津关两个坝址的继续勘测和研究，对一切主要的技术问题和经济问题的探讨，都应当采用展开争论、全面论证的方法，以求作出充分可靠的结论；某些重大的技术问题必须作试验研究。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要点报告应当于1958年第二季度交出。三峡工程的规划性设计应当争取于1959年交出，初步设计应当争取在1962年交出。

（四）长江较大洪水一般5年可能发生一次，要抓紧时机分期完成各项防洪工程，其中堤防特别是荆江大堤的加固，中下游湖泊、洼地蓄洪排渍工程等，决不可放松。在防洪问题上，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

（五）长江流域规划工作的原则，应当是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同时需要正确地解决以下7种关系：远景与近景，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即有销路）；这7种关系必须互相结果合，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轻重缓急和先后的次序，进行具体安排。三峡工程是长江规划的主体，但是要防止在规划中集中一点，不及其他和主体代替一切的思想。

（六）由于条件的比较成熟，汉水丹江口工程应当争取 1959 年作施工准备或者正式开工。

洞庭湖水系的规划问题和两湖间的防洪问题，应当于最近期间由王任重同志负责召集有关省分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开会商议，定出方案。四川和贵州水系的规划，鄱阳湖水系的规划，以及安徽和江苏有关长江的防洪、灌溉等问题，都应当分别由地方负责同志召集各有关方面开会研究，定出方案。

（七）为了加强对三峡工程长江规划的领导，应当正式成立长江规划委员会，委员名单由周恩来同志提出，报告中央通过。三峡工程和长江规划中的设计文件，均应经过国家计划委员会会同有关方面审查，报告中央批准。

随后，由中国科学院、水电部、一机部和长办联合有关部委和地方科研部门共 300 多技术干部参加的三峡第一次科学技术研究会，于 6 月 5 日至 16 日在武汉举行。我当时已无暇顾及此事，只听到参加这个会议的一机部电机方面负责人周建南同我谈起，王任重在会上说，中央成都会议通过了三十几个文件和决定，都是促进的，只有三峡这个文件是促退的。后来 8 月间，在北戴河那样“大跃进”的会议上，讨论三峡问题时，周恩来也只说过，三峡最快可在 1962 年开工。成都会议共通过了三十几个有关“大跃进”、总路线的决定和文件。35 年过去了，现在回头来看，所有这些决定和文件如过眼烟云，早被世人忘却，唯独关于三峡这个决定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自然同周恩来当年在这个问题上的实

事求是精神分不开；也同南宁会议之后，关于三峡问题的要害所在，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都有所了解分不开。以后，直到周恩来、毛泽东去世之前，不论有关方面怎样催促三峡上马，他们再没有就三峡何时开工有过首肯之辞，至于长江规划委员会，则始终没有成立。



## 酝酿总路线的成都会议

重庆三峡总结会结束后，大概是3月7日，我随周恩来等乘专列到成都，参加中央的会议。这是继南宁会议之后，再次批判反冒进，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推动以高速度为中心的“大跃进”，并酝酿总路线的极其重要的会议，史称成都会议。

### 会前形势——山雨欲来风满楼

南宁会议与成都会议之间1个多月，全国已经出现“批右倾争跃进”的潮头，地方与中央各部门纷纷上书表态。经中央转发的河南省委2月2日的报告，最具有代表性。报告说：毛主席不断革命的指示，从理论上、思想上解决了能不能跃进、敢不敢跃进的问题，打破了庸俗的“平衡论”，粉碎了“反冒进”（就是反跃进）的观点，以最锋利的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把我们武装起来，乘风破浪，跃进再跃进。又说，贯彻60条指示，就能缩短我国的过渡时期。在这与帝

国主义争时间、比胜负的时期，中国的大跃进，对世界的命运有着决定的影响。60条指示提示我们，中国已进入技术革命的新阶段。为了保证新的革命的胜利，必须在领导方法上来个大的革命。能否又红又专的问题，已经成为我们在技术革命中前进或掉队的问题。又红又专最大的障碍是保守与暮气。报告谈到，河南省委常委会初步检查，保守与暮气主要表现在：眼光不远，信心不坚，魄力不大，学习不专。我们容易动摇，大台风来了要动，小台风来了也要动一动，不能始终坚定不移地以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分析问题，这是需要十分警惕的。常委会决心认真回忆总结过去两年多来跃进、反跃进斗争的经验教训，提高到理论、思想的高度来接受经验教训。目前各方面都出现跃进和革新的气象，是全面大跃进的形势，特别在整风之后，要充分估计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干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在改进领导方法上已经决定立即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指示。省委马上搞试验田、试验车间；省委委员每年保证下去4个月，一天也不少，今年1月份大部分常委委员都在下边；省委强调抓先进，先听好的，先看好的，到先进地区就开会，总结先进经验，带动落后。省委委员都要作出学习计划，包括3部分：一是学习基本理论和文化科学；二是掌握文化工具（外国文、古文等）；三是亲自动手写文章。在学习上特别强调打掉暮气，学习毛主席的学习精神。

河南省委的报告，显然是一份“争跃进”的决心书。

“大跃进”口号，最早出现在实现农业发展纲要40条的号召中。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根据中央刚发布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

案，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工作，在12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南宁会议之后，“大跃进”之声更是不绝于耳。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把这个口号推向了各行各业：“我们国家现在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2月上旬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上，人大代表的发言中也出现了诸如：“促进食品工业大跃进”、“水运事业也要来个大跃进”、“商业工作要同生产一同跃进”、“促使科学事业大跃进”等等口号。有些省的代表还提出了“苦战争3年，改变面貌，10年计划，5年完成”这一类的计划。与此同时，全国继续批判1956年“反冒进”。2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鼓起干劲，力争上游！》中说：“1956年我国各项事业的大发展，尽管其中有个别的缺点，但仍然是一个基本上健康的大跃进。正确的态度应当是肯定跃进，肯定好的东西，同时采取适当的方式来调整和克服其中个别的缺点。但是有些人却分辨不出9个好指头和1个坏指头的区别，把个别当作一般，把支流当作主流，对整个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名为‘反冒进’，实际反跃进。”

经过毛泽东审阅的2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认为：“在十五年赶上英国和苦战3年、改变面貌的伟大号召的鼓舞下，群众不能不要求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不能不反浪费反保守。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发展。”

2月28日，人民日报社论《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力主不断地以先进的指标和定额的积极平衡，打破落后的指标和定额的消极平衡。3月3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指出在两三个月内进一步开展的这个运动“双反运动”，“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是在全民整风运动中改进整个国家工作和促进全民鼓干劲的一个带决定性的运动。”《指示》认为，经过这个“就可以迅速地打掉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和娇气，就可以进一步密切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提高群众的觉悟和积极性，使干部和群众真正打成一片，就可以用同样的人数和同样的财力、物力，办出比原订计划多百分之几十以至数以倍计的事业。”

因此，在成都会议之前，各地和各部门就已开始重新修订各自的计划，再次提高原订的各种指标，并上报中央。中央的“双反”（反浪费反保守）指示中，也提到右倾保守思想的阻力仍然存在。“很多单位还没有开始发动或者还没有充分把群众发动起来”；“大跃进”运动还有待进一步清除前进中的种种障碍。这样，就“从思想实际”为成都会议作了准备。

成都会议之前的2月18日，中央政治局还在北京召开过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继续批评“反冒进”，但语气比南宁会议缓和些了。他肯定南宁会议的“反冒进”，说还是要放一炮的，不过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紧张。还说，先念同志现在睡不着觉，吃安眠药，何必那么紧张，今后还是靠你们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毛在南宁会议上对“反冒进”那样上纲上线，那样疾言厉色，无论是当事者还是旁观

者都不可能不紧张。大概是“火”发过去了，觉得有必要缓和一下，所以反过来安慰一番。实际上，对“反冒进”的老账，他总是记在心上，而且一有机会又旧事重提。

成都会议于3月9日开始，26日结束，比南宁会议多开了7天。按照习惯，这样的会议都称之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共39人（比南宁会议多14人），他们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罗荣桓、李富春、彭德怀、李先念、乌兰夫、陈伯达、薄一波、谭震林、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李锐、王鹤寿、廖鲁言、滕代远、彭涛、林铁、刘仁、陶鲁笳、黄火青、欧阳钦、黄欧东、吴德、柯庆施、陶铸、王任重、李井泉、谢富治、周林、张德生、张仲良、高峰、王恩茂、李大章。上述名单中，中央各部只有冶金、农业、铁道和化工4部部长，地方上各大协作区负责人和北京、天津、东北、西北、西南各省第一书记参加了。

除开参加南宁会议的最后3天外，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正式参加这样的中央会议，身份是毛泽东的兼职秘书。在延安参加过一次毛泽东主持的会议，是1942年《解放日报》的改版座谈会。1948年在哈尔滨时，东北局的会议是常参加的，虽然中央委员很多，但那究竟不是中央的会议。因此，18天的成都会议，在我的记忆中留下的印象很深。3月9日第1天会议是上午举行的，我去得最迟，照料会场的叶子龙，将我安排坐在毛主席正对面的坐椅上，环顾左右，这个位子显然对我不合适。这以后我就总在后排同田家英坐在一起了。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我在水电部挨批斗时，曾将我的工作笔记本以及保存的信件、日记等全部上缴了。“文化大革命”我关在秦城8年，这些笔记本通通由专案一办编

了号，都没有遗失，1979年1月复职时，又物归原主。因此，我现在追记“大跃进”时期的各种亲历情况，尤其是历次中央会议，能够做到比较确实，不会有大的误差。

在成都会议上，全体人员参加的称大组会，主要开大组会；另外分成3个组，小组会开的次数很少，主要是通过文件。头10天是大家轮流发言，结合讨论，后7天主要是大组讨论。在大组会议上，毛泽东一共有6次讲话，即3月9日、10日、20日、22日、25日、26日，每次都讲一两个小时，在大组讨论大家发言时，他都有长短不一的插话，不下二三十次。现在按照讲话、插话和讨论的内容，以时间为序，不避烦琐，转述如下。

## 讨论二十五个问题

3月9日，会议一开始，毛泽东提出25个问题，要求大家讨论。这25个问题原来的排列比较杂乱，当是边想边记下许多的问题和要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108~112页共记有72条），然后整理成25个问题。现在按内容分列如下（问题原序号不变）：

以下7个问题，是有关大跃进和高速度的问题。这是毛泽东当时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导思想。但有些问题还留有余地，如“平衡还是应当要一点”，“要跃进，但不要空喊”等等。

5. 第二本帐问题。要在这里谈谈，提出原则，4月党代表大会通过，月交人代会通过。

6. 究竟多久完成 10 年农业计划和工业计划？个别合作社已完成，或 1 年完成，或苦战三年完成，12 个省 5 年完成，但未把荒年算在内，恐怕落空。湖北 5 至 7 年完成（包括 2 年灾荒），争取 5 年完成，就比较主动。现在帐已公布出来了，完不成要挨骂，有无把握？挨骂不要紧，无杀头之罪，无非是主观主义。我现在又有点机会主义，无非是怕打屁股。

地方工业，全国劲头很大。东北农业劲头不大。辽宁工业已占 85%，着重搞工业，没有注意农业，没有双管齐下，是“铁拐李”，农业腿短，要接腿。

原先说 3 个 5 年完成工业化，究竟能缩短多少时间？

8. 平衡问题，全国、省与省、城与乡之间的平衡，调整分工，要好好研究一下。全国各地搞工业，上海工人失业，如何办，哪里去吃饭？

9. 平衡理论问题。现在好像不要平衡，还是应当要一点。现在有社论认为越不平衡越好，是否有道理？

13. 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南宁会议批判了“反冒进”的错误。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如除四害，一种是老办法，不除（苏联不除）；一种是要除掉。如何除？也有两条路线，有快有慢。一说快除，就能除掉，越慢越除不掉。如执行计划，一种方法是 10 年计划 20 年搞完，一种是二三年搞完。又如肥料，1956 年比 1957 年多 1 倍，1958 年要超过 1956 年 1 倍。湖北今年积 160 亿担（1957 年 70 亿担），平均每亩 6600 斤。肥料多好，还是少好？去年搞“马克思主义”，生产不起劲；

今年搞“冒进”，还要超过1956年。哪种办法好？1957年的“马克思主义”好，还是1958年的“冒进”好？办任何事情都有两种方法比较。苦战3年，改变面貌，但“一天消灭四害”，“苦战三天”，当然不行。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

16. 要跃进，但不要空喊。指标很同，实现不了。通县原来亩产150斤，1956年提出要1年内就产800斤，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这也无大害，屁股不要打那样重。现在都跃进，有无虚报、空喊、不切实际的毛病？没有具体措施，工农商文都可能有此情况。现在不要去泼冷水，而是提倡实报、实喊；要有具体措施，保证口号的实现。

14. 文教有人提倡搞14项，商业是否也搞14项？

以下接着的4个问题，是与上述问题有关的财经等方面的问题，另外两个是有关技术革命的问题：

3. 税制和价格问题。

4. 地方工业中的劳动法。省、专、县、乡工业是否实行8小时制？劳动保护、工资福利如何？

7. 招工问题。现在又有大招工的一股风，这可不得了。山东要15万人，山西招临时工17万人。1956年工资冒了10多个亿，如果不注意就是真正的浪费。

10. 粮食包干问题。浙江赞成有一个报告，已印发。

15. 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继续谈谈不断革命。

19. 农具改革运动，要普遍推广，要一直改到拖拉机。湖北当阳手推车的改进，省力一半，即技术革命萌芽。

以下是有关工作方法的4个问题：

1. 协作问题。现在普遍存在协作问题。全国省与省、市与市、社与社、农、工、商、交通、文教，都要协作。



2. 中心工作与非中心工作如何结合，县是一揽子，什么都要管；书记抓了中心，其他同志有意见。县级以下，不要因为中心而丢掉其他。

11. 又统一又分散——地方分权问题。欧洲现在没形成统一的国家，可是地方（各国）发展了。中国自秦起一统天下，统了，地方就不发展了。各有利弊，一万年后再写历史，各有褒贬。

20.60条现在还非正式〔文件〕，还要有所增减，要修改或重写，基本观点不变，可少改。

以下3个问题，是关于整风、反右和继续反对“反冒进”的问题：

17. 整风问题。双反抓到题目了。知识分子“红透专深”，这个口号好。刘备招亲，弄假成真。他们有部分人是真的，多数是半真半假，有小部分是假的，可以发展突变的。有去年整风反右为基础，今年又有生产高潮，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突变可能。红安县干部改变快。

基层整风如何作法？要大鸣大放，大整大改。群众中一些思想错误也要解决，不论工厂或农村。

18. 右派大会开不开？一个城市、一个区、一个学校召开右派大会，有左派参加，可以左、右各半，以便争取分化右派，给他们一条出路。一打一拉，又打又拉，就是给出路（太行山的地主要求拉）。

25. 过去8年的经验，应加总结。南宁会议提出，反冒进是个方针性质问题，有许多同志紧张，现在好了。谈清楚的目的在大家有共同语言，绝无要使哪一个同志不好混之意，而是好了做好工作，好混，绝非不好混。

以下3个问题是关于办报刊和一个理论性问题：

21. 报纸如何办？中央、省、专区报纸如何改变面貌，生动活泼？《人民日报》提出23条，有无跃进可能？组织生活，指导工作，主要靠报纸；单是开会，效果有限。

24. 出版理论刊物问题

12.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究竟有什么问题，这两类矛盾的情况如何？克服的趋势如何？

此外还有国防和国际形势两个人问题：

23. 国防计划问题，究竟如何办

22. 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英国的备忘录是不驳我不行，驳了又怕搞坏关系，无生意可做。最近英国外相找宦乡同志谈话，给我们一个备忘录。宦乡说刺得我们很不舒服，其实他们是用针刺我们，而我们则用锥子刺他们，我看很舒服。印尼、阿拉伯世界的情况好的，朝鲜经验，波兰〔农业问题〕有希望的。社会主义12国经济协作问题要研究。我们同日本订长期贸易协定，搞得很热。东欧觉得我们冷，不订长期计划，相形之下，不好看。“亲资疏社”，他们可能有意见。因此他们谈，要做生意，互相帮助，两利是基本。匈牙利一垮，就不得（破伤风死人的）。这也是政治要和业务相结合，是否外贸这方面有不足之处？是否参加12国协作会议，成为其中一员？成员与观察员关系不大，问题实质在于是否彼此真正协作。

25个问题谈完之后，毛泽东最后还详细讲到规章制度问题。他说：南宁会议提过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了一大批，已经深入人心。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

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还有其他：一曰化验〔食物〕；二曰出去前呼后拥；三曰不许参观，不许游水，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陈云同志让自己姐姐做饭，这是好事，警卫部门认为不得了。这是谈公安部。其他各部都有，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王鹤寿想革命了。现在双反、整改，大有希望。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这也是拿钱买经验。开国之初，没有办法，但也不能认为非都搬不可，没有其他办法。政治上、军事上的教条主义，历史上犯过，但就全党讲，犯这种错误的只是一小部分人，多数人并无硬搬的想法。建党和北伐时期，党比较生动活泼，后来才硬搬。

规章制度是繁文缛节，是“礼”，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大批的“礼”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部长也不一定知道。这种“礼”的基本观点是想法治。孙中山的《民权初步》有开会法。（毛泽东最反对那种固定的开会法，中央会议是随着他的起居时间而定的。）工业和教育两个部门搬得厉害，农业部也有一点。中央对农业抓得紧，几乎章程和细则都经过中央，还批发一些地方的经验，从实际出发，因此，搬得少一些。农业有物也有人，工业只有物没有人。商业好一点。计划、统计、基建程序、管理制度、财政搬得都不少。基本思想是用规章制度管人。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当年一股风搬，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历史教训就是理论要和实际结合，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建国后，这个道理没有用到经济战线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唯物论，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为什么硬搬？就是

不讲辩证法。苏联有苏联的一套办法，苏联经验是一个侧面，中国实践又是一个侧面，这是对立的统一。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达不到这个要求。如搞一长制，一长制不灵了，我看也可以。如办报纸，要搬《真理报》的一套，不独立思考，好像3岁小孩一样，处处要扶，丧魂失魄，丧失独立思考。部长们都50岁左右了，非3岁小孩要扶。什么事情都要提出两个办法来比较，这才是辩证法，不然就是形而上学。铁路选线，工厂选厂址，三峡选坝址，都有几个方案，为什么规章制度不可以有几个方案？条文可否改变？不加分析，生搬硬套，进口“成套设备”。规章制度是上层建筑，有一部分属生产关系。军事系统也受此灾难，规章制度训练部门搬得多。

毛泽东讲完之后，3月9日余下的时间，接着由乌兰夫和陶鲁笳发言。

乌兰夫主要谈畜牧业增产计划。内蒙一半是草原，现在2300万头牲畜，农牧区多羊，羊容易养，应大力发展羊，十年内争取达到6000万头。外蒙革命时1300万头牲畜，36年后，只有2200万头。乌兰夫讲完后，毛泽东问他：你现在敢不敢整汉人干部？于是谈到中国汉民族，是历史上许多民族逐渐混合形成的。汉人在历史上整过少数民族，将他们赶往边远山区。不管什么民族，只看真理在谁的方面。马克思是犹太人，斯大林是少数民族。究竟我们是吃民族主义的饭，吃地方主义的饭，还是吃共产主义的饭？首先应当吃共产主义的饭；我们要民族，要地方，但不要主义。

陶鲁笳发言，先讲了一句顺口溜：“干部订，群众通，

指标挂在半空中。”他认为必须解决指标与措施的矛盾，抓水、土、肥外，还应抓高产；提出实行基本农田制度，改广种薄收为少种多收，前者还破坏水土保持。山西 1550 万人，有 6800 万亩地。

毛泽东立即插话，引发了对人口问题的看法，要破除这种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他说，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 2.5 亩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发展到 7 亿 5 到 8 亿时，再控制不迟。现在还是人口少，少数民族和人少地区不节育，其他地方可逐步控制。到赶上英国时，人民有了文化就会控制了。山西人口可以达到 3000 万。毛泽东讲话时，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正在大挨批判，说是宣传马尔萨斯理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写于 1955 年，认为中国人口多，生殖又快，会妨碍国家加速工业化；“人口多，资金少”，是一个重要矛盾；人口多就消费大，积累小；如不节制生育，人口同资金积累间的矛盾将永远存在；“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毛泽东随后的插话还谈到：一切正义的、有生命的事，开始都是违法的。许多事外行比内行的高明，改良京剧就要靠群众。从农业“八字宪法”到《工作方法六十条》，毛泽东对农业问题过问较多，而且很注意农业科学的专业知识。他插话说：改良土壤有二法：一为深翻，一为调换。可以 4 至 5 年轮流深翻一次。山东莒县大田农业社就是如此。他读过苏联农学家威廉斯的《土壤学》，介绍了这本书。会议期间，这本书马上翻印出来，人手一本。

陶鲁笱谈到县办综合工厂的好处：要什么办什么；可充

分利用当地资源和季节性人力；可培养技术力量；节约干部和资金。介绍了沁县经验，只有120个基本工人，其他都是社员，“农业工人”；1200个中学生轮流做工，是“学生工人”。农民叫能工巧匠为“万宝全”，非常迫切要求技术人员下乡。

毛泽东于是插话说：参观沁县，这是真经验。现在的中心问题是要大办地方工业，一为农业服务，二为大工业服务，三为城市生活服务，四为出口服务。化肥厂，南宁会议谈到统一由专区办，现在看每县都可办。要全党全民办工业，文章做在全民。过去县以下无人管工业，总是靠城市援助，投资靠国家，要发动群众大办工业，不要搞正规工业那一套。这样，3年或4年产值超过农业，变为工业省。大跃进主要是劳动力和技术两个问题。

陶鲁笱说，山西10年9旱，不怕涝灾，只有广泛用地下水，用尽种种办法截水引水。同水土保持、绿化同时，山西3年可以做到水利化。毛泽东于是对林铁说：岗南水库花钱太多，可以不修；你每年到山西去朝拜一次。陶鲁笱还谈到山西煤运不出去，要搞综合利用，提高自己的消化能力。毛泽东即插话：我们有些人有错觉，认为农产品出口容易，换工业机器不容易。其实正相反，活东西（粮食）难办，死东西（有色、黑色金属）好办，应把看法改过来，农产品很贵重。

毛泽东这种即时插话，说古论今，生动风趣，尤其是对苏联经验要“择善而从”，这种辩证精神，给听众极深印象，感觉是大开眼界，大动脑筋。

### 3月10日的讲话——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

3月10日的会议，又是由毛泽东先开讲。由于昨天讲了一篇关于规章制度的问题，意犹未尽。为启发大家破除迷信，推动“大跃进”运动，使会议开好，于是联系到党在历史上犯教条主义错误的教训，同苏联的关系，以及对斯大林犯错误的认识等问题，他又作了长篇讲话。讲话中着重谈到建国之后，学习苏联犯有教条主义偏向，还特别谈到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下面是我记录的大意。

规章制度是一个问题，借此为例，讲一讲思想方法问题。题目暂定为：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

国际方面，要同苏联、一切人民民主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友好，讲国际主义；要学习苏联及其他外国的长处，这是一个原则。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孔夫子说过的。那时学礼、乐、御、射，读书写字等等；现改为规章制度、国际歌、枪炮、驾汽车、飞机等等。学习外国一切长处，永远是原则。但是，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明朝前后七子做诗，专模仿唐人；王千秋的诗，模拟占很大部分。一种是独创精神。学习应和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

我党从建党时期到北伐时期（1921年到1927年），虽有陈独秀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思想，但当时党的作风比较生动活泼。大家参加五四运动，我就是这时开始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3年，我们建了党，人

党的人都是参加五四运动和受其影响的青年人。十月革命后，列宁在世，俄国阶级斗争很尖锐。斯大林尚未上台，他们也是生动活泼的。关于斯大林问题，列宁有遗嘱的。陈独秀理论来源于国外社会民主党和国内资产阶级。我们国内没有社会民主党，但有资产阶级思想。这个时期，虽发生了陈独秀的错误，一般说没有教条主义。国外生搬硬套斯大林作风，也还没有形成气候。

内战时期到遵义会议（1927年到1935年），中国党发生了3次“左”倾路线，1931年至1934年王明路线最厉害。当时苏联反托派胜利了，在理论上反德波林唯心主义学派，也在这个时期。中国“左”倾教条主义者参加过苏联的反托派和反德波林学派，这两件大事都是在苏联受到影响的。当然，也不是所有去莫斯科的人都是教条主义者。当时有些人是教条主义者，有的人不是，如任弼时，他教条主义不多，但也有一点。有些人联系国内实际，有些人不联系，只看外国，专搬外国。斯大林的统治，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好转，开始巩固（大巩固是在肃反后）。共产国际当时的领导是布哈林、皮可夫、季诺维也夫，东方部长是库西宁，远东部长是米夫（已被斯大林处决）。库西宁是个好同志，善良、有独创精神，就是太老实了些。米夫的作用可大了。这些条件使“左”的教条主义得以形成，有些中国同志也受到影响，“左”倾在知识青年中也有。当时王明等搞了个所谓“28个半布尔什维克”，几百人在苏联学习，为什么只有“28个半”呢？就是他的“左”得要命，自己整自己人，使



自己孤立，缩小了党的圈子。<sup>①</sup>

中国“左”的教条主义有中国的特色。表现在战争中，表现在富农问题上。由于中国富农人数很少，我们决定原则不动，向农民让步。但是“左”派不赞成，认为阶级路线不明确。他们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结果，地主没有饭吃，一部分被迫上山，搞白色游击队。在资产阶级问题上，他们主张一概打倒，不仅政治上消灭，经济上也消灭，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形势分析上，从恐慌出发，认为帝国主义是铁板一块，不可分割，都支持国民党。而不懂得日本人为对付国民党，希望中国内部越争吵越分裂越好。我们有根据地，是地上党。斯大林教条主义是完全的执政党。欧洲是无政权党的地下党。

全国解放后（1950年到1957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经济工作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统计工作，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银行还有点），横竖自己不晓得，勘测、设计、施工、成套安装等等，只好照搬。统计工作几乎是抄苏联的。教育方面也相当厉害，例如5分制，小学5年一贯制等，甚至不考虑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卫生工作也搬，因苏联有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汤，害得我三年不准吃鸡蛋，不准喝鸡汤，后来又说能吃了。总之，是苏联第一，一切照办，一切奉行。商业照搬得少些。因为中央接触较多，批转文件较多。轻工业中的教条

<sup>①</sup>：“28个半”是历史上多年传下来的说法，党史研究者现在已不沿用

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社，未受教条主义影响，因为中央直接抓。中央这几年抓革命和农业，商业也抓了一点。苏联没有文化部时，认为我们的应取消；后来苏联又有了文化部。还有电影局叫局或部的问题。关于中医中药，同卫生部作过斗争。请苏联人研究中医中药，因中国人不愿研究；外国人一研究，大概信中医中药了。

教条主义的情况各有不同，哪些部受影响多少，需要分析比较，找原因，有哪些？

一、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中国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而且还要借苏联的经验和苏联专家，破中国旧专家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完全必要，如地质工作，苏联是有道理的。苏联设计用到中国，几分正确，几分不正确？恐怕大部分正确，一部分不正确，是硬搬。

二、我们对整个情况不了解，对苏联和中国经济情况的不同更不了解，只好盲目服从。现在情况变了，大企业的设计施工，一般说来，可以自己搞了；设备，再有5年就可以自己造了。对苏联，对中国的情况，都有些了解了。

三、在精神上有压力。菩萨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其形象使人自觉渺小。戏台上的英雄豪杰出来，踱方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他比我矮，画家定要把他画高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多高多重是物质问题。苏联画家画我们两人坐像，他在抽烟，我手里拿一本书，表示向他学习。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马列主义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

力。中国党内绝大多数人是不同意的，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随声附和，要打倒个人崇拜（有的是过去压力残余，心理状态复杂）。还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吗，斯大林正确的东西也还要崇拜。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现在既有个人崇拜，也有反个人崇拜。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崇拜自己则很舒服。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让别人崇拜自己。列宁在世时，许多人批评他独裁。他说，政治局只5个委员，有时还不开会。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因此，只要正确，不要推，不如我独裁；也开点会，不全独裁就是。不要信这个邪，你反对个人崇拜，反到天上，无非想自己独裁。不要屈服于一种压力，一种风。斯大林很欣赏高岗，专送一辆汽车。他们互相崇拜。高岗每年“八·一五”都给斯大林打贺电（后来收回打贺电之权，实行独裁）。现在各省也有这样的例子：是江华独裁，还是沙文汉独裁？广东、内蒙、新疆、青海、甘肃、安徽、山东等地，都发生这样的问题。你不要以为天下太平，时局是不稳定的，“脚踏实地”是踏不稳的，有一天大陆会下沉，太平洋会变成陆地，我们就得搬家。轻微的地震是经常会有，高、饶事件是8级地震，莫洛托夫是9

级地震。

四、忘记了历史经验教训，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我昨天已经讲过，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从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替代方案？应当是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用，不合适者不用，另外想办法。总之，不作分析，不动脑筋，不加比较。过去我们反对教条主义，他们的《布尔什维克》刊物把自己说成为百分之百的正确，自己吹嘘自己。其办法是：攻其一点或几点，不及其余。过去中央苏区的好处，教条主义者一点也不讲，《实话报》上写文章，攻击中央苏区 5 大错误。

1956 年 4 月搞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跟苏联有同与不同，具体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的一套。“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 5 条是主要的。国防费在和平时期要少，行政费任何时期都要少。

1956 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一九五〇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互助同盟条约，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们的态度：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无碍大局，我接受。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利益，还有两块“殖民地”，即东北和新疆，不准第 3 国的人住在那里，现在取消了。批判斯大林之后，使那些迷信的人清醒了一些。我们的同志应当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么迷信。对苏联经验，一切好的应接受，不好的应拒绝。现在我们已

学会了一些本领，对苏联有了些了解，对自己也了解了。

1957年，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提出了工、农业同时并举，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还有农业合作化，节约等问题。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右派，广大群众对我们工作中错误的批评，思想的启发很大。

1958年在杭州开小型会，在南宁，现在在成都开中型会，前两次会大家提了很多意见和问题，开动脑筋，总结5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南宁会议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改革。共产党是革命党，自己制造的规章制度，不适用的应当改革。究竟有多少？一个部，将规章制度都摆出来，无论是硬搬还是软搬，大家都看看，查一个部的规章制度。这是同群众见面的办法。另一个办法是搞大字报，问题逃不掉。另一个问题是地方分权，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能集则集，能分则分，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后定下来的。分权当然不能是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在社会主义之前是进步的，到社会主义时期是反动的。苏联俄罗斯族占50%，少数民族占50%，而中国汉族占94%，少数民族占6%，所以不能搞加盟共和国。

东欧这块地是苏联的犁犁开的，我们是用自己的土犁犁开的。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面取得胜利的，假洋鬼子“不许革命”。“七大”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一切革命力量，建立新中国。这条路线早就形成。同王明的争论，从1937年开始，到1938年8月为止，我们提10大纲领，王明提6大纲领。延安街头，一天出现“一切通过统一战线”

的大标语。按照王明即斯大林的作法，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革命成功了，斯大林又说是假的，我们不辩护。抗美援朝一打，就真了。可是到我们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我们讲，他们不讲；右派猖狂进攻时，还说我们是搞自由主义；一反右，好像又是真了。这个报告公布后，《纽约时报》全文登载，并发表文章，说是“中国自由化”资产阶级遭灭顶之灾时，见了稻草也要抓的，他们以为“人民内部矛盾”就是稻草，很是高兴。但资产阶级政治家中不是没有有见解的人的，如杜勒斯看了我们的报告，大概犹豫了几天，10天后做结论说：中国坏透了，苏联还好些。当时苏联看不清，给我们一个照会，怕我们向右转。反右派一起，当然“自由化”没有了。

总之，基本路线是普遍真理，但各有枝叶不同。各国如此，各省也如此。有一致，也有矛盾。苏联强调一致，不讲矛盾，特别是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他们对外、对兄弟党、对我们，搞父子关系，猫鼠关系。

### 大家发言时毛泽东的插话

从3月10日起，会议日程安排得很紧，除白天开会外，有时晚上也开，中间两个星期日（3月16日、23日）休息。

从10日至15日的下午，17日至19日的上午，各地负责同志先后发言，一共有16人，谈本省、市的基本情况，主要是经济方面的，也谈问题，都提到跃进的计划。这些大组会，毛泽东都参加了，都有或长或短的插话。在李井泉、

陶铸、柯庆施、黄欧东发言时的插话最长，在张德生、周林、王恩茂等发言时则插话较长。

上下午或晚上，共有5次大组讨论会，讨论那25个问题及印发的30多个文件中比较重要的和存在不同意见的问题，毛泽东没有参加这种讨论会。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中央各部部长，发言比较多。晚上开的3次小组会，都是通过会议文件。其他时间则阅读文件。

现在将毛泽东的全部插话，按内容分录于后。

关于阶级关系及其处理问题。

解放相互关系，要分析一下。一种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右派、中间派与工人是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另一种是劳动者内部关系，党政工团和工人农民的关系，不同于一般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有“五气”，不是平等关系，不是普通劳动者的关系，是官与民的关系，在这一点说来，同国民党一样。“五气”是资产阶级给我们的，我们从旧社会来，当然有。单是所有制改变，工人、农民不感到与我们是平等的，不敢批评我们。整风反右派解决了这两个方面，反了右派，也批评了干部，干部整改，解决了领导与被领导的相互关系问题，使工人觉得真正解放了，工人生产情绪大增。过去是为官做工，“计件打冲锋，计时磨洋工”，为5大件奋斗。一曰所有制，二曰相互关系，三曰分配，这是经济学。所有制和分配改变了，相互关系未改。这次整风，大鸣大放，接受意见，改正缺点，基本上解决了相互关系，工人觉悟都大大提高，说：“样样是榜样”，“八路又回来了”。要抓住这件事，凡是做得不彻底的，还要继续搞。

（谈到整风中工人当中“阿飞”和“废品大王”态度有很大转变时）过去许多资产阶级思想还统治着我们党、工人、农民，“无”还没有兴起来。现在变了，“无”兴起来了，“无”的自由就扩大了，横竖自由只能有一个，要无产阶级真有自由，一定要把资产阶级思想灭掉。有些人感到不自由，是资产阶级思想没有破尽。“资”灭多少，“无”的自由就有多少。有你的自由，就无我的自由。“废品大王”本来是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着的“资”灭掉，“无”就兴起来了。

首先是阶级消灭，而后是国家消灭，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

在取消定息问题上，我们准备处于被动，总是不松口，这样对我们有利。

对资本家的薪金部分的工资高一些，是为了“赎买”，目的是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净尽。必须向工人做解释工作。工人阶级不要和资产阶级比，不可比，比不得，这是两个不可比的阶级。资本家工资太高的，也以不动的好，一动就不好了，就给他们增加了政治资本。他们吃“五个菜”，政治上就被动，他们薪金高，说话声音小。

要和中间派做朋友，也要找几个右派分子交朋友，做工作。现在连我们这些中央委员都怕沾右派的边，那怎么行？怎么能了解他们呢？

（谈到工商户要把股票给工商联时）接受了被动，对内好，对外不好。每年只拿100元，要把资产阶级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帽子戴起来对我们有利……。他们交了股票，手里无股票，头上无帽子，政治资本就在他们手里。

群策群力。群策，即大鸣大放，大家出主意；群力，即



大家动手。这个策略古来就有。

（谈到民主党派誓师时）可以搞，交心可以，不要交股，另外要帮助他们动员知识分子参加。

公私合营全国不取消定息，内蒙、新疆、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也不取消。

定息不能取消。资本家要求取消定息，想去掉帽。资本家自动不领定息是可以的，但不摘帽子，也不宣传。资本家劳动可以。

关于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问题。

不要以为天下太平。不太平是正常现象，也不过是个把指头，但不能任其泛滥，不及早注意就会传染，一变二，二变三，发展下去就会天下大乱。

（当谈到民族主义者希望出匈牙利事件时）实质就在这里。三中全会议题之一是反民族主义，过去我们反对大汉族主义，现在就主动了。有关报告中提这个问题，引起辩论。

许多人过去看不清楚。山东8个地委，2个反对省委，2个拥护，4个中间动摇，后来摇过来了，但未彻底搞，问题未解决。现在省委指挥不灵，也是一条经验。

分两种情况：一种有反党集团，要推翻领导，自己挂帅。也有另一种情况，像四川那样的，是右派活动。是不是各省都大同小异，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阶级斗争发展到这个阶段，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一定会暴露出来，不出来反而是怪事。党内思想动向值得注意。阶级斗争情况如何？可谈一谈。

摸工业、摸农业、摸阶级斗争，就是要找马克思主义

当然，按业务来讲，还有文教和商业，文教和商业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阶级斗争。要逐步研究马列主义，要研究理论，结合解决当前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

1958年的劲头，开始于三中全会，许多事是没有料到的。如1956年斯大林问题，匈波事件和1956年的反冒进。当时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以为只是所有制问题，而没有弄清那只是一部分，还有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

右派、反冒进都对我们有压力，人民内部干群关系中也存在问题，心情并不舒服。经过整风、反右，关系改变了，人家的思想都得到解放，如铁道工人的节约，就可修6000公里铁路。

右派的帽子也可以摘掉，全靠自己改造。右派这个对立面转过来将我们的军，也是一种推进工作的力量。

（谈到工业的生产竞赛时）根本解决这个问题，要推翻资本主义，搞个世界政府、地球政府，5年计划，分工合作。

（谈到整改工作）这与去春不同，去春夹杂着敌我斗争，看不清楚。现在反保守、反浪费目标鲜明，批评领导，领导觉得越批评越舒服。

知识分子、科学家的态度也在改，这些人要就不改，要就突变。

反地方主义教育，全国各省、市都需要进行。

对地方主义者，实行回避本籍的制度，让他到外省去夺取政权。

地方主义者，实际是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

王明究竟怎么处理？开除不行，拿出讨论也不必要，还

是让他住在苏联有利；再拖 20 年，赶上英国再说。

右派开除党籍，地方民族主义者不开除党籍咋行？

教条主义是资产阶级性质，比较容易改。右派是资产阶级中的反动派，不容易改，两者不同。

没有南方的布尔什维克到东北、华北、西北建立根据地，先取北方后取南方，革命咋能胜利？现在把南方干部北调，各地干部互相渗透，对工作有好处。

对地方主义不要让步，要派一批外地人去广东，广东干部可调一批到北京来。泥里掺沙，沙里掺泥，改良土壤；天下人吃八宝饭，不能单打一万和九万。掺的政策是有利的政策，区乡不在内，可以清一色。县以上掺外来干部，现在省、专的负责人，大部分是外地去的，对反地方主义感到理不直、气不壮。应采取列宁的办法：“与其你专政，不如我专政。”

这次实际是一次清党，1200 万党员中，清除二十万，百把万，五六十万，不算多。这比苏联几次清党人数少，方式好，经过群众，民主。

这次山东的一个教训是没有划右派，没有搞臭、搞透，是非没有分清楚，鸣放不够，以致现在省委指挥不灵。广东问题较彻底。

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说人民内部矛盾经典作家没讲，这个话不对，列宁说：“一个郑重的党，对于自己的错误，向群众公开承认，找出错误的原因，加以克服。”这就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但未这样说。工人阶级、共产党内部经常不统一的，参差不

齐的。我们这些人那么统一？3个月不开会，就不统一了。因为各人所得的情报、材料和观点不同，就不统一。开会就是为了达到一致，不统一才开会，统一了还开什么会。

整风没有整好的，要补课。不然，总有一天要暴露出来的。

军队中废除肉刑——打骂、枪毙，不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是调整矛盾的政策吗？当时推行这些政策不是长时工作之后才行通的吗？

各省、市要准备出点乱子，群众中出了乱子，领导中出了乱子，要有精神准备。不要采取赫鲁晓夫的答复：没有矛盾。杜勒斯看到很多人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有幻想，他读了几遍。他看见抱有幻想很危险，他就以全世界资产阶级总司令的资格说话，指出这个危险。英国报纸有些观念是不对的，但它也摸到点气候。去年春季波兰拥护，中国右派也拥护那篇文章，而左派摇头。苏联现在敢于说人民内部矛盾，但不说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杜勒斯很常识我那篇文章，他也注意7月1日的社论，他们很注意我们这些东西。资产阶级注意研究我们的东西，我们干部为什么不注意研究呢？美帝为什么注意我们的动向，因为它将要灭亡，总想看到我们的弱点，把芦苇当渡船。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形成。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是在8年内逐步形成起来的。时间不算很长。中国革命路线是经过多少年才形成的。1935年遵义会议未完全形成，1941年到1945年才形成。建党、北伐、内战时期，未形成自己的政治路线。那时有

“左”倾，又有右倾，即陈独秀右倾路线，三次“左”倾路线，抗日时期王明路线，这就没有可能形成。从1921年至1942年共21年，到“七大”时才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政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8年不算长，还不能算形成，再有5年就差不多了，苦战3年也可能形成。过去革命中损失很大，8年建设中也受了一些损失，但损失不大。同时这个时期也顾不上、抽不出手来抓建设，如去年春季到夏季右派进攻，1950年到1953年抗美援朝，大部分力量在朝鲜，1955年合作化高潮，也难抓建设。对事物的认识，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在实践中才能认识清楚。现在切实抓一下，苦战3年，建设路线就可以形成。没有陈独秀主义、王明路线，就没有比较。1956年下半年，斯大林问题发生，我们每天开会，一篇文章写了1个月，又发生了波匈事件，注意力又集中到国际方面。现在才有可能抽出时间来研究建设，开始摸工业。现在要苦战3年，形成一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

这里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一条多、快、好、省，一条少、慢、差、费。是否有？明显地有：一为排、大、国，一为蓄、小、群，这不是两条路线吗？把水排走是大禹的路线，从大的出发，依靠国家（过去依靠国家修了好多水库）；现在是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河南的水利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农业比工业更难些。盲目性是慢慢克服的，所谓盲目性就是对客观的必然性不认识，因而也没有自由。什么叫自由？就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对客观必须性的认识，自由是对必然性的了解。自由和必然是对立的。所谓盲目性即对必

然没有认识。农民上肥料，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对农业不了解，就不自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逐步的，不可能一下就认识。例如治淮排涝是曾希圣发明的。他是曾颜，在他以前山西大泉山的和尚张凤林，在高阳县发明了治水的方法，他和一个雇农发明了鱼鳞坑。现在全国推行。他是蓄、小、群，不是排、大、国。当然他并不那么系统，经过我们许多同志一帮忙，就系统化了。把滹河等经验一总结，总结出了葡萄串、满天星。这是对事物逐步认识的过程。排、大、国同蓄、小、群是对立的统一。蓄、小、群为主，当然也要排、大、国。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也是逐步形成，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形成，至少还要5年，苦战3年再加2年。如工农业不出大乱了，路线就差不多，就可以说形成了。5年加8年，共13年，付出一部分代价，无非是浪费一点，群众痛苦，时间延长，苦闷一点，但成绩总是主要的。

15年赶上英国，20年赶美国，那就自由了。学苏联首先在路线上学。斯大林基本上正确，但有错误。他们不工农并举，反对大中小。我们是大中小结合，基础放在小的上，靠地方，靠小的。他们是靠标准设计，干部，技术。盲目性是慢慢克服的，对客观必然性是逐步认识的。没有克服以前那就是盲目性，就是自然界的奴隶。对于社会斗争，去年反右以前，我们也是奴隶，因为你对右派这个客观现象不太认识嘛！不认识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阶级斗争，不了解客观世界，就是客观世界的奴隶。

是否民主革命较早的老区，对社会主义革命不那么积极？2年前，河北、西北都有此情况，10年前，陕北有此情况。过去曾发生老区土改后社会主义改造的劲差一些。原因

是新区土改后接着搞合作社，群众没有习惯于“新民主主义秩序”——实际是资本主义民主秩序，发展资本主义。不断革命就是从这里出来的。去年以来有变化，是好现象。

总路线，规律，总是经过反复才得出来的，规律就是经常出现的东西。美国的经济状况，2月份增加失业者70万人，达到520万人。衰退——萧条——危机。苏联20次大会，对资本主义的估计是有毛病的。

七届二中全会对社会主义问题是讲清楚了，当时没有公开讲，直到1953年才讲，原因是抗美援朝、恢复经济、土地改革，但是做的80%是社会主义的，20%是半社会主义的。当时不讲，有个策略问题。例如孙行者、糖衣炮弹，这些不好公开讲。邓老（邓子恢）根本不管“七届二中全会”，他搞“四大自由”，他说是从河南取来的经验；但为什么不从西柏坡取经，而从河南取经？

二中全会决议不是突如其来的，是在整个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了思想准备，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我们就看出社会主义因素，如在江西打土豪分田地，就看出其中有很多社会主义因素。当时红军拿着武器，但是跟老百姓讲平等，那是社会主义；群众耕田队，那也是社会主义萌芽，当时在陕北就讲那是另一个革命，当时在安塞发现一个完全集中的合作社，我们很感兴趣，并发展了互助组，这些为二中全会作了准备。但是没有唤起更多的人注意，例如邓老仍搞“四大自由”，也不跟中央商量，我说他资产阶级思想根深蒂固，他老不承认，直到7月30日（1955年）他才缴出武器。因此说，邓老有资产阶级思想，但这个人是个好人，可以改造的。作为思想问题，经过严肃对待，坚持原则，改得彻底。但是有些同

志对此却避开锋芒，表示宽宏大量，无非是怕不好混，不好共事，或者怕失掉选举票。马克思主义者不要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对邓老讲过，要改造你的思想，不是撤你副总理的职，不开除你的中央委员。对许多错误思想，党内要作严肃斗争。在原则问题上，共产党员要有明确的态度。但有的人怕“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有相当庸俗的空气。思想阵地你不插旗子，他就插旗子。

革命路线吃过亏，有经验。建设路线不能迷信苏联，不破除迷信，要妨碍正确贯彻执行建设路线。

总路线就全党来说，是逐步完备的。开始提出工业化是不大完备的。

关于工业、农业并举和农业机械化问题等。

省的工作应该从三分之二的人口出发，做到粮食自给。

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是在 1956 年 4 月“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在以前，我们也没有认识这个问题。辽宁工业为主，8 年吃了这个亏。一开始就提出并举，可不可以？这个问题也可以研究。提出并举的时间也许晚了一点，但宣传上有很大的偏差，一直就是讲工业化，没有把农业放在恰当的位置上。总路线宣传提纲中强调了工业，未强调农业。对农业机械化，过去也讲得很远，现在看有 2 个到 3 个 5 年计划就可以实现。过去有忽视农业的思想，认为农业落后似乎是应该的。

农业机械化（包括拖拉机），靠地方制造为主，还是靠中央为主？恐怕要靠地方，地方自办为主，国家支援为辅。头两年所需要油料、钢材和高级技术员，也可以地方为主，



中央帮助，以后自己解决。

拖拉机社有，或大部分社有。

“苦战3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在7年内实现农业40条，实现农业机械化，争取5年完成。”各省可不可以这样提？特别是农业机械化问题，各省可以议一下。

对工业化不要看得太神秘了。看农业机械化看得太神秘了，但忘记了一条，有苏联，许多事情就好办了，有葫芦，照样子一面就行了。机械化了，合作化就可以最后巩固起来。我国农业机械化可以很快实现。

小社势必合并一些，合并以后，仍然不能搞的（指机械化），可以联社搞。

农业机械化的所有制如何？现在苏联已改变。过去苏联是耕者无其机，是否以社有或大联社所有。合作社买不起的，恐怕也要贷一点款。

整个中国农业机械化，要打破陈旧观念，可以试办，可以缩短时间。

应普遍提高人工翻地，一年翻一部分，三五年翻完，可保持3到5年丰收，这是改良土壤的基本建设。《人民日报》应该把土壤学宣传一下。

改良土壤有二法：一为深翻，一为调换。可4至5年轮流深翻一遍。山东莒县大山农业社就是如此。

麦子的穗太短，如果能研究培育一种新的品种，那就很好。

化肥太多破坏土质，还是以自然肥为主。

（谈到群众集资问题时）不搞就不搞，一搞就搞这么多，我们这个民族就是这样。

8年中只有2上半年，大灾很值得注意，肇源县去年60%的亩产达到400斤，东北、华北、西北地区为什么不能？

乌克兰称为苏联的谷仓，为什么东三省不能称为中国的谷仓。

牧区的改造经验很好，因为在社会主义包围中，他是不安心的，这和西藏不安心是一样的。

中国创造了一条经验：合作化增产，农业牧业都如此。今年如果能增加1000亿斤粮食，700亿斤也好，整个地球就翻过来了。

农村房子很不卫生，在10年内应改为砖房；不要茅房，这不发生爱国不爱国问题。青岛、长春最好，成都就不如重庆，开封不如青岛。应有一个计划，十年内改变房子样子搞点好，不要封建主义，应搞些标准设计，采取因地制宜。几年丰收的合作社，可以逐步修筑农民的房子。苦战7年到10年，改变农村房子的基本面貌。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上海看齐。

关于水利化与外行内行问题。

河南水利全国第一，达4800万亩。

（谈到水利化时）现在算成3年，大修水利。现在搞政治运动，为了多打粮食，现在可以考虑除了地广人稀的地区外，搞大型社，可议一下。当然不是回去就弄，而是五年之内，要逐渐弄。

打开通天河、白龙河与洮河，借长江济黄，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同北京联起来了。

山上到处搞梯田，搞鱼鳞坑。

（谈到修东渠，水利局反对的问题时）科学家不科学，水利局应登报检讨。种草很重要，要加进去，覆盖面中要有草。

外行解决问题来得快，还是内行跟着外行跑。内行跟外行跑，恐怕是个原则。今年修水利，不是谭震林等同志，靠些内行，100年也修不出来。

许多事外行比内行高明，唱戏如此，改良戏要靠观众，靠外行。

苏联技术出口，我们依样画葫芦，并不那么神秘，工业化、机械化不要那么迷信。也不要迷信科学家。科学家的脑筋中总有一部分不科学的。

关于大办地方工业的问题。

现在中心问题就是地方工业，即是解决机器的问题。地方工业有4大任务：一为农业服务（基本的），一为大工业服务，一为城市人民生活服务，一为出口服务。

只要提出问题，各地就想办法解决。南宁会议只提出若干年地方工业赶上农业总产值，并没有提出办法。可是，现在各地解决了。

化肥厂，南宁会议谈到统一由专区办，现在看每县都可办。

（谈农村搞工业问题时）比较大的最好是乡政府搞，国、社、私3者合营，国家也不一定投资，赚的钱可以多少分一点红。

大社可办一些加工厂，最好由乡办，或几个乡镇合办，

县办社助，手工业社办厂矿。

农具展览（包括人力的、小型的，不只是耕作的。而且要有加工的、运输的），在今年4月间搞起来。

新疆地区分散，加工工厂必须分散办。流动加工厂、轧花、面粉、榨油、化肥。这个办法可以在地广人稀的地方应用。25000元可以搞一个流动汽车加工厂。水多的地区可以搞船上流动加工厂。

工业方面，全国平衡，超产部分，地方与中央分成，由地方调动。地方协作，也可以平衡，60条中加1条：协作关系。

我们有些人有错觉，认为农产品出口容易，换工业机器不容易。其实相反，死东西容易搞，活东西不容易，农业不易。应把这种看法改变过来。农产品很贵重。

关于定计划指标等，还得留有余地。

对那些（指指标过高的）也需要压缩空气

这次会议应对时间取得一致看法，除四害可3年到5年、1年突击，3年推广，第五年扫尾。粮棉是5年至10年。绿化3年到5年。这样两本帐，有伸缩好些。

（谈到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时）辽宁3年，广东5年，是左派；3年恐怕有困难，可以3到5年，上面可以打长一点，让下面超过

现在有些虚，不是计划，而是要措施，不要措施工人没有信心。许多事要有具体措施，才有保证。计划要和措施结合，否则计划会落空。

（谈到3年实现亩产400斤时）不要吹得太大，还是五

年计划争取3年完成。这么快法我有点发愁。可以活动一点、再看一看。

（讲到要克服动口不动手的官气，安于现状的暮气，怨天怨地的怨气，和制定、执行计划是春天必大、秋天必小时）计划不合实际，很值得注意。去年粮3700亿斤，今年4700亿斤。靠得住靠不住？有暮气，值得注意。

3年内不要减少自留地和个人养猪。可以议一下。增加合作社的积累。分的少了，应该让农民发展一些副业，增加一些收入。自留地减少，又不要多养猪，两头猪死不好，合作社庆丰收，这不同于婚丧，吃一顿，每人块把钱，不必泼冷水。

关于领导干部要读书，要又红又专。

各省的第一书记和参加会议的部长同志，大家要读一读威廉斯著的《土壤学》。从那里面可以弄清楚作物为什么会增长。土壤学是农业的基础科学，好像医学的解剖学。日本农业并不高明，我们苦战3年就可以赶上去。不要请他们来插手，要请社会主义国家的，我们对帝国主义国家决不开门。日本现在跃跃欲试。

大家回去找一个大学当教授，发聘书，每月讲1次，1年讲几次，学柯庆施，都要有著作。在座的同志、中央委员，1年做两篇文章，一业务、一政治，专深红透。

中央的人没有上课，总有一天要比输的。比输也好，我们下去，你们上来，一直下到当老百姓。

为什么不做政治工作？各部可否设政治委员？设政治委员是设置对立面，逼部长进步。管业务和管人，是两面。

请各省、市抓一下工业，抓1个月，没有1个月抓2个礼拜，然后到北京去开会。还要抓思想、抓理论，这是纲。以后口里要触到马克思主义，现在是不讲政治经济学，不讲辩证法，也不讲自然科学，只讲部门经济学。以后要略带一些理论色彩。报纸的社论，也应略带一些理论色彩。以此为光荣

技术决定一切，政治思想不要了？干部决定一切，群众不要了？全面的提法就是又红又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技术又要政治思想；要干部又要群众，要民主又要集中。

又铧犁不能用，是因为思想不能用，脑子不能用，不是客观不能用。可见思想是统帅。思想动态要当成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应首先抓。在委员中应经常注意谈，平常不谈不好，平常没有意识到就不好了。有的省对思想讲得少，不重意识，山东一开会就发现。

学习苏联和一切国家先进经验，是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做的一件事，要坚持。同时又要独创，独立思考，但要防止不学外国，防止两极化。

关于教育与文化等问题。

学制、课程要由各省、市去研究改变，有了典型，教育部门才能改出来。历来统一的东西，都是由典型到普及的。

（讲到勤工俭学）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半工半读，专读书就是最坏的，见书不见物，脱离实际，四体不勤。不一定全自给，有半自给、四分之一自给。方针是不要全读书，一定要又读又劳动。我们民族又穷又白，省下来的钱多办学校，中小学可以大办，农业学校也要发展。只有教育发展了，才

能赶上英国。靠文盲建设不起社会主义。

苏联有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要上千万的知识分子，美国就怕这一点。

中等技术学校，都归地方管，学生三分之一给地方，或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农学院完全归地方，医学院三分之一归中央。

全国青工、青农、青年学生、社会青年，确实需要很好的教育，要在鸣放中让他们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谈到除四害、扫文盲时）大鸣大放，提出问题，几个星期，面貌大变，农民不见得那样保守。

技术革命开禁，不一定到7月1日。对整风无害。文化革命也可开禁。

报纸是一个材料部，它反映很快，也很经常，给我们提出新问题。

现在有些过去常写东西的人，现在不写东西，因为他们还在过渡状态中，过些时候就会写出来。

中间派现在是不敢动笔的。只要把无产阶级兴起来了，他就有很大的自由，才能写出东西。

现在是过渡时期，需要的小说不是什么大作品，而是写一些及时反映现实的中篇、短篇，像鲁迅的那些作品。鲁迅并没有写什么大作品嘛！现在是兵荒马乱时期，大家忙得很，知识分子还未改造好，大作品是写不出来的。我们也一样，没有创造一件，都是把群众和下级创造出来的东西加以提倡。不接近群众如何能提倡好的东西？创作也是一样，也必须和人民接近，听人民和下级干部的话。

关于规章制度等零星插话。

规章制度，各方面都有些问题，工厂报表，要人减少。由儿人小组负责整理一下，下次会议提出汇报，并且提出一个革命的办法。实现规章制度革命。各地来个专题鸣放。

无产阶级之风压倒资产阶级之风，正风压倒邪风。

过去许多是资产阶级分子在办事，反右派后，工厂并未搞坏，反而更好了。这是生产关系的改革。

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2.5亩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也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情；实际人口到7亿5至8亿时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口少，现在很难叫农民节育。少数民族、黑龙江、吉林、江西、陕西、甘肃不节育，其他地方可以试办节育。一要乐观，不要悲观；二要控制。到赶上英国时，人民有了文化，就会控制了。

西北四省、山西、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及其他少数民族区，不要提倡节育。本省内也要有地区的分别。

（谈到劳动中工伤事故时）工业也有，花这一点代价赶上英国也是要付的。各省准备死500人，1年1万多人，10年10万人，无时不死人，要有准备。

（谈到工厂劳动强度问题，白天工作晚上出大字报出工伤事故时）应通报，着重搞技术革命。大字报数量不要追求。

党政军、商业机构缩小，技术机构扩大。

地方工会、产业工会，应下放由省市管。

没有办法时，睡一觉起来开会就有办法。

对60条你们应该提出意见，取消什么？增加什么？



“酒、色、财、气”，酒是粮食，色是生育，财是财经，气是干劲，一样不能少。

大字报在农村可以推广。有4条好处：一、可以及时议论国、社大事；二、干部能听话；三、群众便于说话；四、不怕报复。这次会议作出一条决议，发一个指示，农村普遍贴大字报。中国自子产时就有了大字报。

没有民主哪来的集中？过去国际范围内的民主集中是一句假话。

因为集中是建立在民主之上，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很好的集中。民主集中首先是民主，然后是集中，没有真正的民主，群众的热情和创造性怎么能发挥出来呢？

### 陈伯达的发言和毛泽东的插话

3月18日，陈伯达长篇发言，从相信水利的“大跃进”，谈“1大等于20年”；谈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分歧，主要是关于速度问题的分歧；谈个人崇拜问题；谈社会主义改造中国有新创造，社会主义建设也应当有新创造等问题。其中不少“理论语言”将反“反冒进”的争论，提到理论高度来认识。从理论上发挥毛泽东的一些观点。于是引发毛泽东就此不断插话，并回顾抗战时期同王明的争论，抗战胜利后同斯大林的分歧，再次谈及1956年反冒进前后的争论，说明这都是有关革命成败与建设路线的重大原则争论。

陈伯达说，昨天同柯庆施同志谈论，南宁和成都这样的会议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会呢？事实上，这是中央和各省党委

的联合整风会议。从去年主席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后，经过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国的形势起了根本变化。这个根本的变化，可以这样说：1天等于20年。马克思、列宁说过，可能将来会1天等于20年。比如中国搞水利运动。解放以来8年，等于几千年。（毛泽东插话：人类有50万年了，一共搞了20多亿亩。）8年间，我们搞了2亿亩，现在几个月搞了2亿多亩。所以，1天等于20年，毛主席这句话说中了。不仅是我们过去革命有1天等于20年的例子，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也出现了1天等于20年的例子。水利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毛主席在莫斯科大学跟一些留学生说过，真正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从去年开始的。以前解决所有制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可以说，去年以来，真正开始了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生产力发展了，逼迫我们不能不前进。现在“大跃进”已成为群众的口号，实际情况正是如此。最近主席了解一下渤海区的情况，我们去住过几天，就感觉到的确是“大跃进”。（毛泽东：我看了一下渤海黄骅合作社，只有2年时间，根本翻过来了，只种一季水稻、亩产1000斤，是新开垦的一个区，80~90%以上的人口都是外来户。从北京坐吉普车，经天津、大沽一天即到。那个地方过去出蝗虫，现在产水稻。）现在北方的水利运动向南方提出警告，将了很大的军。经过民主革命，又经过社会主义革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给我们很大的压力。中央与地方必须适应这个形势，不能适应，就将落伍，陷入被动局面。整风会议就是摆出问题，交谈认识，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解决思想问题，达到团结。现在看来，经过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的确

达到了这样的目的，就是说，党更团结了，团结得更好了。

（毛泽东：叫整风会议，我看也可以。因为我们这些人就没有参加整风，你怎么搞的整风？比如，各国——西方和苏联、东欧怎样评论中国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运动？有些材料、文件过去没有机会看，这回看到了。想一想，分析分析，这是一种整风，思想可以提高。还有会议上提出的各种文件、各种意见，带理论性的、带材料性的都有。比如王鹤寿那篇，应该说是带理论性的，说明了问题，说明了所以然。）

最近我看到刘晓同志关于王明的那个报告。王明对整风的看法，对过去也是对现在都是一种攻击。王说，整风的结果，搞出了两个东西：一个民族主义，一个个人崇拜。（毛泽东：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大家笑声）

历史已经做了结论。大家都承认，没有延安整风运动，中国革命不可能胜利。中国革命胜利的结果，就是社会主义阵营由3亿人口扩大到9亿人。对此，王明叫“民族主义”，我们叫国际主义。全国集中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下，形成了统一的意志与统一的行动，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一个一个扫除掉、摧毁掉。无此统一，社会生产力不可能发展。王明把这叫做“个人崇拜”。

对个人崇拜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应当把必要的权威同个人崇拜区别开来，这是两种不同的事情，没有权威是不行的。（毛泽东：委员会要有一个主任，总要有-一个委员长。）恩格斯写的《论权威》的文章，轮船在海上航行，全船命运就交给了舵手。权威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种常

识，没有权威，革命就不能前进；正如没有舵手，轮船不能前进一样。任何阶级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代表群众的中心人物和中心思想。马克思、列宁如此，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也是如此，他是我们中国无产阶级思想的中心代表人物。

苏联反对个人崇拜，突破迷信是好事。赫鲁晓夫现在是中心人物，代表中心思想。没有赫鲁晓夫不行，没有群众也不行。没有领袖，没有权威不行，这个问题，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中讲得很清楚。反对人民领袖，从“左”、右两方面来，王明是从右的方面攻击，他所想的还是中华民国，同我们现在的中国无关。新中国建立8年了。

（毛泽东：就是违背了王明的意志，才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照他的那个搞法，就是不准备胜利的。他的意思是讲我反国际。这里面有一部分真理，是反了国际。他历来自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就叫反共产国际。但是我没有从组织上反对国际；在思想上，我不赞成国际的一些不正确的东西，即中间有一个时期曾违背了马列主义。一个国际的远东部长米夫，跑到中国来，强迫中国共产党推翻自己的三中全会决议，称之为调和主义，调和路线；他代四中全会起草了一个决议案，强迫通过，批评李立三右了，于是扶王明上台。那个决议本身也是不正确的。至于抗日战争时期，那就不是王明当年那个小册子包括得了的。他从国际回来，搞了个《六大纲要》，两个“优秀青年的总汇”<sup>①</sup>那一套，把我们那个《十大纲要》推翻了。长江局成为中央，中央成为留守处，我是留守处主任。我还只能管城

<sup>①</sup> 指国民党和共产党。

内，外面城墙都不能管，墙上刷了“一切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标语。所有那个时候的中央局以及对国民党的工作，统统听长江局，并不听中央。什么人听中央呀！这有文件可查，有事可查。他在分裂党，他自己实际上成立了中央，办了一个报纸，叫《新华日报》，叫“党报”，我说叫“派报”比较妥当。我的一篇文章，就是《论持久战》，他不登，说是太长，但是陈克寒那个关于晋察冀的报道，比我的还长，却可以登。我的就是以太长为理由，只能印小册子。打电报来，我回了电报，我说要登，决不让步。他也是决不让步，决不登。我的文章在武汉推销不行，这是党报还是派报？延安报纸小得多，叫《新中华报》，3日刊，4开，给《论持久战》全登了。）

王明身在莫斯科，心还在中国，精神同中国相联系。联系了什么呢？他所代表的是中国资产阶级右派，因为他现在想的是中华民国的问题，他看不见革命的胜利，他看到的革命胜利变成“民族主义”，变成“个人崇拜”。

（毛泽东：同是共产国际回来的人，王明是1937年12月回国的，王稼祥是第2年5月中旬回来的。王明并没有带圣旨回来，只是口衔天宪。王稼祥后回，是带有圣旨的<sup>①</sup>，对中国八条决议，那些决议是我们赞成的，因为要发动群众，要讲民主。而王明他就是不要发动群众，不讲民主，照蒋介石那一套搞，就是不要触动蒋介石。究竟谁反共产国际？王稼祥一个国际，你王明一个国际，你也没有圣旨，这是朝廷旨意，还是6部公文？既无朝廷旨意，又无6部公

<sup>①</sup> 指季米特洛夫的信，信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毛泽东。

文，你又要收鱼税银子。隔5个月，王稼祥带的朝廷旨意来了，你说谁反共产国际呀！我很高兴，库西宁说，共产国际有些东西可以反。斯大林没有准备中国革命胜利。日本投降后，他来了电报，坚持反对我们同蒋介石打仗。说如果中国发生内战，民族就会毁灭。就是执行雅尔塔协定，保证中华民国20年统治。罗斯福说服蒋介石，斯大林就来说服我们，因此有电报来：不许革命。你让我到重庆去谈，可以；但是不许革命，不干。抗日时期，中国革命一切准备工作——思想准备、组织准备都完成了，时机完全成熟了，在这个时候来泼一瓢冷水，这是原则错误。不许6亿人民革命，这条错误将来要受审判，马克思当审判厅长，那斯大林至少要打40大板。)

所以，领袖问题是个路线问题，各阶级各有领袖。实际上，王明并不否认领袖的。我印象很深的是，《新华日报》不断登他的像片：“中国共产党领袖王明”。（毛泽东：他那个照片送得可多了。延安六中全会时，贺龙接到照片了，关向应也接到照片了，我们的将军都收到过他送的照片。这一条我没有他厉害，我没有送过谁照片。）王明只承认他是领袖，否认全党所信任的领袖。

我想再谈一下所谓“民族主义”和“个人崇拜”的问题。我们是国际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人，有中心人物，中心思想，但并不是个人崇拜。（毛泽东：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斯，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就是说，正确的主张赞成，错误的上张反对）是呀！个人崇拜如果按这个定义，全部是正确的。如果盲目地实行，不加思

索，像斯大林所提倡的那样，那就当然不对了。事实上，所谓“民族主义”，所谓“个人崇拜”，就是毛主席领导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在马克思的语言里面，添加了许多中国的语言。这实际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立思考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本身是提倡独立思考的。延安整风运动在马克思主义语言里面添加了许多新的语言，这样才把我们全党全民动员起来，取得全国的胜利。一个国家和人民不能用自己的语言表达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可能取得胜利，包括革命和建设。毛主席在民主革命时期有许多新语言。

（毛泽东：这要感谢王明，是他逼出来的。讲逼，第一个还是蒋介石，还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第二个就是教条主义，还有陈独秀主义。有了陈独秀，有了王明，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说我们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论，一点国际主义都没有，就把我们逼出来了。只要有机会，我就射箭，明箭、暗箭都回射；说我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嘛。《论策略》说得较完整，出卖我这一套。《矛盾论》、《实践论》也是为此目的写的。那时是多产作家，你一枪来，我一枪去。）

从大革命时期《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始，毛主席就用马克思新语言，反映中国的实际。社会主义改造，也是独立思考提出的。这个路线胜利了。在建设问题上，有两个时期。根据地时期，1942年延安有十几家经济学说，思想混乱，就是要搞钱。只有发展生产，钱才越搞越多。这即是从国民经济出发，还是从财政出发？大生产运动发展起来，困难解决，找到了出路。现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争论分歧仍然在此。1956年发生的问题，只是从交换和分配这方

面看问题，而不是从生产方面看问题。对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考察，是从流通过程到生产过程。（毛泽东：当时的困难从哪里找出路？是从全面发展经济、发展生产找出路，还是从财政收支分配找出路？）还有市场不稳定的问题，也只能从生产方面找出路。（毛泽东：所谓市场者，就是生产品交换的场所；收税者，就是国民所得的分配问题；至于收起税来如何使用，那是一个再分配的问题。）所以，1956年这个分歧，事实上还是不同程度上回到延安时期，十几种学说跟一种学问的分歧。十几种学说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一种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学说表现在《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这个小册子上。（毛泽东：反冒进那个时候同志们倒不是不赞成搞生产建设。156项，800多项，都是要搞的。只是当前遇到困难怎么办？相当限制一些是可以的。但是当作理论性的问题提出，市场和基建，搞几个平衡，恐怕就不妥当。）解决的办法，后来还是用中央的办法：增产节约，几个月就解决了问题，那时，有些同志就是把问题看得太严重。（毛泽东：1942年严重得多，11月还没有棉衣。国民党不发钱，还是解决了问题。现在是全国政权，6亿人民，1956年那么一点小困难，夸大成很大的困难，觉得非常危险！）1951年冬天，说财政困难，提出增产节约，问题解决了。1953年又碰到这个问题，又提出增产节约，又解决了。（毛泽东：记忆力衰退。1956年是第3次了，我们把旧的生产关系推翻了，对生产力的解放，对新的生产力这个力量，我们总是估计不足。反复的经验证明，只要我们能稍微注意一下，动员一下，这些困难就可以迎刃而解。）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1941年提出的，是马克思主



义新语言。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我想回忆一下《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这一段：“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是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和发展。”这回小平同志要我搞个文件<sup>①</sup>，我又把“序言”重新反复研究了一下。这一段，我觉得，一个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刚出现的时候，主席马上就提出了新问题，看出了到来的新问题是什么。（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我写了几十篇按语，一共有2万多字，然后把它概括成为那么一篇序言，有二三千字。）主要就在这一段，已不是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右倾，“面是在其他方面”。什么呢？主席提出了建设问题，是生产和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问题。（毛泽东：不是讲社会主义问题完全解决了，而是讲速度问题。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解决所有制的速度问题，就是跟邓子恢的争论。）在这方面存在的缺点，就是对情况估计不足，要批判、克服才能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序言”上说的：“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毛泽东：这篇反冒进的社论，上面不引，下面不引，中间只按了“胡思乱想”那么几句。而在1956年，特别是11月2中全会时，是那样说的：“现在的问题不

<sup>①</sup> 指成都会议印发一个文件摘录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的若干按语，毛泽东为此写了前言《关于一批按语》。

是右倾保守，而是急躁冒进。”双轮双铧犁问题是个关键。造了170多万部，结果只销了86万部，还剩90万部卖不出去，就证明这个不行，就吓倒了。有些同志搞双轮双铧犁是积极的，出了力的。）那时说的这段话，经过3年，现在回头再看一下，还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于中国在解放以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可能性、潜在力量估计不足。1956年的分歧，主要是速度问题，中国是否可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更快一些。

（毛泽东：两个速度分歧：一个是改造速度，同邓子恢；一个是建设速度，冒进派与反冒进派。我是“罪魁祸首”。就是写了这篇序言，又提出几个口号：一个农业40条，一个促进委员会，一个多快好省。不促进党不变国民党？这是1956年1月党的知识分子大会上，到了1000多人，我在会上放了一炮。说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多快好省，这四个字形成有个过程，开头只有多快好，“省”字是富春同志加的，那是1955年。40条是一个积极的农业纲领。农业发展了，工业就有了市场，有了积累，寄很大希望于农业。这40条也是大家谈出来的，开始只有15条，17条。大家都很积极，包括我们总理和陈云同志。1956年预算、基建费搞大了，市场问题一来，有些东西就压缩了一下，是应该压的基建那时不压缩一下也不行。问题在连带把这3个东西都吹掉了。三中全会开会前，在休息室时，我同我们几个常委谈了，把多快好省、促进会、40条吹掉了。全会讲话时，我就捅出来了。会场那么多人，都不敢讲，不敢提多快好省，可见那时候的空气。我还讲到，只记得郭沫若在哪次讲演中还提到多快好省，我说只剩下这一个知己。

我讲完了，会场还是鼓了掌的。鼓掌不是反对，而是赞成嘛。后来也没有一个人写信给我，对我讲的表示反对。所以，我说这三个东西复辟了。复辟了，我就有劲了。有二中全会的合法根据，在杭州、南宁会议上，我就发难，就大讲了一气。）

这次会议揭露出来，1956年的分歧，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分歧。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分歧，主席刚才说了，主要是邓子恢同志的小脚跟毛主席大踏步前进的分歧，那已经解决了。解决以后暴露出一个新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究竟怎么样？我还参加过富春同志起草一·五计划文件的工作。在一五计划中，除改造问题有独立语言外，没有中国新的独立语言。我们究竟可不可能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更快地进行建设呢？社会主义改造速度解决以后，毛主席就提出了40条纲要，10大关系，多快好省，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系列问题，还有《高潮》序言（毛泽东：知识分子会议上放了3炮，促进委员会等）。我感到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我们有了新的独立的语言了。过去纯粹是抄袭人家的，我参加富春同志那个文件的起草，事实上我也是一个文抄公。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并没有独立的语言，富春同志，你看可不可以这样说。当时的确有困难，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完成。

不管是改造，还是建设问题的分歧，实际上，最根本的问题，是对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估计不足，很多毛病、很多不妥当的意见就产生出来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速度，问题刚开始提出来，一些争论、分歧自不可避免。这个争论是一个科学的争论，还是有实际作用的争论？将来的历史会

把这个问题说清的，现在一下还看不清。现在看起来，这个实际作用已明显起来了。现在农业、工业生产都已出现高潮，这个争论的重要性就会逐步显露出来。

我很赞成、很欣赏柯庆施同志在上海那个报告中的一句话：“现在是跟帝国主义争时间争速度的问题”。（毛泽东：我们的文件要加上这一部分。）这句话，把问题说中了。苏联第一个5年计划时，反对右倾思想，实际上也是这样一个问题。尽管斯大林有错误，但他主要的成绩在一五计划的干劲，这对于后来战胜德国法西斯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毛泽东：有两上问题。一个问题可以这么看，同帝国主义争时间，争速度。假如帝国主义都搞掉了，也是两种办法：一种是干劲十足，群众路线，在轰轰烈烈热潮中前进。另一种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也可以是这样一条路线。“凄凄惨惨、冷冷清清”，那并不见得好。这是宋朝女诗人李清照的一首词，她是个寡妇。这首词可能是金兵打杭州，把宋高宗追到海里头那个时候写的。是以一个寡妇面孔、寡妇心情来建设社会主义，还是另外一种心态建设社会主义？不是讲寡妇面孔最难看吗？右派说我们的干部都是寡妇面孔。鲁迅也批评过寡妇的，说寡妇不能当校长，要拆学生的信的。鲁迅说，接吻不等于性交，而在寡妇看来，大概接吻就等于性交。）毛主席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主要在干部这方面，这同苏联一五计划有相同之处。但是提的问题更深刻、更全面，因而可以避免斯大林所犯过的错误。

我想在这里提出两点来说。第一，列宁、斯大林解决了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个问题。毛主席接受了这个观点。（毛泽

东：这是接受他们的，这是正确的，但是还有添加的东西。）添了一个：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这是新的语言。在列宁、斯大林的文献里没有完整的提出这个问题。（毛泽东：后来我们的社论里讲得更全面、更充分了：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一个又有现代工业、又有现代农业、又有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苏联强调了集中，这个集中主要在中央领导机关，而缺乏群众的民主基础。我们接受了集中，但又提出中央与地方同时并进。列宁提出过民主集中，地方创举，生前来不及具体化。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有缺点。（毛泽东：第一是人民首创，然后提领导机关首创。苏联强调后者，不强调前者。斯大林不承认反映论。）斯大林中断了列宁思想，形而上学，无辩证法。（毛泽东：人民同领导，是对立统一；中央同地方、省同县，也是对立统一。我们借用右派口号，搞出条大鸣大放；原来鸣放只限于学术和艺术，右派一扩大，我们就抓过来。农业40条纲要，是民粹派，也抓过来。延安精兵简政，是李鼎铭提出来的。）我们的路线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工业农业并举；中央管最重要的，中央与地方并举。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建设路线的新贡献。（毛泽东：这种观点的性质属于上层建筑，这种提法使生产力不受束缚；否则就会受束缚。我们还提出形象性的口号：15年赶上英国。）这两个并举是根本的东西，是新的概括；解决得好，速度就会超过苏联

关于计划问题。计划估计到需要。但新的生产创造，促进新的需要。电灯、火车、汽车、印刷机、工作母机的出现，生产和需要都随之发生变化，产生新的需要。（毛泽东：

生产与需要是对立统一，决定的是生产。5 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需要是无穷无尽的。计划工作如不看到这些，就会犯错误。）一个需要满足了，又要解决新的需要。沉睡了 2000 年的生产力，一下唤醒，其力量不可估量。（毛泽东：我们是真正的醒狮派。但发起威来，不搞大国主义。）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是充分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精神相结合。我们要有革命精神，新的大革命，充分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气概。

### 陶铸、王任重的发言

3 月 18、19 日，陶铸、王任重先后在会上发言。王任重在南宁会议上就受到过毛泽东的表扬，陶铸在南宁会议上则表示过要“赶上柯老”，会后在“大跃进”发动过程中都是活跃人物，在各省中名列先进。这次成都会议他们的发言，“跃进”的调子更高了。

陶铸发言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搞社会主义立场的问题。陶铸说，这个问题，在广东党内外都没有完全解决。（毛泽东：全国也没有解决，哪里只是广东呢？北京也没有解决。）在广东党内，过去民主革命的立场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得好。解决社会主义立场问题，在党外，我们反右派搞得迟了一点。在农村里，去年青岛会议以后，根据主席的指出，我们就开始搞了社会主义教育，搞了 3 个月，对富裕中农的批判是比较彻底的，富裕中农在农村的影响是大大削弱了。解决社会主义立场，党内的问题就是反对地方主义的斗

争。我们理解，广东党内的反地方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党内反右派斗争的继续。（按：当时广东党内反冯白驹、古大存地方主义的错误，已经平反。）

陶铸说，南宁会议以后，搞大跃进，广东总算跟上去了，进度还可以。主要还是靠本地干部工作，他们躺倒了，工作就很困难了。一个反右派，一个反地方主义，在广东来讲，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对我们的工作是一个很大的推动。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过去对主席的指示也是领会不够，现在看来并不是那样很简单的。能够过民主革命阶段，不一定能够过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合浦专区比较严重一点：县委委员、县级机关干部，包括乡基层党委书记，全区干部14389人中，严重右倾的（就是对合作化不满意，对统购统销有意见那类情况）1305人，占9%；有严重个人主义、违法乱纪的714人，占5%；地方主义思想严重的111人；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234人。这样一个队伍过社会主义关是有困难的。县以下干部大概有80%搞社会主义是有困难的。那天柯老讲的安于现状这个思想，在党员里面是比较普遍的。公有汽车北京取消了，我们也取消了。科处长以上看病有特进证（毛泽东：这个要取消）。总而言之，我们现在不替群众便利设想，就是为着我们干部舒适，干部便利。所以有很多规章制度脱离群众。但是，这些规章制度现在要改变不是那么容易的，阻力相当大。

陶铸讲的另一个问题，是坚决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问题。他说：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我们一进城的时候，主席就提醒了。拿我个人来检查，一取得全国革命胜利，抽象的要搞社会主义的观点是有的。但我犯了两个错误，一个

就是邓老提的新民主主义那个问题，我是拥护的。第二，统购统销，我们发过电报的，在广东推迟半年。财经会议上主席提出了社会主义总路线（应为过渡时期总路线——著者注）问题，但在广东来说，我们的认识就不觉悟。（毛泽东：七届二中全会就基本上提出要搞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来了，讲清楚了依靠什么人，要对付什么阶级，对付资产阶级是一种什么方针，在国内基本矛盾是什么，反帝反封建这个任务的基本标志是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政权，就是打倒了国民党。至于土改，当时还没有搞，还没有讲。打倒了国民党政权，政权到无产阶级手里来了，无产阶级有了国家机构，势必就要开始建设社会主义。）二中全会到主席反合作化右倾，在党里面这个认识也是经过一个时期才完全统一的。

建设的总路线主席在 10 大关系中提出了。1956 年 4 月 25 日的省市党委书记会议上我们听主席讲了。我的发言也讲了，感觉苏联搞社会主义就是搞得阴森森的，社会主义算是个社会主义，但是代价太大。主席在青岛会议上提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实际上 10 大关系里头已经提出来了，但作为我个人来讲，认识是不够的。前年反冒进，我是没有反冒进的，我是被反的，但是我在这个问题上不坚定。双轮双铧犁，我们有个贺西民同志来开会，那是总理主持的会议，我讲广东要多少多少，但后来也没有坚持。这个双轮双铧犁是小问题，但是作为思想问题来检查，那就是一个大问题，一个机械化问题。（毛泽东：唉，你这个人还讲一点老实话。）这是事实。

我现在从我个人思想上来检查，对总路线的认识不那么



坚定。我看这里面有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广东党内有一种教条主义倾向。对于苏联、对于第3国际的迷信，在党内还没有完全消除。在全党来讲，这个问题是不是彻底解决了？拿我个人来讲，对于第3国际不是那么崇拜的，也吃了亏的。在革命路线问题上，我们胜利了，中国有中国革命的具体路线，我们是吃了第3国际亏的，这个问题我看是解决了的。但是在建设路线上，我看少数同志还是有迷信。苏联革命那个办法，我们经过教条主义的证明，我们是吃了亏的。在建设问题上，工业建设，苏联还是很高明的，我们大概要很好学习的，也没有问题，主席经常教育我们，学习苏联是肯定的。但是现在看来，在建设路线上，苏联也不是尽善尽美。现在的问题，我看是党内还有这样一个教条主义的倾向（正如主席指出来的，这就是一个方法问题），阻碍他更快地认识这个问题。（毛泽东：就是硬搬，忽然硬把一大堆东西搬来。现在陆定一写了一封信，写得很好，他简单明了，用那么几百字就把问题提出来了。他说，教育制度中硬搬的东西害死人的东西可多得很。）当然，我们没有经验也是一个原因。但另外恐怕就是对第3国际，对斯大林的迷信，还没有完全清除。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阻碍我们更迅速地认识中央、主席所规定的这个建设路线。我想，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总觉得自己搞革命是有一套，搞社会主义建设好象是不大成。我看1956年主席提出的十大关系就是我们完整的一套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方针。那一天柯老讲的，总的是调动积极性，多快好省。现在看得很清楚，苏联以重工业为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放松了农业，赫鲁晓夫现在在补这一课。（毛泽东：它现在轻工

业产品还不够，没有我们多。)象下放和地方分权问题，1956年主席10大关系就讲清楚了，赫鲁晓夫是后来才执行的。(毛泽东：发明之权应该在中国，他执行得快)。

关于学习问题，我是讲我们理论方面太差，总的方面有时候掌握得不那么稳。王鹤寿同志有个名言：“恨铁不成钢”。就是感觉这个思想赶不上，理论太低。

工业农业只讲一点左派右派的问题。广东是5年实现“40条”，(毛泽东：你算左派。)我事实上是中派，可以说是中间偏左。(毛泽东问：为什么?)因为我们那里5年实现，主要就是粮食、绿化、四害、扫盲这4项困难一点。曾希圣同志将我的军将得很厉害。(毛泽东：他跟你唱对台戏，你的“敌人”不仅是王任重，而且有曾希圣。)周围各省都逼。确实广东有这么一个条件，它技术比较高，自然条件比较好，也应该搞赶快一点。(毛泽东：你是亚热带，也是800斤，你得900斤，首先提出来的是安徽。)

王任重是第二天作的发言。王在中南几省是最突出的人物，所以会上受命与未到会的河南、湖南两省联系，了解这两省南宁会议后落实农业“40条”的情况。他的发言先谈了联系的情况：联系了两个省。湖南周小舟不在家；河南吴芝圃讲了一些问题(电话里讲的)，他主要讲了这么一个情况：今年麦收以前全省消灭四害。(毛泽东：怎么能消灭那么多?)1958年底全省扫除文盲。(毛泽东：这怎么行？哪个文盲字认得这么快?)今年实现四五八。打了个电话，给他讲了一下，说主席的意见不要讲得过死了。问他是不是登报了？没有登报，在党内讲的。他又打了电话，活一点了，说今年或是明年实现四五八。他有些观点讲得很好，技术革

命要搞，文化革命也要搞，主要是群众路线问题。

湖北省委法时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王任重发言主要还是谈对南宁会议以来发动大跃进问题的看法，一共讲了6个问题，篇幅较长。

第一个问题，讲一讲我个人对两次会议（南宁、成都）的认识。昨天伯达同志讲了，这次会议也可以说是一个整风会议。我很同意他的看法。柯老同志讲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建设路线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如果说还存在着争论，或者存在着意见不一致，我看优先发展重工业问题是没有问题的。工农业同时并举问题，自从主席关于10大关系的讲话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矛盾的文章出来以后，一般的问题是解决了的；问题发生在速度上，就是多快好省这方面。我们能不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经过批判反冒进的错误，经过三中全会，经过南宁会议，也解决了。现在着重解决的是如何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主席在10大关系中已经基本解决了，工农业的基本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等，从许多方面实际上把问题解决了，不过我们没有认识这个问题，具体措施也没跟上。这次会议主席讲的一些话以及各地方同志讲的一些话，我们现在讨论的许多具体问题，我看就是属于如何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现在还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速度到底有多快？我的看法，农业也好，工业也好，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其快的速度，不是我们在平常情况下就能估计到的。到底1年实现四五八，3年、5年或者7年？现在还难以断定。（毛泽东：你河南这一来，把我们什么东西都捅破了。假如它能一年实现

四五八，只有 2 个月就要全部实现水利化，今年就要消灭文盲。谭震林：这两条，一个水利化，一个消灭四害，我看是可能的。毛泽东：一个四五八，一个消灭文盲，不一定能做到。）我的意见，这个问题危险不大，就是最好不要登报。尤其作为一个全省来讲，恐怕 1958 年看它 1 年，再决定这个速度就比较有把握。1958 年干这 1 年到底怎么样？今年劲头不是很大吗？到底增产什么样子？通过 1 年的实践会修改人们的认识的。

今年看来，不管河南也好，湖北也好，增产确实不是平常的速度。湖北省今年春季作物，麦收这一季要比去年增产 50~70%，50% 是有八九分把握的，就是增产 20 亿斤。原来春季作物（麦、蚕、豆）40 亿斤多一点。要按地委的数字，那就是 30 亿斤不止，襄阳一个地区增产 15 亿斤小麦，比去年增产一倍。孝感也增产一倍。（毛泽东：你是离开武汉时确定这个数目的？）我打了电话问：能不能增产 15~20 亿斤？家里一些同志说，15 亿恐怕困难，10 亿可能。我说，你们再问一问地委，开个电话会，地委保证 22 亿。河南说小麦今年春季最少增产 40~50 亿斤。所以我考虑可能今年春季这一季就能等于过去两年增产的总数。湖北过去两年（1957 年比 1955 年）增产 30 亿斤，今年春季一季就可能增产 30 亿。今年一年可能赶上过去 5 年。过去 5 年（1957 年比 1952 年）增产粮食 50 多亿斤。今年一年可能超过过去 5 年。我们一本帐是 26 亿，二本是 46 亿，第三本帐就是地委的保证数 70 亿。所以，看来事物的发展是相当快的。关于农业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速度，我的想法是：只要我们总的精神是促进的、积极的，对下面不是束缚的，领

导上提的指标稳当一点为好。

保守思想现在不表现在指标的高低上，有的情况有虚假。他指标定得并不低，可实际上是保守思想，他的措施是保守的。水、肥、土，因为搞了这么大的运动，大家逼起来了，这不保守；但在改制问题上，在技术问题上，比如密植、良种，种不种粳稻，种不种双季稻，在这些问题上有保守。现在正在搞大鸣大放辩论，辩论这些技术问题，如到底要不要密植，这个问题很争论。

另外，这次主席提出总结我们过去的建设经验，批判教条主义。1956年10大关系最后一条主席讲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不要学落后经验，批判教条主义。后来主席又讲过，现在世界上有个反苏浪潮，我们暂时批判教条主义不好，缓一缓，找个适当时机来批判。（毛泽东：这是什么时候？）好象是去年了。（毛泽东：不要去批评苏联什么东西，批评我们自己的什么规章制度，保守思想。）我看只有批判教条主义，才能使我们的思想进一步解决。主席讲，不要光空喊，要实喊，要实干。芝圃讲了几条很好，就是所有的问题，比如搞技术改革，搞文化革命，搞除四害，所有这一切，都是采取了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希望把10大关系整出来，作为党内一个正式文件。另外，我同意伯达同志昨天讲的意见，在这一次党代表大会上要着重地把社会主义建设路线问题作为一个主题来讨论一番，这样来统一全党思想。

第二个问题，关于地方工业和农业机械化问题。我感觉这次会议在我个人思想上收获最大的是这个问题，像主席所讲的，打破了迷信，解放了思想。南宁会议以前，我们在地方工业问题上是不积极的，总是小手小脚的；南宁会议提出

地方工业要赶上农业，我们回去也作了一个初步规划。（毛泽东：农业机械化是你们提出来的嘛。）我们对工业有迷信，感觉工业特别重工业难得很。我说这个变化很快：三中全会说各省办化肥厂，这叫做大进步了；南宁会议，井泉发明的，是各专区办化肥厂；这次会议上出来了各县办化肥厂。这个问题我来以前根本没有想到，是不敢设想的，因为没有知识，不知这个家伙多困难，也不知花多少钱，也不知技术多复杂，也不知设备有没有。所以，农业机械化我们是很积极的，但发生一件事，就是农业机器没有！（毛泽东：造！）我们自己又造不了，思想保守了。对工业还有迷信，总感觉工业设备也很困难，干部也困难，技术也困难，资金也困难，这个东西束缚了自己的思想。我们来的时候考虑过地方工业在5年内增长4~5倍，这样就赶上农业产值了。地方工业、手工业现有产值才21亿，增加4倍达到100亿，到1962年和农业产值大体相等。这个指标看来是不小的。可是我们来以前，没有考虑县办化肥厂和煤电油厂。来了这里打电话回去一问，说可以，县委也在搞，麻城县自己搞小拖拉机了。原来我们考虑轻工业多一点，考虑这一方面少一点，就是思想没有解决。在会上听了各省同志们的发言，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了。看来农业机械化会是很快的，不是很慢的。主席讲，农业机械化的机器制造以地方为主，这也是这次会议提出的新方针。在这方面我们存在保守思想是由于缺乏知识，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办，也不了解全国情况。这次会上，一波同志说，机械不成问题。南宁会议一批判反冒进，我们也考虑一下，我们那里到底有没有保守。我们和地委共同讨论，总的结论是：湖北1957年和1956年相比，工

作是好的。我们没有反冒进，我们查了报纸、会议文件、记录，从全年看，省委总的方向上是反保守的。八大后，二中全会后，1月省市委书记会议后，1956年冬春矛盾是反右倾保守，不是反冒进的。可是1956年冬和1957年春有一股恶风，非常厉害，那就是批判斯大林。匈牙利事件以后，咱们又增加工资，资本主义思想泛滥。我们那时一方面批判右倾保守，一方面批评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作风。当时思想相当混乱，冬春到处闹事。我们的结论是这样：1957年算平常的一年，比1956年有所进步，与1958年一对照，显然劲头是不够的。（毛泽东：1958年的劲头，就是因为三中全会开始把3条恢复了，还发了指示，全国大搞水利，把右派搞掉了，腾出手来了。）4、5月到6月一段很被动。南宁会议以后，我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大鸣大放，郑重批判了右倾保守。正如主席所讲的，批判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是必要的。比如农业生产能不能跃进？工业能不能跃进？这些问题在党内思想也是不一致的。批判这些东西，是很有必要的。在我们看来，每前进一步都会产生新的保守思想，所以还要批判。要不断地批评我们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来促进我们事业的发展。这个指导思想很有必要，是主要的。另一方面也要防止一些主观主义、强迫命令。主流应该放在批判保守思想。

第三个问题，对农业机械化问题的一个看法。一个礼拜一个县就车子化了，群众性的工具改革。机械化首先化什么呢？从湖北看，第一是运输，用动力、畜力来代替肩头运输。其次是加工，用动力、机械来代替人力加工，如碾米、磨面。

第四个问题，关于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问题。（毛泽东：考虑提不提“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是不是要这样提？）我考虑可以不这样提，我们就是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又红又专。（毛泽东：“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群众的积极性就不决定了？我们把技术跟政治并提，又红又专，群众跟领导者、干部并提。这叫做走群众路线，又要民主，又要集中。）

关于文化革命，我想除了技术方面，就是提高文化水平便于提高技术外，同时恐怕有另一方面的意义，就是提高政治。列宁讲文化革命，他主要是讲政治的。他说，只有文化革命，人民文化水平提高了，官僚主义才能最后消灭。他说，官僚主义来源之一是文盲。（毛泽东：恐怕有那个道理，但是，比如一个大学里就没有官僚主义？）这是相对的。

第五个问题，关于整风、干群关系问题。这次主席提出，进城以后，咱们和群众的关系，是不是官和民的关系？在工厂里面，要求计划管理，要求有组织地、有节奏地组织生产（那个一长制也是从这里来的）。这一方面是有道理。可另一方面，把什么搞掉了呢？生产当中要不要发动群众、搞群众运动？那天刘仁同志也讲了，其他几个同志也讲了，似乎很多人主张就是要计划管理，不要群众运动，说群众运动妨碍计划。如果说打破平衡，创造先进，破坏得好，就应该破坏。还流行一种口号，叫做城市里面不适用农村作风、游击作风。还有说同吃、同住、同劳动也是农村作风。这回我又加了两同：同学习、同娱乐，五同。经过这次整风，把这个问题定下来了。在工厂里要发动群众，要三同。如何三同法是另一个问题。修房子书记在一所，部长在一所，处长



在一所，工厂干部宿舍跟工人宿舍分开，到底为了什么，谁也答不出来。这实际上是不自觉地脱离群众。中央从1956年2月就强调艰苦奋斗，打掉官气、转变作风实际上从去年冬季开始了，这是比较大规模的转变。我们叫干部作风大转变，群众思想觉悟大跃进。

在这里，我们有一个经验：主席常讲由农村来逼城市、压工业，有这么一个作用。（毛泽东：现在有没有这个作用？现在好象又有这个作用。）有，农村这样大搞水利，我们推广红安、麻城经验。去年1月开了一个党代会，一些县委书记一发言，城市干部听了就受感动了。武汉市的干部、大专学校请县委书记作报告，一听感到农村情况了不得了，他们就派人去参观。参观回来，落后分子也转变成先进分子了。群众自己发动自己。他们说，农村在那里大革命，我们城里还照例上班下班。所以，回来后城市就运动起来了。农村对城市有很大的推动。现在干群关系是一个突变，不是一个平常的普通变化，象主席讲的，生产关系相互关系方面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第六个问题，关于同农业生产有关的一个问题。我们向中央报告，争取5年完成10年的规划，就是粮食、棉花翻一番，油料加两番。在5年内消灭血吸虫，消灭四害，扫除文盲，都可以的。三年突击，两年扫尾。在这里，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主席讲的那个意思，有些事情，只有快才能办得成，慢办不成。咱们中国有句老话：“欲速则不达。”我看有些事情是欲慢则不达。比如苍蝇、老鼠这类东西，它有一个繁殖率，如果你打得慢，你赶不上它那个繁殖率，根本不能消灭。1956年一股风，不强调积累，不强调艰苦奋斗，

光强调改善生活，大吃大喝，铺张浪费，摆阔气；去年（1957年）提倡苦战3年，提倡艰苦奋斗，勤俭持家。现在就根本不关心人民生活，我找了一些农民座谈，一个感觉是累，劳动强度过高，白天也干，晚上总要加班，张汽灯，过年有些地方小放假，有些青年感觉吃了干，干了吃，吃了再干，毫无文化学习。这样“有什么意思呢？”也有的说“这跟劳改犯差不多！”有人讲：“今年肯定生产要增加，收入要增加，人口要减少！”（毛泽东：到议论甚多那个时候，恐怕又要来一个反冒进。）

### 3月20日的讲话

我讲四个问题：

一、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它的意义很大，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因为几亿农民在动手动脚，否定肩挑的反面一搞就节省劳动力几倍、十倍。以机械化代替肩挑，就会大大增加劳动效率，由此而进一步机械化。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完全机械化，总有些角落办不到，1000年，500年，100年，50年，总有些还是半机械化，如木船；有一部分手工业，过几万万年会有的，如吃饭，永世是手工业，它同机械化是对立的统一，只是性质不同，应当结合起来。

运动的特点是迅速有效，群众的积极性起来了，每天有新的创造，将来还会有各种新巧发明。现代化、机械化与改良农具是对立的统一，两者应同时进行，请各省市迅速推

进。群众性的创造是无穷无尽的，河南、河北已形成群众运动，是自下而上搞起来的。我们发现了好的东西，就要加以总结推广。江苏农民坐飞机到四川来，采访育秧法。

二、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两年可以做到，也不要登报，内部可以通报。像土改一样，开始不要登报，告一段落再登。大家抢先，会搞得天下大乱，实干就是了。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说河南第一，各省都要争个第一，那就不好。总有个第一，“状元三年一个，美人千载难逢”。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让河南当状元。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

如果在一年内实现四、五、八，消灭文盲，当然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我们做工作要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只要总路线正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几句话更通俗）。那么后1年、2年、3年至5年完成40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能算不荣誉，也许还更好一些。比，一年比4次，高级社合作化，逼得周小舟紧张得要命。四川的高级化，李井泉从容不迫，不慌不忙，到1957年才完成，情形并不坏。迟一年有何关系？也许更好些。一定要4年、5年才完成，那也不对，问题是看条件如何，群众觉悟提高没有？需要多少年，那是客观存在的事情。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还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的好？十年、八年搞个40条，那样慢一些，人人都不舒畅，那样搞社会主义也不会开除党籍。

苏联 40 年才搞得那么点粮食和东西，假如我们 18 年能比上 40 年当然好，也应当如此。因为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不同，比较生动活泼，列宁主义比较多。他们把列宁主义一部分丧失了，死气沉沉。列宁在革命时期的著作，骂人很凶，但是骂得好，同群众通气，把心交给群众。

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也不要公开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氧气未损失，卫星上天靠液氧）。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指标高，没有措施，那就不好。总之，要有具体措施，要务实。务虚也要，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好的，但没有措施不好。

三、各省、市、自治区两个月开一次会，检查总结一次。开几个人或十几个人的小型会。协作区也要 2、3 个月开一次会。运动变化很大，要互通情报。开会的目的，为了调整生产节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波一波的，这是快与慢的对立的统一。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下，波浪式的前进，这是缓与急的对立的统一，劳与逸的对立的统一。如果只有急和劳，则是片面性，专搞劳动强度，不休息，那怎么行呀？做事总要有缓有急（如武昌县委书记，不看农民情绪，腊月 29 还要修水库，民工跑了一半），也是苦战与休整的对立统一。从前打仗，两个战役之间必须有一个休整，补充和练兵。不可能一个接一个打，打仗也有节奏。中央苏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就是反休整，主张“勇猛果断，乘胜直追，直捣南昌”，那怎么行？苦战与休整的对立统一，这是规律，而且是互相转化

的。没有一种事情不是互相转化的，“急”转化为“缓”，“缓”转化为“急”；“劳”转化为“逸”，“逸”转化为“劳”；休整与苦战，也是如此。劳和逸、缓和急，也有同一性；休整与苦战也有同一性。睡眠与起床也是对立的统一，试问谁能担保起床以后不睡觉？反之，久卧者思起。睡眠转化为起床，起转化为睡觉，开会走向反面，转化为散会，只要一开会就包含着散会的因素，我们在成都不能开1万年会，王熙凤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这是真理。不可以因人废言，应以是否为真理而定。散会后，问题积起来了，又转化为开会。团结，搞一搞就有意见分歧，就转化为斗争。发生分歧，重新破裂，不可能天天团结，年年团结。讲团结，就有不团结，不团结是无条件的，讲团结时还有不团结，因此要做工作。老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不是马列主义。团结经过斗争，才能团结，党内、阶级、人民都一样；团结转化为斗争，再团结。不能光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矛盾。苏联就不讲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没有矛盾斗争，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老讲团结，就是“一潭死水”，就会冷冷清清。要打破旧的团结基础，经过斗争，在新的基础上团结。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党是这样，人民、阶级都是这样。团结、斗争、团结，这就有工作做了。生产转化为消费，消费转化为生产；生产就是为了消费，生产不仅为其他劳动者，而且自己也是消费者。不吃饭，一点气力没有，不能生产；吃了饭有了热量，他就可以多做工作。马克思说：生产就包含着消费。生产与消费，建设与破坏，都是对立的统一，是互相转化的。鞍钢生产是为了消费，准备几十

年更换设备。播种转化为收获，收获转化为播种；播种是消费种子、种子播下后，又走向反面，不叫种子，而是秧苗，收获；收获以后，又得到新的种子。

要举丰富的例子，搞几十、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春夏秋冬也是互相转化的，春夏的因素就包含在秋冬中。生与死是互相转化的，生转化为死，死物转化为生物。我主张 50 岁以上的人死了开庆祝会，因人是非死不可的，这是自然规律。粮食是一年生植物，年年生一次，死一次，而且死得多越生得多，猪要杀掉，越死越多；猪不杀掉，就越来越多了，谁喂呢？

《简明哲学词典》专门与我作对，它说生死论是形而上学，战争与和平转化是不对的（同尤金谈过）。究竟谁对？请问，生物不是由死物转化的，是何面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机物，以后才有有机物，有生命的物质都是氮、氢等 12 种元素变成的，生物总是死物转化的。

儿子转化为父亲，父亲转化为儿子，女子转化为男子，男子转化为女子，直接转化是不行的，但是结婚后生男生女，还不是转化吗？

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相互转化，就是资产阶级、地主与工人、农民的关系；当然，我们这个压迫者是对旧统治阶级讲的，这是阶级专政，而不是讲个人压迫者。

战争转化为和平，和平是战争的反面；没有打仗是和平，三八线一打是战争，一停战又是和平。军事是特殊形态下的政治，是政治的继续，政治也是一种战争。

总而言之，量变转化为质变，质变转化为量变，欧洲教

条主义浓厚，苏联有些缺点。事物总要转化的，因而我们总是乐观的。但搞不好，又会硬化的，将来如果我们工业搞成世界第一，苏美落在后面，就会翘尾巴，思想就会僵化起来。

古代的辩证法转化为中世纪的形而上学，中世纪的形而上学转化为近代的辩证法。有限变为无限、无限转化为有限。宇宙是无限的，无限宇宙是前进的，无生命转为有生命，有生命转为无生命，生生不息，永无休止。宇宙也是转化的，不是永恒的。

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要转化的，也是有始有终的……只是有量变没有质变，那就违背了辩证法。世界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发生、发展和消灭的。猴子变人，发生了人，整个人类最后是要消灭的，它会变成另一种东西，那时候地球也没有了。地球总是要毁灭的。太阳也要冷却的，太阳的热现在就比古代冷得多了。冰河时期，200万年变一次，冰河一来，生物就大批死亡。南极下面有很多煤炭。可见古代是热的。延长县发现有竹子的化石（宋朝人沈括说的，延长古代是生长竹子的，现在不行了）。

事物总是有始有终的。只有两个无限：时间、空间无限。无限是有限构成的，各种东西都是逐步发展、逐步变化的。

讲这些就是为了展开思想，把思想活泼一下，凡事推而广之，与干部谈谈；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要教育干部，中央、省、地、县4级干部很重要，包括各系统，有几十万人。总而言之，要多想，不要老看经典著作，经典著作可以

少看些。尧舜时代有无书读？书越来越多，书压死人。要开动脑筋，使思想活泼起来。

四、社会主义的建设路线，还在创造中，基本点已经有了。全国 6 亿人，全党 1200 万人，只有少数人，恐怕只有几百人，感觉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可能还有很多人将信将疑，或者是不自觉的。例如农民搞水利，不能说他对水利将信将疑，但他对于路线则是不自觉的。又如除四害，真正相信者，现在逐渐多起来了（谭震林到河南后才相信），我自己也将信将疑，碰到人就问：“消灭四害能否办到？”合作化也是如此，没有证明之事就要问。再有一部分人根本不信，可能有几千万人（地、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以及劳动人民内部和我们干部中的一部分）。现在已经使得少数人感觉到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对于我们来说，在理论上和若干工作的实践上（例如有相当的增产，工作有相当的成绩，多数人心情舒畅），承认这条路线是正确的。但是 40 条，十五年赶上英国，这是理论，四、五、八大部分尚未实现，全国工业化尚未实现，15 年赶上英国还是口号，156 项尚未全部建成。第二个五年计划搞 2000 万吨（钢），都来办工业，几万吨，在我脑筋中存在问题，是好，大好，中好，不甚好，或出乱子，还是天下大乱？我现在没有把握，所以要开会，一年四次，看到有问题就调节一下。看来出乱子也不会很大，无非乱一阵，还会走向“治”；出乱子包含着好的因素，乱子不怕。匈牙利建设工业出了些乱，现在又好

了。

路线已开始形成，但是实现后是一种什么状况，还没有证实。路线反映了群众斗争的创造，这是一种规律，领导机



关反映了这些创造，提出了几条。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许多事情是没有料到的。比如，1955年合作化高涨轰轰烈烈，没有料到斯大林问题，匈牙利事件，“反冒进”。明后年怎么样？又会出什么事，明年又反什么人？反什么主义？谁人能料到？具体的事是算不出来的。

现在人们的相互关系，决定于三大阶级的关系：

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残余分子，右派分子是它们的代理人，不革他们的命，就束缚生产力。右派占资产阶级分子中的1%或2%，其中大多数将来可能改变，转化过来，那是另外的问题。

第二个是民族资产阶级，是指右派以外的那些人，他们对我们的新中国是半心半意的，半心被迫向我们，半心要搞资本主义；经过整风，已经有了改变，可能三分天下有其二了（北京民主党派开自我改造誓师大会，全国都要开）。

第三个是右派，即劳动人民、工人、农民（其实是四个阶级，农民是另一个阶级）。

路线已经开始形成，但是尚待完备，尚待证实，不可说已经最后完成。工人向农民摆阔气，问农民有无手表？有些干部争名誉、地位，都是资产阶级思想，不是以普通劳动者见面。不把这些问题解决，不解决这些相互关系，就搞不好生产，不能很好进行劳动。过去我们在建设上用的心思太少，主要精力是搞革命。搞建设还只有7、8年，错误还是要犯的，不可能不犯，犯错误是正确路线形成的必要条件。正确路线是对错误路线而言的，二者是对立的统一。正确路线是在同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形成的。说错误都可以避免，世界上只有正确，没有错误，这种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

题是少犯点，犯得小点。正确与错误是对立的统一，难免论是正确的，可免论是不正确的。只有正确，没有错误，历史上没有这个事实，这就是否认对立统一这个规律，这是形而上学。只有男人没有女人，否定女人怎么办？争取错误犯得最少，这是可能的。错误多少，是高子和矮子的关系。少犯错误是可能的，应该办到，马克思、列宁就办到了。

## 会外活动

在南宁会议时，柯庆施是大受表扬的人物，但在成都会议似乎受到冷淡，他大概觉得这同没有交出一篇文章有关。于是这位柯老找到我，要我为他写一篇文章。他的主要意思是在工业和农业大跃进的同时，也要同时做到教育和文化的大跃进、大革命，但谈不出多少具体内容，印象深的记得他谈了一条：15年内，全国人人都成为大学生，到处都办起大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非常勉强写了1、2千字交了卷。结果，此文没有印发出来。后来田家英告诉我，柯对他说：李锐的文章没有写好。以后中央开会，他就必带张春桥了。八大二次会议时，柯庆施有一个文化革命的发言，大大描述了一个理想的文明社会。

成都会议时，大概在3月20日前后，毛泽东找我谈过一次话。成都城外金牛坝那个地方，已经盖了礼堂和开会的场所，还有多幢两层小楼，也有集体住的较大楼房，树木成荫，花草芬芳，边沿还保留了一片田地。只有毛的住所是一层，房间高而宽大，旁边还有室内游泳池。这是大跃进当

年，各省市相互仿效的建筑规模，连西宁也不例外（1980年经过西宁去龙羊峡工地时，我见到从未装过水的游泳池）。一走进房门，胡乔木在座，毛泽东就指着我对乔木说：这也是一个不知世事的人。对这句话，我当时摸不着头脑。叫我去，是让我汇报大组、小组开会的情况。

在汇报大家发言的要点和精神时，记得我特别讲到，刘少奇发言有这样的话：我们跟主席比，差一大截。毛泽东对此没有发表意见。随后我又不以为然地谈到柯庆施和陶铸的发言，其中有这样的话：对主席就是要迷信，对主席就是要盲目服从。这时毛泽东说道：他们是有所指的。

该谈的谈完了，起身送我们出来时，毛泽东显然兴致很好，又指着我对乔木说：他刚来，你们可不要欺负他呀！关于毛泽东身边为他服务的人事情况，田家英过去就同我谈过一些，我知道其中一些复杂的情况。对毛泽东性格的某些方面，也略知一二。这句话当时给我的感觉，似乎是自己将进到这个圈子中来了，这确实是我所不愿意的。

出门后，我就问乔木：不知世界，是怎么回事？乔木简单谈到，毛泽东对国务院的情况久有不满：那么多部，都干些什么；尽事务主义，抓不住主要矛盾。这大概是“大跃进”时期“以钢为纲”、“三个元帅，两个先行官”等等方针的最早由来。

会议期间，同我来往较多的是田家英。田告诉我，毛泽东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有查看地方志书的习惯，这次就借来全套《四川省志》，以及《华阳国志》、《蜀中名胜记》等，以及唐、宋各代有关四川的诗词等。田说，毛主席让会议印发了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以

及“附录”：《苏报究实录》（张篁溪）、《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合印成一本。之外，还要他选录一批有关四川的旧诗词，印出来发给大家看看，以帮助活跃思想。田要我帮忙一起选录。此事真花了点时间。除开李白、杜甫的名篇外，还选了其他一些比较流传的诗词。印发出来后，毛泽东似乎不甚满意，在讲话中提到，这都是一些古东西，不合时宜。

在成都时，毛泽东有几次外出游览，到过附近的工厂、农村，还去过都江堰。现在记忆中印象深的，是关于一种野草“打破碗花花”之事。3月17日上午大组讨论时，毛泽东将这种宽叶矮株的野草带到会场上，给大家观看，并作了介绍。16日下午，由地方同志陪同，毛来到郫县红光农业社，随意走到一户农家闲谈。在嘘寒问暖之后，谈起了“除四害”的问题。户主说：我们这里是“队七害”：“麻雀、老鼠、苍蝇、蚊子、跳蚤、臭虫、偷油婆（蟑螂）”。毛泽东还起身到碗柜里找偷油婆，没有找到，看见碗盏很清洁，放得整齐，于是对农家的卫生水平很是满意。在回来的田头路上，又谈“除七害”的事情，社干部特别介绍了用“打破碗花花”消灭蚊蝇的情况。这是一种野生的毒草，田坎上到处都生长的，它的花或浆汁放在粪坑里，能杀掉蛆虫和蚊子的幼虫孑孓。毛泽东于是问起，为什么叫“打破碗花花”？原来是大人怕孩子去摘这种有毒的花，有这样相传下来的说法：摘了这种花，就要打破碗，打破了碗，就吃不成饭了。“打破碗花花”因此得了名。毛听了后非常高兴，说这是群众的创造发明，应当推广。于是社干部就在田坎上随手拔了一株，送给了毛主席。

3月21日，毛泽东来到向往已久的都江堰。他曾经站在玉垒山腰，俯看岷江全景，这条由北向南，穿雪山，过草原，奔腾湍急，一泻千里的清澈江流，到了灌县，被都江堰所驯服。江岸上修建的二王庙，纪念李冰父子这一千古奇功；从此才有不怕水旱的丰饶的成都坝子，四川才有天府之国的美称。中午还在街上一家普通餐馆用餐，吃豆花和辣子回锅肉。玉垒山头现在建有一座亭子，纪念毛泽东这次愉快之行。

关于在街上馆子吃饭，似记得在成都还有过一次，是在楼上，被群众知道了，结果饭馆周围街道上挤得水泄不通。警卫人员好不容易开出一条小道，才走出层层人群。这样的事情，1958年在武昌蛇山脚下也发生过一次，随行人员的暖水瓶也挤破了。大概从此以后，由于警卫部门的干预，毛泽东就失去随意上街的 freedom 了。他对这种进城后的“失去自由”，是很不满意的。

写文章、讲话或谈话时，引用经典故事、成语诗词，这是毛泽东的多年习惯，常常是恰到好处，使人印象深刻，引发深思。延安七大时，讲愚公移山的故事，当年起过多么大的影响。3月22日讲话，讲到要提高风格，振作精神，要势如破竹，有高层建瓴的气概。“高层建瓴”，典出何处？“建瓴”是什么意思？可把大家难倒了。有次讲话中，还提到昆明大观楼的那幅有名的180字的长对联，背了几句。这都引起一种“主席真是博古通今，高不可攀”的感觉。

3月18日，陈伯达长篇发言时，毛泽东的插话很多谈到要同帝国主义争时间、争速度时，就讲到一定要干劲十足，发动群众轰轰烈烈地朝前进；而不要“冷冷清清，凄凄

惨惨”，走另外一条路线。说这首词的作者李清照，是个寡妇；“我们不要用寡妇面孔、寡妇心情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比喻我倒不以为然，记得同田家英谈过。李清照的太夫赵明诚是金石学家，夫妻非常恩爱，宋朝南渡后，赵病死。易安词分前后两期，前期写闺情思恋，明快妍丽；南渡后期，半壁河山沦陷，朝廷屈辱求全，加以太夫去世，因此词情凄黯，沉哀入骨。这首《声声慢》，18个叠字，同这种深沉感情分不开。下阕并非作者无病呻吟，而是个人生活凄楚与国家兴衰之感的结合，表现了作者傲世不屈的一种气质。仅仅以“寡妇心情”来形容易安居士这首千古绝唱，是很不公平的。

当时我同家英闲聊较多。关于“正确的个人迷信”，对柯庆施其人的“要迷信、盲从”的说法，我们都很不以为然。关于“不知世事”，我们也深有感触：国务院那么多“口”——经济、外事、文教、交通，几十上百个部门，什么都要过问，总理日理万机，哪里能像主席那样自由主动。谈到“主公”（田对毛的习惯称呼）不熟悉经济尤其是工业，家英当时极力想把我拉进中南海，不作什么“兼职秘书”，因为他们对工业也很不熟悉，想这方面多一个帮手。我立即作了坚决的表态，我对水电事业有极高的热情，决不愿再坐而论道。我的这个意念，家英倒是清楚的。

陈云没有参加南宁会议，会议的一些情况细节和紧张气氛，毛泽东那样严厉地批评了“反冒进”，他是间接知道的。“当时，大家心里在纳闷，这到底是批评谁？少奇同志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1月17日晚上，毛主席约富春、先念同志和我谈话，明确讲到批评主要是对

陈云同志的。”<sup>①</sup>会议期间，我同周太和（陈云的秘书，延安时的老熟人）说过，我要去看望陈云同志的。可是我终于没有去，并不是不想去，而是有一种顾虑，去了后怎么谈法呢？当时有一位我很熟的中央领导同志，着意同我谈过几句有关陈的闲话，其中有一句很重的话：“陈是四中全会后上来的。”过去高岗也同我谈过这样的话，在延安时毛泽东对高说：“陈云是树叶子掉下来怕打脑壳的。”在延安时，我在马列学院旁听过陈云讲党建课；在中央青委时，参加过中央组织部陈云主持的唯物史观读书班；接管沈阳的半年多，我当过陈云的政治秘书；转业到水电岗位，在工作中更得到过陈云的直接支持。我对陈云一直是非常敬重的，并不同意那种“树叶子掉下来怕打脑壳”的说法。陈云是一个能坚持自己意见的人，当然也照顾大局。“反冒进”之事我知道一些。1956年，粮食比头年减少200多亿斤，一年增加职工200万人（市场多卖粮110亿斤），基建投资多了15亿，财政赤字达30亿（占财政支出的十分之一）。陈云历来对粮食抓得最紧，基建项目他是一个一个亲自审查的；历来主张物资、财政、信贷三大平衡。因此他认为一九五六年还不是小冒，而是冒得比较多了点，必须采取措施，反对冒进，使整个经济稳步发展。陈云在八大有关经济工作的发言，尤其承认多种经济形式的存在，得到上上下下的支持。我知道他当时的忧虑心情，对毛泽东倡导的“大跃进”、“总路线”，一定存有疑虑，我当时也有这种心情。我可以同田家英议论“主公”，见了陈，我是讲真心话还是讲假心话呢？我虑及如何谈去，

<sup>①</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56年版，第639页。

相互间深浅都不当，所以犹豫再三，还是没有去。开完会，我们同乘一架飞机回北京，周太和还问我，为什么没有到陈那里去。

3月21日，陈云在大组会上作了较长的发言，检讨了反冒进中的“错误”。毛泽东随后讲到，反冒进的问题不要再谈了，不要再作检讨了。可是八大二次会议上，陈还是再次作了书面检讨。

开国之初，3年经济恢复时期，由陈云主持财经工作，重大决策是陈作出的，曾得毛泽东的称赞，认为在延安时期没有看出陈这方面的才能，一直到“大跃进”之前，都是陈云主管经济工作。“大跃进”期间，他虽然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实际上只是一个基建委员会主任的名义了。

陈伯达同意并受命创办理论刊物后，由他主持召开过一次会，到的人有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等（不到十人），我也参加了。确定要组织个编辑班子。开初拟定的召集人名单中似有我，我表示自己业务甚忙，后来也就没有列我的名字了。回北京后，我再没参加过《红旗》的会议，只是应约写过稿。

## 陈云等检讨反冒进中的错误

在整个会议期间，陈云较少发言。3月14日上午讨论工业下放问题时，他表了个态。我的记录本上记了这么几句：如果重工业多数下放，一个省恐吃不消。重工业牵涉面广，是多管，还是少管？小的工业可以归地方。省如果要，



也可以下放，出点毛病也不要紧。钢超产部分，可以分成。但实际会有困难。大的少分，小的多分，大家分一点。

3月17日下午讨论地方工业时，他谈到乡社一级，问题不大。县一级日用品或与大城市有冲突；机械工业规模多大，值得研究，应当多搞修配和改良农具之类，旧机器设备，军工系统可以调出很多，支援地方。矛盾焦点在百货，津、沪等大城市同省城等中等城市，自由竞争会有冲突，大城市发展高级产品。至于钢铁、煤炭、纱布、糖等，仍需由中央平衡。决定关键还在原料与市场需要，经济核算，也要照顾穷省。3月18日晚上大组讨论商业体制问题。陈云说商业问题复杂，同5亿农民和每个人都有关系。物价水平决定生活水平。主要是价格问题，商业部还是要管分配与定价，这方面地方同中央争执较多。农产品价格，要全国公议，每年两次；工业品分配，还是要由商业部统一。地方都要有物价机构，物价可以下放，但主要物价要议。

直到3月21日，陈云才在大组会上作了较长的发言，检讨反冒进中的错误。他说：八届二中全会反冒进，有我的意见，应负主要责任。当时考虑财贸问题多；对合作社、水利，没有怀疑，认为凡个体农民办不到的事，都可以办；关于打井，听到些议论，也没有异议，但是农业其他方面怀疑较多，如种子问题，推广双季稻的速度，定产计划偏高，双轮双铧犁推广，等等

反冒进错误的影响，主要在基本建设、财政投资太大这方面。这是没有分清生产运动高潮中，出现缺点，总是难免的。右倾保守思想，与这样两方面认识有关：

一是没有区别财政赤字，一种是战争时期，一种是和平

时期。对 1955 年出现的财政赤字，过于恐慌，战争时期的特点带被迫性，仗非打不可，经常有赤字，影响到长期物价波动。抗美援朝在国外打，国内秩序正常，做到勉强无赤字，还是日夜担心。从 1944 年 3 月起，做财经工作 14 年（其间只在东北时有一年没管），战争环境，脑子中装的是物价波动与财政赤字，影响很深。和平建设时期也可能出现赤字。1953 年、1956 年两次赤字，为偶然现象，并非不可避免，乃疏忽所致，当时未觉得是赤字预算，曾认为预算可以平衡。和平时期的赤字，也会相应影响物价，情况同战时相似。但可以迅速消灭，手段很多，如节约、增产、挖库存等办法，第二年就可解决，这种偶然赤字，不比战时之可怕。这一点，当时未加区别，导致当时过分恐慌。今后还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看清可以改变过来。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人民生活极为紧张，这对我们也有影响。1935 年时，他们百货奇缺，推测有不小赤字，以发行货币手段来弥补，于是购买力与物资不平衡。苏联是否可以避免这种现象，难以评论。苏联建设过程中这种赤字现象，对我们有影响，总想极力避免。因此常常说道：为维持物价稳定，宁可建设速度慢一些。这就在多与少、快与慢、积极与消极等方面，同主席多快好省的方针有区别。

二是向主席、政治局反映情况少了。少下毛毛雨，一来就倾盆大雨。多次有过这种批评，没有坚决改过来。这实质上是封锁了消息。1955 年冬，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委会，财经各部工作展开讨论，觉得一两个人反映情况有困难，应向主席和中央常委反映全面情况，可是随即又陷于搞文件去了。没能做到及时反映。今后要规定几条：

——财经各部有关负责人，如王鹤寿、彭涛等，分头向主席汇报请示，只有这样才能将问题讲清楚。

——财经有关文件都经过书记处。富春、先念都参加书记处工作的。

——决定写短报告，文字要简短明了。但口头报告比文字更重要。

——办《零讯》，由薛暮桥主编。登一点有争议的东西，内部可以争论，不要“怕外传”，不登不活跃。可以稍稍登得广一些。

——政治局可开座谈会，随便一点，各部轮流作书面、口头报告。大家相互提问题，出席可以自由一些，到两个人也开讲。

——中央财经小组的同志，常参加协作区会议，也可召集协作区区长所在省、市的计委主任（或财委主任）开会。现在北京开会上百人，很难讨论问题。人少可以谈得深一些。一年开两三次，各地轮流开。财经工作是协作区的主要问题。做财经工作的同志应注意政治，思想不要太窄。

3月20日前后，刘少奇在发言中，特别谈到同主席的差距。他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到底应当多快呢？现在还难以预料。从当前来看，右倾保守还是主要的。

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不论从思想、观点、作用、方法哪一方面，我们都比他差一大截。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向他学习，应当说是可以学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不是高不可攀的。当然，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那样强。这一切不是谁都可以学到的。

3月19日，周恩来谈国际形势和外交问题时，关于反冒进问题，又附带讲了几句：反冒进的发生，自己属于经验主义，在方针上有所动摇，不懂得建设可以走多好快省的新路线。这个部方针掌握不稳。

### 3月22日的讲话

无事不登三宝殿，想到一点问题交换意见。

《西厢记》中，有一段张生和惠明的故事。孙飞虎围着普救寺，张生要送信请他的朋友白马将军来解围。无人送信，开群众会议，惠明挺身将信送去。这是描写惠明见义勇为，坚决勇敢，是坚定之人。希望中国要多出点惠明才好。自己当张生，也不要老当下去。要在县委委员以上几十万人中搅动一下，发动一下大鸣、大放、大字报，指名道姓批评领导。这是一种无产阶级的气氛，共产主义的气氛。群众骂你一顿出口气，并没砍你的头，撤你的职。这是蓬勃的战斗情绪，又是很高的共产主义风格。现在群众斗争的风格很高，我们同志之间也要提倡这种风格。

陈伯达写给我一封信，他原来死也不想办刊物，现在转了180度，同意今年就办，这很好。我们党从前有《向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的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倡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上说话，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也可以说太阳、

银河的话。

各省都有角色。地方工作同志总是要到中央来的，代替中央同志的；中央工作的人，总有一天非死即倒的。赫鲁晓夫是从地方上来的。地方比较接近群众，阶级斗争比较尖锐，更接近自然斗争，这是地方同志比较中央同志有利的条件，中央的人比较老大。周天子时代，秦称王最后，在韩、赵、魏之后，但是称帝最先。

要提高风格，讲真心话，振作精神，要有势如破竹（破几节之后，迎刃而解）、高屋建筑的气概。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抓住工作中的基本矛盾，同时还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但我们的同志并不想势如破竹，反而精神不振，这很不好，是奴隶状态的表现，像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要尊重马恩列斯，但不可迷信，当作神明，不敢触动。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要用点思想，不能抄书照搬。在这方面，斯大林比较好一点。《联共党史》结束语6条第1条说：“马克思主义个别是原理不合理的，可以改变。如一国不能胜利<sup>①</sup>。”中国的儒家对孔子就是迷信，不敢称孔丘。唐朝李贺就不是这样，对汉武帝直称其名，曰刘彻、刘郎，称魏夫人为魏娘，哪一个人都不在话下。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压住了，不敢跳出框子想问题。学习马列主义，没有势如破竹的风格，那么危险。斯大林后期有这点风格，也可称势如破竹，只是破得不好，有些破烂了。他写的列宁主义基础、语言学、经济学，有很多正确部分，但也有错误，有些问题值得

<sup>①</sup> 指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内首先取得胜利

研究。例如，国有制价值法则的计算根据？值所得研究，哥穆尔卡认为不对。在社会主义阶段中，各尽所能，各取所值，薪水分高低，就带资产阶级色彩。价值法则的作用如何？是否拿劳动准备时间消耗多少，来定工资的高低？读书多就要补偿多？在社会主义中，个人私有财产还存在，小集团还存在，家庭还存在。家庭是原始共产主义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康有为的《大同书》即看到此点。家庭在历史上是个生产单位、消费单位、生下一代劳动力的单位、教育儿童的单位，有几种职能。现在工人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合作社中的农民也大都变了，农民家庭一般为非生产单位，只剩部分副业。至于机关、部队人员的家庭，更是什么东西也不生产，变成消费单位、生育劳动后备并抚育成人的单位。教育也主要靠托儿所和学校。总之，将来家庭可能变成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东西。现在的分配制度是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按劳付酬，家庭还有用。到共产主义时，分配关系变为各取所需，各种观念形态都要变。也许几千年，至少几百年之后，家庭将要消灭。我们许多同志对于这许多问题不敢去设想，思想狭窄得很。这些问题经典著作上已经讲过，如阶级、党的消灭等，这说明马恩列风格高，我们很低。

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我也有一点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很少，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教授，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源于奴隶制度“谢主龙恩”的残余。我看此事再不能容忍了，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们一顿，而是接近他们，教育他们，

交朋友。他们自然科学可能多学一点，但社会科学就不见得。他们读马列主义比我们多，但读不进去，懂不了。如吴景超、雷海宗读了很多书，一有机会就反马克思主义。

不要“自惭形秽”。伯恩斯坦、考茨基，后期的普列汉诺夫，马列主义比我们读得多，也比斯大林读得多，但他们并不行，读得多有什么用？把第二国际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仆从。现在情况已有转变，标志是陈伯达同志的一篇演说<sup>①</sup>，一封信<sup>②</sup>，一个通知<sup>③</sup>，有破竹之势。他的思想曾萎靡不振，勤恳工作好，但统治宇宙胆子小了。有许多同志在资产阶级面前精神不振，没有设想消灭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算什么？要灭掉你的。几次运动，思想战线上的斗争，相当多的人无动于衷。批判胡适、梁漱溟、《武训传》、《红楼梦》、丁玲、胡风等。本来，消灭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基本观点，在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中已经有了。在过去民主革命时期，就经常讲革命分两个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前者为后者的准备。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但许多同志对于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革命，土地改革后搞什么，都不去想。对社会主义萌芽熟视无睹。实际上，社会主义萌芽早已诞生。比如在瑞金，在抗日根据地，就产生了社会主义萌芽，农村互助组。

陈独秀是主张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让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然后壮大无产阶级，再搞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激进派。但是，经过

---

① 指陈伯达关于厚今薄古的演说。  
② 指陈伯达给毛主席的一封信。  
③ 即当时准备下达的一个通知。

30多年，还有这样的人。如丁玲、冯雪峰。再如邓子恢，完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那一套，找他的朋友，企图分裂政治局，达到他的目的；无非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搞“四大自由”，讲农民怕冒尖。他就是跟我尖锐对立。河南的富裕中农装穷，有好东西不让干部看，无人时，才向货郎担买布。我看这是好事，这表示贫下中农威力很大，使得富裕中农不敢冒尖，使冒尖即怕贫农。这说明社会主义大有希望。但邓小恢认为不得了，要解除怕冒尖的恐惧，即人出布告，搞“四大自由”。既不请示，也不商量，这明明是跟二中全会方针作对，要各走各的路，他没有搞社会主义的精神准备。现在被说服了，积极了。

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孔夫子23岁开始讲学，学问是慢慢学来的。耶稣年纪不大，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19岁创佛教。孙中山青年时有什么学问？他的学问也是后来学来的。马克思在开始著书时，只有二十几岁，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30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了。那时，马克思所批判的都是一些当时的资产阶级博学家，如李嘉图、亚当·斯密、黑格尔等。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充满民主革命精神，以反满为目的。康有为也是如此。刘师培成名时还不过20岁，死时才三十几岁。王弼注《老子》的时候，不过十七八岁，因用脑过度早死，死时才二十几岁。颜渊（二等圣人）死时才32岁。李世民起义时，只有18岁，当了总司令，24岁登基当了皇帝。秦叔宝也是年轻的。岳飞建立岳家军只二十几岁，死时才38岁。年纪不甚大，学问不甚多，问题是看你方向



对不对。年轻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梁启超年轻时也是所向披靡，大经济学家比不过。而我们在教授面前就那么无力，怕比学问。办刊物，只要方向不错，就对了。雷海宗读了马列主义，不如我们，因为我们是真相信马列主义，他越读得多还当右派。

现在我们要办刊物，要压倒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只要读十几本书，就可以把他们打倒。刊物搞起来，就逼着我们去读经典著作，想问题，而且要动手去写。这就可以提高思想。现在一大堆事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不办刊物，大家就不想，不写，也不会去看书了。

各省办一个刊物，成为一种力量，一个对立面，并且担任向中央刊物发稿的任务，每省一年6篇就够了。总之，10篇以下，由你们去组织，这样会出英雄豪杰的。

自古以来，创新学派、新教派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的。马丁·路德创新教，达尔文出来后，多少人反对！发明安眠药的，既不是医生，更不是有名的医生，而是一个司药；开始，法国人不相信，但德国人欢迎，从此才有安眠药。据说盘尼西林是一个染坊洗衣服的发明的。美国富兰克林发明了电，他是卖报的孩子，后来成了传记作家、政治家、科学家。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当然学校也可以学到东西，不是要把学校都关了，而是说不一定在学校。问题是你方向对不对，去不去抓。学问是抓来。从来创立学派青年，一抓到真理，就藐视古董，有所发明。于是博学家就来压迫。历史难道不是如此吗？我们开头搞革命还不是一些娃娃，20多岁，而那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段

琪瑞、谭延闿、赵恒惕都是老气横秋的。讲学问，他们多；讲真理，我们多。

我很高兴，最近群众首创的大字报，很有气魄，批评得尖锐、生动，把暮气、庸俗空气一扫而光。我们老是粉底朝靴，四平八稳走方步；“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不讲真的话，不敢暴露自己的缺点，不敢批评别人的看法，就是说，也是吞吞吐吐，毫不尖锐。恩来在1956年二中全会中的报告敢说心里话，这一点可取，虽然是错的。

王鹤寿第二篇文章好，敢于批评教条主义。彭涛的也好，有说服力，尖锐性差一点。无非是“打击别人，提高自己”，但不是个人主义的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为了打击错误思想，提高正确思想，是完全必要的；当然，打击错误中，也包含自己的错误。滕代远那一篇也好，但说服力不够，修那么多铁路，要说出理由来，不然就把别人吓倒了。<sup>①</sup>张奚若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无产阶级就是这样嘛！任何一个阶级都是好大喜功的。不“好大喜功”，难道“好小喜过”？禹王惜寸阴，我们爱每分一钟。孔子“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孔子“席不暇暖”，墨子“突不得黔”。这就是急功近利。我们就是这个章程，搞水利上、整风、反右派，6亿人搞大运动，不都是好大喜功吗？我们搞平均先进定额，不是急功近利吗？不鄙视旧制度，反动的生产关系，我们干什么？我们不迷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们还干什么？

我们这些人错误是有的，主观主义也是有的，但是“好

<sup>①</sup> 所指3篇文章，都是会在印发的，谈冶金、化工、铁道3个部如何大跃进。

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是正确的，这就是我们的章程。天津、南京两个党员写的信，虽然是反对我的，但精神可取，我看是好的。天津的更好，南京的萎靡不振，骨气不硬。陈其通等四人，……敢于说话的精神是可取的。当面不说，背后唧唧咕咕，这最不好。应该大体一致，至少要基本一致，说话可以尖锐一点，也可以委婉一点，但不能不说。有时要尖锐鲜明，横竖是从团结帮助的态度出发，尖锐的批评不会使党分裂，只会使党团结。有知不说，就很危险。当然，说话要选择时机，不讲策略也不行。例如明朝的大三案，反魏忠贤的（东林党人）那样不讲策略，自己被消灭，犯了圣怒，当朝杖打屁股。一个四川人杨慎，即因得罪皇帝，被充军到云南。历史上讲真话的，如比干、屈原、朱云、贾谊等这些人，都是不得志的，为原则而斗争的。不敢讲真话，无非是“一怕扣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我看只要这样的准备好几条，看破红尘，就什么都不怕了。没有精神准备，当然不敢讲话。难道为此就可以封住我们的嘴巴吗？我们要造成一种环境，使人家敢于说话，交出心来。马林可夫在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说：“要造成一种环境”，这对群众来说是对的。先进分子应该不怕这一套，要有王熙凤的“舍得一身刚，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

我们跟苏联同志有些原则上的争论，如王明问题，不许革命，怀疑是假革命，不订条约，派“监军”（特务）来，大国主义，波兰问题，斯大林问题，和平过渡，等等，采取当面谈，不同意见都不登报，我看这是对的。不应该采取登报的办法，不能像波兰、南斯拉夫那样。至于一些小事，也

可以不讲。公开这些分歧，没有好处，不但敌人说我们中间有裂痕，而且人民也一时不了解。这些我们当面都讲了，在六十四国党的会议上也讲了。过去名曰兄弟党，实际上是父子党，猫鼠关系。我们同苏共谈了，对斯大林我们是有意见的，具体意见我们没有说。

我们应当领导群众，现在群众比我们先进，他们敢于贴大字报批评我们。当然同储安平不同……。现在是同志之间的批评，完全正确。我们有些同志的作风不好，有些话不敢讲，只说三分话。这是一怕不好混，二怕丢选票；这是庸俗作风，要改变，现在已有可能改变。

1956年吹掉3个东西——好快好省，促进派、40条。有3种人，3种心理状态：一种是痛心的；一种是漠不关心的；再一种是吹掉高兴，一块石头落地，从些天下太平。这三种态度的人，两头小中间大。1956年有许多问题，都有这3种态度。反日、反蒋、土改是比较一致的，但在搞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问题上，就不同了。有3种态度。这种估计是不是对？

这次会议解决了一批问题，取得协议，为政治局准备了文件。但缺点是思想谈得较少，是否用2、3天的时间谈谈思想问题，谈谈心里话？

同志们说这次会议是整风会议，可又不谈思想。实践诺言，和风细雨，把心里话讲出来；一不搞斗争，二不划右派。要人们敢说，精神振作，势如破竹，像马克思、鲁迅那样，敢说。把顾虑解除，把空气冲破一下，搞出一种新气氛。邹容18、19岁写了一篇《革命军》，直接骂皇帝。章太炎写文章驳康有为，也是精神百倍。年纪越大，用处越不

多，但也不要妄自菲薄，要有用处就要鼓点劲。当然，年纪大的也还要，也要掌舵。三国时刘备不好，还是老头子挂帅。要冲破党的沉闷气氛。

印了一些诗，尽是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任，回去以后搜集点民歌。各阶层的人，青年，小孩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点试办，每人发3、5张纸，写写民歌，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10天搜集。这样，会收到大批旧民歌，下次会印一本出来。

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两者结婚产生出第3个新东西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就不能写诗了。现在的新诗不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100块大洋。搜集民歌的工作，北京大学做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以几百万成千万首的民歌，这不费很多的劳力，比看杜甫、李白的诗舒服一些。

## 受表扬的冶金部与河南省

毛泽东3月22日讲话中，表扬了王鹤寿的第二篇文章，敢于批评教条主义。这些文章是会议期间先后印发的。

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的第一篇文章，题为《争取有色金属产量的飞跃，占领有色金属的全部领域》。文章谈到当时各国钢铁工业的竞赛，实质上为有色金属或更准确说是稀有金属的竞赛。我国机械工业和国防工业一开始发展，就向冶金部提出了几乎全部有色和稀有金属的要求。经过第2个

5年计划，将有9个省、区成为“有色金属省”。有色金属工业飞跃的保证在“今后不是一个冶金工业部，而是加上20多人省市区共同进行有色金属工业的建设。”

当年大家关注的中心还是钢铁上不上得去。第二篇文章《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设想更快一些》，署的日期是1958年3月20日。文章开篇即说道：我们可以设想冶金工业（以及整个工业）发展的速度更快一些。例如10年赶上英国，20年或稍长一点时间赶上美国。随即谈到我们想有两个先决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如何使经济部门的干部专而红；如何正确地对待苏联经验，冲破我们自己的教条主义束缚，取得自由。就冶金部系统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情况来看，大致为三类：一类是既钻业务有又政治；一类是钻了业务忽视了政治，但又不甘于政治落后，要求政治的进步；一类是只钻业务技术，而不自感政治落后。这三种类型是两头小，中间大。多数是要求技术进步，但还没有解决业务政治的统一问题。以规模为250万吨的龙烟选矿厂为例，单纯技术观点去建设，投资要4600万元；但以勤俭建国的观点，则只需2200万元。大中小结合的建设方针是一种政治；反对建设中小厂，又是一种政治。

三反五反，镇反，三大改造，整风，反右派，大鸣大放，双反，这些政治运动，究竟是妨碍了生产建设，还是促进了生产建设？只钻技术业务的干部，认为政治是政治、生产是生产，企业里搞政治运动太多了，会妨碍生产。实际情况相反，几十万张大字报一出，不仅马上出现了增产50万吨钢、45万吨生铁的事实，而且马上就不断地出现技术经济定额提高的事实。又如工资福利问题，是多年来企业领导

苦恼的事，即使每年用大量资金，职工仍然不满，但是一经发动群众，一出大字报，经过讨论和辩论，很多问题就解决了。

文章着重谈到苏联的经验教训。苏联经验中的某些方面，如一长制，不走群众路线等，实际上影响着干部专而不红这一倾向的滋长。教条主义地搬用苏联经验，还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苏联的工业化没有能够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它主要依靠国家的中央工业部门，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中央和地方地关系。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我们采取大中小相结合的建设方针，苏联没有这种明确的方针，相反，它的建设经验给我们另一种影响，即只有现代化的大厂才是合理的。再加上一套繁锁的平衡方法，实际上就把积极的平衡变成消极的平衡。苏联在工业管理方面的理论是一长制，其结果只能是命令主义，引导干部只专不红，脱离党的领导和群众的监督。苏联也有先进生产运动，对群众的鼓励，主要靠物质奖励。苏联建设的思想理论，反映到工业管理方面的，还有一大套繁琐的规章制度。如一个比较小的钢铁厂，一年需要填的报表，即有 680 种，合起来共填 13 万张，即每种平均要填 3600 张。

文章最后谈到钢铁的跃进计划：以前我们各主席和中央的报告，说明在第 2 个五年计划中，钢的水平可以达到 1500 万吨（超过八大指标的 1050 ~ 1200 万吨），最近部党组织根据主席的指示，又研究了钢铁工业的建设情况，我们认为钢铁工业苦战 3 年，10 年赶上或超过英国是可能的，即争取 1962 年达到 2000 万吨左右。1967 年达到 4000 万吨左右；20 年或多一点时间赶上或超过美国，即争取 1972 年达到 7000

万吨，1977年超过1亿吨以上。我国的钢铁工业每年都有很大积累，每一个五年投资约55亿元，积累（利润和税收）则达82亿元。

化学工业部部长澎湃的文章印发日期是3月4日，题为《争取我国化学工业的主要产品产量分别在5年、7年或10年左右赶上和超过英国》。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全国建设几千个化肥厂，如主席所说的是那样星罗棋布，满天星斗。文中谈到，多建小型氮肥厂是迅速提高化肥产量的捷径。按照南宁会议上主席提出，中央、省、专区三级都可以设立化学肥料厂的意见，化工部立即着手研究了小型氮肥厂的标准设计问题，并且提出了小型氮肥厂的两项设计方案。

每一种，每年生产碳酸氢铵4.2~4.5万吨，相当于合成铵1万吨。建设投资包括自备电源在内，约1400~1500万元；如有电网供电，只需1000万元。

第二种，每年生产碳酸氢铵8000吨，相当于合成铵2000吨；建设投按上述计算，为350~380万吨，或250万元。

过去许多人认为，1962年全国化肥产量要过到700万吨也是困难重重，很没有把握，现在化工部已经把指标提高到1000万吨，而且认为搞得好的话，还可以超过这个数字。

小化肥厂的发展，后来也经过曲折的道路；但不比大炼钢铁时的小上群，当年这条经验基本上还是成功的。

铁道部长滕代远的文章日期为3月20日。文中主要提出一个“十五铁路新线网发展规划”的草案。即要求今后15年内共修建8万公里新线（二五2万公里，三五、四五各3万公里，其中干线占四分之三）。到1972年，全国铁路总



长将达到 11 万公里，从现在世界第 11 位跃到第 3 位，即仅次于美国和苏联；以铁路与土地面积相比较，铁路密度可以接近印度。这一水平同我国地广人多的情况可以大体适应。

毛泽东在讲话中大加称赞的，还有河南省的全面跃进形势。《河南省委吴芝圃同志在电话上谈的几点意见》是 3 月 18 日印发的。《意见》开篇即说：“河南省麦收前，可以做到水利化”，“打算 2 年实现水利机械化，五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然后列了一个从铁、钢到木材、水泥各缺多少千吨、万吨，以及从交流发电机到拖拉机各缺多少千台、万台的长单了。

上面说的这些物资，希望中央能够给我们就好。我们正在积极想办法，解决问题，我们的办法是发动群众。比如，我们正在试用土法制水泥，已经试制成功，质量还好。铁的问题，也是尽量发动群众，用土办法搞。预计到明年，水泥可以做到自给，铁也能搞出不少。

在过去冬今春兴修水利和积肥运动中，群众发明创造的新式工具有 1100 多种。

全省已经有十几个县普及了高小和初中的教育，有 20 个县扫除了文盲。所谓劳动和教育结合，就是边生产、边教书，边生产、边读书，教学质量很好。一般地说，比官办学校的教学质量好，教师很负责，学生很用功。如何扫除文盲？办法是，千人教，万人学。包教包学，教学与生产结合。造成识字的环境，造成学文化的空气。这样，只要 50 天到 80 天的时间，就可以在一个合作社里扫除文盲。采取这样的办法扫除文盲，效果很显著，做到了多快好省。

除四害，不能慢，只能快；不能拖拉，只能突击。办法

是，下定决心，全民动员，统一行动，分片包干，封闭食物，撒下天罗地网，连续打死灭战，一鼓作气，坚持到底。

在这样的新形势下，领导必须做到，既抓住了重点，又照顾了全面。这就是说，要有适应新形势的领导方法。《六十条》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很兴奋我们的任务是要把《六十条》具体化，将它变为得动。只有的人看不清这种形势不相信全面跃进，全面高潮，中心和全面都没有抓住，工作进展很慢

电话最后谈到：只要不遇特大灾害，今年全省粮产量可以比去年增加 50~100%。实现四、五、八，就是今年或者明年的事情，而不是很远的事情。

同吴芝圃的报告可以媲美的，是《陈正人关于河北徐水工作经验的报告》，这是 3 月 14 日印发的。报告中说，徐水县从去冬 11 月 1 日，苦战 3 个月，已经实现了农田水利化，全县境内 3 条河流的洪涝灾害，基本得到根治。全县 86 万亩耕地，除极少数外，都有了一套两套或三套灌溉设施，他们叫做“水利保险”和“三保险”，他们的口号是：“无雨保丰收，大雨不成灾。”目前正在去年平均亩产量 216 斤的基础上，为今年实现平均亩产粮食 500 斤而奋斗。徐水县的胜利证明了，争取在 3 年内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是完全可能的。

报告接着谈水利的成绩和经验：在去冬水利高潮中，他们依靠全县 13 万劳动大军（全县 36 万多人，这 13 万是主要劳力），按照山区、平原、洼地一齐搞，防洪、防涝、防旱结合搞的原则，在瀑河、漕河、萍河两岸和上下游，修建了葡萄串式的平原防洪中型水库 11 座，满天星式的平原防

涝小型水库 160 多座，这些工程可以蓄水 1.4 亿多立米；还修建了坑塘 1300 多处，能蓄水 5000 多万立米。以上合计能蓄水 1.9 亿多立米。徐水用开挖大小渠道的办法，把各种水利工程联结成一个系统，全县的河流和大中小工程交织成为一个完整的水利网，做到河河相通，库库相连，并使地上水和地下水在使用上互相支援。徐水的经验，一再证明小型工程是水利建设的基础；小型工程量多、面广、易于普遍推广，收效也快。他们把跟兴修水利有关的工作分成 11 条战线，即瀑河大水库、平原防洪涝水库、打砖井、打机井，挖自然泉、山区水土保持、除四害、养猪、积肥、物资供应、经费措施等，各为一条战线。

徐水大部分水利工程都是在去冬冰天雪地的严寒季节里完成的。但是群众的干劲冲天，越干越大，不分昼夜，坚持苦战，忘记了严寒。群众说：“现在要季节跟改革走”，“只要思想不冻，地就不冻”。有一个乡，由 480 名妇女 3 天 3 夜修成一座蓄水 13000 立方米的“妇女水库”；700 多名学生和 40 多名教员，只花了 1 天时间，修成了蓄水 15000 立方米的“红领巾水库”；“夫妻窖”、“姐妹窖”、“父子窖”、“母女窖”到处出现。群众情绪之高，空前未有。甚至过去闹退社的富裕中农也说：“以后再不闹退社了，只求修水利当个模范。”他们很注意批判错误，纠正消极思想。县水利科长就是一个对水利高潮采取反对态度的人，他们及时地展开了批判，后来发现，此人原来是一个右派，经过揭发后，有力地推动了水利高潮。

报告做了这样的结论：徐水全县面积约 760 平方公里，36 万多人，人均 2 亩多耕地，属平原地区，只有十分之一

的山区，有 30 多万亩低洼地。他们的经验证明，像这样条件的县，只要一两个冬春就可以改变农业的自然面貌。

徐水的经验，还没有在会议上大加表扬。徐水的大出风头，作为全国共产主义的试点县，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到徐水视察，是 1918 年 8 月后的事。但是，这种“大跃进”的幻灭，试点的迅速破产，在全国也是最早的。

## 会议通过文件

根据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提出的 25 个问题，几次小组会分别讨论并通过了 25 份文件，其中主要有以下 26 份，按照内容归纳如下：

1. 《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帐的意见》。
2. 《关于铁路规划问题的意见》。
3. 《关于工业产值计算问题的意见》。
4. 《关于改革工商税收制度和改变工业品出厂作价办问题的意见》。
5. 《关于彭涛同志报告的指示》。
6. 《关于王鹤寿同志两个报告的批示》。
7. 《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
8. 《关于工业企业下放的几项规定》。
9. 《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
10. 《关于在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进并举的方针下，关有半协作和平衡的几项规定》。

11. 《关于改进物资分配体制问题的意见》。
12. 《关于调剂和补充职工问题的意见》。
13. 《关于工会组织问题的意见》。
14. 《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合并为大社的意见》。
15. 《关于发展农旱农场的意见》。
16. 《关于合作社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收入在社员总收入中应占比例的意见》。
17. 《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
18. 《关于适当扩大某些专署权限问题的意见》。
19. 《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问题的意见》。
20. 《关于在各省自治区和专区建立科学研究机构和地质队伍的意见》。
21. 《关于在河北、广东、北京、上海进行试点，研究坦步改进税收管理体制的意见》。
22. 《关于粮食供应工作的通知》。
23. 《关于国防工作的意见》。
24. 《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
25. 《关于整风问题的指示》。
26. 《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通知》。

通过了这么多文件，就其在当时实际工作中产生的作用看，首先是有关 1958 年计划和预算的第二本帐，促进了工农业各项指示的高涨。其次是促进地方工业的加快发展，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第三是关于农业方面，开展农具改革。促进农业机械化。第四是农业合作社适当合并为大

社，以及有关自留地等在社员总收入中应占比例问题。第五是有关残存私营工商业等继续改造问题。现在分述如下。

一、《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帐的意见》，大体同意国家经委党组3月7日提出的《关于一九五八年度计划第二本帐的报告》，和财政部党组3月8日提出的《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第二本帐的简要报告》。按照这两个《报告》，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比当年二月上旬一届人大五次会议所定的第一本帐超出很多。第二本帐比第一本帐工农业等产值的增长数，以及增长数的百分经同1957年相比较，如下表：

工业总产值	157 (亿元)	33%
农业总产值	66 (亿元)	16.2%
工农业总产值	223 (亿元)	24.8%
生铁	67 (万吨)	35.5%
钢	75 (万吨)	33.5%
原煤	1665 (万吨)	30.1%
原油	11 (万吨)	15.28%
发电量	21 (亿度)	29.3%
粮食	396 (亿斤)	16.6%
棉花	593 (万担)	24.8%
生猪	4515 (万头)	52.7%
基建投资	29.3 (亿元)	41.5%
财政收入	37 (亿元)	20.7%

当然，成都会议这第二本帐的增长指标，同八大二次会议后的增长指标要比较，还是小巫见大巫。例如钢，第一本帐是624.8万吨，比1957年的524.4万吨增长19.2%；第二

本帐是 700 万吨，比 1957 增长 33.5%。

二、《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提出地方工业的任务基本是为农业服务，也为国家大工业、为城乡人民生活 and 为出口服务。实现这些任务的方针和办法是：打破对于工业化的神秘观点，各级办工业，全党办工业，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走群众路线。各省、自治区应当在大力实现农业跃进规划的同时，争取在 5 年或 7 年的时间内，使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赶上或者超过农业总产值。地方工业的建设资金，除了少数较大和重要的项目主要同中央投资外，其他都由地方自筹，即地方企业、手工业合作社和农业的积累，必要时，可以行地方公债。县以下办的工业，应该面向农村，主要为本县的农业行产服务。

《关于在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并举的方针下，有关协作和平衡的几项规定》中，指出在实行中央地方经济管理新体制后，要解决好工业生产和建设方面的协作和平衡问题。各类产品要实行分级管理、分级平衡的制度；在组织工业生产同基本建设的协作时，必须贯彻点和面相结合、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原则。《规定》还提出：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实行“双轨”的计划体制，即一方面中央部门必须对自己所管的企业和地方所管的同类企业，进行全面规划；另一方面，各省、市、自治区也必须对该地区内所有中央部门管理的企业和地方管理的企业，进行全面规划。国家计委和经委应根据这两方面的计划回综合平衡，制定全国的计划。

三、《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要求全国各地开展农具改革运动，这是由毛泽东亲自提倡的。经过这个运动之后，逐步过渡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要在 7 年内（争取 5 年

内)能够基本上实现,促使农业生产力的大发展。农业机器应以小型为主,配合以适当数量大型和中型的。除了大型的和技术要求较高者以外,农业机械的制造应以地方为主。实行农业机械化,主要靠农业合作社自己的力量。成都会议之后,各地农具改革包括运输工具的改革,曾成为全国性的运动。

四、《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早在1955年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就在《大社的优越性》一文中谈到:“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可以一乡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一个社,平原、山区都可以办大社。《意见》认为:我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作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许多不便。因此,在有条件的地方,应当将小社适当地并为大社。规定了这样4个条件:在发展生产上有需要;绝大多数社员确实赞成;地理条件适合大社的经营;合作社的干部有能力办好大社。《意见》要求农业社的合并,必须有准备有计划地进行,需要合并而不合并是不适当的;不需要合并而合并,或者合并得过早过大,也是不适当的。

《关于合作社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收入在社员总收入中应占比例的意见》中,规定这个比例为20%~30%。认为留给社员一定比例的自留地,鼓励社员发展喂猪和其他家庭副业,适当照顾社员个人利益,这一政策是正确的,并



已收到显著成效。但是有些地方这方面收入比例过大，对于巩固合作社发生了不利影响，因而应当采取适当步骤予以调整。

五、《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首先分析了形势，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后，当年下半年和1957年上半年，许多地区又自发出现一些小型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其中私营工业和个体手工业从业者，约70万人，小商小贩约60~70万人。《指示》认为上述情况产生的原因有3个方面：主要是目前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在某些方面还不能满足人民复杂的变化多端的需要；其次是目前还有多余劳动力，一时还无法完全解决就业需要；同时也由于经济改组工作和市场管理方面，还存在一些漏洞的问题。关于这种现象要承认它们有两方面的作用：既同广大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对社会主义的工商业和合作社起着一定的补充作用，有些还是相当长时期内无从代替和不必要代替的；但同时它们又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和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其中有一小部分还属于资本主义经济，在生产经营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不仅妨害国家市场的管理和消费者的利益，而且影响若干手工业、农业社和商业合作组织的巩固，乃至影响公私合营和国营企业一些职工的思想意识。因此，我们的方针是要将它们一律管理起来，不允许它们未经登记进行非法经营；允许经营的要加强监督和管理，取缔其投机违法行为。总之，对它们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既能发挥它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益作用，又能限制它们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在它们中间要开展以反对资本

主义道路为中心的整风运动，在政治上把资本主义彻底搞臭，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审查区别，对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原则上不允许继续存在；对个体手工业加强领导、改造，在自愿基础上，吸收其参加手工业合作社；对小商小贩尤其有违法活动者，要限制其活动范围，对无组织的小商贩要进一步将他们组织起来

会议通过的文件中，同我的工作有最直接关系的是《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我参加了这个文件的起草，前述《周恩来带队查勘三峡》一节，对此事已有记述。这里要补充一点的是，文件中谈到长江流域规划中，需要正确解决的7种关系，最后2种“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即有销路），是毛泽东加上去的，可见这时关于三峡问题，他已有了相当的了解。

在“大跃进”逐渐走向高潮时，回首当年，大概只有三峡工程没有继续升温。李葆华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中，关于三峡问题是这样说的：“长江的治理与开发，我们将坚决根据中央决议，积极研究与解决修建三峡枢纽的各种问题，并按期提出设计。对于长江流域的各支流，凡是条件成熟的，都应积极兴建水库与水电站。对于长江的特大洪水，在三峡工程兴建以前，应积极找出各种办法加以防治。”

### 3月25日的讲话

会开得很好，重点归结到方法问题，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我们许多同志对此并不那么尊重。反冒进不是

什么责任问题，不再谈了，我也不愿听了，不要老是自我批评，南宁听过了，北京也听过了；作为方法的一个例子来谈，那是可以的

唯物论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主观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反映客观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事实在实践中反复无数次，才能形成观点。一眼望去，一下抓住1、2个观点，但无大量事实作根据，是不巩固的；只大量的事实，才能认识问题。向上写报告，是反映下面干部和群众的意见的，要经过调查研究。省反映地、县的情况，不详细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就冒出一篇报告来，那是危险的。要先听训，才能训人。要老老实实听群众的话，听下级的话，个别交谈，小范围（县、社、工厂）交谈。省委解决问题如此，中央也如此。中央以后遇到大问题，一定要与若干省委书记谈一谈。反冒进的问题，就是没有征求省委书记的意见，也没有征求各部门的意见，这个办法是不对的。在中央方面，工业部门想多搞，财贸部门想少搞，这不仅脱离了省，也脱离了多数的部。

反冒进也是一种客观反映。反映什么呢？一般，特殊，全面，个别，这是辩证法的问题。把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误认为一般的、全面的东西；只听少数人的意见，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没有反映，把特殊当成一般来反冒进。

除四害的指示，是卫生部起草的，根本不能用；还是去年的例子，这几个月的情况，根本没有接触，所以说卫生部最不卫生。后来由乔木找了一些同志座谈，经过反复研究写成一篇很好的指示，不然根本写不出来。如果一个指示不起作用，顶好不发表；文章也是如此，如果写得不好，人家连

看也不看，怎么指导工作呢？因此以后我们要注意学习唯物论、辩证法，要提倡尊重唯物论、辩证法。

尊重唯物论、辩证法的人，是提倡争论，听取对立面的意见，把问题提出来，暴露了对立面。1957年1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黄敬同志对经济问题有不同意见，我当时的注意力在思想问题方面，没有很好注意他提出的问题，故在1月省、市书记会议上有些问题的争论，没有展开。

辩证法是研究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的。矛盾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过去发生反冒进的错误，即未抓住主流和本质，把次要矛盾当作主要矛盾来解决，把支流当作主流，没有抓到本质现象。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开会，对个别问题解决得多，没有抓住本质问题。这次会议把过去许多问题提出来，经过商量解决了。

冶金工业部党组开会，吸引了部分大厂的同志共十儿人参加，空气就不同了。谈了几天，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部如此，各省也如此。中央开会有地方同志参加，必要时，除省委书记外，再加上若干地、县委书记，就有了新的东西。中央同志1年下去4个月的，也要找地、县委书记、合作社、学校谈谈，只同省委第一书记谈是不够的，要一竿子到底，不要仅仅限于间接的东西。我很想了解一个城市、一个县的工作，把一个县各方面的问题都谈一谈，不要多长时间，有2、3个星期就差不多了。各省也应该这磁做。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要打掉官气，当了老爷，不愿向别人请教，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各级都有。红安县1956年的作风，不就是老爷作风吗？那怎么能指导农业生产呢？一般说来，越上越离群众远一点，但也不能一概而

论，有的越上官气越小。例如列宁就没有那么多老爷气。相反，有不少人越下官气越大，许多乡长、厂长、常委书记，官气也不小。

越请教得多，搞出来的东西，大概比较有把握。但不能说就正确了，因为还没有实践的证明。许多事情我自己就是半信半疑。例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究竟对不对？还要看几年。我们的革命路线，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是已经证明了的，但建设路线还要看看。

所有制的解决，已经是一种新的关系，而相互关系分配关系，只解决了一部分。我们的党、政、工厂、学校，不管有多少官僚主义，总是与国民党有原则区别的，所以相互关系不能说完全没有变化。如果不经整风，则国民党的作风、老爷气还要大量存在，这是与国民党相同的一面。“八路军不见了”，经过整风下放干部，“八路军又回来了”。

我们讲鸣放，右派（也有中间派）加了个“大”字，大鸣大放，从艺术科学转到政治方面来，我们很快就转过来了。《解放日报》有一篇“只放不收”的社论，讲1万年都不收，放手发扬民主，很主动。只要抓本质、主流的问题，例如一个口号——15年赶上英国，就会起很大作用。本质问题解决了，次要问题人们会去解决的。如果只抓枝节现象，问题就解决不了。从部分现象看问题，那很危险的。

我们很多同志不注意研究理论。究竟思想、观点、理论从哪里来呢？就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人们反映它，不过是比较地合乎客观情况。任何规律都是事物的一个侧面，是许多个别事物的抽象；离开客观的具

体事物，那还有什么规律？《老子》是唯物论，还是客观唯心论？我是怀疑的。规律存在于每一个具体的人、具体的社会，反复出现。普遍存在的规律，才是普遍性的规律。比如打仗，诱敌深入，战役上以多胜少，战略上以少胜多；战略上包围了我们，战术上我包围他们，等等，这是经过多少年战争，胜仗、败仗，才概括起来的。完整的体系，只能在后来完成，而不能在事先或者初期完成。对井冈山时期的 16 个战术，当时人们就怀疑，哪有这样的战术法则呢？这 16 个字战术法则，在苏联军事史上是找不到的，但这是从群众斗争中得来的。赫鲁晓夫同志片面地单纯依靠原子弹，是危险的事情。

1956 年发生的几件事，没有料到，就是国际上的批判斯大林，波匈事件，国内的反冒进问题。今后还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我认国过高的指标要压缩一下，要确实可靠。大水大旱，有话可说，必须从正常情况出发。做是一回事，讲是一回事。过高的指标不要登报，登了报也不要马上去改。河南今年 4 件事都想完成，也许可能做到；即使能做到，讲也要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也要给下级留点余地，这也就是替自己留点余地。过去我们就是不留余地之事。例如 1947 年的土改纲领，提出“开仓济贫”的口号，后来又取消了。支票开得太多，难以兑现，对我们不利。

今年这一年群众出现很高的热潮，上海很多落后分子觉悟起来，共产主义精神大大提高。太原的协作精神，就是共产主义精神。落后的起来了，是革命的标志，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标志。现在不仅先进的起来了，而且广大中间、落后的群众起来了。农村富裕中农不想退社了，城市的职员和落后

的工人也积极起来了。我很提心，我们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面，可能被冲昏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一个县、一个地委没有多大关系，中央和省两级必须稳当一点。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压缩空气，把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下马，而是要搞好措施。去年是搞革命的一年，经验非常丰富，大大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懂得社会主义是些什么事情。今年再搞一年建设问题，很有好处。所有制的问题，可以说基本解决了，但未完全解决。对本质问题，主要问题，要看得到，抓得起，加以分析，研究方法，求得解决策。几年来许多同志就是看不到、抓不起本质的问题，自信心建筑在不巩固的基础上。也有能看得到而抓不起的人，缺乏一种魄力。

以后究竟有什么事是预料不到的？国内、国际上会有些什么事可能出乎意料？如世界大战，疯子要打。苏联还会发生什么问题？……原子弹把我们一套通通打烂，那也没有办法，打了再建设，可能建设得更好些。国际，国内能发生的不可意料的危险，有多少条、各省、各部党组可以谈谈，列出一个单子来，思想上无准备不好。当然，在我国发生波匈一类的事件，可以不必预料，但是，部分地区还可能发生。最近甘肃不是发生问题了吗？西藏完全可能出乱子，有的上层人物心在印度、英、美，对我们是敷衍的。汉族内部一点事也没有也不可能（如张清荣叛变），领导人被暗杀是可能的（如列宁、基洛夫、高尔基），但不能因此脱离群众。

冶金部党组前次会议专搞虚业，不搞实业，这种办法要提倡。抽出一段时间，专谈思想性、理论性的问题，不伤心，讲心里话。先虚后实也可以。下次开会可以多找几个

部，并且事前准备一篇报告。文章写得有说服力，要尊重唯物论、辩证法，对本质问题要看得到的，抓得起。

### 3月26日的讲话

会议文件怎样处理？有些文件可以印发到县、团一级、各省、各部选择一下。有些关系不大的，国防问题一类的文件，可以不印发。反对分散主义的决议草案可以印发参考，人民内部矛盾报告的国内反映，可以合印一本。有些文件都是草案性质，要等回到北京政治局会议通过后，才能作为正式文件下来。

这次会议开得还可以，只是事无没有想以虚实并举，实多了一点。但也有好处，一次解决大批问题，并且是跟地方同志一道谈的，这就比较合乎实际。虚实并举，先实后虚，或先虚后实（南宁会议也是先虚后实）。各省各部可以斟酌情况办理。也不是讲任何会议都要一虚一实。不过，现在希望虚多一点好（过去我们太实了），我以为今后一段时间内多搞些虚业，或专搞一次虚业会议，以便引导各级领导同志关心思想、政治、理论问题，使红与专结合。希望各省、各部安排一下。没有到会的省、部，由协作区长、中央同志去传达。

一年抓4次很重要。3年看头年，由于形势发展快，很多矛盾要很快反映和解决。如果不抓4次，许多问题不能及时解决，拖久了就会影响工作。还是一年抓4次，省、地、县抓得更紧一些才好。请地方同志斟酌。协作区会议一年六



次，每两月一次（曾有规定），是否引起埋怨开会太多了？开一下，再看看嘛！两个月1次，一次的时间不要过长；如觉得多了，将来再减少。目的是全年抓紧一点，以便更及时地掌握群众的情绪，掌握建设的进度就会稳一点。

下次会议重点放在工业，7月间开。

河北的100亿斤粮食，一靠人民，二靠上帝。

现在有些问题还是不摸底。对农业了解比较清楚，工业、商业、文教都不清楚。工业方面，除到会的几个部接触了一下外，其余没有摸。煤、电、石油、机械、建筑、交通、邮电、轻工业、商业都没有接触。财经贸易，还有文教，历来没有摸过，林业也没有措过。今年有些要摸一摸，政治局、书记处都要摸一摸。政治局开座谈会是个好办法。过去有一句口号：“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现在还是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学是文教、兵是国防）。今后这5年，还是要抓这5个方面。这次接触了国防，但是没有怎样谈过；过去总是搞军事，现在几年都不开会，文件看都没看，等你们整风以后再接触一下。

人有五官——眼、耳、口、鼻、舌；五性——声、色、香、味、触，加上“意”和“法”，即佛经上所谓的六根，“意”即大脑，“法”即规律。我们工、农、兵、学、商本身样样有思想即政策。工农兵学商都是事业，报纸，刊物为实业，文艺为虚业，这6种都要抓。南宁会议讲工、农和思想，没有讲教育和国防。今后再讨论国防问题，地方也要讲点军事工作。从1953年下半年起（抗美援朝后），没有管国防、军事工作，地方也只是招兵、复员而已。地方要管军事工作。北京军区，北京市、河北省都管不着，今后规定省要

管武装。今后要回过来搞点军事工作。

阶级分析。我们国内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第一个剥削阶级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地、富、反、坏未改造好的部分，再加上右派（全国右派在这些人中，可能10万以上，改造好的不算），他们反社会主义，是敌人。改造好的地、富不算，反革命改造好的形刑满释放有选举权的不算。富农，一无剥削、二有选举权，但人们不欢迎他。右派原来是与我们合作的，如罗隆基、章伯钧、章乃器等，他们反共反社会主义，是国内的国民党，故看作敌人。他们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代理人。帝国主义、台湾蒋介石非常赞成右派，非常关心他们的命运，杜勒斯很关心右派。地、富、反、坏、右是可以改造的，大多数是可以改造好的。

第二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中右派只占10%，其余90%是中间派和左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右派只占2.5%，老教授中右派的比例就大了。全国大概有右派分子30万人，其中县以上和大专的是16万人。我们对右派方针是孤立、分化、改造，除极少数违法者以外，不捉不办，给选票，以便分化改造他们。中间派对我们又反又不反，又拥护共产党又反对共产党。如陈叔通、章上钊，反社会主义不反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200万人，要很好地做工作，他们是可以转变的。

劳动阶级是：工人、农民，过去被剥削或不剥削人的独立劳动者。独立劳动者中有一部分是有轻微剥削的，如富裕中农和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按三个阶级分，恐怕清楚一些。工人、农民分开，也可以说是两个劳动阶级。对外贸易要有明

确的政治方向，不要迷失方向。总的原则是两个阵营——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要有严格的区别，不能“疏社亲资”。当然，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要做生意的。

对日贸易，现在仍在闹，蒋介石反对，说要和日断绝关系，这是美国在后策动。对于谈判贸易的人，要跟他们讲清方向，大势，形势方面要弄清楚。对日贸易，5年合同，钢铁一项是1亿英镑，合2.8亿美元。今年全部对日贸易的5点，加肥田粉等，6000万美元。（周总理：今后每年也达不到1亿美元。）

与波兰贸易10亿卢布，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增加40%多。

有些同志说，希望第一书记工作解放一点，这很有必要。从中央、省到地这三级，第一书记和其他某些同志，解放一部分繁重工作，这才有可能比较注意较大的问题，才可能做一些研究工作、调查工作。比如党报的总主笔，也必须如此。总之，少管一些事，才可能多管一些事。吴冷要学张季鸾<sup>①</sup>如何解放？大家研究。

今天会议就结束了，明天如何走法？分道扬镳。

## 会议导致的错误倾向

成都会议是继南宁会议之后进一步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会议。南宁会议之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声浪日益高涨，各行各业“跃进”热情不断升温。2月上旬召开的全

<sup>①</sup> 张季鸾，原《大公报》主笔。

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上，各地方、各部门的代表纷纷按照“大跃进”的精神，提出了口号或计划，原定计划和指标大都被突破和提高。工业方面，一些部门提出“15年赶上英国”；农业方面，一些省份提出“苦战3年，改变面貌”。《人民日报》2月12日以“一次争取大跃进的大会”为题的社论说：这次大会“是1958年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序幕”“全民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胜利，给我们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政治条件。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胜利，不仅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进一步巩固了全国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团结，巩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而且进一步提高了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鼓舞了广大下部和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干劲。经过整风运动，许多人过去认为根本办不到的事情，现在很快地就办好了；许多原来想不到的好办法，现在群众都想出来了；许多过去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现在很快地解决了；许多过去没有被发现的潜在力量，现在不断地发掘出来了。”但是，在毛泽东看来，“右倾保守思想”仍是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严重障碍，“反冒进”以来党内的“沉闷空气，还须以“破竹之势”来冲破。同时，参加南宁会议的中央领导同志到得不全，地方领导同志只有中南各省，中央工业方面也只有3个部，因此很有必要将各省一把手、多几个工业部的领导，召集起来，再开一次既务实又务虚的会，进一步贯彻毛泽东当时的指导思想。于是召开了成都会议。

成都会议沿着南宁会议的思路，继续批判“反冒进”，强化高速度意识。它并不是南宁会议简单的重复，而是向“左”的错误的方向又滑行了一大步。成都会议最主要的标

志，是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概念，对有关内容作了初步阐述。毛泽东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的路线，一条是轰轰烈烈、干劲十足的路线。有破才有立。彻底批判了所谓“右倾保守”的“冷冷清清、慢慢吞吞”的路线，才能确立起“轰轰烈烈、干劲十足”的路线。成都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讨论这条总路线时，从主观愿望出发，把复杂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简单而武断地归结为一个速度问题，断定高速度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独立的语言”。因此成都会议形成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虽然讲了多、快、好、省四个方面，但是其中心在突出“快”字。速度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灵魂，且被理解为只要发动群众，“鼓足干劲”，就一定可以实现。这种经验和做法，在战争年代是大家驾轻就熟、行之有效的；何况经过反右派斗争之后，又增加了新的“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经验；加以全国水利化运动“马到功成”的启示，于是从上到下，尤其毛泽东本人，推行这条“总路线”似乎已是水到渠成之事。可是实际上，1958当年的实践已说明，这条总路线带有浓重的主观空想色彩，既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又脱离了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的，成都会议为它的通过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虽然毛泽东在讲话中也谈到这条总路线已开始形成，还尚待完备、尚待证实这样的话；但从会议过程中他的全部讲话总的精神，以及与会者的理解和接受来说，毫无疑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似已深入人心，无人敢去怀疑和提出异议了。

破除迷信，是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阐述的一个重要观

点。所谓“迷信”，毛泽东指的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苏联经验，二是经典著作，三是专家学者（即毛泽东常说的教授）。“大跃进”、“总路线”不是来源于苏联经验，也没有经典著作可作依据，却可能受到那些具有科学知识 with 科学精神的专家学者（实际上并不止是专家学者）的疑虑和批评，毛泽东对这些人有重视的一面，但主要则是轻视他们徒有书本知识，因而要打破对他们的“迷信”。说穿了，就是要解除发动“大跃进”的一切思想障碍。“破除迷信”本来的意义并不错上，对苏联经验也好，经典著作也好，专家学者也好，不应该迷信和盲从。但是“大跃进”运动中的“破除迷信”，实际上不仅完全否定了人类社会发 展、尤其经济发展的正常经验和客观规律，完全漠视了那些不可违背的种种制约关系，而且首先打破了一五计划期间行之有效的，有计划、按比例、求平衡的关系和秩序。加以经过反右派斗争，贬低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的知识和作用，因而实际上不是破除迷信，而是破除科学，违反规律。

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一方面强调“破除迷信”，另一方面却又倡导“正确的个人崇拜”。他把个人崇拜这种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政党、群众关系学说的现象，分为正确的和错误的两种，并且肯定“正确的个人崇拜”。从南宁会议开始，党内高层的民主生活就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损害，而成都会议一经提倡“正确的个人崇拜”，使党内的政治生活特别是中央领导层的政治生活，更进一步向不正常的方向发展。当时所说“正确的个人崇拜”，毫无疑问，就是对毛泽东的崇拜，把毛泽东作为真理的代表和化身，把服从真理等同于服从毛泽东。这实际上就

形成了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当时柯庆施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在会议中号召：“相信毛泽东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以盲从的程度。”“大跃进”运动以后，就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可以说，这是成都会议的一个悖反现象：在倡言“破除迷信”的同时，却又制造了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这也是毛泽东晚年悲剧的由来。在当年，这个看似悖反的现象后面，却有着完全一致的目标背景，即倡言“破除迷信”也好，肯定个人崇拜也好，都是为了更顺利地发动“大跃进”。“破除迷信”是清除思想障碍，肯定个人崇拜才便于动用个人威望以至无限权力。

应该指出，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毛泽东从来怀有敬仰之情，这其中确含有一部分迷信的成分。对此本应予以区别和引导。作为党的领袖应该始终处理好个人同中央领导集体的关系，防止个人专断、个人迷信等不健康的意识的滋长。建国前和建国初期，毛泽东本人也曾强调和重申过这个意思，七届二中全会曾就此作出有关决定。然而，他在成都会议上从正面意义肯定了个人崇拜，有关对他的崇敬以至带个人迷信色彩的颂扬，都表示容忍以至欣赏，这就给个人迷信、个人专断日益发展，党内民主生活的进一步损害，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逐渐削弱开辟了道路。

在政治上，成都会议还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使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失误继续发展下去。毛泽东在会上关于“两个剥削阶级”的论断，首先是不符合中国社会当时的阶级状况实际的。经过土地改革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内地主、富农不再拥有生产

资料，自然不再具有剥削的手段，也就不可能有剥削的行为。作为一个阶段，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已经被消灭，不再构成一个剥削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在公私合后还取得一定定息，极少数私营企业主还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但已经大大受到了限制，在整个国民经济成分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即便有一定剥削，也不过是剥削制度的残余罢了。因此，民族资产阶级也已处在消亡的过程中，而不再是完整意义上的剥削阶级。

其次，存在“两个剥削阶级”的论断，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学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阶级是一个经济概念，是一个与生产资料相联系的概念，根据占有与否和占有生产资料的程度来划分。毛泽东把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甚至知识分子，都划为剥削阶级，并没有经济上的根据和理由，实际上是以政治标准和思想标准是制定的（且不说这政治标准和思想标准本身就有问题）这就为他在不久以后正式提出将政治、思想作划分阶级标准的主张作了铺垫。换句话说，毛泽东后来从政治、思想上划分阶级，是他在成都会议关于“两个剥削阶级”论断的逻辑发展。

将“右派言论”同“反冒进”思想联系起来，将反右派斗争同“反冒进”斗争视为同一条“路线斗争”，这是从南宁会议到成都会议贯穿着的。这样，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同“大跃进”运动就结合在一起了。毛泽东是依靠“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来推动“大跃进”的。“阶级斗争”是一种手段，它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一切对“大跃进”的异议、怀疑都可列入“阶级斗争”的范围，作为敌



对阶级的“动向”，迫使那些即使对“大跃进”有不同看法的人们，也不能不参与到“大跃进”中来。“大跃进”运动的发动，一直发展到最高潮，可以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总之，同南宁会议比较起来，成都会议所形成的“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左”的错误观点和认识，为全面发动“大跃进”运动和正式通过“总路线”的八大二次会议，作了更全面的准备。

“文革”期间我被关在秦城八年，我的忆旧诗词中有一组“戊己诗”（1958、1959两年），其中一首七律记成都会议：

毕竟锦城春色浓，人心更经海棠红。  
地球只怨转旋慢，豪杰能争造化功。  
一代欲成千代业，初更忽响五更钟。  
“不知世事”真堪笑，身在盘涡谷转中。

## 武汉会议与广州会议

3月26日，成都会议结束之后，大家分道离去。3月27日，毛泽东乘专列去重庆，随行者有李先念、李井泉、柯庆施、王任重等十来人。每次外出，毛泽总是找机会多下农村、工厂去看看。途中为观看天然气井的生产，临时在隆昌停留，冒雨在露天参观。这个厂当时年产碳黑1000多吨，占全国产量四分之一。28日凌晨抵重庆，然后乘船去武汉。在武汉停留到4月12日，于13日乘飞机到广州。

到了武汉，毛泽东原来想听听河南、安徽关于落实农业纲要“四十条”的汇报，后来索性把没有参加成都会议的华东、华中、华南大区各省、市委主要负责人都找去汇报，从4月1日到9日，实际上开成了一次会议。毛一方面听汇报，一方面插了许多话，也讲了话。田家英回北京之后给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作过传达，称武汉会议是成都会议的补充。

毛泽东一开始就指示：整风挂帅，生产是中心，带动其它工作。他要求各省的汇报以此精神进行，所以汇报主要是讲整风高潮和生产高潮。

河南吴芝圃汇报了四条：（1）去冬以来群众生产情绪高

涨。(2)出现了大批积极分子，不仅积极参加体力劳动，而且参加脑力劳动，因而出现了种种创造发明。(3)过去劳动力不足，钢铁不足等现象，目前已基本上解决了。(4)学习科学技术的劲头很大。群众说：“社会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群众奋斗目标明确，一切为了丰收。指标是宝塔形的，越到下层越大。

湖南周小舟汇报了六点：(1)劳动态度改变了，目前合作社出工人数一般占全体人数50%~60%，而且早出晚归听指挥。(2)集体与个人关系处理好了，如积极向合作社投资、投肥、爱护公共财务等。(3)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已成为人们的深厚思想。(4)干部与群众关系好了。(5)社会风气有很大改变。群众现在愿意开会，会开得也有内容，能使用批评武器。儿子可以批评老子，老子也能耐心听取批评并加改正（因老子是下级，有错误）。特别是许多人安心农村工作了。(6)干部领导作风改进了，普遍搞试验田。

江苏江渭清的汇报，对整风问题讲得比较系统。江渭清谈到江苏在大鸣大放中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1)两条道路问题。(2)先进落后对比、学先进赶先进问题。(3)两种作风：命令主义或群众路线问题。(4)两种经营管理方法问题：多快好省或少慢差费。江苏提出改进工作的“五跟上”，主要是领导要跟得上，思想要跟得上（反保守），规划要跟得上，政策要跟得上（主要是指合作社的一些具体作法如计工等），技术要跟得上，领导带头跟得上。

其它省汇报的内容，同河南、湖南、江苏差不多。毛泽东在会上的插话和讲话，大体有这样一些内容：

一是关于生产高潮 说以前有过高潮，也有领导高潮的

经验，如 1954 年到 1955 年春的农业生产和农田水利；去冬今春又出现了更大高潮。由于反冒进的错误，形成一个马鞍形，但有了快一些慢一些两种工作方法的比较。一整风反右派，群众的干劲就起来了，中央恢复了农业 40 条和多快好省的口号。生产上出现这么大的高潮，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过去只有参军上搞过群众性的大规模动员。由此，同成都会议时的讲话精神相比较，毛泽东讲了要多务实的问题。如打仗，两个战役之间要有休整，现在有几亿人的生产高潮，这是从古以来没有过的事。应当特别注意，劳动大军在两个战役之间应有休整。不要使群众老紧张下去。高潮中要务实，不要搞空气。关于“苦战 3 年，基本改变面貌”，是提基本改变，还是初步改变？大家可以研究，中央也要看一看。改变面貌，不是挖了些沟沟汊汊就改变了，而是指粮食、肉类、油料、棉花真正增产了，才算数。今后还要特别注意油料，40 条要加油料指标，全国要大搞油料，作规划要雷厉风行，这关系到出口，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我们的油料。

毛泽东这时有冷静的一面，可能是由于大家都热心于什么都想“化”有关。他说，关于“化”的问题，《人民日报》不要轻易宣传哪个地方什么化了。稀稀拉拉种一些树，也叫绿化、那不行，怎样才叫绿化？在飞机上看绿化；才算绿化；现在飞机上看，恐怕还多是一片片黄化。大家研究了什么叫“化”，树光种上是化？还是长出来了是化？除四害，今年取得些经验。报纸上不要单纯宣传指标，要多介绍先进经验，多宣传措施，搞水利实质是为了粮食、吃大米，群众听了很高兴，但不要宣传水利化了。说苦战了年水利化了。我是怀疑的。真是如此，我们的子孙干什么呢？10 年内，

还会发生几次大水、小水，还有旱灾，共产党只能管地，不能管天。如果来了灾，这个帐怎么算？不要单纯宣传指标，多宣传措施和先进经验。水利化也是如此，水利化为吃大米，这是我们的前途，所以农民高兴。但不能过早宣传水利化。

做事情要留有余地。苦战3年之后，还要苦战。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我提的不是三年，是要苦战几十年。我们要想得深远一些，要留余地。四无城变成四有城就下不了台。最多说基本上四无，不要说绝了。总之，凡事要留有余地，要务实。要粮食到手，要树木扎根；要比措施，比实绩。指标是领导头脑里的东西，要到秋后才算数。今年是历史上大跃进的一年，要好好总结经验。世界上有真有假，没有假就没有真。在运动中的事，打了折扣才可靠，干什么都要踏实些。

又再次讲到宣传工作要务客，报纸不要尽讲“化”；宣传工作要深入、细致、踏实。现在宣传多快好省，但与与省宣传得不够，华而不实是要不得的，不好怎么办？好大喜功是需要的，但大话是不需要的，华而不实是不好的。假如华而不实，喜功就变为无功，喜大变成喜小，轰轰烈烈之后无功而返。

现在我担心会不会来个反冒进，今年干劲这么大，如果不丰收，群众情绪受挫折，就会反映到上层建筑上来，一些干部、民主人士；党内有右倾情绪的人，就会出来刮台风，观潮派、算帐派就会出来说话。各省要向地、县讲清楚，要有精神准备。现在干劲很大，不要秋天泄气，定要搞措施，到12月（还有9个月）就会看出结果来，比输了活该，要

看最后结果。宣传中不要华而不实，浮而不深，粗而不细。

现在好比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今年这一年是关键性的一年。今年增产700—1000亿斤粮食是可能的，方针就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湖北就是这样说的：“干部带头，革新先试验，干劲加办法，跃进定实现。”要对要农民讲清楚，可能有天灾，鼓起眼睛看丰收，但也要有歉收准备。（成都会议时，介绍了山东莒南县厉家寨乡大山农业社大搞深翻土地的经验，可以增产百之百。）谈到这里，毛泽东说道：特别是深翻土地，大有味道，一亩地宁可花几百个工也使得。（后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河南长葛县委第一书记为此大出风光。）

关于生产高潮问题，毛泽东最后说：要劳逸结合，干一段休息一天，有节奏地波浪式前进。指挥作战，必须注意休整；连续作战是战役和战役组成的。河南一年要实现几个化，当然我们不要说他过火了，但某些口号要调整一下。空气压缩并不是量的减少，而是变成液体、固体。反冒进则是把空气吹掉一半，我们压缩是要增加氧气。

二是关于国内阶级情况政治形势问题。

毛泽东用了比较长的时间讲国内的阶级问题，对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的“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的判断作了进一步阐述和发挥。

他提出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究竟怎么样？两条道路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这是可以设想的。我们要有策略，要冷一冷，然后再放一放，不冷不放他（阶级敌人）不会出来的，尽在反右派高潮中就不会出来，当然也有沉不住气出来的。

在成都会议说过，现在中国有两个阶级，两个劳动阶级。一个剥削阶级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残余，把 30 万右派分子也算进去。地主，现在分化了，有改造好的，有没有改造好的。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和右派分子，这些人反共，就是现在的蒋介石国民党，是敌对阶级，如章伯钧等。右派分子党内党外一样，包括一些现在划入中间偏右还没有触动过他的右派。这些人如果占人口 10%，就有 6000 万人，占人口 15%，就是 9000 万人，但是没有那么多，按大约是 5% 计算，就是 3000 万人，比较恰当。这是敌对阶级，尚待改造。我们的办法，一曰斗，二曰拉。假使我们在右派分子中能够把十分之七化出来，就是一个大胜利大成功。要调动他们，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几年之后，他们把心交出来，真正改变，可以摘帽子，右可转左，或转成中间；可能也有由左转右的，如考茨基。第二个剥削阶级是民族及其知识分子，加上一部分上层小资产阶级（如刘绍棠、陈伯华，农村富裕中农也包括在内）上层小资产阶级，他们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我们统统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畴中。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大多数是中间分子，他们是剥削者，与前一个剥削阶级不同，又反共，又不反共，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反共，但不坚决，与蒋介石不同，看谁力量大，就拥护谁。汉口有个资本家就靠拥护公方代表这句话吃饭，多一句话也不讲。如果中国出了纳吉，右派登台，这些人会出我们的大字报，一股风都上来了，打倒共产党，都干。这些人对共产党是半心半意的，当然其中也有的人真心真意，有的人无心无意（右派是无心无意的）。这样的人大约在 4000 万人。经

过去年一年到现在，这些人政治上正在发生着大变化。去年这些人多数是迷失方向的。但是经过大鸣大放，农村、城市整风的胜利，一年的生产大跃进，他们就不能不有所改变。因为形势逼人。形势是人造成的；人成堆，所谓形势就是多数人逼少数人。龟山、蛇山无变化，长江大桥、工业化等可放在形势里面。这个剥削阶级比较文明一点。我们也用文明一点的办法对待，采取批评方式，跟与右派斗争的方法不同。一是批评，一曰改造，因为你有一半好处。至于右派则采取带点武的性质，无非骂得臭。这两个剥削阶级，我们的方针也不同，我们是团结后一个剥削阶级，孤立打倒前一个剥削阶级，即团结中间，孤立右派。他们虽有3000万之多，但分散在全国，在包围之中，受孤立。开右派大会，他们还料不到有这样的事情，就等于皇恩大赦。各大城市（30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都要开。要主要负责同志去讲话，讲透一些，首先一训，然后一拉。训则凄凄惨惨，冷冷清清；拉则全身发热，通身舒畅，有了希望，象刘姥姥借钱。凤姐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两个劳动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但人心是不齐的。意识形态，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工人、农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做工、种地，相互关系过去摆得不恰当。大都与国民党不相同了，但还是一部分相同。就象老爷对小民，奴隶主对奴隶一样，只压服不说服。例如复旦大学一个女职员，管干部的干部，自己霸占一个厕所，不许别人进去拉屎。有些干部的坏作风同国民党差不多，个别的甚至超过国民党。因此，工人、农民对他们就看成是国民党。他们的世界观未变，我们说为人民服务，他要为“五大件”和人民币



而奋斗。这种工作态度与国民党时代有何区别？农民在社里不敢说话，怕挨整；干部也不敢说话，怕穿“小鞋”，怕脾气一来不好混，谁敢贴大字报。大鸣大放，大整大改以来，这种关系有了大变化。所以，双反就一窝蜂，反了一个，又反一个。反了大家，又反自己。工人自己批评自己为“五大个”而奋斗不对，工作态度改变了。理发、洗澡工人说自己不应增加工资。武汉有个商店，工人一当干部，对店员就板起脸孔，这就是国民党作风。红安县干部，老爷气一经改变，就与群众打一片，关系就大改变了。

生产关系，一则所有制的改变，一则相互关系，一则分配三个问题，我们现在抓中间，带两头。即抓住相互关系，就是整风。反右派也是相互关系。右派是敌人，他与人们的关系是真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民族资产阶级是半奴隶主，共产党员某些人在社会上学校里学了一点奴隶主的神气。刘介梅是向社会上学来的。把相互关系整一整，工厂里的党政工团和工人的关系，合作社干部和社员的关系，各级党、政人员与下级的关系，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校长、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一句话，是人民内部的矛盾，用说服的方法，不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这一来揭开盖子，人民舒服，精神解放，敢写大字报。这是列宁主义，不是机会主义。列宁死早了，他的作品，特别是在革命时期的著作，生动活泼。他说理，把心交给别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和敌人作斗争，也是如此。斯大林这位同志有点老爷味道，在教会学校读过书，辩证法不甚通，唯物论也不甚通，脱离实际；相互关系就没有搞好，相当僵硬。过去苏联与我们是父子、猫鼠关系，现在好点了。

我们的传统是从历史上来的，我们搞根据地无钱、无粮、无枪，孤立无援，必须民主，必须依靠群众，军队必须与人民一致，官必须与兵一致，党必须与人民打成一片，非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可，非平等关系、民主关系不可。以平等待人民，废除肉刑，不枪毙逃兵，经常做教育，经常做斗争。打一仗，新兵来，又要做教育。所以，老爷态度虽有点，但民主。我们还是在实际斗争中学了一点。这是因为斗争艰苦，时间长，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但也有一部分人不赞成。如济南有人在夏季时说春季右倾了，只赞成夏季形势，不赞成春季形势。其实夏季形势也不是真赞成。夏季形势就说了，军队可用民主，对人民为什么可用民主？可见这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经过过去一年特别是今年丰收，苦战3年，基本（还是初步）改变落后面貌，就不同了。人们就通了，真相信了，但还要写文章，用理论说服这些人。

我看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5%的细菌还是会有，中间派也可能反攻，他们的嘴巴不过暂时不说，将来还要说。还会有长期反复。但是阶级斗争的基本战役已经过去了。问题是几亿人民蓬蓬勃勃起来了。右派孤立了，30万右派搞臭了，没有资本；以知识分子我们已经封了他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封了他们在斗争中迷失方向而且动摇，那他们还有什么资本呢？他们当中出不了领袖人物，要找领袖人物，还是从现在的左派中间，从我们这些人中间。将来犯错误的人也出在左派，因为有资本，一不小心就会犯错误（莫洛托夫）。

党的领袖、党的决策者莫洛托夫，40年的政治局委员，脱离群众，一个工厂也不去，一个农村也不去。赫鲁晓夫的

好处，就是下去，到处跑，人家说他是旅行家。当旅行家也有好处。过去我们打游击就是旅行家，旅行了几十年，现在还是南方旅行到北方，还要当旅行家。中央和省两级按规定4个月当旅行家，地、县更多。这是赶出大门。

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究竟如何？一定要估计反复。要估计是否还要出什么大问题，如国际出什么大问题，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会作乱，中间派还会出乱子的，但基本战役（淮海战役）过去了。形势恐怕要这样看。

毛泽东在大家发言时，还有以下一些零星插话。

对马列主义也要破除迷信，不要以为只有外国人才觉得好。洋人都是了不起的。中国人算不算洋人？我们叫不叫神仙呢？我问过好多人，都说不算。他们说神仙是住在别的星球上的，我们叫凡人。问别的星球上的人看我们叫什么？也叫神仙。我看，我们看外国人是外国人，外国人看我们也是外国人；我们是不是神仙？我们看地球以外的是神仙，外星球的人看我们也是神仙。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看不起自己，什么东西都是别人行，自己不行。

要有股干劲，要有股气。气不能少，气是统帅，气就是思想。凡是讲问题都要讲思想，我们有些同志只是专心于量，说话就是数目字，不讲思想，不要学苏联那些院士。对当前问题要注意。孙行者是无法无天的，他是反教条主义的；猪八戒一辈子是个自由主义者，有修正主义，想脱党；唐僧是伯恩斯坦。

对科学家也不要迷信，对其科学要半信半疑。自古以来，青年人总是比老年人更好，学生比先生好。看戏的人总比演戏的人厉害，戏的改革主要靠观众，不是靠艺术家。

省以下人代大会、党代大会都可以贴大字报，贴那些院士的。党内怀疑《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人不少，初步接受的人也不少。社会矛盾除反革命外，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不下厂、不下田，作风不好，是由于过去的影晌产生的。大字报一来，好似滚滚长江，就把那那些渣滓冲掉了。中央和省的负责同志，要有4个月跑出来当旅行家，地、县要更多些。

有些同志不了解为什么让右派闹……反右派斗争开始时，只给少数人发指示，就是要大家看看魔怪，要考验考验下放干部，看看他们什么态度。

整风调整关系，整风没有内外夹攻是整不好的，但一定要划清敌我界限。人民政府对人民是不专政的，我们的办法是整风；对敌人才专政，于是大鸣大放，让右派登台演说。不是说政权不巩固了，相反地我们夺了他们的政权；整风反右派，在许多地方、许多单位，带有重新夺取政权的性质。

技术革命是逼出来的，世界上好多东西是逼出来的。整风是逼出来的，有了对立物就逼出来了。你看“拷红”，用家法打红娘，逼出了一篇道理。红娘压倒了老夫人。

看问题、研究问题，要有观点，用观点来研究问题，要学会用政治来带业务。先进政治面貌，然后讲工作面貌；要有观点来说明材料，不要被材料淹没了。不要倾盆大雨，要毛毛雨。不要一下子把许多观点都拿上来。有些人说是政治水平很高，但谈问题只讲数字，政治都没有了，这还有什么水平。今年秋天要开一次报纸编辑会议。

大鸣大放，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敢这样做，只有我们敢，这正是列宁主义态度。列宁常常自己下工厂，他特别对官僚

主义骂得很凶。

一个阶级内部有许多阶层，有许我复杂情况，容易发生矛盾。一个机关有干部问题的矛盾，有上下关系，党内也有上下关系。我们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同右派的矛盾则是敌我矛盾。经过大鸣大放，我们在群众中扎了根。干部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什么应该反对，什么应该拥护，就划清了界限。

中小学有 10% 或 20% 的政权，如不整风，是在人家手里，最近才夺回来了，或开始夺回来。

对农民的教育问题。农民瞒产是有理由的，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前途。要向农民讲清楚，增产不增购，说明粮食情况，把总帐告诉他们，向他们交底。今年粮食多了，可以跟他们讲清，国家并不多拿，留在合作社里是跑不了的。说清要苦战 3 年，要节约，不要都吃了，明年不好办。

为什么农村不能办大学？15 年普及，15 年提高，30 年普遍办大学，每乡办一个大学。第一书记要当大学教授。

中庸之道，实际上是落后论，四平八稳，成为一派“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实际为右倾。所谓稳妥可靠，结果是既不稳妥，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这样稳，会出大祸。一旦发生事情，时间过去了，就要失败，就要出大事。对于稳妥派，有个办法，到了一定时候就提出新的口号，使全无法稳。这一派，人数可能比较多，稳健派、观潮派、等潮派，如果来一个灾荒，他们还是要出来讲话的：“看你们跃吧！”“老子讲过，现在如何呢？”“冒进”是稳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准备这一着。

可以看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重要性。盖子一揭开，

15亿担肥料任务，就可以完成二15亿担。

现在讲跃进不挨骂，讲冒进就要挨骂，实际冒进是稳妥派安在正确派头上的。1956年上半年劲大，下半年就挨骂；1958年上半年劲更大，下半年是否挨骂呢？现在客观上逼着我们答复这个问题。应当是把工作措施办好，准备挨骂，对者改正，不对者顶住。观念形态的作用，这就上层建筑人作用，是如何适应生产力的问题

中央七虚三实，“实”多了不好。地方多搞实。

党要抓工、农、兵、学、商、思六大问题。今年都要抓。七月再谈一次，可以在一个地方，分两批谈。四、五、六三个月抓工、商、学，结合抓军队。7月以后秋季再着重抓军队，要教育军队，不要象匈牙利军队一样烂掉了。每个东西抓两三个星期即可。抓政治带业务，以红带专。我们搞了几十年，从来对群众没有说过用压服的办法，而只是说过用说服的办法。为什么解放以来来了一股风，要讲压服，道理究竟在什么地方，是否是新干部多了的原因？恐怕是以胜利者自居，有了政权，就发生了压服。有些单位在国民党作过事的多了，就发生压服。

蒋介石也讲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我们现在讲政治与业务，方法叫说服。所谓强迫与自愿相结合，必然发生强迫命令，列宁多次讲说明。现在整风之后，工农中间落后部分开始觉悟起来。如决心书，但有三之一是假的。

农民隐瞒产量，可以原谅，因为不足，但不能提倡。把大局告诉他们，每年只征880亿斤，使他家有底，假使今年增产700亿斤，等于不征购。

尧“设谤木”、“设谏鼓”，也是民主作风

过去搞了那么多的运动，以为差不多了，实际出了这么多右派，现在这个运动之后，仍然掩盖了不少右派分子的。

傅鹰列为中间派，但这次对他出了不少大字报，弄一下也好，武汉现在把大字报当作礼品送礼。

集中智慧，暴露矛盾，改进工作，增加团结，这是整风之结果。

近来要抓工商学兵。

地方工业的方针是：为农业服务，为大工业服务，为消费者服务，为出口服务。三自给：一则自有原料，一则自己推销，一则自有资金。小型为主。

毛泽东在武汉停留十一二天，主要是休息，也出外活动。就在4月6日（这是个星期天）的正午，毛泽东还来到武汉体育馆，那里正在开“武汉科技界大跃进誓师大会”，共有来自科研、设计、卫生和教育等方面5300多人参加，大家纷纷上台宣誓、表决心，扩音器里不时响起这样的口号：“向党交心，向6亿人民交心，向毛主席交心！”毛泽东由李先念、柯庆施、王任重、李达等陪同，走到台上，同主席团的人一一握手，走到台前向会众招手致意。这对当时武汉和湖北各行各业的“大跃进”，自然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毛泽东于4月13日离开武汉，乘飞机到达广州。

关于广州会议，多年来党史界无人提及，几乎是一个空白。如果不是《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出版，真还难以找到一个确切的证据。“文革”时期，到处见到的多卷本《学习资料》或《毛泽东思想万岁》等文件资料书，有的可以找到“武汉会议”，但都不见“广州会议”。

4月21或22日，我从北京来到武汉，参加计划会议（大概是中南地区的，也许是全国的）。1958的各种计划会议，从部内到部外，从地区到全国，连绵不断，可以说，大家都泡在计划或指标调整（当然是向上调整）中过日子。就在25日，我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李颀伯的电话，要我立即住到武昌周总理的住处去，一同去广州开会。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185页有这样一封《给周恩来等的信》，信后面署的日期是“4月25日上午6时”。全文如下：

恩来、陈云、德怀、富春、一波同志：

想在这几天内谈一下工业问题，除富春已答应来此以外，你们几位是否有时间，是否愿意来此谈一下。如果可以来的话，请于25日或26日南来。又想邀鹤寿、彭涛、滕代远、张霖之<sup>①</sup>、刘澜波、石油部长余秋里、地质部刘景范、水利部李葆华来此一谈，并请带李锐同志一道来。最好本日<sup>②</sup>动身，以便开4天会，30日回去，5月1日站天安门。如何，请酌复。或者今日到长沙，明日上午到此。

刘、邓即阅，用电话即发。

其实这时水利、电力两部已经合并，称水利电力部，部长仍是原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李葆华、刘澜波（原电力部部

<sup>①</sup> 张霖之当时任煤炭工业部部长  
<sup>②</sup> 即4月25日



长)和我都是副部长。名单中人除陈云外,都于26日到达广州。

25晚上,我到东湖的宾馆住下。先遇见彭德怀,没有谈几句,总理就来问我,晚上去不去看汉剧名演员陈伯华的《张羽煮海》。我虽然对旧戏兴趣不大,还是毫不犹豫答应了。记得去剧场前,还有罗瑞卿,3人起到武汉大桥桥头散头。我是第一次徒步到这个大桥,但关于大桥修建时的地质处理,打管桩的办法,我是清楚的。这个办法是苏联专家决定的。他们国内还没有使用过。周恩来特意到桥头来漫步,想必感慨万千。1938年他在武汉,是长江局的负责人,同国民党折冲樽俎的地方,自然会有种种怀旧之情。1935年12月,“一二·九”运动游行示威,我也曾在蛇山脚下江边露宿过,是当年武汉秘密学联的负责人。在延安抢救运动时,我被关在保安处1年多,周恩来回来延安,了解我的情况后,由于他的关心,1944年6月,我得以最先释放出来。到剧院去看戏,我们悄悄进去,又悄悄出来的,没有惊动一个观众。当年周恩来外出,总是轻车简从。

广州会议大概只开了3天,我没有笔记,毛泽东没有作什么长篇讲话,大家发言时,插话也不多。这大概同都是几个工业部的汇报,业务问题比较多,他对这方面不大熟悉有关。毛泽东住在小岛,开会的房间不大,不到20人。当时,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也在广州,他们都没有参加。

毛泽不宣布开会,说这次会找几个工业部来,主要谈15年赶上英国的问题,围绕着这个问题谈。记得开扬白就是这么一句话。

第一个发言的是刘景范,他是地质部的副部长。旧中国

大概只有清华和北大有地质系。可以说，就是搞工业的人，也大多不懂得地质的重要。地质就是找矿，当年没有听说过什么工程地质、水文地质。1952年，我转业搞水电建设时，碰到的第一个大事件，就是浙江省正在建设的黄坛口水电站，左岸的地质出了问题，大坝不能按原设计接头，工程被迫停了下来。这个工程是省内自建的，施工前坝址地质工作做得不够。《人民日报》为此事发了社论，我刚任燃料工业部水电工程局的局长，只好“代人受过”，向监察部来检查的人作检讨。当时整个水电系统只有一个有职称的真正地质工程师。于是我采取紧急措施，找到刚成立的地质学院院长刘型（原湖南省委的秘书长，我们一起调到北京来的），由水电投资，招一大批高中毕业生，请该院办工程地质培训班。官厅水库开工后，水库库区的地质调查，是增建水电站时，由我们补做的。当年陈云非常重视地质工作，成立了地质部，有关这方面的大事他都直接抓。

刘景范汇报时，带了一大堆材料，还有个发言稿，他就念了起来。只念得几分钟，毛泽东就疾言厉色，要他讲问题，不要念稿子。刘可能没有参加这种场合的经验，还是照旧念下去。于是毛泽东发火了：你不要念了，你讲不清楚，找何长工来。刘当然非常尴尬，满脸涨红，停了下来。大家也觉得很不自在。似是薄一波打了圆场，由别的同志汇报了。此后几个部长的发言，都紧扣如何争取快速赶上英国的问题。

现在我能回忆得比较清楚、手边还能找到参考资料，是刘澜波关于电力工业的发言，这是我们预先商量过的。关于《电力工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成都会议有过一份文件，其

中就讲到，电力工业建设必须贯彻大中小结合，中小型为主的方针，改变过去中央集中过多的做法；二五计划的1600万千瓦设备，一半交由地主建设和管理。而且还谈到，除东北、京津唐、江南和将要投入的三门峡等4个跨省的电网，仍由水电部为管理外，其他各省区市的发电厂、电力网连同电业局，一并交给地方管理。最后还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全民办电”的号召。在会议期间，这个文件曾得到毛泽东的赞赏。这个文件当时电力部另一位负责同志起草的，“全民办电”的口号，我是不赞成的，这件事“全民”不了。刘澜波的汇报中，没多强调这个口号。

刘首先谈电力如何才能赶上英国的问题。1957年，我国生产电力为190亿度，发电设备为442万千瓦；煤为1.2亿吨；钢为524万吨。按照1962年各个经济部门要求达到的水平，电力需要增长的倍数最大。英国1957年产煤2.2亿吨，钢2200万吨，电1070亿度。按照我们现在规划的发展速度和英国可能的发展速度推算，我国的电力赶上英国要比煤和钢迟几年。然后谈到，一五期间，工业增长1.32倍，电增长1.43倍，看来电的速度似乎走在前面，但实际情况正与此相反：电力速度慢了一年，这是由于我们的五年计划是4年完成的；1957年工业总产值超过原订计划15%，而电力设备超过原计划不过3.6%。因此，第一个五年中，电力工业的教训主要是速度慢了，应当先行，而未先行。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就是计划部门机械地搬用了“负荷平衡论”。平衡工作的任务，应当不是为了限制，而是尽可能保证和促进生产的发展；经济建设中不会也不应设想有绝对的永久的平衡。我们一切初创，缺乏经验，过分强调所谓

“负荷平衡”，死扣负荷，“有多大负荷修多大电厂”，必然脱离实际，造成各种人为的困难。所谓“负荷”，常常是一些纸面上的数据，而对群众的积极性，各经济部门的潜力，往往估计不足。结果，工业一增产，电就不够；负荷一来，电厂赶不上。刘于此举了两个很生动的例子。一个是，正像有人等着吃饭，才开饭馆；先计算好有多少顾客，才开多大的饭馆；不要说上座多了，就是客人饭量一增，要菜一多，就不够吃了。另一个是如何争取主动性。人们说，电像个舞伴，有人来请，才去陪舞。电确有此种特性，但此种常规也并非不能打破，舞伴也不是不可以请人跳舞的。尤其是大水电站和区域性火电站，由于其位置、规模、特性等，受到自然条件限制，用户完全可以主动与之协调配合，如耗电工业靠近水电站。实际生活常常是这样，原以为负荷不足的电厂，等建成之后，电很快就不足了；有了电，工业也就跟着来了。这就是电力平衡工作中的辩证法。（事实证明，刘家峡水电站带动整个兰州经济尤其工业的发展，没有前者就有后者。）

刘然后谈到依靠地方、依靠群众和大中小并举的问题。特别谈到机组大小容量的问题，从经济上说，6000、1.2万、2.5万、5万、10万千瓦的机组，其单位造价，逐级降低15~20%；在电网内和老工业区，还必须采用大机组。在全国广大地区，特别是专、县两级，现在需要的则是中型和小型电厂。随着农业、水利建设的跃进，农业用电问题是亟待解决的。现在各地举办的大小水利工程，绝大部分可以兼顾发电。我们的口号是：只要有跌水（落差），就应当发电。农民对于建设小水电站，积极性很高，花钱少，时间快，投资

收回也快。

刘专门谈到“水电为主、火力为辅”的问题，这在前面已经述及。他说，实现这个方针的关键，在于第二个五年中，水电要有个大跃进，而关键又在今明两年。这两年全国电力负荷必将有很快的增长。因此，今明年两年除了争取一些大型水电站及早开始建设外，还需要尽快建设一大批中小水电站。这方面目前有两个有利的条件：其一，各省近年来建设了并且正在继续建设着大批的水库工程，其中绝大部分都能结合发电；其二，水轮发电机制造部门的生产能力，有可能迅速提高，会比火电设备来得快。

从50年代直到现在，电力一直未能先行，全国一直处在电力紧张的局面，“限电拉闸”成为常态。回首当年“大跃进”时，有关电力尤其水电的大跃进论述，还是比较接近实际的，是应当也可能大跃进的。“水主火辅”的方针，当年如果坚持若干年，水电必将发展得快一些，也决不会因此就影响火电的发展。

话扯得太远了，还是回到广州会议来。

毛泽东在大家发言中的插话，我现在只记得这样两次：

一次是，关于提意见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身边有个胡乔木，喜欢顶人，有时把你顶得要死，顶到墙上动不得。会后，我连忙将这个话告诉田家荣基，让他转告乔木。据田后来说，并没有这样严重的情况，主席是夸张其辞。后来在庐山会议时的感受，乔木在毛泽东面前还是很小心谨慎的，哪里谈得到“顶得要死”。

另一次是，李葆华谈水利运动的新形势，谈到过去治淮8年，国家投资14.5亿元，做了16亿多土石方；今年仅安

徽一省，主要靠群众力量，就做了 50 多亿土石方。然后谈到，水利建设的正确方针，应当以蓄水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群众自办为主。而不能以排水为主，以大型为主，以国家举办为主。关于治淮的问题，毛泽东是非常关心的，早就题过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他同曾希圣接触较多，对淮河的情况比较熟悉。曾希圣对治淮方针和办法，有自己一套看法，同当年淮委技术方面的负责人有过争论。曾算过帐：国家投资，每千方土要支出 364 元，蓄千方水要支出 290 元；现在群众所做的工程，前者只合 2.3 元，仅为过去 1/158；后者只合 1.8 元，仅为过去 1/160。不论这个算法如何，是否准确，但以此对“国办为主”，对技术专家的指责，是极其严厉的。加以过去修的佛子岭、梅山等水库以防洪为主，没有结合灌溉（水电站和灌溉都是后来补上的），而涝灾在安徽对群众的威胁更大，涝灾比洪水为害频繁得多，旱灾又占天灾的一半。曾希圣的这些意见，毛泽东都知道。因此在李葆华发言中，毛泽东就指出：“蓄、小、群”同“排、大、国”，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实质问题是办水利究竟依靠谁，是靠群众，还是靠专家？于是又把科学家在大大挖苦了一顿：科学家不科学，还直指钱正英的名字。其实，当时毛泽东并不知道，关于“蓄、小、群”的问题，钱正英早就作了理论的谁，完全同意这个方针。会后，工业部长们整理了一个简短的“会议纪要”，其中本来写上毛泽东批钱正英的话，后来一商量，将这几句话勾掉了。

总之，关于 15 年赶英国的问题，大家劲头十足，都考虑可以提前；就是比较落后的石油，余秋里也讲得很肯定，干劲与信心，决不亚于冶金和化工等部。

小岛位于珠江边。有一天上午开完会后，中午在一艘很宽大的游船上吃午饭，还记得吃红烧狗肉，装在瓦钵内，一共两桌。饭后，毛泽东即下江游泳，能游者都换上泳裤下水了。我也冒冒失失跟着入水，岂知 20 多年没有在这种大江大河中游过，下去不多时，就适应不了，连忙上到跟随着的船上来。毛泽东和他的随从们，一直游到珠江口。

“戊己诗”中有这样四句记广州会议：  
广州三月赛杭州，赤县当追约翰牛。  
艇上尝珍须尽兴，珠江口上一同游

## 全面发动“大跃进” 的八大二次会议

召开八大二次会议，是成都会议上讨论决定的。成都会议之后不久，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召开八大二次会议的正式通知。1956年9月党的八大修改通过的党章，曾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改为常任制，每届5年。八大二次会议是改常任制之后召开的，它是中央党史上唯一的一次这种性质的会议。

经过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大跃进”势头已起，毛泽东关于高速度发展战略的一系列思想和主张逐渐提出来，并为以后几次中央会议所接受；特别是他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经过酝酿在成都会议上已作了初步概括。当然，“大跃进”的发动还是初步的，党内外对“大跃进”的认识尚不一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毛泽东自己也还为“尚待完备”，“不可说已经最后形成了”（成都会议上讲话）。八大二次会议就是为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发动“大跃进”，统一党内外思想，正式制定和系统阐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而召开的。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几次讲到，不开会大家想法不同，开个会，采取比较合理的意见，作个报告，搞个决议，全国人民就有了方向。会议开了17天，充



满着一种极为热烈的气氛，可以说正式通过“总路线”是“大跃进”运动全面发动的一个标志。

5月5日上午，大会举行了预备会议。通过了大会的日程和主席团名单，并组成华北、东北、西北、西南、中南、华东、中直、军队等八个代表团。主席团由44人组成，常委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乌兰夫、柯庆施、李井泉。八个代表团的正副团长分别是：华北：林铁、陶鲁笳；东北：欧阳铁、吴德；华东：柯庆施、曾希圣；中南：陶铸、王任重；西南：李井泉、谢富治；西北：张德生、张仲良；军队：聂荣臻、萧华；中直和国家机关：杨尚昆。代表团内按省和部门分组。

大会的正式代表共977人，列席代表387人。列席代表中有中直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人、解放军总部和部队的一些负责人、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妇联的负责人，县委书记、大城市的区委书记、省辖市（没有代表的市）的市委书记、工矿企业的党委书记、厂长和技师，乡、镇、合作社的党委（支部）书记、农业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的主任，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党委书记、校长、院（所）长等。代表的方面如此广泛，是前所未有的，目的就是要在全党上下、全国范围造成一个规模和声势巨，的“大跃进”运动。

大会于5月5日开幕，5月23日闭幕。全体会议开了15次，都是半天进行大会发言，其他时间小组讨论。主要议程有四项：一、听取并讨论通过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二、听取并讨论通过邓小平所作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报告；三、听取谭震林

作关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案）》说明；四、增选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八大召开时，我是列席代表。八大二次会议时，大会所有文件都发给我了，会议的情况我都及时了解。

## 刘少奇的报告

5月5日下午，大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邓小平作了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报告。

刘少奇的报告是会议最重要的议程。报告分三个部分：一、目前形势；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三、今后的任务。报告集中阐述了自1956年以来，党中央特别是毛泽东关于国内外形势、政治关系、经济建设等问题的一系列分析、观点和主张，对其中有些思想观点还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关于形势，报告援引了毛泽东的判断，世界形势的发展在最近达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人心归向、人口众多、生产发展速度等方面，早就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帝国主义阵营的首脑美国，现在已经陷入新的严重的经济危机，生产猛烈下降，失业大量增加。这个危机正在冲击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矛盾加深了，帝国主义各国之间首先是美、英、法三国之间的矛盾扩大化了。报告说，东风已经压倒西风，而且将继续压倒西风。

关于国内形势，报告首先肯定：整风这条总纲带动了党和国家的全部工作。党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发展成为全民的整风运动，而全民的整风高潮，又进一步地推动了全民的生产和建设的高潮。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我国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带有决定意义的斗争。由于这个斗争的胜利，就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形成了一个共产主义的思想大解放，从而深刻地改变了我国的阶级力量的对比。

报告接受并阐述了毛泽东有关“两个劳动阶级和两个剥削阶级”的观点，认为：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资产阶级右派实质上是帝国主义者、封建买办残余势力和蒋介石国民党的代理人。另一个是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大多数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处在动摇的过渡状态。两个劳动阶级：一个是农民和其他原先的个体劳动者，这些劳动者的绝大部分已经加入了合作社，愈来愈成为社会主义的热烈拥护者。一个是工人阶级，这是全国人民中的最先进的队伍，是我们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

报告根据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正式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结论，从而认定：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资产阶级右派在 1957 年的进攻中表

现的就是如此。

报告特别谈到了 1958 年上半年的形势：1958 年的春天，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全面跃进的春天，无论工业、农业和其他事业，都有比以前更大更快的发展。报告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社会主义革命，要求人们精神的解放；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人们精神的解放，又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跃进；这种生产力的跃进，又继续刺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改进和人们思想的前进。马克思预言过，无产阶级革命将使我们进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如果说我们过去在革命中经历过这样的伟大时期，那么，我们现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又是在经历着这样的伟大时期吗？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报告重点阐述的内容。报告首先回顾八年多建设过程中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逐步形成的情况，其中特别对“反冒进”问题予以严厉批评。报告说：在一九五六年跃进中也曾出现了一些个别的缺点，这些缺点，比之当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本来是很小的。但是当时有一些同志不适当地夸大了这些缺点，对于当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却估计不足，因而认为 1956 年的跃进是一种“冒进”。在反对所谓的“冒进”的这种空气下面，多快好省的方针，农业发展纲要 40 条，竟然受到了某些人的怀疑。其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 1957 年生产建设战线上特别是农业战线上的进展。但是不久，党就纠正了这个错误。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1956 年——1957 年——1958 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现在全国的广大群

众对于生产的跃进充满信心，而且决心把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继续提高。

报告说：在8年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起来的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已经在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证明了自己的正确性。虽然这条路线还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考验，并且使它继续发展和完备起来，但是我们认为，它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可以确定下来了。根据几年来人民斗争的实际经验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发展，党中央认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国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地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计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成都会议上陈伯达受命对总路线的概括比起来，这个报告的概括内容更完整，表达更明确。

在阐述总路线方面，报告特别突出强调速度问题，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经济本来很落后，我国的外部还有帝国主义，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设，才能尽快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提高

人民的生活水平。报告批评了对高速度持有异议的意见：有些人不认识提高建设速度的重要性，不赞成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提出了这样那样的反对意见。

——有些人说，提高建设速度，会使人们“过于紧张”，宁可慢一点好。但是，难道慢一点就不紧张吗？要知道，6亿多人长期处在贫穷和缺少文化的状况下，用很大的努力才能勉强维持很低的生活水平，不能有效地抵抗自然灾害，不能迅速地制止可能的外来侵略，完全处于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被动地位，那才是一种可怕的紧张局面。为了摆脱那种局面，几万万人民鼓起干劲，满怀信心地投入热烈的劳动和斗争中，这是我们应当双手欢迎的一种革命的常规。这种“紧张”完全没有什么可怕。有人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说得正对！难道我们能够不好6亿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吗？难道我们应当好小喜过，绝功弃利，安于落后，无为而治吗？

——有些人怀疑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会造成浪费。事实证明，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可以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潜在力量高度地发挥起来，可以在整个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中造成最大的节约。反之，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限制人民群众和积极性和潜在力量的发挥，就一定要造成人力、财力、物力和时间的浩大的浪费。

——有些人又担心执行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会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在财政的收入和支出之间，造成不平衡。不平衡一定会有的，不实行这个方针，不平衡也会永远存在。问题是采取什么方法去平衡，是使落后赶上先进，还是让先进迁就落后。可问的不是出现不平衡，而是对于不平衡惊慌

失措，要求先进向落后看齐，要求削足适履，因噎废食。

——有人怀疑农业生产究竟能不能迅速增长，他们曾引经据典，证明农业的发展只能是慢慢的，并且是不能保证的。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长的速度还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消费就多，积累就不能多。由此，他们对于我国农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作出了悲观的结论。他们只看到人是消费者，人多消费更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多，积累得更多。显然，这是一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报告提出：党的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系统地改进国家工作，加强各级党组织的工作，百折不挠地为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而斗争。今年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是苦战三年的第一年，也是争取十五年赶上英国的第一年。今年的成绩是对整风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重大考验，大家都在看着这一年究竟怎样。因此，对于今年的工作必须努力抓紧，努力做好。在这里，重要的是领导真正能够站在群众的前面，运动的前面，而不要落在群众的后面，运动的后面。现在群众的热情很高，这是一切事业能够迅速向前发展的基本依靠，我们应当十分爱护，绝不允许向群众泼冷水。报告也提到，领导者必须把革命的热情和务实的精神结合起来，不但要善于提出先进的指标，而且要善于及时地采取有效措施来保证实现这个指标，切忌空喊和虚夸。

可以说，刘少奇的报告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思想，尤其充分反映了从南宁会议到成都会议及其后的许多想法。这方面给我的印象很深。

5月6日、7日下午，各代表团小组分别举行会议，讨论刘少奇的报告。大家意见比较集中的有以下这些方面：

——关于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究竟哪种最为危险？多认为实际工作中经验主义多一些，更顽固些。“反冒进”的思想主要属于经验主义，对“反冒进”带来的损失和影响估计不足，这是路线性质的错误，必须予以彻底批判。还有人发言，联系到八大的报告，中央有的同志对毛主席的意见是否尊重。八大没有提多快好省和农业40条，二五计划的指标也很保守。许多人认为，教条主义在工业交通系统最为严重，很多规章缺席与此有关，严重束缚干部思想。

——要彻底破除迷信，做到真正的思想大解放、思想大革命。对毛泽东不存在迷信的问题。过去的学习偏重学马恩列斯原著，而对毛泽东的著作学习得不够，今后干部必读，应以学毛著为主，这是活的辩证法，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真正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有人提出，应当确定毛泽东主义的提法，也有人认为这不够妥当。

——关于建设的速度问题，还存在种种错误思想，“右比左好”、“慢比快好”、“技术条件不够”等右倾保守思想，也还没有完全解决。这方面要坚持毛泽东提出的，以虚带实，以红带专，以政治带业务。还必须批判洋奴思想，肃清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对那种认为加快建设速度，增加国家积累，就会影响人民生活的改善，会出问题的说法，也应加以批判。

——对“两个剥削阶级”的提法，讨论中无人有异议。

——关于总路线的提法，多快好省，开始作为方法提



出，以后作为方针提出，最后才作为路线提出。湖南组有人提出，是否可以在“多快好省地”后面改写为：“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浙江组有人提出，最好还加上“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的内容。——讨论中也还有比较冷的一面。如在农业产量和单产上，到1972年超过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有人认为这可能办不到，报告中应留有余地。如“7个月内扩大灌溉面积3.5亿亩”，估计有些设施不一定顶用，可否改为完成初步灌溉面积。以如“今年1至4月，全国造林2.9亿亩”，按成活率，打个7折为好。

后来在讨论谭震林关于农业纲要说明时，也有人认为“麻雀、老鼠、苍蝇、蚊子现在打得看不见了，但是也可能一到夏天，还可能出现”。有人认为现在“四害”还没有被“打得看不见了”，到夏天也不是“可能出现”，而是“肯定会出现”。

从5月8日开始，主要在9日、10日，各组讨论邓小平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大快人心”。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都一致谴责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错误，认为苏联批判纲领的文章还不够尖锐。

## 毛泽东第一次讲话

5月8日下午，在江渭清、张平化等7个人发言后，毛泽东在大会上作第一次讲话，主要讲破除迷信的问题。

我讲一个破除迷信。刚才不是有同志讲破除迷信吗（指罗天代表的发言）。我们有些同志有好些怕，其中有的怕大学教授。整风以后，最近几个月以来慢慢就不那么怕了，或者怕得没有那样厉害了。有的人已经接受了大学教授的聘书，我在报上看到了柯庆施同志接受复旦大学的聘书，去当教授，这就是不怕的表现。还有的也准备去当教授，这是讲怕资产阶级教授。是否也怕无产阶级教授？我看有的。譬如说，怕马克思，他住在很高的楼上，要搭上好几层楼梯才能爬得上去，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在成都会议上讲过，不要怕，因为马克思也是人，他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一个脑子，跟我们差不多。不过他脑子里有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他写了不少的书给我们看，我们不一定都要看完。杨献珍同志在不在？（杨答：在。）你看完了没有？你看完了，你到楼上去；我没有看完，还在楼底下。我们没有看完他的著作，都是楼下人，但不怕。马克思的东西，不一定都要读完，读一部分基本的东西就够了。但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列宁说的做的，许多地方都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有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所以在实际方面是超过了。马克思那时有那时的条件。他没有做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际也超过了马克思。在实践中就会产生出道理来。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我们革成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到意识形态上，就成为理论。

我们理论水平不高，现在不高，但不要怕，只要努力就能上去的。楼梯是可以造成的，而且还可以造升降机。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看不起自己。我常常和一些同志谈，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宣传那一套，要服从洋

人，服从外国一百多年了，吓怕了，什么都怕。封建主义宣传那一套，要服从孔夫子，总觉得自己不行；对孔夫子说来，我们也不行。鸦片战争以来，对外国人来说，我们不行，我们怕外国人。从前怕孔夫子，董老，你不是服从过孔夫子吗？这是什么道理？那时“非圣即违法”，反对圣人就是违犯宪法。对外国人说，我不成；对孔夫子说，我不成，这是什么道理？我问过在我身边的一些同志，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他们都摇头说，不是的，住在地上。我说，不，我们是住在天上，在地球上看到别的星球是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们一看我们，不就是在天上了吗？所以我说，我们是住在天上，同时又是住地上。中国人喜欢神仙，我问他们，我们算不算神仙？他们说不算，我说，不对，神仙是住在天上的，我们住在地球上，也即住在天上，为什么不算神仙？如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们不是把我们看成神仙吗？第三，问他们，中国人算不算洋人？他们说，不算，外国人才算洋人。我说，不对，中国也叫洋人。因为我们看外国人是洋人，外人国看中国人不也是洋人吗？这说明在这些看法上，是有迷信思想。

有一种生物叫细菌，它虽小，但在某点上来说，它比人厉害。它不讲迷信，干劲十足，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天不怕地不怕，目中无人，它要吃人，不管是谁，它都要钻进去。即使你是 80 公斤的体重，你有了病，它也要吃掉你。在它看来，什么人都不算数。细菌的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不比某些人强吗？

自古以来，很多学者、发明家，创立新学派开始都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的，都是被人看不起的，或是被压迫的

人。这些人到后来才变成壮年、老年、学问多的人。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这是不是一个普遍规律？不能完全肯定，还要调查研究，但是，可以说在部分如此。他们变什么能变成发明家、学者、英雄呢？是因为他们方向对。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最怕事的是最无创造性的人。“人怕出名，猪怕壮”，名家往往是最落后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成了名，年纪大了，有了地位了，不受压迫了，忙得很，就不去研究学问了。当然，不能全盘否定所有名家，也有例外的。年轻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

战国时候秦国有个甘罗，大概是甘茂的孙子，他 12 岁当丞相，还是个少先队员，红领巾。当时吕不韦是个大政治家，但没有主意。甘罗给他出了个主意，叫他亲自出马到赵国去，后来事情果然成功，甘罗就作了丞相。

汉朝有个贾谊，17 岁就被汉文帝找去了，1 年升了 3 次官，后来贬到长沙。他写了两篇赋，《吊屈原赋》和《鵩鸟赋》；又回到朝廷，写了两篇文章，中《治安策》和《过秦论》。我看，他也是古时的秦汉史专家。范文澜同志在场不在场？对不对？请你考证一下。他写了几十篇作品，留下来的是两篇文学作品（两篇赋）和两篇政治作品（《治安策》和《过秦论》）。他死时只有 33 岁。

汉朝刘邦年纪比较大。项羽 24 岁起兵，3 年为诸侯，后来，自立为西楚霸王。又跟刘邦打了 5 年仗，死时才 32 岁。霸王别姬应当还是青年时候，现在唱戏扮相不对，给霸王挂胡子，我看应该扮小生。

韩信也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人，他在年轻的时候曾受过

“胯下之辱”。

孔夫子在青年时也没有什么地位，当过吹鼓手，在人家办丧事时给人家喊礼，后来教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也是短期的。鲁国不过几十万人，只顶得上我们一个县那么大。他那个司法部长，只顶得上我们县政府一个科长。他还当过管钱的小官，相当于我们农业社的会计。但他学了很多本领。

颜渊是孔子的弟子，算个二等圣人，他死时才 32 岁。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也是青年时候的事，不过十几二十岁，他是印度当时一个被压迫民族的王子。

《西厢记》里的红娘是个有名的人物，人家都是知道的，她是个青年人，是个奴婢。但她很公正，很勇敢，敢于冲破老规矩，帮崔莺莺、张生那么大的忙，当时是不合乎宪法的，是违犯婚姻法的。老夫人打她 40 大板，来个拷红受审，但她不屈服，讲理，把老夫人责备了一顿。究竟是老夫人学问好，还是红娘学问好呢？谁有创造？红娘是发明家，还是老夫人是发明家？

南北朝时候有个荀灌娘，河南临颖县人，是个 13 岁的女孩子，顶多只是初中一年级学生。她和父亲被困的时候，敢带几十个人杀出重围到襄阳去搬兵。你看她有多大本事。

唐朝诗人李贺，死时才 27 岁。唐太宗李世民起兵时才 18 岁，做皇帝时只有 26 岁。李贺、李世民都是贵族出身。

山东罗世信（罗成）也是 14 岁还是 18 岁起兵，打仗很勇敢。还有杜伏威（山东章邱人）16 岁就当了大将。唐朝诗人王勃，《滕王阁序》的作者，唐初四杰之一，也是一个青年人，死时才 29 岁。宋朝的名将岳飞死时才 38 岁。

范文澜同志你说这些人和事对不对？你是历史学家，我说的不对，你可要订正呀！

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壮年、老年时创造出来的，而是在青年时创造出来的，写《共产党宣言》时，才29岁。列宁在1903年31岁时，创造出了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

孔明27岁时当军师，周瑜也是青年人。孙权原来的统帅程普是个老将，但孙吴打曹操都用周瑜挂帅，为左将军，程普为右将军。程普先不服气，后来周瑜打了胜仗，周瑜死时才36岁。这里还有我的老乡黄盖，湖南醴陵人，他也在这个战役中立了功。我有这个老乡，真不胜光荣之至。

晋朝的王弼七八岁就是哲学家，注解《易经》和《庄子》。24岁时死去。

安眠药的发明者不是什么专家、医生，是法国一个小药房的司药。我在一个小册子上看到的。为了发明安眠药，他共做了10年的试验，做试验时几乎丧失了生命。试验成功了，法国政府不赞成，说他犯法；德国却很欢迎，把他接过去了，给他开庆祝会，给他出书，于是安眠药才出世了。

盘尼西林——青霉素是一个染匠发明的，因为他的女儿害了病，没有钱送医院，没办法就在染缸旁边抓了把土，用什么东西和了和，吃下去就好了。后来经过化验，这里头有一种东西，就是盘尼西林。

达尔文，大发明家，青年时开始信宗教，也被人轻视。他于是研究生物学，到处跑，南北美洲、亚洲都跑到了，只是没有到过上海。创造进化论时也是个年轻人。

得诺贝尔奖金出名的杨振宁、李振道当时也是年轻人。

不过 30 左右，台湾成立了科学院，胡适当院长，把他俩请去当院士。

郝建秀，全国人大代表，是青岛纺织厂的女工，她在 18 岁时就创造了纺纱的先进方法。

还有共产党员音乐家、国歌的作者聂耳，也是年轻人。

《封神演义》里的哪吒，本领很了不起，他是托塔天王李靖的儿子，也是个年轻人，他是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也不怕的。

南北朝北魏的兰陵王，也是一个少年将军，他很会打仗，很勇敢。有一个专门歌颂他的曲子叫《兰陵人阵曲》，据说这个曲子现在日本。

现在的许多优秀的乡干部、社干部，都是年轻人。总之，有为的年轻人很多。

举这么多例子<sup>①</sup>，目的就是为说明年轻人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胜过学问多的人。不要被大学问家、名人、权威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被某些东西所束缚，要从这种束手脚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要发挥人的创造性。

劳动人民的创造性、积极性，从来就是很丰富的。过去在旧制度压抑下没有解放出来。去冬今春就看到了，开始发挥创造性了。要把劳动人民中蕴藏着的无穷无尽、丰富的智慧、创造能力解放出来；办法是揭盖子，揭压抑创造性的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爆发出来。过去有不少人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秘得很，认为“搞工业化

① 共举了 29 个例子

不容易呀”。总之，迷信很大。我也不懂工业，可说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同几个搞工业的同志谈过，我说，不要把它看得那样严重，这是不正常的心理状态。开始不懂，学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我看，大概只要十几年功夫，我们的国家就可以变成工业国。对于这类事情首先要藐视它，然后在具体做的时候要重视它。七搞八搞，我看只要 15 年就可以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并且还要赶上美国，照李富春同志的说法，最多 20 年也就够了。美国算不算数？也算数，也不算。美国有点工业、科学，因此第一是算数；第二不算数，也能赶上和超过的。现在你厉害，过几年我们赶上了，就比你厉害。争取 15 年，打个保险系数多一点时间，20 提是办得到的。今天《人民日报》上登的，“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我看这个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这样说是不是狂妄呢？不是，我们不是狂人，是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者，革命者。我们主张俄国的革命热情与美国的求实精神统一起来。在文学上，就是要革命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统一。

我们的革命精神，不是与实践脱离的，而与实践相结合的。中国应当成为世界第一个大国，因为中国人口世界第一个多嘛！过去林彪同志在延安曾谈过，将来中国应比苏联强。那时我还有点不大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完全有可能。我们这么多人，现在 6 亿，再过 10 年、15 年 8 亿，人多总要做事，总不能光睡觉嘛！吃了饭就干社会主义，无非是搞工业、农业、文化科学嘛！因此说，十几二十年就可以赶上世界上一切国家，还可能超过美



国。在座有没有新华社的同志，可不要发稿，对外还是15年赶上英国，美国让苏联赶，大家分工赶，不过我们也能赶上。15年赶上英国对内给你们讲了，你们是党的负责干部，是党人八大代表；对外就不要讲了，不要登报。不要大国沙文主义，这是丑恶的东西，是低级趣味。《法门寺》这个戏里有个角色叫贾桂，刘瑾手下的人，刘瑾是明朝太监，实际上是当时的“内阁总理”。有一次，刘瑾叫贾桂坐下，贾桂说，我站惯了，不敢坐，还说站着好。这就是奴隶性。中国人当帝国主义的奴隶当久了，总不免要留一点尾巴，要割掉这个奴隶尾巴，要反掉贾桂作风

人要谦虚 谦虚有两种：一种谦虚是庸俗的谦虚，一种是实际的谦虚。教条主义是过分的谦虚，模仿派，什么都照抄别人的，抄外国的，看不起自己。你自己干什么的？你就不动脑筋。中国的旧诗中，有一种拟古体，就是过分的谦虚，自己没有独创的风格，一味去模仿别人。修正主义者也是一种过分的谦虚。铁托无非是抄伯恩斯坦的、新修正主义抄老修正主义，新伯恩斯坦抄老伯恩斯坦。教条主义是一国的无产阶级抄另一国的无产阶级的。有好的就抄好，不好的也抄了，这就不好。抄是要抄的，但要抄的是精神本质的东西，而不是皮毛。如十月革命是普遍真理。《莫斯科宣言》的九条共同纲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说的是五条，《莫斯科宣言》分成九条，是普遍真理。各国的共同东西要照抄，少一条也不行。共同的东西，这就是要把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只是照抄，那是过分的谦虚。非普遍真理，那就不能照抄。普遍真理有的国外的东西也不能照抄，就是国内的东西也不能照抄。如土改时中央没有特

别强调哪一个地方的经验，就是怕照抄。现在工作中，也要注意这个问题。南方、北方，各地有各地的经验，不能乱搬，有共同的经验，也有只有一地适用的经验。

修正主义者都是资产阶级化了的人，资产阶级照抄资产阶级的东西。伯恩斯坦、铁托就是一例。

我们要学列宁，要敢于插红旗，敢于标新立异。当然，标新立异也有两种，一种是插红旗，是应当的，如列宁向第二国际的标新立异，另插红旗。旗帜横竖都要插的。一个合作社、一个生产队，就有一面旗帜。无产阶级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一定会插白旗；与其让资产阶级插，不如无产阶级插。不要留空白点。资产阶级的旗子，我们要拔掉它，要敢插敢拔。

列宁说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这话说得好，现在还是真理，还是适用的。现在我们先进，西欧落后。将来印度、印尼也不弱。……共产党当政，可以许多不同的党存在，只要不违犯宪法就行，但像章罗那样的，我们就要搞掉它。事物总是要走到它的反面。10年15年后，那时赶上了英国，甚至赶上美国，工业化了，钢不是500万吨，而是1亿多吨，8亿人口了不起。那时就可能翘尾巴，看不起人，神气就来了，就看不起小国，看不起别的画家。

我们藐视资产阶级，藐视神仙，藐视上帝，但不要藐视小国，藐视自己的同志。对帝国主义，老子瞧不起人，人瞧不起老子。将来赶上英国，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时，情况就会变好。将来如果翘尾巴，我看不怕，我们现在就讲清楚。我看有办法防止，狗翘尾巴，泼一盆冷水就不翘了，不一定打棍子。

我们有的时候是泼一泼冷水的。

不正当的自信心，庸俗的自信心，虚伪的自信心，那是不允许的。不建立在科学上的谦虚，不叫谦虚。真正谦虚要合乎实际。我们常常同外国人说，我们现在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还落后，才开始建设，还穷等等。这在外国人看来是谦虚，在我们说来这是实际。一般的是合乎实际为谦虚。当然，过分谦虚就不对了。这种说法类似鲁迅说的，“把寻常的事物，过分加以强调，就变成讽刺”。是不是这样？周扬同志，你是文艺理论家，你说呢？周扬最近一篇文章写得很好，我很赞成，特别是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好，解决很多问题。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sup>①</sup>，我看了很高兴，这是站起来说话了，这才像个样子。这篇文章引了许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我国史学的传统，引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他有“以古非今者族”的禁令。（林彪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6000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了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事实总是要走向自己的反面的。希腊的辩证法，到了中世纪形而上学，是走向了反面。以后文艺复兴。这就是否定之否定。

<sup>①</sup> 载1958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中国也是如此。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这是辩证法。以后封建时代两千年来的经学，是形而上学。现在又讲辩证法了，即走向反面了，是不是？范文澜同志，你对这些很熟悉。

刚才我说15年后会走上反面，会翘尾巴。当然我们并不因为事物要走向反面，就不加劲干了，难道怕变成大国沙文主义，就不为建成社会主义大国而奋斗吗？即使将来出现大国沙文主义，也不要怕，出了大国沙文主义也不一定是坏事，也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的，总会有一个正确的东西代替它的，会有马克思的非大国主义来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有什么可怕。那时，也不可能是所有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全部人都变成大国沙文主义。

由列宁的辩证法到斯大林讲形而上学。当然斯大林也不完全是形而上学，他懂得辩证法，但是不深刻。苏联到现在又讲辩证法，这也是否定之否定。

人民群众中的创造性，是客观存在。设置对立面很重要，对立面是客观存在的。他们想说话，我们就让他们讲，让他们大鸣大放。这是有计划地这样做，目的是设对立面。整了右派后，我们有些同志对自己的错误、缺点就松懈了，不想整改了；我们又强调“双反”，强调了大字报，上海几万万张大字报，这样对立面就出来了，逼得工厂、学校党委非整改不可。所谓对立面，是要客观上存在的才能设置起来，客观不存在的东西，是随意设置不了的。

讲多了吧，我讲完了。这个题目叫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也不要怕马克思。

## 卑残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关于破除迷信，关于年轻人胜过老年人，关于学问少的超过学问多的，毛泽在会上不止一次讲过。5月18日晚，在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他还提出要编一本各种发明家小传。他说：一本近300年来的各种科学技术发明家的小传，写明其年龄、出身、简历等，看看是不是都是没有多少学问的人。各行业搞各行业的。科学家华罗庚是个中学生。苏联搞出人造卫星的齐奥尔科夫斯基，是个不出名的中学教员，主要教数学，搞卫星是他的副业，慢慢搞成专业了。当然美国也有发明，但发明者不是杜勒斯，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不知道。一个人能够发明什么，学问不一定很多，年纪也不一定大，只要方向是对的。二三十岁敢于幻想。人学问多了，就不行了。白蚂蚁全世界没有办法，广东一个只读过初中的青年学生想出了办法。中国古代楚人“卞和”（即和氏璧的和氏）得璞玉于楚山，献于厉王，被割左脚；又献于武王，被割右脚；文王就位时，第三次抱璞玉哭于荆山之下，文王叫玉石匠割开，才识此玉。“完璧归赵”，就是这个璧。瓦特是个工人。富兰克林是个报童。种试验田要三结合——领导、技术人员、老农（老工人），只有这样，外行才能领导内行。总而言之，我这些材料证明一条：是不是贫贱者最聪明，尊贵者最愚蠢，以此来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要少一点奴隶性，多一点主人翁的自尊心，鼓励工人、农民、老干部、小知识分子的自信心，自己起来创造。

同一天，大会印发了国家计委倪伟、王光伟给计委党组的一份报告。报告主要讲辽宁有一家技术力量薄弱的安东机器厂，现有 500 多人，没有工程师，只有一个技术人员和几年老工人，原制造拖拉机零件，经过修理和改装速度过快、牵力太小的进口拖拉机，使之速度降慢，牵力加大，可以多耕地，并节省燃料。他们又摸索到制造内燃机的经验，终于克服种种困难，于 1957 年初试验成功一台 30 马力的拖拉机。现在安东市委准备将此厂同安东动力机厂合并，正式大规模生产适合本地使用的拖拉机。这种拖拉机虽然落后、笨重，但构造简单，操作方便，修理容易，铸铁等原材料也易于取得。

毛泽东将此件冠以“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题目，写了下面这个按语：

请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收集材料，编印一本近 300 年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这个工作，科学院和大学也应当做，各省市自治区也应当做。各方面同时并举。如果能够有系统地证明这一点，那将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无所畏惧创造精神，对于我国七年赶上

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卞和献璞，两刖其足；“函关月落听鸡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难道不是的吗？

这个批语在会议期间以及“大跃进”初始，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发生过广泛的影响。

最早编出发明家小传的是二机部。5月19日，毛泽东提议的第2天，二机部部长赵尔陆即向毛泽东送上《关于机械、电气技术史上主要发明家的材料》。这个材料搜录了机械电气技术史上41个重要发明家的小传。赵尔陆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史实完全证明了主席的指示：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大都是从劳动人民中产生出来的，大都出于那些社会地位低、学问少、条件差的人们。这41个知名的机械电气技术发明创造者中，有25个是劳动人民出身，基本上没有受过学校教育，在发明前是被社会看不起、受打击摧残的。有8个人虽曾受过学校教育，但都不是机械电气的‘内行’，原来从事其他职业，是‘外行’钻研成‘内行’的。真正受过专门的技术教育，并在机电工厂或研究部门工作的只有7个人。但是在发明前，也只是普通工程师、研究人员、助手等，并不是什么权威。”第二天，毛泽东就向大会批发了这份材料。此外，大会还印发了《四百个科学技术创造发明家的小传资料（初稿）》、《沈鸿同志关于“技术科学创造和发明者小传”的说明》、《关于李始美治白蚂蚁的情形》等材料。

毛泽东讲话后，大会分团分组讨论中，破除迷信的问题

成为一个重要内容

贵州组在讨论中认为，毛泽东破除迷信的讲话，不仅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对促进文化和技术革命尤其重要。贵州同志较普遍地存在着一种自卑思想，以为贵州交通闭塞，工业落后，各个方面都比不上外地，矮人一头，不敢力争上游。在工业上，有些人认为离开几个工程师，戏就唱不起来；在理论上，则认为“山沟里出不了好秀才”。有许多事情本来可以办，但有人还要回顾历史，观望外地，好像前人和别人没有办过的事情，就不可轻易去办。金沙县委书记赵广玉说：“我的迷信思想就很严重，既怕教授又怕洋人。县里中学批评我去得少，是同我怕教授分不开的，害怕教员提出难题，不好解答。对理论问题更感高不可攀，在县报还可写点文章，但省以上报刊就没有勇气投稿了。这次来京开会，确定要我搞个发言稿，几乎成了思想包袱，心情紧张得拿起笔就打哆嗦。去年苏联专家说，我县群众遍地采磷矿，在苏联就算违法。我很重视，认为这是专家说的，不可忽视。现在看来，遍地开花，遍地结果，群众性的办工业还是对的。”

北京组的讨论认为，过去许多老干部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因为同他们接近时，没有共同语言和感情，就敬鬼神而远之。这些人可以“通天”，在学校稍有声色不妥，就到处告状，有些干部对这点很恼火。这些人用“洋人”、“外国”、“学问”吓唬人，实际上没有什么学问。如马寅初近来写一本书，题目很大，胡说一气，笑话连篇；从前蔡元培一篇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也是通篇不知所云。应该打破理论工作的神秘观点，只要把实际中的经验和群众中的许多创造总结出来，就是很好的马克思主义。



甘肃组的代表认为，甘肃人民群众在学习技术、发明创造和破除迷信上，做了许多事情。但由于不少干部存在着严重的自卑心理，认为自己落后，看不起自己的东西，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总结、提高和推广，以致发生了不少“墙里开花墙外红”的事情。比如：临洮县全民卷入了改良工具的高潮，县农校教职员和学生创造成功了风力发电机，目前正在研究一种树木速长注射液；该县一个14岁的小学六年级学生张裕富，为引洮工程创造了3种工具。平凉市中学教员早在1955年就创造了太阳能灶，上海还去人参观学习过，但在甘肃省内没有很好推广。

江苏组讨论中，代表们体会主席的指示，主要是要我们打破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做。大家认为，只有彻底改变由于我国过去长期穷、白、弱养成的民族自卑感的那种精神状态，才能更好地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方针、总路线。钱俊瑞在发言中说，关于怕知识分子问题，1953年以来，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强调他们的作用一面多，而对他们必须经过改造的一面强调得不够，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更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这种情况。主席指示对知识分子必须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而把他们放在应该改造、消灭的阶级之内，才又把对知识分子的认识端正过来。

山东组在讨论中一致认为，主席提出破除迷信思想的问题很重要。因为现在还有一部分人很迷信教授、科学家，而对劳动群众的创造发明容易忽视；对古人的东西总看成是天经地义，而对现代的新生事物往往忽视；对外国的东西很重视，而对本国的创造发明和潜力则重视不够。所以破除迷

信，从种种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敢想敢干，是非常必要的。

实际上，所谓“破除迷信”变成了破除科学。“高贵者最愚蠢”，把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不放在眼，什么专家、学者、教授统统不在话下。这是会议导致的一个严重恶果。会后，江苏省委《关于传达和学习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情况的报告》很能说明问题。《报告》说，省委全会“大破了对于‘科学技术’和‘科学家、技术人员’的迷信……科学技术并没有什么神秘，自然科学就是生产斗争经验的总结，把我们现在在生产上所干的一套总结起来，有许多就是最新的科学技术，有些还是世界科学技术的尖端（如我国小麦亩产4000多斤）”。《报告》说，“从这次交心运动<sup>①</sup>中，暴露出这些道貌岸然的‘学者’，有的是对党有刻骨仇恨，愿意带着花岗石的脑子去见上帝的顽固分子；有的是一贯崇美亲美的投机政客和实行奴化教育的‘专家’；有的是不择手段弄虚作假骗取名利的大骗子手；有的虽有一些真才实学，但对却是以奇货自居，向党向人民讨价还价的贪心分子。具有真才实学而又诚心诚意为劳动人民服务的还是少数……我们决心通过交心运动，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贯彻到底，拔掉所有的灰旗、白旗，把工人阶级的革命红旗插遍各个角落（例如大学的各个教研室、厂矿的各个科室、各个科学研究所和技术推广站等）。”

<sup>①</sup> 即知识分子向党交心的运动。

## 工业部门的跃进指标

冶金部王鹤寿发言的题目是《十五年赶上美国》，他着重讲了钢的产量完全可以大跃进，5年超英、15年赶美。他说：最近以来，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思想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再次地和各省市研究了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后，我们的结论是：明年钢产量达到1200万吨以上，1962年达到3000万吨以上，1967年达到7000万吨以上，1972年达到1.2亿吨以上，是完全有把握的。就是说，钢产量明年达到“八大”指标；5年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提出15年赶上美国，是有极重大的政治意义的。这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兴无灭资的问题。因为在不久的时间内，超过英国已经是很清楚的了。而美国，目前却以资本主义世界“天之骄子”的样子在那里“神里神气”，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赶上和超过它，就预示着资本主义世界灭亡的速度加快。

王鹤寿说：15年赶上美国之所以是现实主义的，首先是因为我们看到1962年达到钢3000万吨的指示，并不是什么渺茫的理想，而是肯定可以实现的事实。3000万吨的产量，是我们根据正在建设的、将要建设的钢铁厂的具体进度计算出来的，这种计算既没有“凭空估计”的成分，而又比较充分地考虑到可能遇到的一些困难，因而与其说它是先进的奋斗目标，倒不如说它还是多少带有保守性质的指标。1957年钢的产量是532万吨，在这样一个小的基础上，经过

5年可以肯定跳到3000万吨（每年增长41.5%），那么从3000万吨的基础上，经过5年跃进到7000万吨（每年增长18.5%）；从7000万吨这样一个更大的基础上，经过五年跃进到1.2亿吨（每年增长11.3%），就是比较容易的了。因此，我们认为在钢铁工业中，15年赶上美国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奋斗目标。如果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那么我们就可以设想：1962年钢的水平达到3500~4000万吨，从而赶上英国的时间将要更快一些。

什么是地道的现实主义，关于这种发展速度，王鹤寿还谈到他从1955年到成都会议的“悟道”过程，经过又破又立五次思想变化，从毛泽东这几年的著作特别是批判“反冒进”受到教育和启发，终于提高了认识。他说，有了总路线，几个并举，全党、全民办工业，我们有信心十五年赶上美国。

石油部李人俊发言，谈石油可以跟得上：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石油工业有了显著的发展，比起旧中国那个“可怜相”好多了。但是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落后面貌，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石油仍是最薄弱的一环。1957年石油产量只有146万吨，这个数字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且又是以世界上史无前例的速度，飞快地建设现代工业和农业相比，就太不相称了。以往几年内我们也很想发展得快一些，但是由于道路走得不对，办法不多，总像小脚女人走路一样，每年产量增加20~70%，再也快不了。因此，很自然的，人们都很担心石油能否跟得上。这种担心对我们是一种很大的鞭策力量。我们承认落后，但决不甘心落后。在党的总路线照耀下，眼睛变亮了，方向明确了，办法也多了，现

在可以响亮地回答大家的关切：石油工业能跟兄弟战线一起大跃进。我们的目标是：1962年生产原油1500万吨，天然30亿立方米，基本适应工农业的发展，保证满足国防方面的需要；在15年内赶上钢铁产量（1吨钢1吨油），到1972年，原油生产水平超过1亿吨。

铁道部滕代远的发言，主要是根据钢铁、煤炭等大跃进的指标，算了一笔帐，以后三年五年计划需要修多少铁路。滕说：根据中央各部的资料，到1972年钢产量将达1亿吨，煤产量将达10亿吨，木材产量将达2.2亿立方米，粮食产量将达8000亿到1万亿斤，这是较低的数字。如果根据各部最近所作进一步的估计，则远远超过此数。以上述主要物资的产量作依据，再加上其他物资，经由铁路运输的货运量，到1972年将达30亿吨左右。按这个运量水平推算，第三个五年和第四个五年增长不到1倍，而第一个五年（1957年与1952年比）则增长了1倍以上，第二个五年（1962年与1957年比）预计增长2倍左右，可见1972年铁路货运量30亿吨左右的估计，还是较低的。滕的发言还估计，1972年客运量水平可能达到15亿人次左右。

滕代远说，这样的客运量与货运量的水平，需要多少铁路呢？我们单拿货运量来计算，发送30亿吨货物，周转量就有14400亿吨/公里左右，以15万公里（通车里程）计算，则每公里的货运密度（铁路负担运量的标志）为1000万吨左右。这种密度，较我国1957年（489万吨）增加1倍，较现在美（265万吨）、英（112万吨）、法（117万吨）超过几倍，也超过了世界铁路货运密度最高的苏联目前的水平（900万吨）。所以，我国每公里货运密度1000万吨左右，

已经是很高水平。如果考虑到我国山区铁路多（在那里铁路运输能力受一定限制），和新建铁路比重大（在初期运量少），那么，这个平均数所包含的意义，远远超过字面所表达的分量。所以到1972年，15万公里铁路（现有3万公里，15年内修建12万公里）或者更多一些，是完全必要的。

滕代远向大会报告了15年内修建12万公里铁路的大体安排：第二个五年3万公里，第三个五年4万公里，第四个五年5万公里。以15万公里的通车里程作为基数，另外还要加上：复线20%，计3万公里（现有2700公里）；编组站及其他车站站线40%，计6万公里（现有约1万公里）；工矿企业（包括军用）专用线20%，计3万公里（现有6000公里）；以上这些将根据需要分别在三个五年中修建。这样，到1972年，全国铁路延展总长度（即包括全部单线、复线和站线折算成单线）达27万公里（现约4.9万公里），全国的铁路网就可以基本形成了。

农垦部的王震发言：根据现有荒地资料，在新疆、黑龙江、内蒙古、青海、甘肃共有荒地5亿多亩可供开垦。在上述地区开垦三分之一的荒地，约计1.5亿亩。在广东、云南、广西围垦海滩，开发山区种植热带和亚热带作物，再加上内地各省共开垦约2亿亩左右。有了以上的土地资源，采用上述开荒投资和多种经营的方针，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即到1967年，在10年内开垦3亿亩地，今后10年每年开垦面积差不多相等于今年开垦面积<sup>①</sup>。国家计划委员会原来规定农垦部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开荒4000万亩，投资20

<sup>①</sup> 1958年开荒指标是900万亩；到开八大二次会议时，根据各省、自治区及直属企业报的第二本帐，计划开荒2000万至2500万亩

亿元。这是一本帐。现在变成仍用 20 亿元投资，采用“边开荒、边生产、边建设、边积累、边扩大”的包干制的做法，到 1962 年达到的耕地面积：第一本帐为 8000 万亩（包括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已开垦的 1800 万亩在内）；第二本帐为 1 亿亩。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开荒可达 2 亿亩，平均每亩基建投资 20 元，总共投资 40 亿元。这个计划的实现，即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末期，国营农场的耕地面积达到 3 亿亩，就可以使全民所有制的农牧企业，从现在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1% 提高到 15% 左右。

大概是为大会的气氛所鼓动，抑或原本就有所准备，就在八大二次会议期间，一些部委又向中央提交了部门或行业“大跃进”的报告。

交通部党组在 5 月 13 日提交的《全党全民办交通，水陆空运大跃进》的报告中提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水上货运的增长速度平均为 25%，到 1962 年，货运量达到 4.7 亿吨，1267 亿吨公里，比 1957 年各才长 2 倍。水运比重将由 1957 年的 22.6% 提高到 24% 强。五年内增加轮船航道 3 万公里，到 1962 年共有通航里程约为 16 万公里，其中轮船通航道达 6.8 万公里。增建江海驳轮 170 万吨左右（其中包括远洋船舶 40 万吨），1962 年全国轮驳船将达到 300 万吨左右。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建公路 30 万到 50 万公里（其中常年通车里程约增 10 万公里左右）；预计 1962 年公路通车里程将达到 50 到 70 万公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将增置公用汽车 15 万到 20 万辆（不包括运输合作社以公积金购进的车辆）。预计到 1962 年，公路货运量将达到 13.6 亿吨，210 亿吨公里，比 1957 年各增长 2 倍多；客运量将达到

13 亿人次，400 亿人公里，比 1957 年各增长 4 倍左右。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中，专业航空（按指航摄、地勘、物探、播种、撒药、防火等）必须加速发展，到 1962 年专业航空飞行的工作量，将比 1957 年增加 8 倍左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除采用国产的中、小型飞机外，并增购少数大型快速客机、直升飞机。到 1962 年，约增加各型飞机 450 架。

纺织部党组在 5 月 13 日提交的《在五年内纺织工业主要产品超过英国赶上美国》的报告中提出：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思想基础上，我们拟出了一个规模宏伟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纺织工业发展规划。这个规划，是在农业大跃进的基础上制定的。1962 年纺织工业生产的初步规划为：棉纱 1200 万件，棉布 3.6 亿匹（127 亿米）；毛织品 1.3 亿米；麻袋 2.5 亿条；人造纤维 15 万吨；蚕丝 3.35 万吨。这些指标比八大的建议数字都提高很多。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纺织工业产值每年递增 23%。1962 年棉纱和棉布的产量将要超过现在世界上产量最高的美国（美国 1956 年生产棉纱 933 万件，棉布 93.7 亿米，而且近年来的纱布产量时增时减，且有下降趋势）；至于英国那就远远地被抛在我们的后面了。我国麻、丝工业的产量，现在已经超过英国和美国；毛纺和化学纤维的产量估计在 7 年的时间内可以赶上英国。到 1962 年两个人就有 1 匹布，将比现在 18 市尺提高 3 倍。加上品种增多和质量花色的改进，就可以做到“春夏秋冬，衣服齐备，男女老少，花样翻新”了。到那时候，全国人口每人平均约有一套毛绒衣，城市的青壮年每人平均有一套料子衣服，城乡人民都有作客的外衣和节日的盛装，在布匹门市部不但可以看到各色各样的棉布、绸缎、呢绒、麻布，还可看



到各种棉、毛、麻、丝与人造纤维的混纺交织品，真是“五光十色，美不胜收”。要达到上述的生产水平，除了大力挖掘现有工厂潜力以外，在第二个五年期间，还要新建棉纺锭 1200 万枚，毛纺锭 100 万枚，麻纺锭 60 万枚，缫丝机 100 万台，粘胶纤维 18 万吨，再加上纺织原料和野生纤维的加工厂等，就会在全国各地建成规模巨大的纺织工业网。

林业部罗玉川在 5 月 10 日提交的报告说：根据现有资料，我国约有宜林荒山荒地 15 亿亩。按照今春造林进度，如果每年平均造林 3 亿亩，5 年内即可把 15 亿亩荒山荒地全部种起树来。从各省绿化规划来看，除四川、甘肃、内蒙古、新疆、青海五省（区）外，其余各省（区）都有可能在三五年内实现绿化。

## 李富春谈第二个五年计划

李富春的书面发言：《赶上英国，再赶上美国，第二个五年是关键》，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跃进指标及如何达到，作了较全面的说明。他首先说，在毛主席和党中央伟大思想启示下，使我们的思想开始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我们增加了一种敢想敢做敢为的勇气。面对着当前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我们真有一种“心潮逐浪高”的心情，充满了赶上英国、再赶上美国的信心和干劲。他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我国已经建成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如初步计算，第二个五年内的钢材和机器设备的自给程度，将分别达到 95% 和 85% 以上。尽管在第

一个五年内，主客观有许多不利条件，一个时期内又被“反冒进”的歪风所挫折，年增长速度工业生产仍然达到 18%，农业达到 4.5%；而且 1953、1956 年两年工业都赶过了 31% 的速度，农业 1955 年赶过了 7%；基本建设 1953、1956 两年都超过了 60% 的速度。难道第二个五年还不能打破常规更快地跃进吗？

他说，1958 年的形势完全说明，第二个五年是可以大大地跃进的。根据国家计划的第二本帐，今年的工业生产，计划比去年增长 34%，经 4 月份的实际，已经比去年同期增加 42%，截至 4 月底，增加灌溉面积已经达到 3.5 亿亩，超过全年计划 6000 万亩；增加的造林面积，已经达到 2.9 亿亩，超过全年计划 1.4 亿亩。我们估计，今年的工业生产，一定会大大超过年度计划中的第二本帐；今年一年增产的粮食，有可能比过去五年（1952 年至 1957 年）增产的粮食还要多。这样就打开了第二个五年速度发展的道路。

李富春说：我们参照目前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初步提出的规划，经过中央经济小组讨论之后，提出初步设想的第二个五年工农业生产的主要指标（见附表）：

按照我们初步设想的指标来估算，1962 年工业总产值大约为 2300 ~ 2900 亿元，比 1957 年增长 2 ~ 3 倍，每年平均增长 26 ~ 32%；1962 年农副业总产值大约为 1200 ~ 1370 亿元，比 1957 年增长 80 ~ 110%，平均每年增长 13 ~ 16%。很显然，这是一个古今中外从来都没有过的高速度。但就是这样的高指标，在实践过程中，经过努力，也是完全可能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的。实际上各地方和各部提出的第二个五年规划的指标，比我们所提的要大。我们所提的这些指标的必

附表：

指 标	-九五七年	-九六二年初步拟定	
		必成数	期成数
发 电 量 (亿度)	193.2	900	1100
原 煤 (亿吨)	1.3	3.8	4.2
原 油 (万吨)	145.8	800 ~ 1000	1500
钢 (万吨)	534.4	2500	3000
铜 (万吨)	5.1	18	22 ~ 24
铝 (万吨)	2.89	18	20 ~ 22
化 肥 (万吨)	80.2	1000	1200
金属切削机床 (万台)	2.8	12	15
拖 拉 机 (万标准台)	-	10	12
棉 纱 (万件)	463.5	1000	1200
粮 食 (亿斤)	3700	6000	7000
棉 花 (万担)	3280	6500	7500
猪 (亿头)	1.38	4 ~ 4.5	5

成数，是准备公开发表的，是要求在4年内完成的；期成数是内定的，是按这样的指标布置工作的，是要求在5年内完成和超额完成的。这样，在长期计划中既鼓足干劲，又留有余地。根据上述初步设想的指标，八大的建议就可以提前在3年左右完成，我国就将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现代工业产值将过农业产值，我国将基本实现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文化科学技术将大大提高。我国的面貌将

根本改变。

李富春还谈到超英赶美的问题：只要我们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上述初步设想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二本帐，我国就完全有可能在 1962 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在赶上英国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的努力，就可能在 1972 年或再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美国。因此，第二个五年是赶上英国和赶上美国的关键。李富春在发言中甚至进一步说到：我们认为，不要 15 年，甚至不要 10 年，只要七八年的时间，就可以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不要 25 年，只要 15 年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就可能赶上美国。这样，过去资本主义国家花费一二百年时间所达到的工业水平，我们就可能用 20 年左右的时间来赶上它们。至于农业，只要在 5 年到 7 年内实现农业发展纲要，逐步实现农业的化学化、机械化和电气化，那我们的农业发展，就可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

还有一些大会发言是谈文化建设的。陆定一在发言中介绍：据各省市的汇报，扫盲工作在 5 个省可以一年完成（现在黑龙江已经基本上扫除了青壮年文盲），全国范围 3 年可以基本完成，边疆地区（西藏除外）最迟的 7 年可以完成。普及小学，12 个省市一年完成（现在，江苏、福建、河南、黑龙江、江西五个省已经完成），全国 3 年基本完成，边疆地区最迟的 7 年完成。

中宣部周扬专就民歌问题发言，题目是《全党动手，搜集民歌》。他首先引用了安徽新出版的《大跃进民歌》中的

卷头诗：“如今唱歌用箩装，千箩万箩堆满仓。别看都是口头语，搬到田里变米粮。种田要用好锄头，唱歌要用好歌手。如今歌手人人是，唱得长江水倒流。”他说：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全国各地涌现出了不计其数的民歌，真是“千箩万箩”的。解放了的人民在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所显示出来的革命干劲，必然要在意识形态上、在他们口头的或文字的创作上表现出来。不表现是不可能的。大跃进民歌反映了劳动群众不断高涨的革命干劲和生产热情，反过来又大大地鼓舞了这种干劲和热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新民歌成了工人、农民、车间或田头的政治鼓动诗，它们是生产斗争的武器，又是劳动群众自我创作、自我欣赏的艺术珍品。社会主义的精神浸透在这些民歌中。这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民歌，它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世纪。我国本是一个民间文学艺术蕴藏极为丰富的国家，现在群众文艺创作又如此蓬勃发展，真是人人会说唱，处处有歌声，我们的国家简直可以说得上是一个诗国。因此，要大规模地、有计划地搜集全国民歌，就非全党动手、全民动手不可。周扬说：今天的民歌，是新的农民、工人、士兵的作品，它们已经不完全是口头创作，有的作者是很有文化的，因此新民歌不但在内容上，而且在风格上与旧民歌有所不同了。它们保持了民歌的格调，同时又更多地承袭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吸取了新诗的长处。它们正像黄河、长江一样，以汹涌澎湃这势，对新诗起着冲击的作用，必将使新诗的面貌为之改观。群众诗歌创作日益发达和繁荣，未来的民间歌手和诗人，将会源源不断地出现，他们中间的杰出者将会成为我们诗坛的重镇。民间歌手和知识分子之间的

界线将会逐渐消泯。到那时，人人是诗人，诗为人大所共赏。这样的时代是一定会到来的。

周扬发言中，引用了十首民歌，说明农民、工人的冲天干劲，英雄气概，歌颂毛泽东思想，新的干群关系，劳动生活中的诗情画意等等。周扬还编选了110首大跃进民歌，汇成《新民歌百首》，作为发言附件印发给大会代表。

### 谭震林作关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说明

5月17日下午的第十次大会上，谭震林作《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的说明》。这是多年来人家最为关注，也是同“大跃进”运动直接相关的大问题。

谭震林首先介绍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以来的情况：《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是在1955年冬季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期间提出来的。1956年1月，中央政治局通过并公布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对农业生产高潮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对“扩大农民的革命干劲”，产生了巨大的鼓舞力量。但在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春季，在反对“冒进”的这种空气下面，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对建设事业采取促进态度的方针，以及农业发展纲要40条，受到某些人的怀疑。其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建设战线上特别是农业战线上的进展。在1956年冬到1957年春，灌溉面积只扩大3600多万亩，积肥总量降至400多亿担；1957年的全国粮食播种面积，比1956年减少了5500万

亩。1957年9月党的三中全会上，重申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接着，党中央又重新公布了经过修正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党中央的这些正确的指示，同反右派斗争和全民整风运动所造成的群众积极性相结合，才又在更大规模上产生了去冬以来农业生产的高潮。

谭震林说：对于多快好省的方针和农业发展纲要40条曾经发生怀疑的那些同志，有些人已从那样一次反复中得了教训，有些人则仍在等着秋后算帐。“让他们去等待罢，反正他们要算输的”。

谭震林说，从去年10月到今年4月底，在农业生产出现了大跃进的形势。全国水利工程建设，按照工程应有的受益面积计算，可扩大灌溉面积3.5亿亩，可改善灌溉面积1.4亿亩，治理了低洼易涝的耕地2亿多亩，改造了瘠薄的耕地1亿多亩；植树造林2.9亿亩；控制水土流失面积16万平方公里。积肥3100亿担，数量比第一次高潮的1956年多5倍，虽然主要是上肥和泥肥，但按肥效来说，也增加了2倍以上。全国粮食播种面积预计将比1957年增加8000万亩。综合各省规划，今年全国的稻谷播种面积将比1957年增加1.1亿亩，其中旱田改水田6700万亩，单季改双季4400万亩；薯类的播种面积将比去年增加6400万亩；玉米比去年增加2300万亩。此外，9000万亩棉花的播种已经基本完成，有灌溉设备的棉田比1957年增加了2000万亩，又有1000万亩棉田改用了岱字棉良种。从夏收作物的生长情况和部分地区收获的实绩看，从春耕进行的情况看，从上述水利、肥料、改良农具、改良土壤和其他各项增产措施的实绩，以及防治病虫害的农药农械等物资准备的情况看，今年

的条件不仅是 1957 年所不能比拟的，而且也大大超过第一个高潮 1956 年。如果今年不遇到大水大旱，粮、棉、油等农产品一定会有较大比例的增长。例如，全国粮食增长的比例，将有可能达到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几。上述情况说明，从 1955 年冬季以来，这三个冬春、三个年头的农业生产建设，显示了两头高中间低的马鞍形过程。这种反复是坏事，也是好事。它生动地教育了干部，教育了人民，使人们有所比较，从而更清楚地了解到：必须坚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必须艰苦奋斗，努力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就是这条总路线在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具体纲领。

接着，谭震林谈了提前实现和超额完成农业发展纲要的问题。他说：自从 1957 年冬季开始农业新高潮以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专区、县、乡、社都提前实现和超额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规划。按照各省、市、自治区的规划，全国共有几百个县（市），计划在今年分别达到粮食亩产 400 斤、500 斤、800 斤，皮棉亩产 100 斤。还有许多单位提出提前实现“水利化”、“机械化”、“绿化”、“四无”等口号。现在各地提出的增产指标一般是积极的，问题在于切实抓紧具体措施。要注意防止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以免秋后达不到指标要求。

最后，谭震林介绍了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修正情况。《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自 1957 年 10 月公布后，到 1958 年 4 月底止，共收到各地方、各方面、各单位和个人的意见 1891 条，综合整理为 337 条；又收到各省、市、



自治区党委比较集中的意见，综合整理为 293 条。根据这些意见，对修正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形成第二次修正草案。

这次草案主要的修改和补充是：第一，在生产指标方面，增加了发展油料作物的指标。《纲要》要求油料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一至二倍。花生亩产达到 300 斤至 500 斤，油菜达到 100 斤至 300 斤，大豆达到 200 斤至 400 斤。棉花亩产量指标方面，将“40 斤”删去了，重新恢复 1956 年 1 月公布的草案，即仍然要求分别达到皮棉 60 斤、80 斤和 100 斤。粮食亩产量指标方面，将几种“除外地区”删掉了，改为“允许省、市、自治区对于本省、市、自治区境内，自然条件特别好或特别差的地区另定指标”。第二，在增产措施方面，主要是把密植单独写成一条，而把水利和水土保持合并成一条。同时补充和修改了关于水利、肥料、土壤和机械化等条款。水利，着重讲了“以小型为主，以蓄为主，以社办为主”的方针。肥料，提高了养质指标和化学肥料的增产指标。改良土壤，比过去的条文写得更具体了一些，特别强调了低产地区的土地改造和土地深翻。机械化、电气化也重新改写了，反映了当前伟大的群众性的农具改良运动，反映了发展地方小型工业和依靠合作社的资金积累，实现农业半机械化的机械化的可能性，强调了农具改良运动的现实意义，也说明了由农业技术革命的这种萌芽，逐步过渡到农业耕作的半机械化和机械化。此外，关于多种主产作物方面，提高了稻谷播种面积的指标，又注重强调了薯类。第三，纲要修正草案第三十一条，“扫除文盲，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这一条，也有比较重要的修改。重新提出了普

及小学教育的要求，增加了关于在农村中兴办中学和提倡勤工俭学等内容，也提到了开展农村体育活动。

八大二次会议决定，基本通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委托中央委员会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再作必要的修改后，提交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讨论通过。

### 李井泉、陶铸的发言

八大二次会议在几项主要议程进行的同时，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大会发言。有些重要发言，前面已经有所介绍。从5月8日下午开始直到5月22日下午，全体会议期间，共有117人在大会上发言。此外，还有145人作了书面发言。这些发言涉及的方面十分广泛，从工业、农业、交通运输、财经、商业到政治、文艺、教育、科学技术、国防、外交，都是围绕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进一步推动大跃进运动这个中心内容展开的。

地方负责人的发言，这里只摘录了李井泉、陶铸、柯庆施和王任重四人的。当年大跃进时，他们带头冲锋陷阵，各有千秋；他们领导的地区是长江上中下游和中南各省，在农业生产和大炼钢铁时，都是大放卫星的地区。

5月14日下午，四川的李井泉发言，说总路线的提出和形成，是从我国几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也是从正确地运用苏联的建设经验中，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反复思考和研究所总结出来的。这是对八大第一次会议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发展和补充，它是“中国型”的社会主义建

设总路线，同时又具有世界意义。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曾经在 1956 年开始实行，获得了成效，证明它所规定的方向是正确的。经过一场波折后，又在去冬今春坚决贯彻执行，在 6 亿人民中立即产生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加倍地飞速前进。只要全党对于这条总路线深信不疑，可以断定，也将同 1945 年党的七大提出的党的总路线一样，一定可以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来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一定可以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把我国建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同历史上许多革命斗争中的经验一样，党内对于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正确路线方针的认识，并不是不经过斗争就可以获得一致的；不经过反复的比较，就连已经获得的正确认识也很难巩固。1955 年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之后，紧接着毛主席又提出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党内曾经有过不同的思想认识，有赞成的，有怀疑的。怀疑毛主席多快好省的方针的人，首先就是从怀疑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能否实现开始。的确，他们也是希望农业更大地发展的，但是他们怀疑全国农业能够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增长速度并增加生产；同样，他们也是希望从工业农业发展中，来增加国家的资金积累的，但是他们怀疑农业的发展速度，因而也就怀疑国家资金积累的，但是他们怀疑农业的发展速度，因而也就怀疑国家积累的比例，能够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得更高些；他们怀疑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够搞得更快些，甚至比苏联的发展速度还快些。两年来的斗争实践证明，这种怀疑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他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经过南宁、成都会议的辩论，又通过这次大会的讨论，加上全党

在实践中的反复比较，相信今后是可以减少波折，使全党在认识上巩固起来的。

李井泉还谈到四川省发展地方工业的设想：四川省对今后地方工业的发展已经作了初步规划，决心争取提前3年或5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40条（修正草案），争取5年内使地方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在1962年达到145亿元（或者还更多一点），比1957年的36.1亿元增长3倍（或者更多一点，但不包括中央现有工业和准备新建工业的产值）；我们认为这个指标是比较有把握实现的。李井泉还谈到一些具体指标，比如5年内全省人民穿衣由省内自给；煤产量由1957年的516万吨提高到1958年1000万吨左右；小高炉的铁产量由1957年的20.5万吨提高到1958年60万吨左右；整个“二五”计划的地方工业投资达17~20亿元。

5月14日下午，广东的陶铸发言，首先说，为什么在1956年夏季会对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发生怀疑和动摇呢？由于思想方法片面，不适当地夸大工作中个别的缺点和错误，这自然是对的；但是，为什么对巨大成绩不予足够估计，而偏夸大个别的缺点、错误呢？他认为主要是对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总路线缺乏足够的认识，遇到一点小困难就动摇。1956年，国际形势曾经一度动荡，到十月间又发生了匈波事件，国内右也开始叫嚣。在这种情况下，更认为我们建设的步子过于快了。如果不放慢些，似乎也会出大乱子。假如这种看法不错的话，教训何在，也就很清楚了，这就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我们紧决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方针路线的时候，革命就能取得胜利，反之就一定蒙受损失。这一教训，

在革命的年代里，已为无数次的事实所证明；在建设的年代里，经过这次反“冒进”的反复，也已为铁的事实所证明。

陶铸说：要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必须走群众路线，但检查我们的建设工作，却往往把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忽视了。自从全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我们搬进来不少“洋办法”，手面很大，也很阔气，动辄按“正规”办事，把我党传统的所谓“土办法”，即不依靠很多钱，不依靠办公大楼，不依靠大本本的规章制度，而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办好一切事情的办法，差不多丢掉了。不重视人的作用，过分强调物的作用，这样就势必只见物不见人，使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受到压抑。生产力中最重要的是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人的重要性连孟子也懂得：“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财。”可是，反“冒进”的人，却目中无人，只看到物的作用，遇到一点困难就张皇失措。我们不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依靠群众，战胜物质条件远比我们优越的敌人，而取得革命胜利的吗？

陶铸还说：辩证唯物主义是在承认物质的第一性的基础上，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的。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是无穷力量和智慧的源泉。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共产主义来提高人的觉悟，建立新的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人民群众能发挥出来的力量，就更加难以估量。从广东来看，今年全面贯彻小株密植，使原来就很紧张的农忙季节的劳动量增加到一倍以上，但是许多地区的农民宁愿日夜苦战，而不降低规格，一定要把措施贯彻到底，彻底打破了儿

千年来在栽培技术等问题上的保守思想。原来认为广东实现工业化，不要10年也要8年，现在大有可能在今、明两年内，使工业产值赶上农业产值，三五年内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半机械化。粮食生产也可在1960年实现亩产800斤的指标，今年就可以增产60亿斤，增长25%，1年超过以往5年。这样快的粮食增产速度，在广东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

陶铸的发言还特别谈到学习毛著的问题：要破除迷信，做到思想解放，必须在全党广泛地深入学习毛主席著作。这几年来，我们的学习有教条主义偏向，过分强调学习外国的经典著作，而忽视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不对的。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的著作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在一系列的根本原理上，捍卫与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毛主席的著作，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好的教科书。但是，党内有不少同志对毛主席的著作，不去努力钻研，却转而向外国的书本寻找经验，这当然还是崇拜“洋人”思想的表现。毛主席的著作不仅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伟大武器，而且是取得建设胜利的伟大武器。事实说明，围绕着毛主席的著作来学习外国的经典著作，对于我们更为有效。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不要怕马克思，人人都可以做马克思。“尧亦人也，舜亦人也，吾何畏彼哉”。真理是客观的反映，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人民群众和自己的实践与学习获得真理。

5月13日上午，河南吴芝圃发言题为《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的主要危险》，揭发候补中央委员、河南省委第一

书记潘复生的严重右倾错误。从5月14日晚到17日上，河南组用了两个半天和两个晚上揭发和讨论了潘复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对1957年上半年河南农村情况，潘认为“粮食统购得太大了”，“夏荒严重，农民生活太苦”，“合作化冒进了”，“干部强迫命令”，“河南这两年政治工作薄弱”，“农民要造反”，错把河南合作化后的农村看成漆黑一团，“农民退社不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夸大牲口死亡现象，说这是罪恶，省委要检讨。总之最严重的是，他趁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时，利用整风带头鸣放，攻击粮食、合作化工作中的缺点和干部作风等问题，并且不准常委同志发言，企图煽动一部分人否定过去工作中的成绩，认为吴芝圃反击右派的发言是“臭表功”。潘认为右派的言化“不是要打倒我们”，“基本上好的，对社会主义巩固有好处”，他很欣赏章乃器、黄炎培等的反动言论；他决定对右派的政策是：他以狂风暴雨对我，我以和风细雨对之。当反右派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就大叫“扩大化”了，把斗争中的个别缺点，说成是“普遍性的问题”，忧虑重重。还有人揭发，潘复生1953年搞确保私有制，河南互助合作组织垮了一半多；1956年以后，说合作化冒进了，合作社没有优越性。他还说过：“搞生产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

参加小组讨论的48人，一致认为给潘复生戴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太小了，应该给他戴右派分子的帽子，同时建议撤销他的候补中央委员。

5月18日小组会上，让潘复生作了自我检讨。大家认为他检讨得很不坦白，态度极不老实，避重就轻，混淆是非，自相矛盾，把自己犯错误的根源归咎于思想方法的片面

性。19是、20日上午，小组继续揭发批判，一致要求撤销潘复生的一切职务，并且开除他的党籍，划为右派分子。

八大二次会议中，好多省都联系会议精神，批判省内的“右倾分子”，河南是最突出的。潘复生当时被定为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受撤销职务处分，1962年得到平反。

### 柯庆施、王任重的发言

还是在成都会议时，柯庆施见到王鹤寿等人的发言印发出来，很受毛泽东的称赞，便找到我为他起草个发言稿，主要谈文化教育问题。他谈不出多少内容，印象深的记得他谈了一条：三个五年后，中国人人都是大学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勉强写了一两千字交了卷。送上去后，没有印发出来。后来田家英告诉我：柯老向他说，李锐文章没有写好。以后中央开会，他就必带张春桥了。5月13日上午第六次会议上，柯庆施所作关于文化革命的发言，看来是张春桥的手笔。

柯说：在15年内我国将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超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在文化建设方面我国也将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达到繁荣，人们的精神面貌将大为改观。他具体描述了一幅15年后中国的情形，现摘录如下：

我们可以这样设想：

到那时，小学教育、中学教育早已普及，而且，不但是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在广大乡村中，也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我们的人民，人人“知书识理”



(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理)，个个都有比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像毛泽东同志曾经预言过的，大家都能够读《资本论》，大家都懂得高等数学，什么天文学、地质学、农业学、机械学、化学、物理学、电子学等等，都会变为普通人常识。“百家争鸣”的局面更加热闹，学术进步空前迅速。那时，我们将不止有几十万、几百万个科学文化方面的专家，而且将从现代化工农业生产实践中锻炼出几千万个专门人才。他们既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又有最新的生产技术，他们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了，社会主义的劳动者。

到那时，人们将过着极为文明、卫生的生活，苍蝇、蚊子、臭虫、老鼠、麻雀等等早已断了绝孙，那时的孩子们读到书上关于这些东西的记载，就像现在的一些学者“言必称希腊”时，所讲的希腊神话里的怪物一样神秘。他们听到老一辈的人说起，几千年来人们曾经忍受过这些小东西的毒害，将视为奇谈。人们只有到博物馆里才能看到这些东西的标本，正如人们现在看恐龙化石一样感兴趣。那时，城市和农村的环境卫生已经大大改观，现在的破旧的茅草棚，除了特别保存下来，当作教育后代的展览品以外，也都被阳光充足、空气新鲜的新式楼房所代替。今年和以后栽种的树木都已成荫成林，城市变成了大花园，农村变成了工厂林立、街道整洁、卫生体育设备齐全的小城市，“村村流水，户户垂扬”。讲卫生已经普遍成为人们的习惯：人人服装整洁，吃饭用公筷，饭前便后洗手，用肥皂和洗衣服、洗澡的用水量将创造空前的世界纪录。全国的体育运动员，贺龙元帅的体育大军，将以万万人计，在世界运动会上项项名列前茅。不难想象，那时人们的疾病将大大减少，健康水平将大大提

高，而逐渐成为德智体能够全面发展的新人类。

到那时，新的文化艺术生活，将成为工人、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不但有了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艺术，而且工农兵自己也能更普遍、更高明地动手创造文化艺术，每个厂矿、农村都有图书馆、文化馆、歌咏队、演剧队，每个生产队、组都有自己的墙报、画报，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人们不但可以经常看到电影，而且可以从电视里学科学、学先进经验，同先进人物会见，看到整个地球以至整个宇宙许许多多的新东西。整个文艺园地处处“百花齐放”，天天“推陈出新”。

到那时，共产主义的道德风尚已经基本驱逐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习惯，领导和群众、群众和群众的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关系，早已成为社会的新风尚，大家都具有为着社会公众利益进行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英雄气概。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并且保证进一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新道德，将成为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的规范。随着生产的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人们的劳动兴趣和技术将大大提高；随着集体劳动和集体生活的发展，人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将大大加强，全国真正变成一个亲密、和睦的大家庭。那时，虽然个人同集体的矛盾仍将存在，但是个人主义已经变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臭东西；先进同落后的东西仍将存在，但是，将在跟现在不同的、更高级的形态上进行着斗争，继续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综合上面说的这四个方面，那时，城市和乡村的差别，体力劳动同脑力劳动的差别，将逐渐消失，而共产主义的最

后建成，也就离我们不远了。

柯庆施这番对未来社会的图解式描述，其实并不是他的“发明”，不过是对毛泽东关于未来设想的具体化。柯发言之后没过几天，陆定一在大会的发言中，传达了毛泽东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他说：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在南宁会议上就得到毛泽东赏识的柯庆施，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再次受到毛的表扬。毛在大会的几次讲话中三次提到了这位柯老。而且就在紧接八大二次会议之后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柯作为地方党委的负责人代表，同李井泉一起，进入了中央政治局。

5月15是下午，湖北的王任重发言，题为《如何领导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谈湖北农业生产的领导经验，充满豪言壮语，有生动的例子，很引起大家的兴趣。他说，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放手发动群众，组织一个有声有色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农业合作化以后，湖北省的农业生产连年丰收。去冬以来，在全民整风高潮的基础上，出现了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高潮，这两大高潮共同点，就是兴起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群众运动的规模愈大，高潮就愈高，它所表现的威力也愈大，整风和生产的成效也愈大。是什么东西推动了群众运动？是广大干部思想大解决，作风大转变，带动了广大群众的思想大解放。广大群众的思想大解放以后，所发挥出

来的集体智慧和集体力量，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在社会主义革命战线上，群众运动的烈火，把资产阶级右派的丑恶言行，烧得体无完肤；把领导干部的“五气”，烧得藏身不住。在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广大群众以前无古人的英雄气概，创造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奇迹。

如何领导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王任重说，两年以来，我们摸索到一些经验：

一、领导干部带头干，这是走群众路线的第一步。他举了麻城一个乡长的例子。原先是只动嘴不动手，而且光发号施令。后来转变作风，亲自车水挑塘泥，社员们才服了他了。经过整风以后，带头干，已经在各级领导干部中成为风气。

二、领导干部带头的一个最好最经常的方式是搞试验田。省委推广了红安县领导干部搞试验田以后，中央也发出了各级领导干部搞试验田的通知，在全省就推广了。种试验田成为行动的中心，大家时刻都关心着，简直成了“试验田”迷。（记得1956年12月武昌会议后，我同刘澜波一行到麻城参观时，就在公路旁的田地里见到插有“王任重试验田”的牌子。）于是很快地成为新的社会风气，有关农村的各行各业的领导干部都搞试验田，广大群众也搞试验田，由小块试验田到大面积的丰产试验畈。黄冈地区已经有60多万农民种了试验田，浠水农民鄢远明的的试验田，创造了水稻亩产2658斤的新纪录。

三、以点带面——领导干部带头干，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都种试验田，为召开现场会议和组织参观评比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内容。现场会议上认真总结先进经验，

要树立起先进的旗帜来，旗帜越鲜明越好，以此推广重点的经验。1957年麻城县和新洲县发生过互相比赛的故事，证明了这个道理。

四、不仅是麻城县和新洲县在互相比、互相赶、互相学，全省的专区与专区之间、县与县之间、乡与乡之间、社与社之间、队与队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人与人之间，正在开展着一个学先进、比先进、赶先进的社会主义竞赛。随县县委书记知道枣阳县县委书记发言稿中有“盖随县”的字样，就召开了30万人收听的广播大会，会后有50万人签名，决心百倍努力，保证不让枣阳县盖随县。人们在这样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中，表现了势如破竹的风格。

五、大辩论，大字报，大检查。在社会主义竞赛中，人们创造了丰富多采的方式，开展了先进和落后的斗争。最主要的方式是大辩论，大字报，大检查。干什么，辩什么，哪里不通哪里辩，方式灵活，田边地头，床头灶头，会内会外，父子、兄弟、夫妻、母女、婆媳之间，都可以辩。一场辩论之后，是非分明，工作好做了，落后保守容易克服，先进经验好推广了。开始，干部很怕大字报，现在许我干部不怕了，他们尝到大字报的甜头了。为国事、为社事而争论，争论得不可开交之时，就出大字报。特别举了一个兄妹大字报的例子：妹妹批评生产队长哥哥“官气很重”，请小学老师代写，结果妹妹“评理”评赢了。大检查，就是大促进。由省委组织全省大检查，一年两次；由地委、县委组织的全区全县大检查，一年四次。检查团吸收各级负责干部、农业技术人员、各部门工作人员、农业劳动模范等人参加。群众查团是“促进团”，是“慰问团”；一边“看花”，一边“取

经”，感到是“学习团”。省地县的检查团跑遍全省的每个县、每个乡、每个社，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是一次整风。群众以极其热烈的情绪欢迎检查团，并且提出很多建议和要求。这是联系群众的一个很好的形式。全省春季大检查已经结束，将于七八月间再举行一次大检查，到年终再开全省会议，对农业生产进行一次总结和评比。

六、抓住中心，带动全面。在检查中，进一步解决了农村的中心工作和各部门工作的关系问题。省委应当狠狠抓住这个中心，使农业一马当先带动全盘工作。今年的生产大跃进，来得很猛，各方面准备不足。要放手发动群众，掀起一个更大规模的冬委生产高潮。

### 周恩来、陈云等在大会作检讨

在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曾说过“反冒进”的问题不要再提了。但八大二次会议上，对“反冒进”的批判却势头不减。对“反冒进”的声讨与唱“大跃进”的高调此起彼伏。刘少奇在报告中专门批评了“反冒进”之后，有些人仍嫌不够。在小组讨论时，有人认为：报告对于“反冒进”问题的思想根源、错误性质和后果的论述，感到不够充分。关于“反冒进”的思想根源，在中央工作的个别同志来说是思想方法问题；在地方工作的一些同志中则不仅是思想方法问题，有些人是由于严重右倾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缺乏热情或严重对党不满，因而借“反冒进”之名对党进行攻击的。就全国说，“反冒进”的错误虽然是思想方法的错误，但不是一

般方法的错误，而是在建设路线上带根本性质的错误。也有人认为：关于1956年“反冒进”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批判得不够，语气嫌轻，对立面讲得不多，思想方法及思想根源没有分析，对“反冒进”带来的影响估计不足。因此，批判的分量要重一些、对立面要明确，特别是对思想方法和思想根源要集中分析批判。还有人认为，这种错误主要不是来自地方，而是来自中央机关的一些同志，中央要多负一些责任。有人发言说：“反冒进”的问题必须加以清算。“反冒进”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挫折和打击很大，影响很广。右派分子就抓住我们这一点，说全面“冒进”了，否定我们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干部很害怕“反冒进”，思想总是不解放，小心谨慎超过敢想、敢说、敢干，结果什么都照章办事。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路线，必须把“反冒进”的问题彻底弄清楚。只有批判得彻底，批判得深，批判得透，才能解放思想。

对“反冒进”的批判甚至波及到军队。在军队代表团的小组讨论中，有人就提出军队是不是有“反冒进”的问题。有代表说，在军队的生产建设中，有人给部队生产热情“泼冷水”。还有代表说，热火朝天的部队军事训练，被一股“时间少、内容多、消化不了”的风吹掉了。

总之，由于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对“反冒进”的批判，以及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中又重提到这个问题，于是大会又掀起一个彻底批判“反冒进”的浪潮。

曾经提出“反冒进”正确主张的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人，从南宁会议开始就受到严厉指责和批评，

并一直为此作检讨，在这次会议上不得不再次就此作全面检讨。

5月17日，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言。他说：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采，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会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我是“反冒进”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

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包含着目标和方法两方面的问题。要不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关于目标的问题；这样建设或者那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关于方法的问题。前者属于敌我性质的矛盾，后者属于人民内部和党内矛盾。毛主席曾经反复地教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进行得快一些，好一些；一种是进行得慢一些，差一些。前一种是多、快、好、省的方法，也就是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依靠各级党委领导，放手发动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后一种是少、慢、差、费的方法，也就是违反党的群众路线，不注意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放手发动群众，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建设社会主义。这两种不同的方法，也是两种不同的方针。犯了“反冒进”错误的人，就是按照后一种方法建设社会主义。这显然是同毛主席所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相违背的。



而且，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曾经减低了我国的建设速度，损害了干部和群众的生产和建设的积极性。因此，它不是个别问题上的错误，而是在一段时间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对于这一点，我在相当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在检讨中有一段“向毛主席学习”的话，颇能使人体会周恩来当时的压力所在。他说：“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错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做对了的时候和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领导思想分不开的。”

周恩来检讨说：“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我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间。当时，我对于1956年的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和困难，作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夸大化，肯定1956年的年度计划“冒”，并且提出1957年适当收缩建设规模的意见。就在这次全会上，毛主席最后讲话，坚定地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成绩是主要的，前进和发展是总的趋势，指出必须保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不要泼冷水，不要“促退会”。不久，党中央又根据毛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的讲话，采取了积极的方针，在全国展开了增产节约运动。这样，才扭转了形势，使1957年的生产和建设计划，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但是，尽管如此，如果拿最近3年生产和建设的速度做一个比较，就会清楚地看到，“反冒进”的错误，挫伤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对我国1957年

建设事业的影响还是不小的，这在许多同志的发言中也曾提到……“反冒进”的错误从反面教育了我们，诚如少奇同志所说的，“正是由于这种反复，党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正确性，就看得更加清楚了”。

周恩来不得不痛苦地将“反冒进”的错误，同右派的“猖狂进攻”联系起来。他说：“反冒进”的错误是严重的，幸而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及时纠正，也还由于资产阶级的右派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因此才使这个错误没有继续发展成为更严重的错误。1957年春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利用“反冒进”的错误，全面否定1957年建设成就，把1956年跃进中的某些缺点，夸大为“全面冒进”，并且进一步否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成就。在这个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我开始觉醒，因而在1957年六月政府工作报告中，彻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冒进”的错误估计，坚决肯定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转折点。这是从敌对方面得到的教训，而更重要的教育，还是三中全会上毛主席关于重新恢复多快好省、农业40条，“促进派”的宣言，接着有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的整风。同时，我又接触了生产大跃进中的一些群众实际活动。这样，才从整风和实践中真正认识到党的这条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无比光辉和无穷无尽的力量。

周恩来说：“反冒进”的错误，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某些问题上表现为教条主义，还有些问题上则表现为两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这些错误，结果造成了

建设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的错误。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总方针。……这里，应该特别讲一讲的，就是政府在指导国民经济的工作中，曾经错误地采取了机械的静止平衡的方法。例如，1956年社会主义建设跃进中曾经发生了一些个别的缺点，给我国经济生活中带来了某些困难。这些一时的困难本来是不必大惊小怪的，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思想，依靠党和群众，相信地方，放手发动群众，继续坚定不移地发展生产，这些暂时的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生产也会得到更大的发展。半年多来我国经济大跃进的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当时我和担任政府工作的某些同志却错误地认为，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速度太快，因而造成市场供应紧张，并且出现了许多不平衡的现象，当时为了稳定市场，保持平衡，就采取了机械的静止的平衡方法，企图以缩小建设规模、压缩消费的办法，只从分配方面去求平衡。这是用“削足适履”的办法求平衡，不但不能起促进生产的作用，反而妨碍了生产的发展

周恩来还按照毛泽东对“反冒进”历次指责的严厉词语，这样检讨说：除了前面所说的认识和方法上的错误以外，还应该特别指出，“反冒进”的错误，是同政府工作中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分不开的，也是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过去一个时期，政府工作特别是财经建设工作，重业务，轻政治，务“实”不务虚，政治空气淡薄，事务主义严重，抓小不抓大，主次分不清。有些重大的工作问题，没有及时地向中央请示报告，更没有经常地系统地向中央反映情况。即使请示了，报告了，也不是“毛毛细

雨”，而是“倾盆大雨”，材料数字一大堆，使中央对于需要作出决定的问题，来不及进行仔细的分析研究。对于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缺乏认真的研究和讨论，领会不深不透，因而就不能正确地在政府工作中加以贯彻。

5月16日，陈云在大会发言。在发言中，他检讨说：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的这一段时间内，我对于我国经过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以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势估计不足，对于1956年生产高潮的伟大成就估计不足，对当时大跃进中出现的个别缺点，主要是由于新职工招收得过多和某些部门工资增加得不适当，一度造成商品供应和财政的某些紧张情况，估计得过分夸大了。我在考虑和提出问题的時候，一般地多从财贸系统的情况出发，而对于中央工业、交通多数部门的情况，对于全国各地党的各方面工作，则注意不够。这样从部分情况出发来解决问题，就不会正确地理解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我在1957年1月省市党委书记会议上所说的争取市场稳定和财政平衡的方法，就是从局部现象出发，因而不是从积极方面，千方百计地去发动群众增加生产，来克服困难，而是采取了消极的方法，迁就了困难。过多地注意物，对于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估计不足；过多地注意了分配方面的关系，对于扩大生产重视不够；过多地注意了所谓“稳”，而不是积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东西。这些错误，曾经使群众的积极性受到损害，并且减低了1957年的经济发展速度。“反冒进”的错误是看不见和低估当时群众性生产高潮的伟大成绩，是夸大估计了当时财政和市场的紧张情况。我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二中全会上，虽然只作了

粮食、养猪、油料、副食品等问题的报告，没有涉及到当时的全盘财经问题，但是，因为我是财贸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对于当时财政和市场紧张的错误看法，首先而且主要的是我的看法。因此，对于当时“反冒进”的那个方针性的错误，我负有主要的责任，首先在思想影响上负有主要的责任。

5月15日，李先念在大会发言，也就“反冒进”问题作了检讨。他说：“几年来，财政工作在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下是有成绩的，是基本执行党的总路线、总方针的。但是，在工作当中确实出现了不少缺点，甚至在一个时候一个问题上也发生过带有方针性的错误。我们的财政工作，既要集中资金，保证重点建设，保证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又要照顾收支平衡，保证市场物价的稳定。这些都是需要的。但是我们在工作当中，往往考虑平衡和稳定多，考虑建设速度少，往往是一怕预算发生赤字，二怕市场波动……正因为我们思想片面，有时偏重于消极的方法和制约的一面，因此只好在预算收支数字上打圈子，打来打去还是不得不到一个好的出路，结果只能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不是轰轰烈烈，势如破竹。建设事业前进当中是会发生某些供求失调现象的，我们就表现异常敏感，盲目叫喊紧张。当1956年建设跃进中出现一些个别缺点的时候，我们只是抓住了事物的局部现象，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夸大缺点，低估成绩，把1956年的跃进说成是一种“冒进”。“反冒进”的错误给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失，这里面我是有责任的。幸而中央及时作出了纠正，否则，损失不知道会有多大。

5月16日，薄一波在大会上发言，检讨说：现在看得很清楚，1956年的“反冒进”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一个带

方针性的错误。对于这个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因为1956年的跃进，是有重大意义的。在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暂时的局部的困难，对于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本来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是我对于这种形势没有很好地加以分析，没有抓住形势发展的主流，对于一度出现的材料紧张的困难，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动员和依靠群众，千方百计地去克服，反而强调了这种困难，认为既然原材料生产赶不上去，基本建设的速度也就不能太快。在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我看到了我国人口多，消费也多，强调提高积累比例有困难，而没有首先强调人多可以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因此，对于“反冒进”的错误我是有份的。在“反冒进”错误的影响下编制的1957年计划是保守的。而且在思想没有完全解放的情况下，编制出来的1958年计划的第一本帐，也对当前大跃进的形势估计不足。今天看来，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于生产和建设的指标高一点或低一点，而在于“反冒进”大大挫伤了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的积极性，给开始出现的群众性的生产建设高潮，泼了冷水。这是必须引为教训的。

## 毛泽东第二次讲话

5月17日下午，毛泽东在大会上作第二次讲话，主要讲国内外形势。

### （一）国际形势

讲讲卫星上天吧。这是好事。第三颗人造卫星比第二颗大一倍以上，1300多公斤。看来也许几个月、半年或一两年以后，会搞2000多到5000公斤。我在莫斯科会议上说，再发射5000公斤的，突破一关就可能有两三万公斤。这是一件很大的好事。

资本主义世界现在乱子很多，我们这个世界乱子很少，也比较团结。南斯拉夫不算在我们这个阵营内，这不是我们不要它，而是它不干。我们阵营是12个国家，形势很好。形势本来就很好，没有哪一天不好过。有时天上出现乌云，有人就觉得不好了；有人认为我们不行，人家很行，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放第二颗人造卫星上天时，我在莫斯科讲了十条证据，说明我们从来就是行的。其中有一条是中国的。讲蒋介石在南京，我们在延安，延安只有7000人口，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蒋介石手里。他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只有几十万游击队。但是我们胜利了。历史上从来就是小的战胜大的，弱的战胜强的，因为小的弱的有生命力，大的强的却没有生命力。什么希特勒、蒋介石、美帝国主义，都不在话下。我们从来把美帝国主义看成是纸老虎。可惜只有一个美帝国主义，十个也不在话下，迟早它是要灭亡的。

日本人到北京来跟我说，很惭愧，对不起你们，过去打过你们。我说，感谢你们，你们是做了好事，正因为有了你们的侵略，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使我们团结起来，领导全国人民打走了你们，我们才能来到北京。我们在延安时曾说，哪一年才能到北京看梅兰芳、程砚秋的戏，有的人怕这一辈

子看不到，可是，我们看到了。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团结起来，全党一致，就把蒋介石推翻了。现在我们有许多胜利，又要团结起来搞建设。七大使党有了个共同纲领。这次会议，也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们又的制定了个共同纲领，全党一致制定了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也是全国人民一致的总路线。全党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这是国内形势。

国际上乱子很多。帝国主义内部吵架，世界不太平。法国、阿尔及利亚、黎巴嫩、印度尼西亚、拉丁美洲等。乱子出在资本主义世界，这些地方发生问题，与我们都有关系。凡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东西，都于我们有利。帝国主义内部吵架，互相争夺殖民地，他们压迫黎巴嫩、印尼、拉丁美洲，争夺阿尔及利亚。这些不详细讲了，大家可以看看材料。总而言之，有时候看形势似乎不好，天上有乌云，这种时候我们要有远见，不要为暂时的黑暗所迷惑，不要因为暂时的黑暗就觉得不好了，就觉得世界不好了，我们不行了，要倒霉了，没有这么回事。

我们过去最不好的那一段是万里长征，前堵后追，军队少了，只剩下一点点，地方小了，党也小了，十个指头剩下一个。那样的困难都克服了，得到了锻炼。以后机会来了，又发展了，又由一个指头发展到十个指头，一直到取得全国的胜利，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苏共党史第一章第一页，就讲这个由小到大的辩证法。苏共由几个人开始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联的大党。他们当时一枝枪也没有，而他们的敌人，先是沙俄，后来是克伦斯基政府，都是全副武装的。是全副武装强，还是手无寸铁的人强？你说哪个强？我说是手



无寸铁的人强。最后是谁战胜谁？我们党的情况也一样。1921年党成立，只有几十个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周佛海是个“好同志”（笑声），有陈公博，又是个“好同志”（笑声）。陈独秀没有到会，因为他有威，选他当总书记。可以他不成材，他不成器，他是伯恩斯坦主义。民主革命他干，是激进派；社会主义革命他不懂，他不懂不断革命，犯了错误。想一想我们的党的历史，我们经过了多少困难！万里长征之前，有一段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四中全会在上海开，没有几个人，危急存亡，党在分裂。

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党也在分裂。党经过了分裂，以后又团结。张国焘跑了，党恢复了团结。后来在延安，蒋介石和日本人包围我们，将我们分割成十几块根据地。那样困难的局面，到底延安强些，还是南京强些？我们强些，还是蒋介石强些？现在证明是我们强，不然为什么我们能在怀仁堂开会呢？他为什么跑到台湾去了呢？是谁胜利了？

## （二）国内形势

现在讲中国问题，中国是国际形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讲国际形势就要讲中国。中国形势证明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最有生命力，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是有前途的，中国是很有前途的。现在社会主义有很大的同盟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同盟军，是帝国主义的后方。在他们后方有我们的同盟军，我们绕到帝国主义后方来了。列宁说：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你看究竟是西德、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先进，还是我们先进？斯大林懂得这一点。1949年6月，以刘少

奇为首的代表团到莫斯科，在宴会上，斯大林举杯祝贺中国将来超过苏联，要少奇同志喝酒。少奇同志说：“这杯酒不能喝，你是先生，我们是学生，我们赶上你，你又前进了。”斯大林说：“不对，学生不超过先生，那还算什么好学生，一定要喝。”僵持了一二十分钟，最后少奇还是喝了。先生教了学生，学生超不过先生，就是不争气。要争气，要喝这杯酒。这说明不仅列宁，斯大林也看出先进的东方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要狂妄，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但也不要有自卑感，不要妄自尊大，要破除迷信，把自己摆在适当的位置。我们要敢想、敢说、敢做，其基础是马列主义。铁托也敢想、敢说、敢做，但他的基础是帝国主义。我们的基础是马列主义，因此我们是正确的。所以敢想、敢说、敢做，是不会出乱子的。

国内问题，还是一个农民同盟军的问题，中国革命始终是农民同盟军问题。工人阶级如没有农民作为同盟军，就不能得到胜利解放。解放前只有 4000 万产业工人，现在有 1200 万，增加了两倍，连家属在内也不过 4000 万人左右。而农民则有 5 亿多。所以中国问题，始终是农民同盟军问题。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不很清楚，甚至在农村混了几十年还不清楚。1956 年为什么犯反冒进的错误，主要原因就在这里，不懂农民的思想感情，也就没有根，风浪一来，就容易动摇。1955 年出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举出一百几十个合作社的例子，除了西藏，各省都有。其实不需要那么多。有一个河北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的资料就行了。另外，书中有个穷棒子社，中农跑了，剩下三户贫农不散，他们还是坚持办下去。这三户指出了 5 亿农民

的方向。每个省都有许多合作社增了产，一百多个社增了产，一增就是一倍、几倍，你还不相信农业40条能够实现吗？我看是能够实现的。可是1956年到1957年这两年中间，不相信的人相当多，所谓观潮派相当多，从中央到省、专、县、乡、社各级都有那种人，现在还有如张仲良讲的“秋后算帐派”。他们不去找积极因素，专去找消极因素。听到几个干部一反映点什么，往耳朵里一吹，就说农村不大妙，眼前一片黑，农民吃不饱，说什么不增产，无余粮等。干部实行工资制后，有了一些钱，农村家里写信来，老子向儿子要钱，总是要说得苦一些，说什么粮、油、布都没有了，他不说苦些，钱怎能寄回去呢？你接到信应该分析一下，是真还是假？柯庆施给我讲过，江苏省作过一个统计：1955年县、区、乡三级干部，有30%喊农民苦，闹得很凶，说统购多了。这些人都是富裕中农成分，或者原先是贫农、下中农，以后上升为富裕中农。所谓农民苦，就是说富裕中农苦，不愿拿出粮食来，想搞资本主义。下边这样叫喊，专区、省以至中央也会受到影响，就没有人跟着喊吗？问题在于你站到什么观点立场上看问题？是站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立场上看问题呢，还是站在富裕中农立场上看问题？现在情况比较好了些。农村生产有了大跃进。经过整风、反右派，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部分管理工作，城市政治空气也变了。那些“农村没有希望”、“农业悲观论”、“40条不能实现”等等，可以说一扫而光了。但是，仍有一些“观潮派”，“秋后算帐派”，这部分人没有扫光，所以要做好工作。谭震林在关于农业发展纲要的说明中，讲到要注意江苏同志的话，防止“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就是说要看到自己

的缺点。十个指头九个好，一个指头有问题。华者花也，不要只开花不结果实；不要粗而不细，要学张飞粗中有细；要看到我们的弱点、缺点，以免秋后达不到指标的要求。请同志们注意，各行各业各部门都要注意，无论哪一项工作，工业、农业、商业、学校、交通、文化、科学、写小说……都要注意这一条。

国内形势很好，一片光明。过去思想不统一，包括对多快好省没有信心。多快好省是讲工业、农业、交通各项工作，基本问题是农业，怀疑40条的问题。现在信心提高了，是由于农业大跃进，逼迫工业，使工业赶上去，一齐大跃进。南宁会议上提出一个问题，地方工业5年或7年能不能赶上或超过农业产值。各省就进行规划，这个纲一提起来，2月到4月3个月来，地方工业就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现在许多同志了解这个道理了。1956年下半年，中央有些同志过去在上面不大了解，现在只几个月也就了解了。1957年6月，周恩来同志在人大的报告很好，以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向资产阶级宣战。那是一篇很好的文章，现在还值得再看一下。那个时候问题就已经解决了，再深刻研究一下还是后来，比如到现在就真解决了。现在中央规定，今后各级同志每年至少要下去4个月，解剖几个麻雀，几个合作社，几个工厂，把根扎在群众中。感谢河南长葛县委第一书记的发言，他讲的土地大翻身，我在这里听了一遍，回去又看了一遍。他讲的深翻土地一尺五寸，将112万亩全年全部深翻一遍，争取亩产900斤。这就提出一个新问题，各县是否都能做到？长葛县能做到，别的县难道就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还不行吗？四年还不行吗？无论如何五年总可

以翻一遍了吧！深翻一尺五寸，这是一个大发明。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把全县土地都深翻一遍，没有好工具，就用长葛县那样的工具，就用他们这个办法。他们的办法是：先把表层熟土翻在一边，然后把肥料施在生土上，再用铁钎把第二层生土翻开，与肥料搅拌，打碎土坷垃后，仍放在下层不动，接着翻第二行，把第二行熟土翻在第一行生土上。依次翻下去，表层上不变。这是一大发明。山东有个大山社，由于深翻地增产百分之百，深翻一次至少要增产百分之几十。增产的措施，土壤应当放在前边。过去只说水、肥、土、种子，现在还有一个密植。在40条中单列一项合理密植。广东一亩要种3万墩，每墩3根秧，每秧3根苗，就27万个穗；每穗平均60粒，共1620万粒；每2万粒一斤，一亩不是810斤吗？这只是纸上谈兵，拿到手里才算数。北方的麦子、谷子、玉米、高粱、大豆等，都可以这样算一下。要充分利用阳光和空气。现在不是在反浪费吗？要反对浪费阳光和空气。太阳每天辛辛苦苦地工作，你们都不利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被植物吸收变成碳水化合物，太阳照在植物上起光合作用，制造它需要的东西——碳水化合物。粮食是热能的储藏库。土壤的团粒结构，每一个团粒是一个小水库。这扯得远了，这一段是顺便扯起的，不是我要讲的主题。

主题是讲扎根串连。研究几个农业社，研究几个工厂。搞教育就要研究几个学校。搞商业就要研究几个商店，军队就要研究几个连队。总之，各行各业都要研究几个。解剖几个麻雀，然后脑子里才有深刻的印象。要尊重唯物论、辩证法，首先要尊重唯物论。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这三个东西是一个东西。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不是天赋的，不

是生下来就有的，是后来外界事物反映形成的概念，是实践观察之后才有的。比如看见了狗，看见了人、树木、马、石头等，才形成了狗和人等等概念。概念初步形成之后，才可能推理和判断。问3岁小孩子，你妈妈是狗还是人？孩子能回答是人不是狗。这就是小孩的判断：妈妈是个别的，人是一般的，这里面有同一性。这是个别与普遍的对立统一。这就是辩证法。3岁小孩懂得矛盾统一，懂得辩证法。我们的思想只能由客观世界刺激感官而形成，为客观实践所形成。概念是哪里来的？是客观世界来的。现在我们的多、快、好、省概念，是积累了好多经验才形成的。中国的经验，苏联的经验，根据地的经验，还有这几年建设的经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话也是非要不可的，没有这个不成。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党没有点干劲，或干劲不足，就不好办事。上游当然要争，上游是四川，力争到四川去看看，你们不愿去看看吗？我这次去看了。不要力争去江苏，这是下游。这是借长江自然地理来谈问题。我们说力争上游，就是向先进看齐。苏联三个卫星上了天，卫星的“四川”在莫斯科，我们争不争啊？要搞卫星。什么1000多公斤我们不抛，要抛，抛它个2万、3万也许4万公斤，当然从几千公斤抛起。像美国那样鸡蛋大的，我们不抛。

我们的同志要和群众联系，要真正懂得群众的感情，要使群众的思想感情深入到我们的脑子中来。群众的思想感情不深入我们的脑子，遇事就容易动摇。深入了，工作上有问题，就有办法对付了。过去我们打仗，也常遇到困难问题，到半夜12点还没有办法，睡一觉，第二天办法就出来了。经常有困难的事，不容易办的事。孙中山说，积了40年的

经验。我们也是积了几十年的经验，深知凡遇到困难的事，就同群众商量一下，睡一觉，开个会，就可以解决问题。现在没有问题、没有困难吗？不要为一时的黑暗所吓倒。经常有两上因素，光明的，黑暗的，不要被黑暗所吓倒。现在河北北部干旱，不下雨，你说河北同志不发愁？他们去年增产40亿斤，今年要增产80亿斤，就是旱，也要增产50~60亿斤粮食。所以说国内形势是很好的。但要看到阴暗一面，不要怕。过去犯了错误的同志，他们不了解，去年6月以后了解了，现在了解得更深。地方上还有许多“观潮派”，等着秋后算帐，要很好地说服他们，给他们讲讲形势。我去年在“夏季的形势”中讲了，要用大力用诚心帮助他们，教育他们，使他们转变，他们还是积极分子。

### （三）除四害

第三，讲个除四害。除四害好不好？对此我很感兴趣。《参考消息》上说，印度人也感兴趣，也想除四害。他们有一害是猴子，吃了很多粮食，谁也不敢打，说它是神。

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这是斯大林提出的；也不提“苏维埃加电气化是共产主义”的口号，这是列宁提的，这个口号很好，但我们可以不提。我们提现在的口号，不提也一样电气化，而且更化得厉害些。前两个口号是斯大林提的，有片面性，不够全面。干部决定一切，那群众呢？技术决定一切，那政治呢？这就缺乏辩证法。斯大林又懂得辩证法，又不懂辩证法。这个问题我在莫斯科会议上也讲过。我们的口号是多些、快些、好些、省些。这是不是高明些呢？我看我们的口号是高明些，应当

高明一些。因为是先生教出来的学生，学生应当比先生强。后来者居上嘛！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比苏联提前到来。苏联 20 年加上半年是 1800 万吨钢。1917 年是 400 万工人，1913 年是 400 万吨。所谓 20 年加半年，是从 1912 年到 1941 年 6 月苏德战争爆发时，搞到 1800 万吨钢，除去底子 400 万吨，净搞 1400 万吨。就拿这些钢打败了希特勒。我们不用这些年，因为有苏联的帮助，有 6 亿多人口，又从苏联学来了经验。他们 40 年的经验就是我们的经验，他们走对的我们继续走，不对的我们就走了。我现在对几千万吨兴趣不大。最近又涨了价，早晚市场不同。到 1962 年，我们的钢有的说是 3000 万吨，有的说是 3500 万吨，有的说是 4000 万吨，这是 8 年加 5 年共 13 年时间。底子不是 400 万吨，而是 90 万吨，主要是日本人搞的，其次是蒋介石搞的。蒋委员长这位老先生真不高明，几十年只搞了 4 万吨，还有满清张之洞的老底子。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苏联 20 年加半年，增加 1400 万吨钢，我们 13 年增加 3000 万吨钢，少 7 年，钢多 1000 多万吨，可见事在人为。我们有了苏联的经验，有 6 亿人口，还有 3 个“并举”，群众路线，以一个普通的劳动者面目出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现在要学列宁主义，列宁讲民主集中制讲得很好，斯大林不会讲。列宁讲多大的官都要与普通劳动者见面。我们 13 年可能达到 4000 万吨，为什么？因为我们有 6 亿人口，我们发展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整风以后，做到了真正民主。不是假民主。大家敢想、敢说、敢做，连落后阶层也积极起来了，落后阶层即富裕中农。工人、贫农中也有落后的。

做事要劳逸结合，有紧张有休整，常常紧张不行，要又



紧张又松弛，太累了不行。河南大办又红又专的学校，这很好。可是大家太累了，上课时有人打瞌睡，先生也累了，但又不敢瞌睡，硬挺着。太累了不行，总要有几天休息。我们要有张有弛；有民主，有集中。不管哪个地方，都一律如此。

要有团结，又有斗争。对于观潮派、秋后算帐派就要进行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不能不准人家革命。阿 Q 最伤心的事是不准他革命。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帮助人家改过，一味批评不好。一曰斗、二曰帮，要好心帮助人，不要居心不良。无非是打倒你，我来干。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人多几个好呢，还是少几个好呢？我看还是多几个好。

辩证法应当在中国得到发展。别的地方我们管不到，中国由我们管。我们这一套比较合乎列宁的辩证法，不太合乎斯大林。不能说斯大林没有辩证法，斯大林否认矛盾，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全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他临死时写了一篇文章，否定了自己的说法，认为有矛盾，处理不好可能发展为对抗的矛盾。斯大林有辩证法，但有几成还要研究，这个人有片面的地方，所以对他不要太迷信。他也以他的方法建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打败了敌人。现在苏联有 5200 万吨钢，今年 5500 万吨，三个卫星上了天。苏联建设社会主义，那是一种方法。我们可不可能有另一种方法呢？都是搞社会主义，都是马列主义，他们是由上而下的方法，我们是搞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列宁比斯大林强，我们采用了列宁的，而不采用斯大林的。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说，革命后的改革是从上而下的和平改革，他不搞自下而上的阶级斗争。东欧没有斗争地主和资本家，北朝鲜搞

和平土改，……我们土改时斗争了地主，“五反”时斗争了资本家。我们有从上而下，又加了一个从下而上的扎根串连，群众性的阶级斗争。现在搞建设，要有决议案，政府发指示，规章制度等等，从上而下的要一点；但大量的还是发动群众自己来搞，搞群众运动。为什么他们40年搞了5100万吨钢，我们搞5000万吨只需15年或者到1963年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条件不同，有苏联的经验、技术和专家的帮助，加上把列宁的群众路线加以发挥，依靠群众，在农村依靠贫农。是不是这样？请大家想一想。我们是否可以比他们快？我看是可以的。

昨天有同志讲：“跟上某人走就不会错”，这个某人就指的我毛泽东。我看这个说法不全面。这句话要修正一下，我说是又跟又不跟。这要看对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地跟，今天的对就跟，明天的不对就不跟。不管是领导人还是挑大粪的，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我们跟马克思，跟列宁，跟斯大林的正确东西。合作化，就是跟贫农、下中农，多快好省，也是首先在群众中出现的，在许多工厂、农业社、商店都出现了。不要跟某个人，糊里糊涂地跟某一个人走，很危险，要独立思考。

十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同志往往搞不清楚，一出事，忘了十个指头的关系。人民内部矛盾，劳动人民有缺点。总是几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许多同志犯错误就在这里（毛泽东这里点出浙江沙文汉、安徽李世农，还有广东、广西等省几个负责人的名字，他们刚被打成右派，或认为犯了极其严重的右倾错误。说吴芝圃发言很好，谈潘复生的问题。）你们发言为什么不讲讲这些人，要献宝，让人

家见识见识。他们这些人不是几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十个黑指头，有的是九个黑指头，只一个指头干净。现在讲的是在大风大浪中有动摇的人，这些同志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清楚了，他们跟这些人不同，要团结他们，要保护这些干部。要坚决保护各级积极分子，虽然有错误，但他们积极，他们怕大鸣大放，怕下不了台。坚决保护就下台了。他们的错误只有十分之一，在整风中要坚决保护这些干部。青岛会议文件上就讲了保护干部的问题，以前也讲过。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个别例外。资产阶级的中间派中，是五个指头与五个指头（五个指头是资本主义，五个指头是社会主义），中左是六个指头与四个指头，中右是六个到七个黑指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脑筋，一下洗不干净，需要几次反复。好几个同志讲，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要有几个反复，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动摇。经过反右斗争，今后人的问题不会有了，小的问题还会有。资产阶级也会起风浪，在 12 级台风面前，我们有的同志还会动摇。但有了去年这一年的经验，全党得到一次锻炼，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波匈事件，我们的船没有翻；去年那么大的风，我们的船也没有翻。有人说，《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是否发早了些？也不早。有些地方可能嫌早了些，有些地方还嫌迟了，再拖一下，有些左派也要烂掉了。问题并不在这里，有毒还是会出来的，反了章罗，右派还是放毒。……只要有适当的温度，温度达到 38 度，他们就会猖狂进攻，还会原形毕露的。

不要忘记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1956 年的反

“冒进”，就是忘记了这个问题，不从本质看问题，要从中吸取教训。

#### (四) 准备对付灾难

现在讲点黑暗。要准备对付灾难，无非是大旱大涝，赤地千里。还要准备打大战。战争疯子甩原子弹怎么办？他要甩原子弹，我们又不是人家的参谋长，有什么办法？甩就甩吧！战争疯子存在一天，就有这个可能。还要准备党内闹分裂。现在看来，一般的不会有，但可能性是有；我们搞得不好，就不会有分裂。苏联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出现了两个集团，莫洛托夫和赫鲁晓夫

战争与和平。和平是第一种可能性，战争是第二种可能性。现在争取和平的可能性比过去大。主要是社会主义阵营力量比过去强大，苏联强大，民族独立运动是我们强大的同盟军。西方国家不稳定，有许多不愿意打仗的人，除去工人阶级，资产阶级中也有许多不愿意打仗的。美国人民也不愿意打仗。和平可能性很大，战争可能性也有。帝国主义为了摆脱经济危机，要准备有疯子。现在打核战争，时间会缩短，一打起来，顶多3年就可以了。要作准备，真正打怎么办？要讲讲这个问题，要打就打，反正他要打，我有什么办法，我不是他的参谋长，他又没有请我去，我现在还在北京啊！一打起来，把帝国主义扫光，然后再来建设，从此就不会再有世界大战了。既有可能打世界大战，就要准备，不要睡觉，打起来也不要大惊小怪，打起来无非是要死人。打仗死人我们见过。人死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汉武帝时5000万人，到南北朝时只剩下1000多万人。那时没有

原子弹、榴弹炮，一打几十年，断断续续几百年。经过三国到隋的统一，唐朝人口开始是 2000 万，以后到唐玄宗时又增加到 5000 万。安禄山反了一下，又分为五代十国，一两百年，直到宋朝才又统一，人口又由 5000 万人减到 1000 多万人。对不对？范文澜同志你研究过的。这个道理我同尼赫鲁说过。我说现在的武器不如关云长手里的大刀厉害，他不信。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死那么多人，头一次死 1000 万，第二次死 3000 多万。我们一死就是 4000 万。你看那些大刀破坏性多大！打原子弹没有经验，不知道死多少，最好人口剩下一半，次好剩下三分之一，全世界 29 亿人，还有 9 亿多人。9 亿人也好办事，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个帝国主义灭亡，资本主义全部消灭，取得永久和平。所以说，真打原子战，不见得是坏事，是坏事也是好事。

再就是党内分裂。假如有人不顾大局，如高岗、饶漱石那样不顾大局，出现党内分裂，就要乱一阵子。但又会走向反面，不平衡走向反面就是平衡。党大会代表，特别是中央委员更要注意，要顾大局。谁不顾大局，谁就会摔跟头。凡是不顾大局闹分裂的，有什么好结果？张国焘闹分裂，有什么好结果？你们大家看过《阿 Q 正传》没有？这是本好书，没有看要看。高岗不许中央一些同志革命，不分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区别。高岗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顾大局闹分裂有什么好处？不应当闹分裂，闹分裂是不对的。只有一种分裂是可能的，第二国际时代，开始列宁同考茨基没有决裂，直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投了帝国主义战争的票，列宁才同他们分裂。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嘛，要调动一切积极力量。我们要作合法斗争，争取多数，不要搞分裂，不顾大

局。

我们要调动 6 亿人民的力量，包括右派都要做工作，要争取改造他们。右派分子大会要开，都开了吗？没有开的都要开。争取十个右派中间的 7 个要改好。经过 8 年、十年改好了，他们会站到我们方面来的。改好了可以摘掉帽子，要再搞右，就再戴上帽子。

讲完了。

毛泽东第二次讲话之后，分组讨论中许多人所谈内容，主要是讲话中涉及的问题。

上海组的讨论说，主席的两次讲话，不仅总结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而且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许多经验的总结，并且在许我问题上，特别是在民主集中制、发扬群众的积极性、破除迷信、发扬独创精神等问题上，发展了马列主义。这两次讲话有国际意义。主席这两次讲话和人会的许多发言，使大家从正面到反面，从理论到实践，透彻地理解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正确性，教育意义很大。

湖南组在讨论中认为，主席的讲话对于我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有极其深刻、伟大的意义。7 年赶上英国，再加 8 年赶上美国是完全可能的。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赶，而在于敢不敢赶，主席的讲话已经使我们从思想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速度，必将打破古今中外的一切纪录，也将大大超过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

这个组的讨论还认为，我们党是不存在个人崇拜问题的。主席第二次讲话中谈到，有人说只要跟着主席走就不会

错。他说又要跟又不跟，要有独立思考，要看真理在谁手里，只要谁手里有真理我就跟。从这里，一方面可以看到毛主席谦虚的高尚的风格；一方面说明了我们衷心地跟着毛主席走，并不是崇拜个人、迷信个人，而是崇拜真理。因为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

湖南组的讨论还谈到，过去中央规定的干部必读 12 本书，都是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没有把毛主席的著作编进去。因此必须重新规定干部必读书，并把毛主席著作确定为干部必读的主要内容。建议中央作出规定，今后干部学习，必须以毛主席的著作作为骨干，结合学习各个革命时期的中央文献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的重要报告。这些文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每一个党员都必须下苦功认真学习。

四川组在讨论中，一致拥护主席 17 日的讲话，对目前国内形势的分析，特别是中国的基本问题自始至终是农民问题，感到非常重要。其他关于 40 条、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尊重唯物辩证法、破除迷信、独立思考等问题，许多代表都谈了体会。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问题，有的同志提出，希望《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早日出版，如果不能早日出版，也希望把 1955 年以来毛主席许多重要讲话，暂时印发给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作为内部学习资料。

新疆组的讨论，大家感到主席两次讲话对自己启发教育极大。讲话从始至终贯穿着唯物论、辩证法。大家认为，唯物论、辩证法在中国有重大发展，并且还在发展，这

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的伟大贡献。大家体会主席讲的创造性，要破除迷信，要解决思想，要敢想、敢说、敢做，使我们提高认识：必须看到新生的力量虽然刚刚萌芽，开始的力量很小，但它是最有生命力的，是有巨大发展前途的；必须看到问题的主流，基本方面，不要为一时的现象所迷惑，看不清方向；必须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群众路线，特别是遇到问题和困难，要同群众见面，商量解决，就是要政治挂帅，不要见物不见人；必须尊重唯物论、辩证法，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看到有利方面，也要看到困难方面；看到困难方面，更要看到有利的方面，看到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方面。

甘肃组研究了传达会议精神的问题。初步计划，先在省委扩大会议上，以主席的讲话、少奇同志的报告为中心，进行传达，并联系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着重解决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群众路线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等问题。达到提高思想认识，增加团结，心情舒畅的要求。然后按口分别进行传达。

这些组的发言内容具有代表性。

## 毛泽东第三次讲话

5月20日下午，毛泽东在大会上作第三次讲话。这次讲话谈了8个问题：

今天讲第三次话。主席团常委会决定我讲一次话，采取成都会议的方法，讲几次。已经讲了两次，今天是第三次。



一、再讲一讲破除迷信。第一机械部搞了一个材料，41个科学家、发明家的小传。其中只有7个人是工程师，有一些社会地位，其他都是穷苦出身的工人、农民。瓦特就是工人。这一批材料很用处。其他各部门都可以搞。这个材料从十八世纪搞起，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恐怕自古以来都是如此。无论从什么时候搞起的都好，对破除迷信很有好处，对我们很有帮助，可以打掉工人、农民、小知识分子的自卑感。我上回只讲到工业方面，农、林、水应加上，卫生、政法、文教各部门都可以搞这方面的材料。

二、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个问题很重要。之所以重要，因为有些人就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不是平等待人，靠老资格吃饭，特别是做了大官的人，靠官架子吃饭，而不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要靠“你是我管的”吃饭。提出这个问题，要靠大多数人做到这点，事情就好办了。过去当官的官气，就是看不起人，“你是我管的”，就靠这个吃饭。这样就妨碍了群众创造性的发展。我们要破除这个东西，只看谁有真理，我们就服从谁，不论他是挑大粪的，扫大街的。不论你做的官有多大，只要真理不在你手里，我们就没有理由服从你，真理在你手里，就服从你。烧掉了多数人的官气，剩下少数人就孤立了，就很难作怪了，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不是共产主义的东西。摆架子、看不起人，这是低级趣味不是高级趣味。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才是一种高级趣味。这样一来，我们要防止的大国沙文主义，就可以防止了。如果全党全国大多数人特别是领导干部，都是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态度，谦虚的态度（科学的谦虚，不是虚伪的谦虚），这样就可以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大

国沙文主义出现了也不怕。

三、外行领导内行，这是一般规律。差不多可以说，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去年右派、中间派都提出这个问题，闹得天翻地覆，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可不可以这样说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处于被动地位，大多数共产党员、工人、农民都不是专家。过去报纸在这个问题上，批驳右派不系统，讲得不透。为什么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因为人人是内行，人人是外行。世界上万种行业，一万门科学技术，每人只能精通一行一门。如唱戏，旦角有青衣、老旦、花旦、武旦、丑旦五行。五行中，梅兰芳只能唱青衣一行，唱老旦不行，李多奎专唱老旦。此外，还有其他角色，生也有老生、小生。一万行中每人只精一行，所以说人人是外行。但人人可能成为内行。一万行中，一行对其余 9999 是外行。一个人精通两三行、四五行，就很厉害了。就算你 18 般武艺俱全，同薛仁贵一样，18 般也只有 18 行，对 9982 行来说，你还是外行。隔行如隔山，内行少，外行多。做领导工作，除了本行以外，把其他行摸一摸，熟悉一下，有点常识，是必要的。如搞党的工作的，摸一下工业、农业、商业是必要的，但是要熟悉得很，成行家，是不可能的。我就只会坐飞机，不会开飞机。中学有十几门课，大学就更多，但只学一个专业。许多事业是由业余转化的。如孙中山开始是被人家看不起的，当个小医生，搞革命，是不合法的。“余致力国民革命，凡 40 年”，60 年除去 40 年，20 岁就致力于革命，搞了几年革命，医生当不成了。开始医生是孙中山的正业，政治是副业，以后转化为政治是正业，医学是副业，这时他对医学就生疏了，甚

至不干了，变成外行了。但是这时，他可以管医生。政治是管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是搞群众路线的，就是我们在座的这些人搞的。我们这些人对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一下。因为有许多工程师、教授看我们不起，我们也觉得自己不行；硬说外行领导内行很难。要有点道理驳他们，我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内行领导外行是很难的。梅兰芳当总统不行，他只会唱戏。

四、插红旗，辨风向。红旗就是我们的五星红旗。世界上什么地方都要插旗子的，是插红旗还是插白旗？世界上没有不插旗子的地方，南极也要插旗子，不是“美”就是“苏”，可惜我们没有去，什么时候去一下，将来开一个团到南极去。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要插旗子，不是红旗，就是白旗，或是灰色的旗子；不是无产阶级插红旗，就是资产阶级插白旗。去年五六月间，学校、机关、工厂究竟插什么旗？双方都在争夺。我们要插红旗，资产阶级要插白旗。现在有少数落后的合作社、工厂、机关、学校，它们那里不是红旗，而是白旗或是灰旗。我们应当到落后的地方走一走，发动群众，贴大字报，把红旗插起来。横竖是要插旗子的。合作社、生产队都插旗子。不要做闭口道士，道士要说文、唱文，要吹吹打打的，不讲话像什么。虚伪的谦虚，低级趣味的谦虚，就是闭口道士，应当批判。

有一种舆论是怀着低级趣味的情绪，不敢挺身而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是从《儒林外史》那里来的。为了插旗子，就要提高嗅觉，学会辨别风向，看刮什么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是苏州姑娘林黛玉讲的。世界总是分党派的，社会上的人总是分左、中、

右三种，有的处于落后状态，有的处于中间状态，有的处于先进状态。现在的任务是：先进的要争取中间的人，改造落后的人。右派插的是白旗，插资产阶级的旗子。中间分子插的旗子是灰色的，争取他们到左边来，插下红旗。唐朝的刘知几，是一个史学家，他说写历史要有三个条件：才、学、识。才就是才干，学就是学问，识就是对问题善于辨别风向。我特别请同志们注意的问题，就是辨别风向，要有辨别力。有无辨别力是极端重要的。中国有很多有才有学的人，但是他们不能辨别风向。斯大林说过，领导者要有预见。预见就是识别风向。就是在还没有刮风的时候，就能感到风要来了，刮小风时就知道要刮大风。站在看台上，什么东西都看不到，这种人是没有用处的。没有预见性，特别是当事物已经普遍存在了，还看不到，就会给右派以可乘之机，你看不到，他们就来了。

不要怕插红旗，凡是应该插红旗的地方赶快去插，到处插起来。每一个山头、村落都要把红旗插起来。每个党委、机关、部队、学校、工厂没有插红旗的地方，都插起来，哪里没有红旗，哪里就要插。要不断地插。现在许多地方并非都是红旗，有些刚刚插起红旗，过几天又落后了，不红了，经常变化，这也是自然状态。旗子变了，要常换。

五、红白喜事。上次讲对付可能的灾难，灾难有大中小，我讲的不是中小灾，是大灾——战争、分裂。

我们中国人把结婚叫喜事，是红喜事；死人也叫喜事，是白喜事，合起来就叫红白喜事。这是很有道理的。中国人是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亲分裂出小孩来，这是事实，是喜事。一个人分裂为二，两个变为几个甚至十几

个，像航空母舰一样。但也不能太多，节育有必要，今天不讲。

新事物的发生、变化和灭亡，老百姓都叫喜事。生是喜事，是突变。死亡也是喜事。一方面开追悼会哭一鼻子，这是人之常情；另一方面却又是喜事。我们有一个孔夫子，两千几百年了，如果还活着，也在怀仁堂开会，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灭亡，不是辩证法，而是形而上学。灾难是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突变是宇宙最根本的规律。生死都是突变。生到死几十年内是渐变。假如蒋介石死了，我们会鼓掌的。杜勒斯死了，我们这里是没有人掉泪的。旧事物死亡是好事。蒋介石政权的灭亡，帝国主义的灭亡，这是合乎规律的。新事物夭折当然不好，俄国 1905 年革命失败，我们南方根据地的丧失，就等于禾苗被冰雹打掉，当然不好。这就发生补苗的问题。我们共产党人总是希望事物改变的。大跃进与一般不同，7 年赶上英国，再加上 8 年赶上美国，这是突变。这不是突然来的，是逐渐来的，要有七年，再加 8 年。工作一年要抓 4 次，一年 360 天，这都是量变，其中也有许多小小的质变。如煤，不要 7 年，两三年就可以赶上英国。在这一点上来说，突变比量变好。但没有量变。就不会有突变。没有量变不行，否定量变，没有根据地去做突变，是冒险主义，在政治上要犯错误。平衡是由不平衡来的，平衡中就有不平衡，没有不平衡就没有平衡。平衡的破坏是跃进，平衡的破坏优于平衡，因不平衡而大伤脑筋是好事。现在一机部、冶金部、地质部、电力部等，日子不好过，大伤脑筋，大家压它们压得很紧，都要大大发展。这是好事。平衡、量变、团结，这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突变、不

团结、分裂，这是永久的、绝对的。团结是经过许多不团结而达到的。团结任务的提出，就是因为有不团结。一个人就没有团结的问题，两个人就有团结问题。何况我们有 1200 多万党员，有各种出身的人，有各种不同的水平。所以年年讲团结，就是因为年年有不团结。各人想法不同，党员水平不同，就必须开会。

为什么要开这个会？我看我们这个常任制是搞对了。过去没有每年开一次代表大会的制度，现在每年开一次极好。我们这个会有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的准备，有去年冬天、今年春天水利、积肥、大跃进的事实出现，这个会就好开了。水利、积肥、大跃进，工业大、中、小同时并举，什么都并举，什么都出来了，都明朗了，这个会就好开了。如果不开这样的会，你这样想，他那样想，每个人想法不同，水平不同，事情就不好办。开个会，采取比较合理的意见，作个报告，搞个决议，意见一致，全国人民就有了方向。这次会议有一些不是代表的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参加，他们讲了很多好的意见，使我们这个会开得更好了。

不仅年年要讲团结，月月要讲团结，而且每天每时都要讲团结。因为如同细胞一样，每天在分裂，每天在灭亡，这就是新陈代谢。我看这个新陈代谢，应该是新代陈谢，就是说姓新的把姓陈的给赶走了（我不是说要赶走陈伯达）。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元素开初不是这么多，只有几十种，现在已经有 102 种。一万年以后，万万年以后，再加上万万年后，也许不是 102 种，而是 204 种。生物是变化的，事物都是变化的，都要转化到它的反面。1200 万党员每天都会有出党的，每天总有斗争，总有人会受到批评。湖

北妹妹贴哥哥的大字报，因为哥哥老资格、有官气。结果哥哥输了，妹妹赢了。可见，真理在年幼人手里。浙江父子二人争论密植问题，父亲反对密植，儿子主张密植，结果儿子赢了。妹妹比赢了，儿子比赢了，这是一般规律；做父亲、做哥哥的，总是有相当危险就是了。但比输了也不要紧，向妹妹、儿子认输就是了，就团结起来了。要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才能免于危险。

要防止可能的大灾难，如世界大战、党的分裂。我们党有四次分裂：第一次陈独秀，第二次罗章龙，第三次张国焘，第四次是高岗。王明第三次“左”倾路线，是以合法姿态出现的，我们对他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经过批评达到团结。今后还会不会有新的分裂？我看有可能，只要有党就有可能，一百年以后还会有。我们的办法是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百年以后，我们这个党可能有变化。到 21 世纪只有 42 年时间了，会有很大变化的。42 年后，我们要出多少钢，多少煤，世界会有多大变化？

有些人说，这样讲了不舒服，我看讲了舒服，讲了大家就有了精神准备。实际上南斯拉夫不是分裂了吗？过去陈独秀、罗章龙、高岗搞分裂，最近有沙文汉、李世农、孙作宾、陈再励等，也搞分裂。北京的政法系统垮了，文艺系统垮得更多，人类灵魂工程师垮了。这些垮了有什么不好呢？我看是好事，这是政治上的分裂。新陈代谢嘛！年年有分裂，月月有分裂，像细胞的死亡一样；年年有团结，月月有团结，像细胞的生长一样。新的事物都有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都是有发生、发展

和死亡的过程。情报局也没有了，现在可以用莫斯科会议的形式来代替。在莫斯科会议上作了个决定，12国共产党作了一个决议，因为波兰人反对，没有公开发表；12国相约，由苏联作会议召集人，有事就开会，现在以新的方式出现了。

六、设置对立面。有两种：一种是社会上本来就存在的，如右派是本来存在的，放不放是政策问题，这是去年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决定放，大鸣大放。放出来作为对立面，发动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同他们辩论，同他们对抗，把他们整下去。……我们采取放的政策，30多万右派这个对立面是存在的，放出来教育了6亿人民，对我们有利。

另一种对立面是原来没有的，是人为设置的，如水库、水坝，这在原来是不存在的，现在到处星罗棋布。水要流，我们设个水坝作对立面，抬高水位，使它有个落差，可以发电，水库还行船、灌溉综合利用。再如开工厂，也是人为设置的，鞍钢是日本人建的，长春汽车厂是新的。自然界没有的可以人为制造，但要有物质基础。卫星上天是人为的，找到自然界规律就送上去了。

我们是乐现主义者，不怕党的分裂。柯庆施就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莫洛托夫对苏联有帮助。陈独秀、高岗对我们也有帮助，王明路线教育了我们党。这些对立面对我们有好处。当然人为地造一个陈独秀、高岗，那也不必要。要有一定的气候和条件，他们才能出来，当然出来没有什么可怕，也不开庆祝会。

乐观主义是我们主导方面，但也不是没有忧愁的。右派



进攻，你能不着急吗？我就有点着急，着急就要想办法对付，要注意领导艺术，领导得好，分裂由坏事变成好事。早早预见到，也可以使之不发生。像锄草一样，农民是有预见的，积几千年之经验，深知禾要长好，必须锄草。1200万党员中，只要有一万、二万、三万人有更高的觉悟，我们就不怕。更高的觉悟能有预见性。这里开会的人只有一千多人，有了预见，搞得更好一些，经过代表去团结其他人，那就不怕。怕有什么用呢？世界大战我们争取不打，要打也不怕，应该力争不打。

我们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犯了错误的人，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如对潘复生。那天讲到党的分裂问题，有的人会感到突如其来。现在我们很团结，没有什么事，中央和地方都很好。经过整风，“反冒进”事件现在搞清楚了，经过团结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我们是乐观主义者，使大家自觉起来，对一切灾难有所准备。

七、昨天周扬同志的民歌讲得很好。各级党委、支部都要收集一些民歌。我们有9万个乡，每一个乡出一集就有9万集，太多了，少出一些，出一万集。新民歌，一般的，社会上流行的，发给每一个人一张纸，请你把民歌写下来。你说不会写，就请柯庆施写，因为他是提倡办文化的，他要办大学的。

八、王任重提出立即布置秋耕秋种。现在离端午节不远（今天是5月20日），要布置秋耕秋种。要准备1959年的经济发展计划与财政收支预算。还有两个月，要好好抓一下工业、商业、军事、文教，特别是工业交通、思想。黑龙江把思想放在第一位。我在什么地方讲过，工、农、商、学、

兵、思。他们把思想放在第一位也好，这就是思、工、农、商、学、兵。以虚带实，以政治带业务，以红带专，把政治放在第一位。斯大林提的两个口号没有辩证法：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列宁是对的，他说：苏维埃加电气化。这就是以虚带实，苏维埃就是政治（如果北京是蒋介石统治的话，我们就不能在这里开会了），电气化就是技术。政治与技术结婚就产生社会主义，它俩结婚就会生儿子，就产生7年超英国、再八年超美国这两个儿子。第一个叫超英，第二个叫超美。

有的同志建议7月不开会，改在8月5日开，开10天，开到8月15日，决定今年明年的大事。

### 第三次讲话后的小组讨论

毛泽东第三次讲话时，已近会议的尾声。小组讨论的内容，更多地集中到毛泽东的几次讲话上。

广东组认为，主席的几次讲话，对大家启发很大，这是真正的思想大革命、大解放。要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不彻底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是不可能的。如果6亿人民都真正把思想解放了，群众的无穷无尽的智慧将化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会大大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因此，主席的讲话对我国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将发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在大会闭幕后，把主席的指示精神贯彻到全党全民中去，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大家认为，主席所指示的插红旗、辨方向，首先就是提高全党辨别大是大非的能力，

在兴无灭资的问题上，提高政治嗅觉；辨明了方向之后，还必须有明朗的态度，要敢于与一切错误思想作斗争；要插共产主义的旗帜，而且旗帜一定要鲜明。为此，就必须反对低级趣味的庸俗的谦虚，提倡实事求是的真正的谦虚。为了坚持真理，不要怕人家说“抬高自己，打击别人”；因为我们的任务就是抬高社会主义，打击资本主义。大家认为，主席指示的我们革命的根本问题始终是同盟军的问题，这一点十分重要。在过去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们许多同志是注意同盟军问题的，但在建设时期却把它忘了。其实6亿人民的积极性，主要是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农民不仅是今天的农业大军，而且是明天的工业大军，不把他们发动起来，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内蒙古组在讨论中，一致拥护主席的讲话，认为三次讲话极其重要。感到毛主席的这种辩证法的思想，是把理论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使大家顿开茅塞。如有的同志过去对外行领导内行，总觉得理亏似的，听了主席的讲话后，更加提高了自信心。还有些代表根据主席的讲话精神，检查了自己的思想，认为自己的思想总是跟不上主席的思想，所以在工作上也经常处于被动的局面。大家认为，这是由于过去对毛主席的思想和著作钻研不够，今后一定要很好学习和钻研毛主席的著作。今后定要很好结合实际情况，在全党组织传达，掀起一个学习高潮。

山东组在讨论中，一致感到毛主席的几次讲话，有一条红线贯串着，那就是辩证法，对大家的教育和启发最大。经过初步讨论，大家感到思想真的解放了，进一步明确了社会

主义建设的方向和路线；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敢想、敢说、敢做，是非常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日千里地发展。大家认为，为了解放思想，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对主席的讲话进行认真的系统的学习。

广西组在讨论中认为，当前阻碍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贯彻执行的主要问题，是思想没有大解放，迷信没有打破。协作问题也必须解放。大家在领会主席对农民问题的指示时说，过去我们有一些同志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没有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有些人虽然重视了，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只注意少数富裕中农，而忽视广大贫农、下中农，不从阶级观点出发，没有走群众路线，所以仍然犯错误。

云南组对主席的几次讲话，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并感到教育深刻，打破了迷信，敢于大胆创造。过去世界各国总是看不起中国人，我们自己也认为什么都是外国的好，洋人高明，洋货就好，而自己站不起来，自卑感很深。听了主席讲话，解放了思想，我们敢于站起来了。我们过去领导穷人干革命，现在搞建设，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说我们没文化，我们自己也自卑，不敢打破迷信。在讨论中，大家列举了过去不敢说、不敢想，使工作不能大跃进的例子，和最近思想解放后大跃进中许多生动的例子作比较。如大姚县1956年全县300多部双轮双铧，已推广80%以上，但以后来了“反冒进”邪风，1957年只使用10%左右，至1958年春大跃进，又都全部用起来了。这说明了思想解放对做好工作的重要性。今春各地水利、积肥、工业、农业、技术改革、生产指标一跃再跃，也说明思想解放的重要。大家认

为，我们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也认识不够。中国有 6 亿人民，又继承了马列主义的传统，我们出现毛主席这样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正像当时德国出马克思、俄国出列宁一样，是完全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为了解决当前中国革命问题，就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光学以往的东西。这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现实问题，不学，就会发生“反冒进”这一类错误。大家认为，只有解放思想，打破迷信，认真学习毛主席思想，在有利于社会主义加速发展的原则下，敢想敢做，才是不断革命论和促进派。总之，主席指示的精神给了我们无穷无尽的力量，对我们国家的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

江苏组代表在讨论中说，人家体会到主席的讲话，一再教导我们要打破迷信，解放思想，对我们的教育意义是极为深刻的。要贯彻执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要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主要的障碍是人们思想上存在迷信，妄自菲薄和自卑感。不把这些东西打破，我们就不能有大的跃进。大家领会，打破迷信，就是要掌握唯物辩证法，掌握马列主义；解放思想，就是要解放 6 亿人民的思想。人民的思想解放了，就会焕发出无比巨大的力量。过去我们的自卑感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迷信洋人，一是迷信高级知识分子。主席的指示把我们从两个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就是：一方面要反对民族自卑感，不仅要敢于超过英美，而且也要敢于超过苏联，事实上我国在建设方面已经超过上述国家；另一方面要反对劳动人民的自卑感，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近来出现的许多新的发明和创造，都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中国 6 亿劳动人民，真正解放了思想，敢想、

敢说、敢做，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定会是一片光明。大家还领会到，主席讲话再次教导我们，要把唯物辩证法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要插旗子，要把人民的旗子、唯物辩证法的旗子、马列主义的旗子插到各个角落里去。主席提的“工农兵学商”前面加一个“思”字，也就是这个意思。主席提出的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在社会主义国家说来，是一条正确的路线。主席提出的农民问题，印度、印尼、意大利、法国……都存在这个问题，是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这些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大跃进。大家讨论了如何跟上主席的思想，认为不能糊糊涂涂地跟，要深刻领会主席指示的精神，认真学习主席的指示，才能比较正确地把主席的思想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

### 毛泽东第四次讲话

5月23日，八大二次会议举行最后一次大会。大会通过了八大二次会议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关于1956年到195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决议。这天的大会还增选了25人为候补中央委员：王任重、张仲良、陶鲁笏、彭涛、刘建勋、赵毅敏、孔原、唐亮、刘子厚、张苏、杨一辰、汪锋、周小舟、方毅、王尚荣、刘震、张平化、张劲夫、韩先楚、李颀伯、廖志高、赵伯平、孙志远、张爱萍、姚依林。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最后一次讲话。

会议结束了，讲了几次，太多了。

我们的大会是有成绩的，开得好。这次大会做了认真的工作，制定了我们的总路线。世界上的事情就怕认真，不认真就搞不好。一认真，不管什么困难，都可以打开局面；不认真，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国土面积广大。现在人民解放了，不仅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而且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也有很大的发展。这些已经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前途。早一些时候还看不清楚，不知道要多少时间可以摆脱落后状态、被动状态。以前我们在世界上没有地位，人家看不起，杜勒斯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是6亿人口的大国，这同我们的情况不相称，所以这种轻蔑的看法也是有道理的。人口虽然多，但是力量没有表现出来。有一天我们赶上英国、赶上美国，杜勒斯就得承认确实有这个国家。我们的方针，你这个客我是不请的，到那个时候，他是要找上门来的，杜勒斯你来了我招待。过去几年，特别是去年一年，有些人对多、快、好、省的方针还不清楚，到底对不对，有怀疑的，反对的不少。这个情况是不可避免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有些人看到了，有些人看不到；经过一些时候，经过反复看，才看到了。总路线的形成是曲折的，道路是曲折的。以后是不是没有曲折了呢？不会的，还会有曲折的。这次大会制定的总路线，还要在客观实践中去证明；虽然经过去年冬天今年春天的大跃进，已经有所证明了。过去3年是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前年高，去年低，今年又高了。有了

这个变化，我们这次会就开好了。

这次大会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反映了人民的干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说是反映了。这些方面，去年9月三中全会就开始反映了；前年11月二中全会没有反映或是反映得不够，没能占上风。1956年冬季，有两件事没有料到，1955年苏共20次代表大会后，引起国际反斯大林，出现了波匈事件，来了一个世界反苏反共的高潮，这个事件影响了世界，也影响了我们国家，影响了我们党。另一件就是国内反冒进，事先也没有预料到，1956年上半年没有预料到。我在成都会议的一个文件上批了一下，没有预料到这两件事。请大家注意，将来还可能发生曲折，要预料到，请大家研究一下，各省委回去研究一下，中央也要研究。所以我在大会上讲了，有战争的可能，就是世界大战，党有分裂的可能。预料到了就不要紧。并不是现在有战争，但是有可能。因为世界上有疯子。《莫斯科宣言》讲要防备疯子，有疯子就可能打世界大战。《宣言》说，打起来，他们完蛋，这个见解是我们的。这次会议的决议里也讲到，如果打世界大战，他们就要完蛋了，世界是我们的。党内会出乱子。不过，不正确的力量总归要被批判的，正确的力量总归是要胜利的。这么多省，一半以上的省、市、自治区出了问题，但是并没有推翻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克服下去了。地委、县委、支部，都多多少少出过问题，这是阶级斗争的正常现象。有些是属于好人犯错误，如对多快好省不了解，有些是坏人混入党内来了。

跟什么人走的问题。我讲了又跟又不跟。今天再补充一下。首先是跟什么人？首先是跟人民学习，跟人民走。人民



里头这么多的干劲，人民的多快好省，许多发明创造。一类社，千斤亩、两千斤亩等等；工业方面，突破定额，发明创造。总之，工业、农业、商业、文教、军事各方面，思想、理论方面，有各种人才，他们是人民的。这次会上，许多发言很好，讲了这么多经验，要我讲就讲不出来；你们比我讲得好。这些都是正确反映了人民的東西。总结起来，你说是跟谁呢？尊重唯物论，就要先跟人民。根据这些比较正确、比较完整反映的人民的意志、要求和思想感情，制成比较完备的体系，如这次大会的决议和报告。过去没有这样的经验，这要经过一个过程。经过这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合作化，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六年的大发展，来一个大波折——“反冒进”，1957年变成马鞍的低部，1957年上半年右派进攻，9月三中全会给了我们一个鼓励，全党全国人民比较明确了方向，以后经过全党努力，去冬今春半年大跃进，又经过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成都会议作了总结，作了一大批决议，为这次大会做了准备。南宁会议，搞了一个工作方法60条，还没完成，还要改写，究竟采取什么形式，大体意思出来了，过几个月再改写一下。所以说，先要跟人民，然后人民才跟我们。按照理论和实践相统一这个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首先是理论来源于实践，然后理论又为实践服务，指导实践。开头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有了阶级斗争的实践，才反映到人的头脑中间，反映到先觉者马克思、恩格斯、列棕、斯大林头脑里面，客观规律反映到主观世界才有了理论性的总结，由他们发展为理论，给我们作了模范。如果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理论指导实践，但理论又只能从实践中得来，不能从别的地方得来。老是不

出门，闭上眼睛，离开了实践，不可能制造出理论体系。我们这次大会上路线的制定，不可能由某些人突然想出来的，不管你地位多高、官多大，多么有名，只要半年时间不向人民学习，不接触人民，不去同与人民有联系的干部接触，就什么也不会知道了，就贫乏了。所以我们规定，领导干部每年要出去4个月，去接触人民，接触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与人民有联系的干部，了解他们想些什么，做些什么，经过哪些艰苦，然后总结上来。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个提法很好，是新鲜的提法，反映了人民的干劲。干劲用“鼓足”二字比较好，比“鼓起”好，真理有量的问题。因为干劲早就鼓起来了，问题是足不足，至少要有六七分，最好八九分，十分才足了。干劲各有不同，所以用“鼓足”二字比较好。“鼓足干劲”是个新话。“力争上游”从前也有，不是新话，现在有新意。什么叫力争上游呢？从国内来说，无非就是争四、五、八，争千斤亩，争两千斤亩。鞍山出钢，不增加投资，争出钢的炉数，还要提高质量。在座的饶斌同志讲，长春汽车厂投资不多，生产比设计能增产一倍以上。40条现在不要12年了，有的省在有的项目上3年就可以实现了；有的省说可以1年实现，对外宣传要说2年实现，争取1年实现，留有余地；有些项目今年可以做到，有些明年可以做到，有些第3年可以做到，大体上5年差不多。一年抓4次，检查4次，每年下去4个月。用这样的领导方法，可能在5年内实现40条，这不是上游吗？不是多快吗？但还要好省。

从国外来说，同外国比较，争取7年超过英国，15年超过美国，报纸上还是宣传15年超过英国。这次大会对这

个提法有些修改，把“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改成为“15年或者更短一些时间内超过英国”。这里打了很大的保险系数，实际上7年就可以赶上了，有些项目还不要7年，比如煤炭两三年就可以赶上了。上海和别的地方有些品种已经超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外国人看了可能不大懂，没有个主词，鼓什么人的干劲呢？本来考虑加上一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作为主词。其实不加主词也可以，世界上怪事多得很，就是不要主词，6亿人民就是主词，干劲就是6亿人民的干劲。6亿人民的绝大多数干劲很大，除了章伯钧、章乃器……他们的劲头可能不大。

我讲的是插红旗，辨风向。昨天有同志讲“辨方向”，不是“方向”，是“风向”。任何山上、任何地方都要插旗子，你不插，人家就插了；你不插红旗，他就插白旗。每个生产队都要插一面旗子，看到没有旗子的地方就去插旗子，看到白旗，把它拔下来，插上红旗。灰旗也不行，也要拔下来，他不肯拔，就通过辩论，把它拔下来，插上红旗子。黄旗也不好，黄色工会、黄色小说，等于白旗。

上次讲的“风向”，不是“方向”，风向，即东风还是西风的风。“反冒进”的风，是1956年6月开始的，本来提了多快好省、促进会、40条、十大关系。4月份政治局扩大会议，各省市的同志都来参加的，但是没有明确的决议，这是个缺点，只订了君子协议，大家赞成。成都会议都有明确的会议，这次大会的决议在报上发表。1956年11月开的二中全会，也没有明确的决议，但有个报告。会上，着重谈千方百计，增产节约，用一切方法增产节约，那股风没能挡住。现在坏事变成好事了，使我们有了比较了。南宁会议、成都

会议，详细地讲了这个问题。这次会议有许多很好的发言，少奇同志的报告，国际问题上小平同志的报告，都反映了人民的干劲，批判了邪气。铁托专门泄气，他的干劲是另一方面的干劲；《莫斯科宣言》的干劲，是我们这方面的干劲；南斯拉夫的干劲，是灭无产阶级的志气，长敌人的威风。

今天，我主要讲辨别什么风向。大风最容易知道的，12级台风人人容易辨别，人吹得不舒服，房子吹倒了，树木吹倒了。小风不容易辨别，领导干部更加要注意。宋玉写了篇《风赋》，值得看一看。他说风有两种，一种是贵族之风，一种是平民之风（所谓“大王之风”、“庶人之风”）。风有小风、中风、大风。宋玉是楚国的文学家。他说：“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上囊之口。”有书为证，在《文选》第45卷。昨天晚上我还翻看了一下。他说，风起于青苹的根尖上，“侵淫溪谷”，大概就是成都；“上囊之口”，就是三峡。宋玉是湖北人，大概是指那个地方。“盛怒”就是生大气，风到三峡就大了。风“起于青苹之末”的时候，最难辨别。

讲多了不好，就讲这些。

八大二次会议闭幕之后，5月25日，中共中央接着在北京举行八届五中全会。议程主要是中央的人事变动。林彪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富春、李先念被增选中央书记处书记。杨献珍、王恩茂由候补中央委员依次递补为中央委员。这次全会决定，由中央主办一个党的理论刊物，定名为《红旗》，每半月出版一次，由陈伯达担任总编辑。全会

要求全党都支持《红旗》杂志的工作，各级党委经常供给《红旗》杂志稿件。全会还决定，除在中央成立一个编辑部外，上海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分别成立一个编辑小组，负责征集、初步审定和修改稿件。会后，6月1日，《红旗》杂志在北京创刊。继《红旗》之后，一些省、市、自治区党委也先后办起了理论刊物，如湖北的《七一》、北京的《前线》、湖南的《新湘评论》等。

### 会后立竿见影

作为全面发动“大跃进”的标志，八大二次会议最重要的结果，就是正式通过了成都会议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会后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的社论，就是这样说的：“这次大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确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这条总路线被认为是：“正确地反映了我国人民最大利益和迫切要求，也体现了我们共产党人的革命气概和对于人民群众高度信任。”6月2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力争高速度》还特别指出，总路线的中心是一个“快”字：“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它像一条红线，贯穿在总路线的各个方面。如果不要求高速度，当然没有什么多快好省的问题；那样也就不需要鼓足干劲，也就无所谓力争上游了。因此可以说，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

本来，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一定时期里，用较

快一些的速度发展经济和文化，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问题。问题是速度必须建立在客观条件许可的基础上，必须同现有的资源情况、经济技术实力乃至人口素质相符合，必须同保证质量、降低成本等方面相协调。当年的“总路线”恰恰是离开这些前提，片面强调高速度，强调多与快。总路线及其基本点，虽然客观上反映了当时广大干部和群众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迫切性，适应了党的工作重点由革命向建设的转变，但是，由于这条总路线是在错误地不断批判“反冒进”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在急于求成、升温发热的主观愿望中制定的，因此脱离了不可逾越的客观经济规律，也放弃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调查研究、以点带面等传统工作方法。只鼓励力争上游，不讲稳妥可靠；只讲多快好省，不提综合平衡；多快好省实际上只讲多快，越快越好；以致“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完全忽视了经济建设必须严格遵循的各种客观规律。在基本点的说明中，所谓几个“并举”，也无视其间的界限、条件及相互关系。作为经济建设的方针，“总路线”也是对八大一次会议确定的经济建设方针的彻底否定。

由于“大跃进”、“总路线”的产生于反右派斗争之中，与之伴生，因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相提并论，并驾齐驱，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旗之下，到处“插红旗”，到处“拔白旗”，批判所谓“观潮派”、“秋后算帐派”，于是，经济建设成为一场革命运动，“大跃进”运动迅速地在全国各条战线上展开。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

也就随之在各地、各部门泛滥开来，而且不断升级。

刘少奇报告中说：“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这是苏联当年的经验，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涉及到的问题。应当说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问题。赶英、超美的问题，是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先后提出来的。提出这样的问题，以鼓舞士气，本也无可厚非。问题就在抓住“1天等于20年”马克思这样一句“预言”，真正千方百计、不顾一切地上上下下蛮干起来。中央正式提出来的赶英年限，原来是“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会议期间一跃进，就以“7年超英、15年赶美”为目标，来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了。随后，“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钢铁的产量提高到几千万吨”，这些豪言壮语就出现于《人民日报》社论《力争高速度》中了。

关于建设方针和速度问题，“反冒进”前后，中央领导层中曾有过分歧和争论。经过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就把这些争论归结为政治路线的分歧，“右派利用了反冒进”、“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了”，从而导致“多快好省”与“少慢差费”的硬性分野，前者是促进派、革命派，后者称“观潮派”、“秋后算帐派”。会议要求在每一个党委、机关、工厂、合作社直到部队，都要插上无产阶级的红旗，拔掉资产阶级的白旗。“拔掉”，无疑就含着组织措施。会议期间，河南就拔掉了原第一书记潘复生这面“白旗”，这是摆在公众面前的实例。

毛泽东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的规律，差不多可以说，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他说，不少人认为工业高不可

攀，神秘得很，有很大的迷信，自己不懂工业，可说一窍不通，可是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继成都会议之后，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进一步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列举了古今中外的大量例证，以说明年轻人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可以高于学问多的人，大家不要被名家、权威所吓倒。在正常情况下，这种例证是有积极意义的。可是，真理过头一步，就变成荒谬。毛泽东这样大讲特讲“破除迷信”，却走到了极端，使之成为否定以往积累起来的正确经验、打破正常的规章制度、贬低理论和科学知识以及专家学者作用的依据。

对“破除迷信”口号的曲解和宣传，导致八大二次会议另一个严重后果，为“大跃进”运动中一系列反科学、反规范的举动，开辟了道路。此后，亩产万斤、几万斤、乃至几十万斤之类的“神话”，被一个个制造出来。而人们却不能批评或怀疑这类荒唐行为，否则就会被戴上“右倾保守”等帽子。“破除迷信”变成了破除科学，解放思想变成了胡思乱想，“外行领导内行”变成了瞎指挥。

八大二次会议之后，热度猛升，表现在二五指标的继续抬高。6月中旬，冶金工业部向中央报告，提出钢的新指标，1958年为820万吨，1962年6000万吨。1962年的指标就比二次会议刚通过的指标翻了一番。毛泽东就此于6月22日批示：“只要1962年达到6000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必须力争在钢的产量上1959年达到2500万吨，首先超过英国。”

与此同时，经过国家计委、经委和财政部对各部指标汇报研究后，由李富春向中央提出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要



点》。

《要点》认为：钢铁等几种主要工业产品，有可能不用3年即超过英国，农业发展纲要可能3年基本实现。第二个五年任务是：提前完成农业发展纲要；5年超英国、10年赶美国，为在10年内赶上世界最先进的科技水平打下基础。华北、东北、华东、华中4个协作区将具有完整的工业体系，西南、西北和华南3个协作区都将具有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以1962年生产6000万吨钢为中心来安排，以钢和机械为纲，带动其他指标。再加上第三个五年计划前期建设的钢厂，到1967年钢产量就能够达到1亿吨。以1958年情况来衡量，第二个五年计划每年工业增长45%左右，农业增长21%左右，是完全可能的；主要工业产品的增长速度，还可能更高一些。为了实现第二个五年指标，1959年有决定的意义，必须争取1959年有一个比1958年更大的跃进。例如工业方面，钢超过2000万吨，争取达到2500万吨，超日本和英国；争取粮食超过6000亿斤。如果这样，1962年的指标就有了相当保证。我们应该鼓足更大的干劲，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全面发动“大跃进”的八大二次会议，真是立竿见影，会后仅仅1个月左右，主要指标就翻一番了。

为在思想理论上全面贯彻毛泽东倡导的“大跃进”、“总路线”，6月1日，由陈伯达任总编辑的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出版。发刊词说：“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国内主要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要在这个斗争中取得彻底的胜利，就必须充分地、全面地、深入地开展思

想战线的斗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精神，破除迷信，厚今薄古，打破旧传统，粉碎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从而把中国人民从资产阶级思想的束缚下面完全解放出来。”《红旗》的“任务就是要更高地举起无产阶级在思想界的革命红旗，坚决地同修正主义和一切脱离马克思主义轨道的思潮决裂，《红旗》杂志在自己的工作中，将遵循着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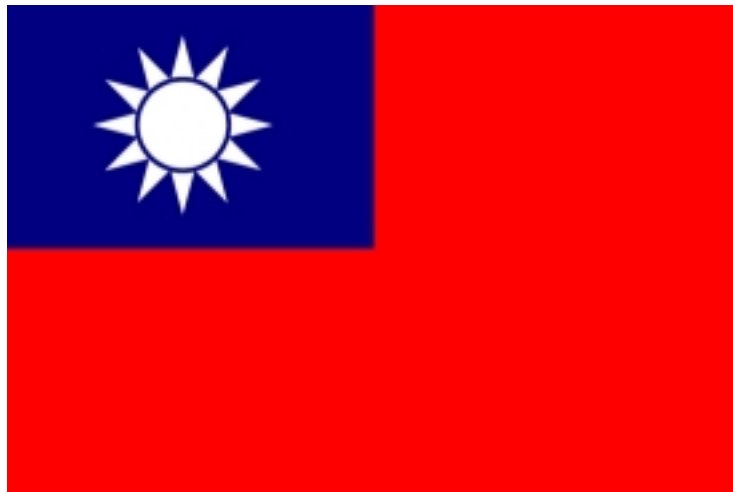
创刊号发表了毛泽东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文章。文中毛泽东预言：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他认为，6亿人口是一个决定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他说：“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争昂扬，意气风发”。文章还谈到中国的“一穷二白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由于毛泽东的大加称赞，对群众中正在普遍推广的大字报，文章给予了这样的评价“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

6月1日，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等7个协作区，都成立协作区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委员会下设办事机构经济计划办公厅，并接受国家计委和经委的指导。中央要求，各协作区应当根据本区域的资源等条件，按照全国统一规划，尽快地分别建立大型的工业骨干和经济中

心，形成若干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从而各地区都极力尽快要成立各自独立的工业体系。

6月2日，中央作出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及其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把成都会议通过的关于工业企业等体制下放进一步具体化。这就是，各个工业部门及部分非工业部门所管理的企业，除了一些重要的、特殊的和试验性质的企业，仍旧归中央继续管理外，约占总数80%的企业，原则上一律下放给地方管理，而且要求在6月15日以前，短短的10来天，就要完成全部下放企业的交接手续。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